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　潮学（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　潮学（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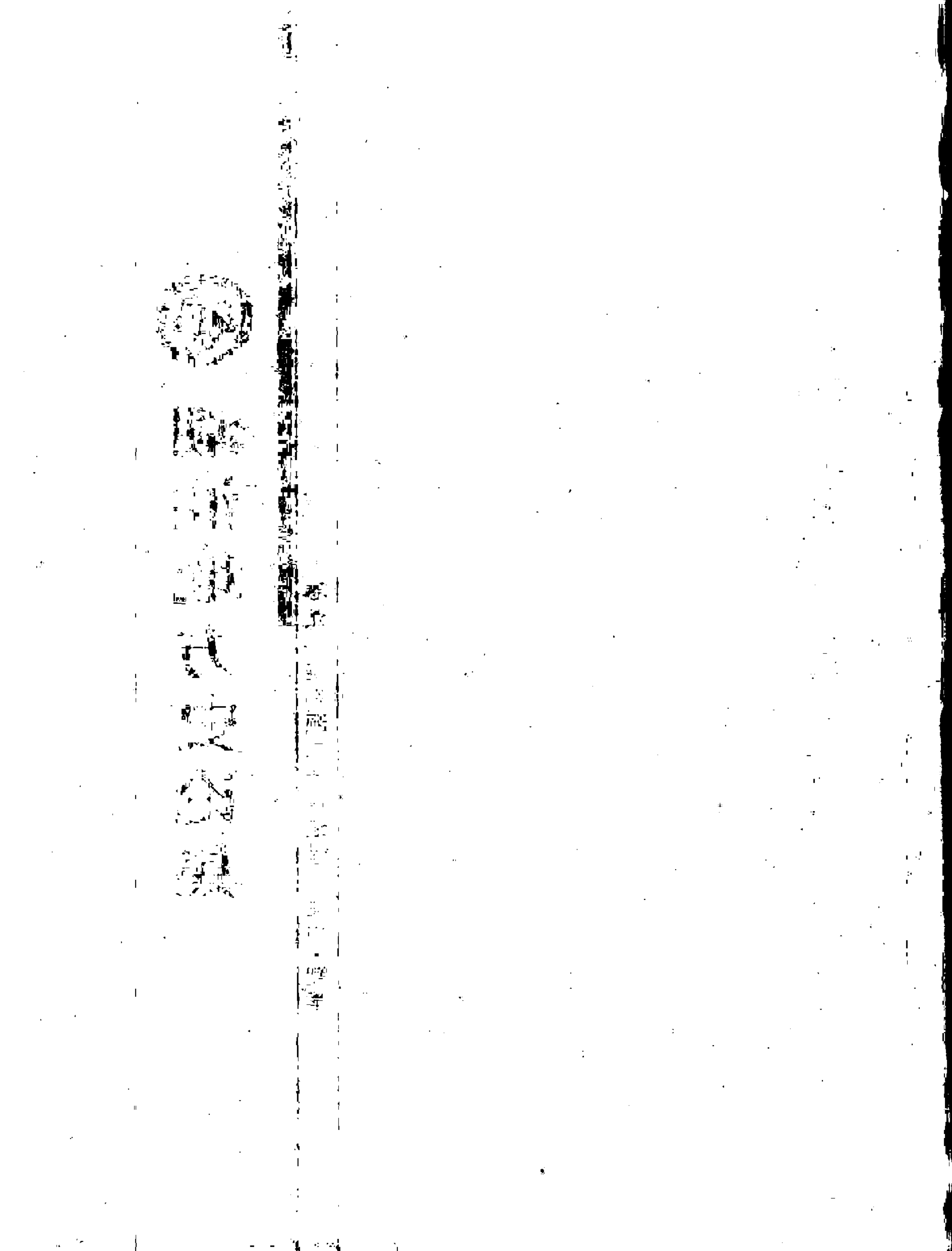
目录



潮汕地方史论集

卷九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



目　录

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

本书略记1941年以来，韩江流域各地对于史前遗物采集经过及所得遗物，作初步报告。前后承英人 N. D. Fraser， T. W. Waddell，美人 W. E. Braisted，及潮安苏悦真先生，澄海王浩真先生，普宁王道文先生，暨两广地质调查所周仁沾、张伯楫、刘毓初、陈君拔诸先生，各以所见或所得石器，惠借采录。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陈教授恺，为鉴定石器质料。潮州修志馆同人吴珏、林德侯、刘陶天、李明睿诸君，于器物之记录，图片之绘制，诸多帮助。而本书初稿，曾荷东友台湾大学人类学教授金关丈夫阅过；附印前，又蒙叶恭绰先生及华西大学教授郑德坤博士校阅一遍；而意大利神父 R. Maglioni 及台大史学系教授国分直一诸先生，于海丰及台湾所得史前遗物，惠允借观。江西饶惠元先生亦以清江大姑山陶片拓本，远道寄示，裨益良多，尤足心感，而潮州修志馆于揭阳黄岐山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所有费用，概承方继仁先生勷助。本书之付刊，复荷饶韬叔先生及述德堂、燕诒堂概助印费，得以问世。诸先生热心文化之诚，至可景佩，谨致谢意，以志不忘。

1950年5月识于香港

一、发见史略

中国新石器时代石斧之采集，莫早于广东雷州之雷斧，盖远在五六世纪时。刘恂《岭表录异》已著其事，故雷州半岛可谓中国石器最先发见地。[①] 光绪间，陈席儒曾于香山拾得石斧[②]，未曾引起一般人注意。至1932年英籍神父Daniel J. Finn. 始于香港舶寮州（Lamma Island）从事先史考古工作。1934年秋，芬神父复于海丰发见史前遗址甚多。其后意籍神父R. Mag Lioni在海丰传教，继续工作，采集更夥，著有《海丰考古学的发见》（*Archaeological Finds in Hoifong*）[③] 一文。1935年W. Schofield于香港大屿山之石壁，发见与舶寮州文化相同之古物，中有石模、石玦等。[④] 1942年春，中山大学教授杨成志等再至海丰探检，为期三十八日，经历十六处遗址，所得石器陶片计万件以上；继寻得汕尾天主教堂麦神父所采集资料，挑取一部分运返坪石，迨坪石失陷，各物多遭遗失。[⑤] 目前广东先史遗物之发见，除香港、海丰外，尚有韩江流域地区，其分布之广，尤值得考古者之注意。

1941年夏，苏悦真于潮安县登塘墟路旁发见碎陶，散布于花生园地面；几经探检，于山地拾得断石箭镞一件及石斧二件，此等遗物后赠与汕头福音医院医生英人裴义礼（N. D. Fraser）。[⑥]

1942年，揭阳真理医院医生美人卜瑞德（William E. Braisted）于揭阳经五经富富美崍采集得石镞，又于崇光岩山上拾获小石锛，后陆续得石镞有孔石斧、石环等多件。

1943年，英人卫戴良（T. W. Waddell）于揭阳南塘山山径拾获小锛三枚，陶片甚多。[⑦]

1946年笔者在汕头市主持潮州修志馆事，曾晤裴义礼君。据云："揭阳西境河婆墟与五经富，及县北黄岐山阴，并有绳纹网纹与双F纹陶片发见。又距河婆八里许地方，因建学校曾掘出铜刀头、矢镞、陶碗等物。澄海城北山

---

① 见章鸿钊：《石雅》，参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

② 据罗原觉君口述。

③ 载香港自然科学杂志（Vol. V，Ⅲ）。

④ 其论文印行于新加坡。

⑤ 顾铁符：《广东海丰先史遗址探检记》上，载《文学》第一期，中山大学出版社。

⑥ 据苏君函告。

⑦ 据卫君口述。

地，曾发见磨光石斧。”裴氏所藏之物，除少数寄藏伦敦，余均于抗战期间遗失。继予闻卜瑞德君所采集者，尚保存完好。乃于1948年2月22日，先派志馆编纂吴珏、林德侯二君前往揭阳，访问卜君。25日，二君赴黄岐山考察，于竺岗岩上山路及战壕侧拾获多量陶片，惟尚未发见石器。4月5日，余亲偕林㳘六（矿学家）、林越（揭阳真理中学校长）、吴珏三君，同往黄岐山，于山坳距表土二公尺处，发见石镞。又于战壕附近，采集石斧、石锛及陶片甚夥。时修志馆为调查潮属各县地质，得方继仁先生慨助调查费用，并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陈恺君莅汕工作。6月16日，余复与陈恺、林德侯二君至崇光岩虎头岭考察，复于山顶拾得石器，并于山上战壕处采集陶片甚多。此消息既发表，国内学术界大加注意，纷纷来函询问。是时王浩真君于饶平黄岗福鼎金村农场掘得石器残片，经余鉴定为石锛。同年11月两广地质调查所派人至潮属一带考察地质，因告以沿途顺便注意采集石器陶片。不久该所工作人员周仁沾、陈君拔，于普宁铁山大棚山、苦肠腹一带，采集得石斧、石锛、石镞、石刀及陶器。同月8日，该所张伯楫、刘毓初二君，亦于丰顺汤坑拾得石斧，又于12日在兴宁水口墟采集石斧、石锛及陶片甚多。是为潮属各地发见史前遗物经过情形。

兹将各县发见遗物时间地址表列于下：

县别	地名	方向里程及高度	器物	发见及时间
潮安	登塘	县西12公里	石斧　石镞	1941（民国三十年）苏悦真
揭阳	富美岽	县西陂头墟附近	石镞	1942（三十一年）美人卜瑞德(William E. Braisted)
	崇光岩	县北6.5公里虎头岭附近	有孔石斧　石镞　石锛　石环	1943（三十二年）前人
	南塘山	县西1.5公里，高37.8公尺	石锛	1943（三十二年）英人卫戴良（T. W. Waddell)
	黄岐山	县东北6公里，高276公尺	石镞　石斧　石锛	1948（三十七年）饶宗颐等
	虎头岭	县北6.5公里，高218.1公尺	石镞　石锛	1948（三十七年）前人
潮阳	澳头		陶片	
普宁	洪山		石斧	1946（三十五年）王茂发
	铁山	县南8.5公里，高462公尺	石斧	1948（三十七年）两广地质调查所周仁沾、陈君拔

续前表

县别	地名	方向里程及高度	器物	发见及时间
	大棚山	县东 6 公里，高 371 公尺	石斧　石镞　石刀	1948（三十七年）前人
	苦肠腹	大棚山西南附近	石斧　石镞　石刀	1948（三十七年）前人
丰顺	汤坑	县南 20.5 公里	石斧	1948（三十七年）两广地质调查所张伯楫、刘毓初
饶平	黄岗（福鼎金）	县东南 36.5 公里	石锛残片	1948（三十七年）王浩真
兴宁	水口墟	墟东南 3 公里高山	石斧　石锛	1948（三十七年）张伯楫、刘毓初
澄海	城北山地		石斧　陶器　钱币形印纹陶片	据英人裴义理（N. D. Fraser）口述

二、遗址

韩江流域史前遗址的分布，可以兴宁、普宁、揭阳三县山地为中心。兹就此三县所发见主要遗址，略记其地形地质与出土情况，其余附带及之。

（一）兴宁

水口　位于兴宁县南，为梅江与兴宁河交叉点。水口墟即建于红色砂岩所成之小冈。红砂岩直接覆盖于火山岩系及变质岩之上，依江流方向，形成一宽约三公里之狭带状。近代之河流冲积层，则沿江之两岸及墟南小河谷间，为狭长之分布。小河循此河谷以南，偏东而行，约二千五百公尺，渐降而成山涧。史前遗址，即在此之东缘，距水口墟三公里，当蓝田至大坑里之中间，高出河床约八十公尺之山巅上。其地海拔为一百六十公尺。遗物所在，散见于一厚不及一公尺，宽广各约廿公尺之山巅的褐色土层中。其北部山势特陡，表土剥蚀最甚，故石器、陶片等物，皆呈露地面，山上陶片遗留极多，不胜拾检。

（二）普宁

大坝后及铁山　自普宁县城南八公里，循省道西南行，至大坝墟后，登山即遗物出露之地。共有两处：一在铁山尖东边韩信点兵山与斩关山间山地北坡，遗址高海拔三百公尺，石器及陶器出见于此（铁山主峰海拔四百六十

二公尺)。一在后岭，当大坝墟和铁山之间，海拔约一百公尺。铁山上部为变质岩，下为花岗岩侵入体，而后岭仅见花岗岩，石器、陶片散布于花岗岩区中。其附近有泛积岩，东起捍塘之北，经铁山到果陇之东，成西北向长条状，其岩石多为细砂岩及页岩。故此间所发见石器之石质，亦以砂岩、页岩为多。

大棚山苦肠腹　遗址在普宁城东，大棚山之南，宝镜园村东二公里，土名苦肠腹，海拔约一百八十公尺。所存遗物最丰，保存亦佳，地质为花岗石，其巨大花岗岩块，经风化后，遗留地表，石器陶片散布其间。①

洪山　在普宁城北西四公里许，海拔二百公尺。洪山地方之山冈有陶片发见。1946 年，贡山乡民王茂发，曾于洪山老坑，拾得石斧一件，系由山坑水冲出者。洪山顶海拔二百四十五公尺，其地层属太古代花岗片麻岩，露头自山顶循东南向下坡，而与花岗岩接触。②

(三) 揭阳

五经富　在揭阳县西陂头墟附近富美崠。有石镞(板岩)发见。其地地质属侏罗纪花岗岩，迤东及南部至灰寨一带，则为侏罗纪煤系，多为黑色板状页岩，中有植物化石。

黄岐山(崇光岩)　虎头岭　黄岐山在揭阳县城东北七公里，高二百七十八公尺。虎头岭在县北五公里许，高二百一十八公尺。两山相接成东西走向长岭，岭西端更西北向，接陈吊岭。岭之南为揭阳城北平原，岭之北为宽谷。全岭悉为花岗岩构成，风化已深。黄岐山半竺岗岩上山路及战壕侧，陶片散见地表。在半山亭上山坳，距表土约二公尺，有石镞发见。自黄岐山至虎头岭一带，前此日军挖掘战壕，蜿蜒数里，于附近采集石器陶片甚夥，当即古文化层所在。1946 年，乡人开辟道路，曾翻动山顶之土层，深者且四至五公尺，故陶片出现地表，几随处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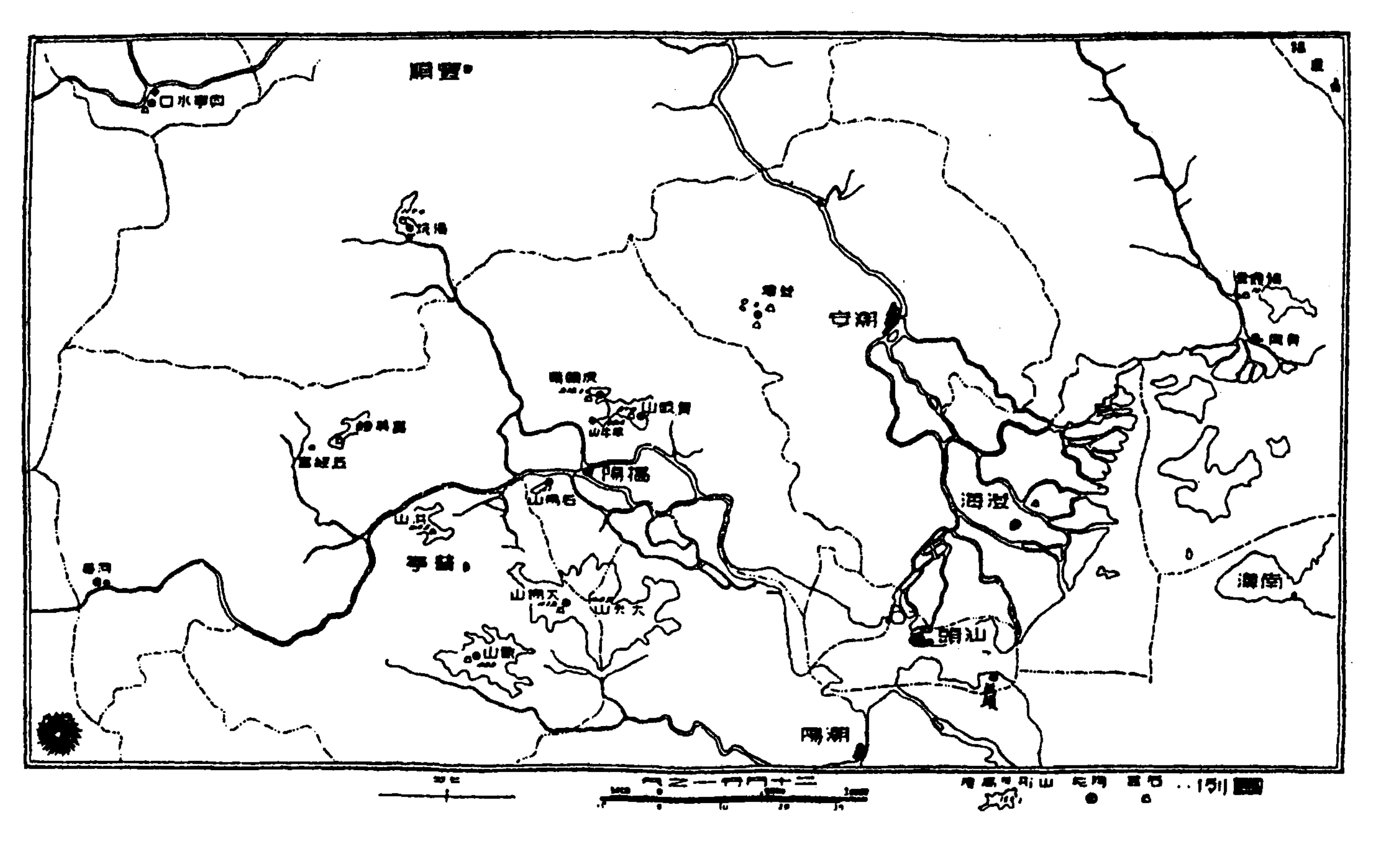
(四) 丰顺

汤坑　地处榕江平原之北角，东南去揭阳县城三十公里。附近岩石以流纹岩为主；惟东南约一千五百公尺处，则为花岗岩。石器即发见于烧水田崠南麓之流纹岩与花岗岩接触带附近，离汤坑东偏一公里，高出现河床八十公尺之山地。

---

① 据刘毓初君调查及周仁沾君口头报告。

② 详拙纂《潮州志》中陈恺撰《地质志》。



图一 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分布图

（五）潮安

登塘　登塘墟在潮安县西十二公里东南，与有名产瓷之枫溪毗接，其地为近代冲积层。西北之白水至飞鹅岭，地质属侏罗纪媒系，其西南部全为花岗岩，石器陶片在距登塘西北半里之山园发见。

（六）饶平

黄岗　石器发见地址，在黄岗福鼎金废村（属饶平县第三区区北乡增多墩村）山坳柑橘研究院农场西南蜜柑园，入土深一公尺。黄岗地质本身为近代冲积层，其东南东北则属侏罗纪花岗岩。

三、石器

（一）石器制作　石质　石器种类

韩江流域石器因由采集得来，未经正式发掘，所得数量较少，故未能把握其特征，以定制作标准。试就其技术而论，包括打制、打磨、磨制三类。而普宁与揭阳两地石器，似可分为二个时期。

1. 普宁之铁山及苦肠腹发见之圆柱形（cylindrical）石器，纯为打制，未经琢磨。海丰亦有此类，于麦神父处见过，盖为一种石槌（Hammer stone）。亦与湖州钱山漾之粗石器相似[①]，此类时代较揭阳为早。

2. 揭阳崇光岩石器，多小型，经精细磨制，其中扁豆状（Lentoid shape）者，或微凸或两面凸（little coves，double-convex）之斧锛皆极精细。与海丰 Pat 区最接近，盖已经过一长时期之进化。黄岐山之扁长式石斧，崇光岩之石锛、石环，普宁苦肠腹之有孔石斧、扁棱式石镞，与海丰几全无少异。

关于石质，揭阳所得石器有基性侵入岩（Basic intrusive）、辉绿岩（Dolerite）、结晶细密火成岩（Felsitic rock）、长英岩（Aplite）、板状页岩（红棕色）（Slaty shale，Reddish brown）、板岩（Slate）、沙质板岩（Sandy slate）、泥板岩（Mudstone）、细沙岩（Sandy Stone）。内以辉绿岩基性侵入岩为最多，板岩次之，结晶火成岩次之，细沙岩均各一片。以上各种岩石，皆揭阳

① 参《吴越文化论丛》慎微之文附图版一、二。

坑内所有。辉绿岩质坚硬，可用作武器，板岩质松，可用作日常器具。兴宁所得石器，石质有脉岩砂岩及基入岩。普宁铁山所得为砂页砂岩。大棚山所得，多为砂岩及板岩。此种岩石普宁境内均有之。

其以结晶细密火成岩为之者，如黄岐山所得磨制小锛及石镞二件，呈赭色斑点，表面光亮。洪山之石斧为辉绿岩，正面为黄土染作黄褐色，有光泽，均极美观。

石器种类，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石镞、石环等，兹分述之：

石斧　潮属各地所得石斧，以扁长式较多。扁平式、厚扁式、短形式、狭长式，间有之。圆柱式最少。有孔者，仅崇光岩大棚山各一件。而普宁洪山所得扁长式梯形斧，长 25.5 公分，为各器中最巨者。

潮安登塘所得石斧，仅二件：一为铲状斧（Shovel-shaped），一为椭圆形斧（Ellipsoidal），原先未见，故不附图。

石锛　潮属所得石器，锛类最多。锛与斧之分别，大致斧之刃对称，锛则扁刃；斧用于劈，锛用于斫，故锛刃较利，形亦齐整。揭阳所得小锛，其细巧者，为錾为凿。大锛类则一面有刃，极铦，一面为背，磨光，较斧类体短，而刃多倾侧。其刃有作半弧形，如状者，亦有作梯形，锋下宽而上狭，如者。《集韵》：“锛，平木器也。”其以铁为之者，亦曰锄，曰镙（俗作铇），用于削平木上斧迹。[1]

石凿　斧锛之小者，用于钻削。《通俗文》：“石凿曰錾。”《说文》：“铣，一曰小凿。”揭阳所得小锛，极细，考疑即此类（见石器图版（二）黄岐山图版及石器图版（一）崇光岩图版）。海丰有矩形小斧，据麦神父云：“有微矩及纯矩二种。纯矩者较少，除有几枚短小之斧，或用以作货币者外，恐以之作细木工。各式细小石斧，皆适宜于木器之铇工凿工雕工。”[2] 揭阳所见精巧石凿，如崇光岩图，纯为矩形，其用途或如麦氏所言。

石刀　崇光岩所得者，为粗刃式，普宁大棚所得残片，则皆长方式，刃磨光作椭圆形。

石镞　揭阳、普宁所得，大别有二类：一为扁棱式（见石器图版（一）富美崃图版），一为片状式，以板岩为之，质不甚坚，薄扁无棱（见石器图版（一）虎头岭图版）。

① 见《广韵》。

② 见原书，221 页。

石环 崇光岩有三件，石质细密，黝润如玉，盖装饰品。

古越族使用之石器，分布于浙江、福建、台湾者，即东南亚细亚系，其特征为有肩式、有段式、靴形式。

有肩式 为环绕太平洋地区所习见者。广东如香港、海丰均有之，韩江流域所得石器不多，仅于水口见一件，为钝角形之肩斧。① 或谓之曰“钺”。② 盖用于切割。麦神父于海丰所得之 Shouldered lentoid，shouldered shovel-shaped 及 unguiform Series 之带肩者，均属此类。裴义礼语余：五经富曾得爪状式（unguiform）斧，与麦神父所举海丰石器第十五种型相类，其柄作半圆爪形（half-circular nail）盖亦属于肩斧一类。

有段式 沿海各地，如浙江、台湾均有之。福建武平最多，以北有一沟，或称有沟石斧（如《良渚图版》14，2a，2b）。亦南洋各岛所盛行者，此类揭阳黄岐山拾得一件，背呈沟状，惟不甚显著。

靴形式（Haches piediformes） 杭州、台湾均习见，为古越族文化特征，国外分布，远及印度支那、爪哇等地。为农耕除草之用。③ 揭阳黄岐山得一件，亦属类似靴形斧。

韩江流域石器采集数量不多，故上述三项石器不多见，如再经发掘，相信必有陆续发见。至北方系之磨制有孔石镞、石戈、半月形及有孔石刀均未见。

综上论之，韩江流域石器，自属于南方系文化，至北方系文化成分则不甚显著。据麦神父分析海丰各地石器结果，认为最初使用扁豆状斧，继替以有肩爪形斧，最后演进为矩形斧。潮属各地有肩爪形斧尚未多见，是否如麦氏所言，犹有待研究。

关于使用此种器物之人类人居广东的年代，据裴义礼意见谓可能在公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④，此种推测，此时尚难证实。又据裴氏云，曾发见铸造空前铜斧之石模⑤，查香港大屿山石壁所得石模亦不少，恐同一范型。又云曾发见构成 Fibula 型之石模，如瑞士湖上村 Lake Villages 所发见者，并记于

① 参日人国分直一《有肩石斧与有段石斧》一文。

② 见施昕更著《良渚图版》15，16。

③ 东友金关丈夫、国分直一有专文详论。

④ 见裴著 *Archeology in Eastern Kwangtung*。

⑤ 裴氏 *Stone Moulds For Casting Hollow Bronzc Adzcs*。

此[1]，以未寓目，故缺不论。

(二) 各地石器记录

揭　阳

崇光岩石器

有孔石斧（石器图版（一）崇 A）　（A）全长 11.5 公分，上部断口阔 4.8 公分，下部尖端阔 2 公分，厚 1.3 公分，圆孔距顶端 3.4 公分。(B) 淡灰褐色。（C）扁长式，磨制，当孔处已断为两片，边缘表面多剥蚀。（D）板岩。

石斧　（A）长 3.8 公分，厚 0.5 公分，平面阔 2.5 公分，锋口 0.5 公分。(B) 绿色。(C) 矩形式，磨制，腹微凸，上端残蚀，带一石脉。(D) 辉绿岩。

石斧断片　（A）残片全长 0.45 公分，上部断口阔 3.5 公分，下端断口处阔 2 公分，厚 0.5 公分。(B) 淡灰褐色。(C) 磨制，面平边削，上部残断。(D) 砂质板岩。

石凿（图版（一）崇 H）　（A）长 4.6 公分，厚 0.6 公分，阔 2.2 公分。(B) 淡灰绿色。(C) 矩形式，细磨。(D) 辉绿岩。

又一件　（A）轴心长 2.5 公分，上端阔 1.4 公分，锋口阔 2 公分，厚 0.5 公分。(B) 淡灰褐色。(C) 矩形式，近刃处稍宽，细磨光滑，似是小凿。(D) 板岩。

石锛（图版（一）崇 C）　（A）轴心长 6.7 公分，腰厚 1.5 公分，上端阔 3.2 公分。锋口阔 4.1 公分。（B）绿色。（C）扁方式，磨制。（D）辉绿岩。

又一件　（A）轴心长 6.7 公分，腰厚 1.5 公分，阔 4.8 公分。（B）绿色。(C) 矩形式，磨制，刃甚锐，上端稍残。正面下左端为自然蚀，有沟。(D) 辉绿岩。

又一件　（A）长 3.5 公分，平面阔 3.4 公分，厚 0.6 公分，锋口 0.5 公分。(B) 绿色。(C) 扁长式，磨制，正面下左端为自然蚀，有沟。(D) 辉绿岩。

又一件　（A）长 3.8 公分，平面阔 2.2 公分，厚 0.5 公分，锋口 0.6 公

[1] 亦见上揭裴氏文。

分。(B) 淡灰白色。(C) 扁长式，腹微凸，细磨。(D) 辉绿岩。

又一件 (A) 全长 4.5 公分，平面阔 2 公分，厚 0.6 公分，锋口 0.6 公分。(B) 灰白色。(C) 长方式，精制上端倾右稍残，似锛。(D) 辉绿岩。

又一件 (A) 轴心长 3.7 公分，腰厚 1 公分，上端阔 2.7 公分，锋口阔 3.5 公分。(B)·灰白色。(C) 刃作半弧形薄锐，磨光，精制。(D) 辉绿岩。

又一件 (A) 轴心长 5.2 公分，上端厚 2 公分，腰阔 3.5 公分，锋口阔 3 公分。(B) 绿色。(C) 方柱式磨制，上端略厚，左正面绿有凹纹，极规则化，锋口稍残。(D) 辉绿岩。

石刀（图版（一）崇 B） (A) 轴心长 8.5 公分，平面阔 3.6 六公分，按柄处 2 公分，尖端锐角 1 公分，上部厚 10.7 公分。(B) 灰褐色。(C) 粗刃式，锋口及背均剥蚀。(D) 砂质板岩。

石镞（图版（一）崇 F） (A) 平面阔 2.5 公分，轴心长 4.4 公分，最厚处 0.2 公分。(B) 淡灰褐色。(C) 扁平式无棱，磨光极薄。(D) 板岩。

又一件（图版（一）崇 G） (A) 轴心长 4.4 公分，上端阔 2.6 公分，厚 0.4 公分。(B) 浅灰黄色。(C) 扁平式，磨光无棱，尖端较锐，按杆处残缺。(D) 板岩。

石环断片（图版（一）崇 D） 一、(A) 直径 3.2 公分，断径 3 公分。(B) 灰色。(C) 细磨，内面齿端圆滑无棱。(D) 板岩。一、(A) 长 3.5 公分，厚 0.5 公分，高 1.4 公分。(B) 深灰蓝色。(C) 扁条状，细磨极精，上内缘圆，外缘有棱。(D) 泥板岩。一、(A) 长 2.7 公分，厚 0.4 公分。(B) 深灰色。(C) 扁条状，下面平，两侧磨光。(D) 板岩。

石圆形器（图版（一）崇 E） (A) 全器直径 8 公分，厚 1 公分，断为两片。(B) 淡灰褐色。(C) 磨制两片异色，似原物断折后埋土中，上下面倒置，故合成原状时颜色恰相反。(D) 砂质板岩。

上器藏美人卜瑞德先生处。

虎头岭石器

石斧残片（图版（一）虎 B） (A) 断口最厚处 1.6 公分，锋口阔 5.4 公分。(B) 灰绿色。(C) 似是厚扁式石斧残片。(D) 辉绿岩。

石镞断片（图版（一）虎 A） (A) 轴心长 2.8 公分，厚口厚 0.6 公分，阔 2.6 公分。(B) 深灰色。(C) 方状式。(D) 板岩。

上器原藏潮州修志馆。

富美岽石器

石锛（图版（一）富）　（A）轴心长 3.5 公分，平面阔 1.5 公分，锋口 2.2 公分。（B）灰绿色。（C）扁棱式。（D）板岩。

上器藏卜瑞德处。

黄岐山石器

石斧（图版（二）黄 A）　（A）全长 9.7 公分，腹阔 4.6 公分，上端阔 4 公分，下端阔 4.7 公分，腹厚 2 公分。（B）灰绿色，正面低洼处，呈深褐色，带石英脉。（C）扁长式，正面后面腹部均稍凸，左右两缘斜椭，正面上右巷端至左腹缘，有石英脉凸出石面 0.2 公分，侵入后面之脉长 8 公分，阔 0.3 公分。（D）基性侵入岩。

又一件（图版（二）黄 C）　（A）全长 6.7 公分，上端阔 3 公分，下端阔 3.6 公分，上端厚 0.8 公分，腹厚 1.2 公分。（B）浅灰色，正面粗洼处呈赤褐色。（C）扁长式，左右缘斜椭，腹处略凸。（D）细砂岩。

石凿（图版（二）黄 E）　（A）全长 4 公分，上端阔 2.2 公分，厚 0.7 公分，下端锋口 2.5 公分，腹厚 1.1 公分。（B）灰绿色。（C）长方式，正面平，腹略凸，为锛式小凿。（D）基性侵入岩。

石锛（图版（二）黄 I）　（A）正面长 4.3 公分，腹阔 3.2 公分，后面长 5.2 公分，腹阔 3.6 公分，锋口高 1.3 公分，阔 3.9 公分，上端厚 0.9 公分，右缘腹厚 1 公分。（B）灰绿色。（C）扁长式磨制。（D）基性侵入岩。

又一件（图版（二）黄 F）　（A）正面长 3 公分，后面长至锋口 4 公分，上端阔 2.5 公分，锋口阔 3.1 公分，腹厚 1 公分。（B）浅灰白色。（C）正面边缘刓圆，左角洼蚀，口作弧形，极薄锐，背面平整，细磨精制，土花斑斓，朱渥夺目。（D）结晶细密火成岩。

又一件（图版（二）黄 D）　（A）正面长 10.4 公分，阔 4.3 公分，上端厚 1.5 公分，后面长 11 公分，阔 5.8 公分，腹端厚 1.9 公分，锋口长 1 公分。（B）灰绿色。（C）短形式，腰稍凸，刃处残缺，似未经细磨。（D）基性侵入岩。

小石锛（图版（二）黄 H）　（A）全长 2.9 公分，上端阔 1.9 公分，下端 2.1 公分。（B）浅灰色。（C）薄方式，正面右端洼蚀，左端切直，锋颇钝。左右上三缘均平滑，殆铣錾之类。（D）长英岩。

石镞（图版（二）黄 G）　（A）全长右缘 3.3 公分，左缘 2.5 公分，上端缺口处阔 2 公分，直径 0.5 公分。（B）原浅灰色，经土侵蚀，呈赤赭色。（C）扁棱式，磨光，按杆处残缺（此器在黄岐山半山亭至塔上路旁，距表土二公尺处发见）。（D）结晶细密火成岩。

有段石斧　（A）全长 8.1 公分，阔 5.3 公分，厚 2 公分。（B）红棕色。（C）矩形式，背面左及上下三缘均凸凹不平，半打半磨，只右缘及正面局部磨光，中间有洼凹，呈段状。

石器断片　（A）正面长 2.6 公分，阔 1.2 公分，后面长 1.9 公分，阔 1.2 公分，上端厚 1 公分。（B）灰绿色。（C）圆柱形，腰微凸，上部左端削蚀，似是小錾。（D）基性侵入岩。

靴形石斧（图版（二）黄 B）　（A）轴心长 9.2 公分，下部阔 4.2 公分，下部背厚 1.2 公分，磨制，发见于黄岐山竺岗岩坑中。笔者曾持示日人金关丈夫教授，据谓系未成形靴形斧。（按：《良渚图版》16，2a 形略近此类，据金关等著《台湾先史时代靴形石斧考》一文所定，应属 B 型，参阅该文。）（B）辉绿岩带沙质。

上器藏潮州修志馆。

丰顺

汤坑石器

石斧（图版（二）汤）　（A）全长 10.4 公分，腹 1.7 公分，腹阔 2.7 公分，上端阔 1.8 公分，刃阔 2.7 公分。（B）深褐色。（C）狭长式，中刃两翼略对称，顶端稍斜，作拗曲状，两侧磨尖。（D）板岩。

上器藏两广地质调查所。

饶平

黄岗石器

石锛残片（见图版（二）饶平黄岗）　（A）左边长 5.5 公分，腰厚 4.4

公分，锋口阔 4.7 公分，厚 1.7 公分。（B）灰色。（C）磨制，刃处完整。（D）辉绿岩。

上器藏潮州修志馆。

普宁

洪山石器

石斧（图版（三）洪）　（A）轴心长 25.5 公分，腰阔 2.9 公分，上端厚 2 公分，上阔 5.8 公分，锋口阔 7.2 公分。（B）原绿色，正面为黄土染成黄褐色。（C）器极完整，上端右角自然蚀，两面磨光，扁长式，似梯形，侧面作圆凸势，向刃处稍锐。（D）辉绿岩。

上器由坑水冲出地面，藏王道文先生处。

铁山石器

石斧（图版（三）铁 A）　（A）全长 13 公分，腹厚 2.5 公分，腹阔 5 公分，上端阔 3 公分，下端阔 5 公分。（B）正面深褐色，背灰黄色。（C）上狭下宽，近腰低陷，锋处成圆状，全体除刃处加工外，均未经琢磨，背面风化特甚。（D）砂页岩。

又一件（图版（三）铁 B）　（A）全长 11.5 公分，腹厚 2 公分，腹阔 4.5 公分，上端阔 3.5 公分，下端阔 4 公分。（B）紫褐色杂铁锈色。（C）矩形式，腹近刃处稍丰，刃处斜削，略加工，他处凹凸不平，均未经琢磨。（D）砂岩。

大棚山苦肠腹石器

石斧（图版（三）苦 A）　（A）全长 12.5 公分，腹厚 2.8 公分，腹阔 4.7 公分，上端阔 3.7 公分，下端阔 5 公分。（B）深褐色。（C）圆柱式，腹特丰，脊凸而缘削，背面大体磨平，刃甚短促。（D）板岩。

又一件（图版（三）苦 D）　（A）全长 7.2 公分，腹厚 1.1 公分，腹阔 4.3 公分，上端阔 3.7 公分，下端阔 4 公分。（B）绿色有紫褐土蚀斑点。（C）扁平式，磨制。（D）板岩。

又一件（图版（三）苦 C）　（A）全长 8.5 公分，腹厚 2.3 公分，腹阔

3.5 公分，上端阔 2.5 公分，下端阔 3.3 公分。（B）铁锈色。（C）方柱式，打磨，侧刃土蚀颇深。（D）砂岩。

又一件（图版（三）苦 B）　（A）全长 6.8 公分，腹厚 1.2 公分，腹阔 3.8 公分，上端阔 3 公分，下端阔 4 公分。（B）黛色。（C）扁平式，上杀下丰，刃甚锐，经细磨，色光黝。表面呈半卵纹，似未出时周缘掩于土中，其暴露部分受风化作用后，稍为低蚀；质坚处间现石纹数条。（D）板岩。

有孔石斧断片（图版（三）苦 F）　（A）长至孔口 3.2 公分，腹厚 1.4 公分，孔阔直径 1.2 公分。（B）灰蓝色，正面朱斑，璨烂可爱，磨光。（C）斧孔内外及折处铁锉甚利。（D）板岩。

石镞（图版（三）苦 E）　（A）全长 5 公分，中厚 5 公厘，阔 1.2 公分。（B）灰色。（C）扁棱式，与海丰出土者同。（D）板岩。

石刀断片（图版（三）苦 G）　（A）刃至背 3.5 公分，背厚 1.7 公分，腹厚 1.6 公分。（B）赤色，背现褐斑。（C）长方形，背厚锋薄，前锐后钝，刃经磨光成椭圆形，近柄处崩缺。（D）砂岩。

一、（图版（三）苦 I）　（A）刃至背长 5 公分，背厚 1 公分，腹厚 8 公分。（B）赤色背有黑斑。（C）长方形式，体平扁背厚锋薄，刃处磨光成椭圆形，近柄处崩缺。（D）砂岩。

一、（图版（三）苦 H）　（A）刃至背 5 公分，背厚 1 公分，腹厚 8 公分。（B）赭黄色，刃背现紫斑。（C）亦长方形式，体平扁背厚，锋薄刃崩缺。（D）砂岩。

兴宁

水口石器

石斧（图版（三）水 A）　（A）全长 13 公分，上端阔 5 公分，刃阔 6 公分，腹厚 2.5 公分。（B）背赤褐色，腹黑褐色。（C）矩形式，打制全未磨，偏刃对称。（D）脉岩。

又一件（图版（三）水 C）　（A）全长 10 公分，上端阔 2.7 公分，刃阔 3.8 公分，厚 1.5 公分。（B）背深灰色，腹灰褐色。（C）狭长矩形式，对称，未经细磨凸凹不平。（D）侵入岩。

石锛（图版（三）水 B）　（A）全长 8.5 公分，上端阔 4.5 公分，刃阔 5.7 公分，腹厚 2.2 公分。（B）背灰绿色，腹灰色。（C）偏刃似锛，扁平式，两面稍凸，打磨上端残蚀。（D）砂岩。

有肩石斧（图版（三）水D）　（A）全长8公分，柄阔2.2公分，刃阔5公分，厚1.5公分。（B）浅灰色。（C）与良渚所得者同，上具柄，下刃作钝角形，面经细磨。或谓为钺，此为越族使用器物，韩江流域仅见此件。（D）砂岩。

图形石断片（图版（三）水F）　（A）直径4公分，厚1公分。（B）浅灰色。（C）边缘呈螺旋纹，似经车制，用途未明。（D）变质岩。

石断片（图版（三）水E）　（A）厚2公分。（B）浅灰色。（C）上下右三面均为圆钬孔，每孔直径约7.3公分，其好之边缘均呈螺旋形纹亦似经轮制。（D）变质岩。

上自普宁铁山以下至兴宁水口各器，均藏两广地质调整所。

四、陶器及陶片

（一）陶器

本书所记潮属各地出土陶器，惟普宁苦肠腹所得有完器一件，为壶类。高6.5公分，口径4公分，厚4公厘，腹凸直径7.3公分，底径6公分，灰赭色，细泥质，轮制，山字纹，腹带凸饰一道（见陶片图版（五），1）。与福建武平甚相似。①

残罐一件，似簋，肩至底高6.5公分，腹径10.2公分，底径7.9公分，底厚2公厘，灰色，粗泥质，含砂，斜条纹，腹下呈凸饰一道（陶片图版（五），2）。

残罐形器，口直径18公分，口边唇阔4公分，厚6公厘，灰褐色，篮纹。

又小残罐形器，口直径7公分，厚极薄3公厘，口高2公分，本浅灰色为黄土侵蚀，呈浅红色，细泥质，绳纹。

（二）陶片简述

颜色　兹所采集陶片，以灰陶为多。水口、汤坑，大部分为深灰色；铁山、洪山顶多半灰色、灰蓝色，苦肠腹多灰色、灰褐色；黄岐山虎头岭则灰

① 见 *Third Congress of Prehistorians*, Singapore, 1938. Plactc XIV。

褐、灰蓝、灰黑为多。虎头岭有银白色，涂薄釉，与灰青色敷蓝色薄釉者。

黑色陶多灰黑，或与他色内外相关，其原质细腻表里有光泽如蛋壳陶（egg shell pottery）者，绝无之。红色陶，为砖红色，或呈紫褐色，间夹黄色，盖受强力氧化所致。而未见有彩绘如仰韶期之制作者。

形制　五经富曾发见完整陶器，多为锅罐（pot），与海丰所见者同。苦肠腹所得亦为壶类及罐形器。黄岐山虎头岭残碎陶片口肩，有瓶碗罐形器及圈足类器。惟三足鬲及陶豆（如良渚所见者），尚未发现。制法则手制多而轮制较少。

质料　粗泥质、细泥质均有之。黑色陶红色陶含砂极多。砂粒大者至四公厘。①

纹饰　韩江流域古陶片之纹饰，纯为拍印。其属彩绘（painted）者绝无，刻划（incised）者亦极鲜见。兹略记其花纹式样如下：

方格纹——即网状纹。可分粗方格、细方格、正方格、斜方格诸种。各地皆有，最为普遍，与福建、海丰及南洋群岛均相类。其精细方格者，可名麻布纹，盖仿制麻布式样。兴宁水口、揭阳黄岐山崇光岩均有之（崇光岩平底罐形器，麻布纹间叙方格纹，深蓝色。见陶片图版（三）崇光岩1）。其复式方格纹，即麦神父所谓双网纹（double net），普宁大坝山及海丰均发见。

条纹——可分直条纹、横条纹、斜条纹、交叉条纹等。其特异者，有交错条纹如栅状者，虎头岭曾发见。尚有间条纹，即竖条纹而间以若干凸出横条纹箍饰者，铁山有之（见陶片图版（五）之铁山陶片），或间以横线条，水口有之（见陶片图版（三）之水口陶片5），铁山有之（见同上铁山陶片），此类非如齐家坪之为凸出线条，乃由折印而成者。

绳纹——可分为竖绳纹、横绳纹、粗绳纹、细绳纹等。揭阳石马山，又有波浪式绳纹（见陶片图版（三）石马山陶片2），似用粗绳或纤维质物扎于木头，当陶泥未干时重压于其表面而成。

簟纹——此类纹式其线条大抵作巜或𠂇形，如晒谷之笪纹。安特生曾用席印纹之名，或称篮纹，或谓篚筐纹。今人每与绳纹混，兹定名曰簟纹，因簟亦竹席之义。北方系陶器有以竹编织物压印而成者，与此类仿佛。惟此似先制成范，再加印于器物之上，有粗细及错综各式。错综簟纹，如苦肠腹图（陶片图版（六）苦肠腹陶片5、8），或纵斜线条交错，或间以横篚状条饰

① 见黄岐山陶片概述。

（同上苦图 9）。水口亦有之，式样甚为复杂。

山字纹（人字纹）——此类与篱纹略近，西人谓为 chevron 花纹，往往交错作形者。江南奄城金山常见之，福建武平亦习见，呈锐角状（Acute angles），林惠祥谓为武平文化之代表型态。亦由拍印而成，可分无规则及有规则二种。前者线条凌乱，后者较为齐整。虎头岭所见灰黑色陶几全属此类，水口亦有（见陶片图版（三）水口陶片 3）。

叶脉状纹——如叶脉状者，西人或谓之鲱骨状纹（herringbone）、树桠纹（branch），揭阳犀牛山（陶片图版（三））普宁铁山有之（陶片图版（五）铁山陶片 4），海丰及台湾均常见。

雷纹——此类初呈圜形，虎头岭铁山苦肠腹（陶片图版（六）苦肠腹 4）及水口均有之。细分可得数种：有若干复式圜状排列相联接者（陶片图版（三）虎头岭图 34 与江西清江全同），有圜状中间以绳纹者（陶片图版（五）铁山图 1），有两圜状纹相交对称如 S 形者（陶片图版（六）苦图 1），与铜器钩连雷纹颇相似。有若干独立圜状纹之间，以方形线条联系成方格状，而方格中又间以半弧形线条者（陶片图版（三）水口图 2）。有圜状似钱币形者（陶片图版（五）铁山图 2）。圆雷纹几何化，遂成为方角雷纹如回字，此类花纹浙江江西俱常见，苦肠腹及水口均有之。有线条呈方形如织席状者（见苦肠腹图 4 及水口图 1），或作复式圜状而间以树桠状条纹者（如苦肠腹图 2）。此种雷纹，形制与铜器所见纹饰多同。①

粒状纹——崇光岩所得陶片，有呈凸起碎圆点类苦瓜皮者，黄灰蓝色均有。西阴村陶片有具凸饰粒状，与此略近（见《西阴村史前遗存图版》4 第一版）。有一种带菱形方格内具凸起圆点（见陶片图版（三）崇光岩 2）。海丰亦有之，即麦神父所谓（diaper type）者，此类纹饰与铜器上雷乳纹无甚异。

V 字纹——揭阳黄岐山虎头岭俱有之。具凸起线条刻划相向斜纹。潮属所见陶片，皆由拍印而成，只此类花纹出于刻成者（见陶片图版（四）黄岐山图 12，陶片图版（二）虎头岭图 27）。海丰有一种精致刻纹，据麦神父观察似用蚬壳刻划而成者，此间未见。

韩江流域各地先史遗址有石器出土者，必见陶片。其中最值得注意者，为揭阳黄岐山虎头岭一带。兹就笔者检拾所得，详为记录，以资参证。并附崇光岩与揭阳城西石马山陶片。其余但揭花纹之特异者，附图于后，不遑详

① 《梦溪笔谈》所谓云雷之象。

细列举。

（三）黄岐山虎头岭陶片概述

黄岐山虎头岭两处出土之陶器，尚无获得完整者，其器物原形，殊难详言。兹就笔者采集所得，依其颜色分为灰陶、黑陶、红陶三类。其花纹概为拍印而成，稍加类列，再由残片测度其形制，记其大要。灰陶所得最多，兹列为首。

黄岐山陶片

（1）灰陶

①方格纹　皆作网形，其精细者，宛似麻布花纹。兹依其纹理分别述之：

（A）粗方格纹——灰褐色，方格较大，粗泥质，含砂。

（B）斜方格纹——形制有五件可推测者，多属于罐形器直唇平肩者二件：（a）口缺连肩处有凹带一道，高 4 公厘浅灰色，内有微凹箍一道。（b）灰色，口浅而平，高 1.2 公分，厚 4 公厘，与腹略成垂直，腹部较薄，约 2 公厘，又弯唇宽肩者三件：灰蓝色、轮制、口内有轮纹一道，细泥质，口高如瓶形。

（C）细方格纹——颜色有浅灰、灰褐、灰蓝、灰绿、赭等色。其形制可推测者四片，余皆腹部片。

平底类二：底下有纹，粗泥质。

口部类二：（a）弯唇带肩，瓶形，细泥质。（b）阔口钵形器，口有凸起边缘一道，粗泥质。

（D）正方格纹——颜色有灰蓝、灰褐、淡灰、灰黑等色，形制可考者，腹部片最多，其一花纹如陶片图版（四）黄岐山 1。

口部带肩片三件。其一口至肩高 3.7 公分，口作瓶形，轮制，细泥质含砂。其一口与肩间有绳箍，粗沙质，口内有轮纹。

平肩片四件，分二种：（a）口边缘凸起者。（b）口边缘凹落者，纹理交错，口高 1 公分（同上，黄岐山 2）。

肩部一片，灰色，粗泥质，肩有凸箍一道（同上，黄岐山 3）。

平肩一片，底下有纹，粗泥质，浅蓝色。

另一种系细沙质，极坚硬，其中有一花纹，亦属拍印而成，但于交错处可窥见拍印时衔接情形，厚三公厘（同上，黄岐山 4）。

又有极薄者厚仅二公厘。

（E）麻布纹——有粗细二种：（a）粗纹，腹部片二件，灰白色与灰色各一，细泥质（同上，黄岐山 5）。（b）细纹一件，有口，外深蓝色，内棕色，

极精细，年代似较近，阔口钵类，口高 2.2 公分（同上，黄岐山 6）。

②条纹

（A）直条纹——仅一件，肩部片，灰色，粗泥质（同上，黄岐山 7）。

（B）交叉和纹——二件，腹部片，灰蓝色，一粗泥质，其一细泥质坚硬（同上，黄岐山 8）。

③绳纹　仅一件，腹部片，淡黄色，粗泥质，含砂甚多（同上，黄岐山 9）。

④篮纹　外边灰黑色，内红者三片，皆腹片，厚 7 公厘，肉为紫褐色。其中一肩部片有凸箍，极薄，厚度仅 1 公厘至 2 公厘，细泥质（同上，黄岐山 10），与虎头岭之灰蓝色带凸箍之陶片，形制纹理相同。

⑤山字纹　灰绿色，与虎头岭相同，腹部片多，色近赤。中含砂粒，内外表皮系细泥质，间有涂上灰绿色薄釉一层，其中有具绳箍两道者一片，最可注意（同上，黄岐山 11）。

⑥V 字纹　一片口部连肩，口部边缘有凹，厚 3 公厘，肩上刻相同斜纹，中作 V 字形，灰色，粗泥质（同上，黄岐山 12）。

（2）黑陶

残片大都质薄，厚度最薄者 2 公厘，最厚者 8 公厘，含砂成分极多，砂粒大者至 4 公厘（与高井台子黑陶含砂情形相似，往往因沙脱落现出空隙。此种系用天然泥质，即田中黑土，非人工配和者。见吴金鼎：《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

（A）颜色

（a）纯黑：表里全黑，仅二片，似经风化，线条变银灰，略见光亮。

（b）间黑：此色较多，有黑灰及赭黑，表里均深黑，其他有外黑内灰，内黑外灰者。又有一片半体为黑，半为银灰色，似风化使然。

（B）形制

（a）尖足式脚（是否陶鬲未由断定）。含粗砂，外浅灰，内深黑，高 3 公分，底尖阔 2.5 公分，厚 5 公厘。

（b）口部一片（似是罐形器），高 5 公分，近肩处厚 1 公分，至口处愈薄，仅 1 公厘，含砂，外灰内黑。

（C）花纹——无花纹者多，或经风化过深，难以辨别，其可辨认者，有方格网形纹，或斜方格纹。

（3）红陶：此类多属残片

（A）颜色

（a）砖红色一片，细泥质，无杂砂，有绳纹。

（b）外浅黄内带灰色者三片。

（c）余片为粉红色，含有粗砂粒。

（B）形制——腹片居多，其中口部带肩者四片，口部不带肩者三片。其一宽肩敛口，细泥质轮制，黄色，有网纹。颈高 4.7 公分，近肩厚 1.2 公分，近口处厚 3 公厘。

又一片颈带肩，轮制，网纹，内灰色，含细砂。

又一片颈带肩，赤色，轮制，粗方格纹，含细砂，颈高 4 公厘，厚 1 公分。

又圈足类一件，喇叭口式，细泥质，含砂少许，黄色，轮制颈厚 2 公分，口端厚 1 公分。

（C）花纹——有密网纹、斜方格纹、粗网纹、细方格纹及绳纹多种，无彩绘，与仰韶期之红陶绝不类。

此外有陶片五片含砂粒甚夥。浅灰色，受风化极深，似是砂陶。

虎头岭陶片

（1）灰陶

（A）粗方格纹——灰蓝色者一片，轮制，细泥质，含粗砂，砂粒厚度 4 公厘，近口处 3 公厘，弯唇侈口，口内有轮纹（陶片图版（一）1）。

又一件极大，轮制，粗泥质，口内有阴轮文六道，折唇侈口，颈高 5 公分，内口直径 1.5 公分，似为瓮形器，下有网纹（同上，图 2）。

灰褐色者共五片，亦作菱形。腹片二，肩片三，其中有口带肩一片，粗泥质，含砂，砂粒径 3 公厘，片厚度 1 公分，弯唇侈口，轮制。

（B）细方格纹——有四片，灰蓝色，网形，肩部片，粗泥质，含细砂。肩处厚 1 公分，腹厚 3 公厘。

①条纹

（A）直线纹——较多，皆腹部片。

灰白色九片，其一具凸绳箍，细泥质，含细砂，厚度 2 公厘，坚硬，手制（同上，图 3）。

灰绿色四片，皆腹片，轮制，细泥质，内有薄釉，含砂坚硬。

灰褐色三片，皆腹部片，粗泥质，厚度 5 公厘，内有薄釉，手制。

（B）斜条纹——灰绿色者多腹部片。灰褐色二片，口带肩者一片，肩高 23 公分，内涂青灰色薄釉，细泥质含细砂，轮制，似为罐形器（同上，图 4），灰黄色六片，其一肩带口者，口高 2 公分，粗泥质，含细砂，轮制，属罐形器。

又肩三片，一具凸箍，一具凹箍，粗泥质。含砂（同上，图 5、6）。又一碗形器足部尖高 1 公分，底无纹，粗泥质，手制厚 5 公厘（同上，图 7）。

（C）交叉条纹——共五十件，此类寿县出土者，王湘云："制法似为泥条卷成"。虎头岭所得者，细审之为拍印成纹（同上，图 8）。以颜色分之，得三类。

灰白色，内外带薄釉者，厚仅 1.5 公厘，多腹部片，有二片带绳箍，最薄处 1 公厘，手制，细泥质。

灰绿色，足部一片，高 1 公分，粗泥质，含砂，底有条纹。又一片有横交叉条纹，具手捏凸饰二处，细泥质，厚度 2 公厘（同上，图 9）。

灰褐色，皆腹片，以灰白色为多，灰绿色次之。

（D）交错条纹——似栅形，拍印成纹，仅一片，细泥质。手制，灰色厚 3 公厘（同上，图 10）。

②绳纹

（A）竖绳纹——共七件。灰蓝色四片，细泥质，含细砂，灰白色三片，粗泥质含砂，带凸箍者二片（同上，图 11）。

（B）粗绳纹——共三十三片。灰白色十八片，灰青色八片，灰褐色七片，纹饰较异者一片，风化极深，绳纹纵横，粗泥质，拍印而成（同上，图 12）。又带凸箍如鸡冠形者一片（同上，图 13）。

（C）斜绳纹——共十七片，灰白色者十一片，灰褐色三片，深灰色三片，其中带绳箍者一片（同上，图 14）。又一片带牙齿状（同上，图 15），与李济西阴村遗存图版 4 第 10 具凸饰牙齿状，极相似，最足注意。就中属肩者二片，余皆腹片。细泥质者五片，外皆粗泥质。

（D）细斜绳纹——一片坚度为各片之冠，深蓝色，似加薄釉刷面，内赤，边缘为极细方格纹，似器盖。有浅凸箍，阔 1 公分，粗泥质，厚 4 公厘（同上，图 16）。

（E）细横绳纹——一片，灰蓝色，极薄，腹部片，厚 1.5 公厘，细泥质，手制（同上，图 17）。

③篦纹　有粗细纹二种，粗纹多而细纹少。细篦纹，拍印，仅见一肩部片，有凸纹二道，凸起处宽 5 公厘，手制，灰蓝色，细砂质，含砂厚 3 公厘（同上，图 18）。

就颜色论之，有灰白、灰蓝、灰褐、灰黄、灰青等，灰白色仅一片，最值得注意，呈银白色；表面有薄釉一层，白夹蓝色，火候已过陶类限制。殷

墟发见有似此者，或称之曰带釉陶片。细泥质，坚硬，手制，有凸炼一道，乃于印纹之后黏上者，内外磨光，厚度1公分（陶片图版（一）19）。

灰蓝色，共十八件，皆腹片。中有一为肩部片，甚薄，厚度1.5公厘，带磨平凸箍，手制，细泥质，含砂（同上，图20）。又属于底部者一片，有脚高1公分手制。底下有曲绳纹，甚薄，厚度3公厘，手制（同上，图22）。

灰褐色，十一片，多为腹部片。其中一片带凸箍一道，粗砂质。

灰青色二十三片，多为腹部片，其中三片，为肩部片，缀条形凸炼，手黏磨平，有蓝色薄釉，细泥质，手制，含砂，厚度1.8公厘（同上，图21）。

④山字纹　细区分之，可为二种：

（A）无规则者，花纹线条凌乱，多腹片，手制。

灰白色，似加一重白色釉彩，有三十二片，带肩者一片，厚2公厘，粗泥质。灰黄色二片，一具带状凸箍（同上，图23），灰蓝色二片，灰褐色六片，其中带锯齿形炼者二片，可衔接为罐形器，肩部片。厚1公分，粗泥质（同上，图24）。

（B）有规则者，线条较整齐。

灰绿色，二十片，有凸箍者三片，厚4公厘，薄者1.5公厘，细泥质，内外涂浅灰色，手制（同上，图25）。

灰白色，十六片，有一片中间凹饰（同上，图26），细泥质，厚度4公厘，含砂粒，手制，有手模型。青色一片，极薄厚度1.5公厘，细泥质，印纹凹处甚深，约1公厘（同上，图28）。

⑤V字纹仅一片，外灰褐色，内浅灰色，刻划相向斜纹，成V字形，与黄岐山相同（同上，图27）。粗泥质，含细砂，有纵凸起条纹，凹处距离3公厘，有横凸炼，厚者6公厘。

（2）黑陶：大小多属残片，颜色有①外黑内灰，②外黑内绿，③外黑内褐，④外褐内黑，⑤内外皆黑，质甚坚硬，粗泥质，含细砂，薄者2公厘，厚者1公分。

花纹以篦纹鲱骨状纹为最多，次为绳纹，仅一片（同上，图29），多属粗泥质含砂粒，内外磨光，手制，厚者达4公厘。篦纹鲱骨状纹（同上，图30、31）者，奄城金山均习见。又有无纹罐形器腹片一件，另一件具有双条凸饰二道，上下皆印篦纹（同上，图32）。此类或呈深灰褐色，磨光，内外薄釉，中色赤，属粗泥质者九片，皆腹部片（陶片图版（三）33），厚3公厘，其最薄者约1.3公厘，厚者1公分以上为黑色陶，而龙山期之标准黑色有光而薄

壳之陶器，则全未见。

（3）红陶：残片大小十三件，颜色有砖红色，紫褐色，惟多黄色，最厚者5公厘，薄者3公厘。雷纹仅一片，粗泥质，厚4公厘，浅红色，腹片（同上，图34），与江西清江大姑山所得陶片雷纹相同。

其他全属粗泥质，含砂极多，腹部片，花纹有横条纹一片（同上，图35）。

斜条纹四片，细方格纹三片，人字纹一片（同上，图36），余皆风化甚深，纹理难以辨认。

（四）与北方系陶器及安徽寿县陶片之比较

有一事须论及者，即凸箍之纹饰。其手捏凸饰无纹理者，虎头岭所得，有呈锯齿形、牙齿形或带形者，则系捏上泥条后，加之雕刻而成。

其他最足注意者有二类：

1. 鸡冠形凸箍，此鸡冠形为龙山期遗物特征，或用为耳把，或凸箍饰。安徽寿县古城子有一陶片，凸箍鸡冠耳（见王湘文图十二之三），与虎头岭发见者（陶片图版（一）13）极相似。

2. 绳形凸箍，此绳形凸饰，为小屯期遗物特征。（王湘曰："用此种绳形凸箍主要目的，似在使其坚固。因为甗的腰部甚细，易于破碎，即有凸箍而仍多从此破碎。这种作绳形箍，很可能是模仿绳子捆着的样子。在早期黑陶文化中的甗，多无此凸箍，似为后来因甗常从此破碎，就用绳子来捆着。因为绳子容易被烧坏，遂成作泥箍。"见《寿县史前遗址报告》。）

黄岐山有一陶片，带凸绳箍、骈列两道（见陶片图版（四）11）。虎头岭陶片凸绳箍，有粗细二种，粗者绳条交织较疏，细者极巧致（陶片图版（一）14）。皆为灰白色陶片，面涂薄釉，与小屯遗物更相近。

就揭阳所发见陶片而论。黄岐山以方格纹为多，虎头岭则多为条纹。此类花纹，与山东、豫东、安徽陶器纹饰多相似，均为龙山文化纹饰之特征。试取山东城子崖，与河南永城县之造律台，及安徽寿县之陶家祠、刘备城诸地陶片花纹比较，其中不无相似之处。

又揭阳所得灰白色陶片特夥，且有带薄釉之白陶，又具有绳纹及绳纹凸箍之罐形器，此二事则均为小屯期陶器之特征。

（五）文化层及年代之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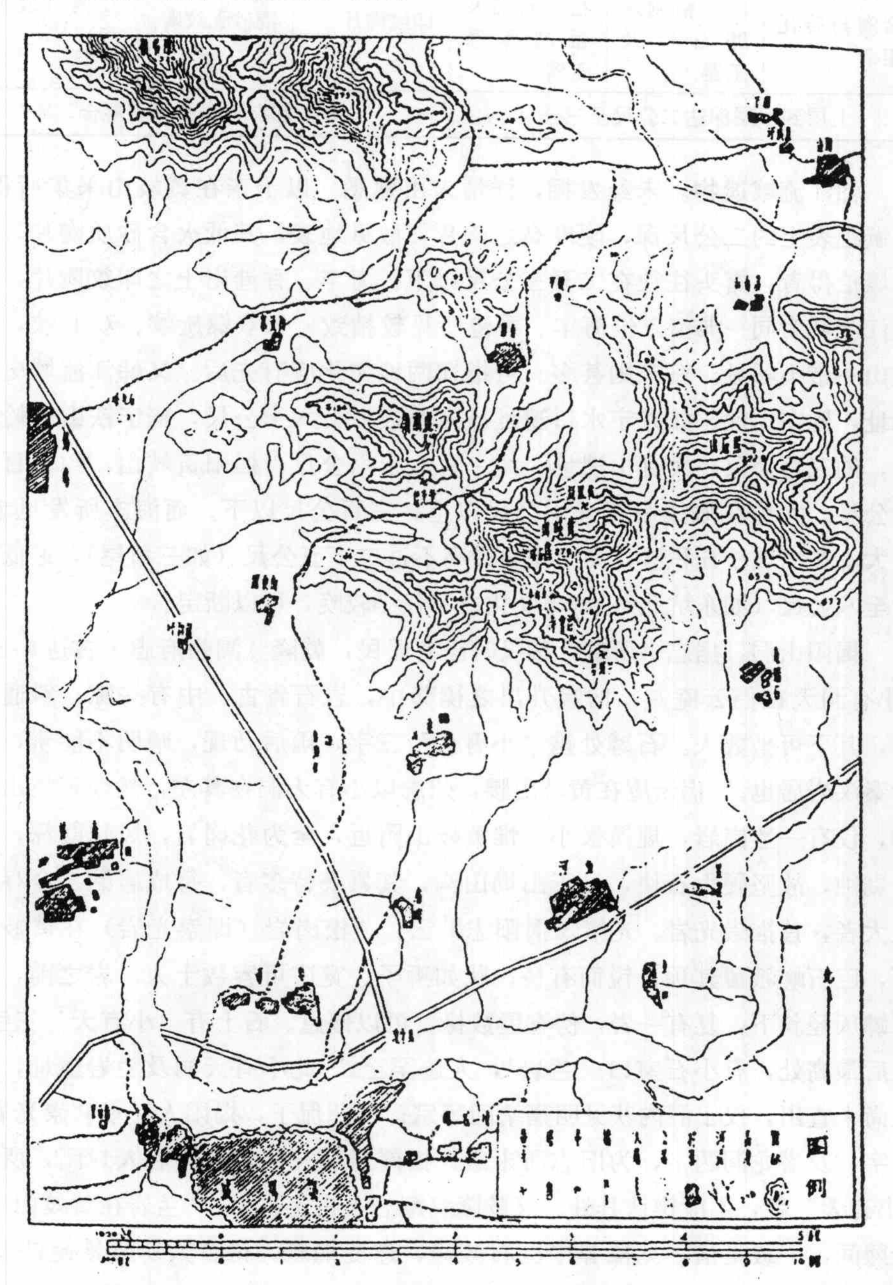
杭县与台湾曾经正式发掘，其文化层现已大体明了，兹表列以供参考。

杭县文化层			台湾文化层		
上文化层	中文化层	下文化层	上文化层	中文化层	下文化层
印纹陶片素陶与砖瓦相杂	少数晚期黑陶 精制琢磨石器及玉器	早期红陶粗制石器及粗制琢磨玉器	印纹陶片	混砂无纹陶	红陶（或彩陶）
上层到下层深达二公尺至三公尺			各层都有石器多打磨混合		

韩江流域遗物。未经发掘，详情未由熟悉。以予亲在黄岐山采集所得，石镞距表土约二公尺深，硬度高之陶片，散见地表，其低火含砂质陶片，在战壕拾得者，露头往往在二至三公尺以下。海丰、香港出土之印纹陶片，与韩江流域为同一典型。惟海丰、香港所见较精致，如双螺旋纹、双 F 纹，黄岐山一带不习见。海丰则甚多。可推知两地文化应有先后。又韩江流域史前遗址，皆在山地，如兴宁水口遗址，当海拔一百六十公尺，普宁铁山后岭遗址，约三百公尺，大棚山遗址，约一百八十六公尺，揭阳黄岐山，约二百七十公尺。大约在海拔一百五十公尺以上，三百公尺以下。而海丰所发见者，则大都在山坡沙丘积沙，高出海面最高不过二十五公尺（如三角尾），最低只七至八公尺（如东坑北）。海丰文化之年代必较晚，可以断定。

揭阳山洞，据志书所载，秦汉时已有居民，乾隆《潮州府志·古迹》云："小有洞天在侣云庵左，僧寂升出之榛莽中，岩石青古，中有一隙，斜通上界，其下可坐数人。石罅处镌'小有天'三字，雨后乃现，晴明不能辨，相传秦汉岩居也。"侣云庵在黄岐山腰，州志以小有天洞在其左，然今黄岐山岩洞，仅有一竺岗岩，规模极小。惟黄岐山附近，全为花岗岩，风化既深，易于剥蚀，故坚硬大石块，见于山坳山沟，其累叠特多者，每成岩洞。今存洞之大者，首推崇光岩。光绪《揭阳志》云："松岗岩（即崇光岩）在黄岐山西，巨石嵯峨覆其顶，锐而有棱，状如狮子。宽广可容数十人。岩之前，有石罅仄径斜下，复有一岩，傍有屋数椽，可以偃息。石上有'小有天'三字。山后最高处，有小石室曰'兰岩'，人迹罕至。"此小有天洞及兰岩遗址，此次尚未查出，仅于洞内获见明嘉靖间薛宗铎（薛侃子，揭阳人）书"崇光岩"三字，及潜龙洞题字，为旧志所未载。松岗岩前一洞门，为后人封闭，所谓"小有天"者，不能辨认其处。又乾隆《潮志·古迹》云："兰岩在黄岐山后，康熙间，一跛足僧，见榛莽中巨石崚峥，遂芟荆棘，得古人所藏铁锉铁锸，因辟胜概作石堂，高二丈余。"观志书所载，岩洞规模，远较今所见者为大。

或因高山剥蚀率较大，致岩洞不能长存。以此推之，秦汉以前，岩洞当更多且深广，可为古人避身所也（参看下图）。秦汉时揭阳有人岩居，则黄岐山史前文化，远推至秦汉以前当有可能。



图二 揭阳黄岐山及其附近村落图

五、后记

韩江流域之古住民，据文献上所载，即越系之僚族、俚族。

《旧唐书》一〇九《冯盎传》："仁寿初，潮、成等五州僚叛，盎驰至京，请讨之。"（《新书》一一〇同。）《隋书》八十《谯国夫人传》："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僚多亡叛，夫人……宣谕上意，谕诸俚、僚，所至皆降。"

《通鉴》一九〇云："武德五年，正月己酉，岭南俚帅杨世略以潮、循二州来降。"可知隋末（约公元600年间）潮州地域之土著通称为俚及僚。

《漳州志·陈政元光父子传》云："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泉潮间蛮僚啸乱，陈政以岭南行军总管来镇绥安。"

《丁氏古谱》云："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龙溪，阻江为界，西岸尽属蛮僚。"

则唐初漳潮之间，亦僚人所居。考陈政子元光征讨之蛮，据福建志乘所载，其酋曰雷万兴，而手刃元光有曰蓝奉高者，从其姓为蓝与雷证之，即后来所谓畲民。是畲民在唐初亦名为僚，盖僚为原有土著之通称。其后中原士族相率南来，原有土著被迫入居山洞，宋以后概被目为畲。僚为越族，汉晋时曰里曰俚，乃粤东之初民。[①]《淮南子·人间训》称："尉屠睢攻越，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故隋唐间之蛮僚，当有不少古越民之孑遗。僚与俚为一音之异称，俚亦作黎，今潮属畲民所居地尚保存黎之名，如潮安县北溪尾村畲民聚落，有山黎（音Loi），旧时饶平弦歌都东洋堡有黎坑，大埔清远都同仁社有黎家坪，古时必为俚人居地。今揭阳棉湖西北有山黎潭，普宁鲤湖大南山有乌黎，其乡村犹存黎称。乾隆《潮州志》记："明时林兴祖奉母，遇僚贼，母被掠，后见之畲中。"是明时犹呼畲为僚。

古僚族以产幏布著称。《说文》："幏，枲裙，蛮夷賨布。"《风俗通》："盘瓠之后，输布一疋二丈，是为賨布。"《玉篇》释幏为蛮布。后代黎人，有用五色吉贝织布者（见《南州异物志》《桂海虞衡志》等书）。韩江流域向产蕉布，唐宋以来，用为贡品[②]，顺治《潮州志·物产》云："布帛之属：为葛布，以凤葛为上。为苎布，为麻布，潮揭出者皆佳，为蕉布，为绸绢，出海阳。

---

① 见谭其骧文，载《禹贡》半月刊。

② 见《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今揭阳特产为夏布，犹存古之遗风。

为蚕绸，出程乡（今梅县）者佳，为竹布。”潮属各地出土陶片，其花纹多麻布纹，浙赣所得亦同。而北方系陶器，则甚少见，此点允为南方系越族文化之主要特征。从上列韩江流域古住民及文化特征论之，可知出土之石器陶器，可能为古代僚族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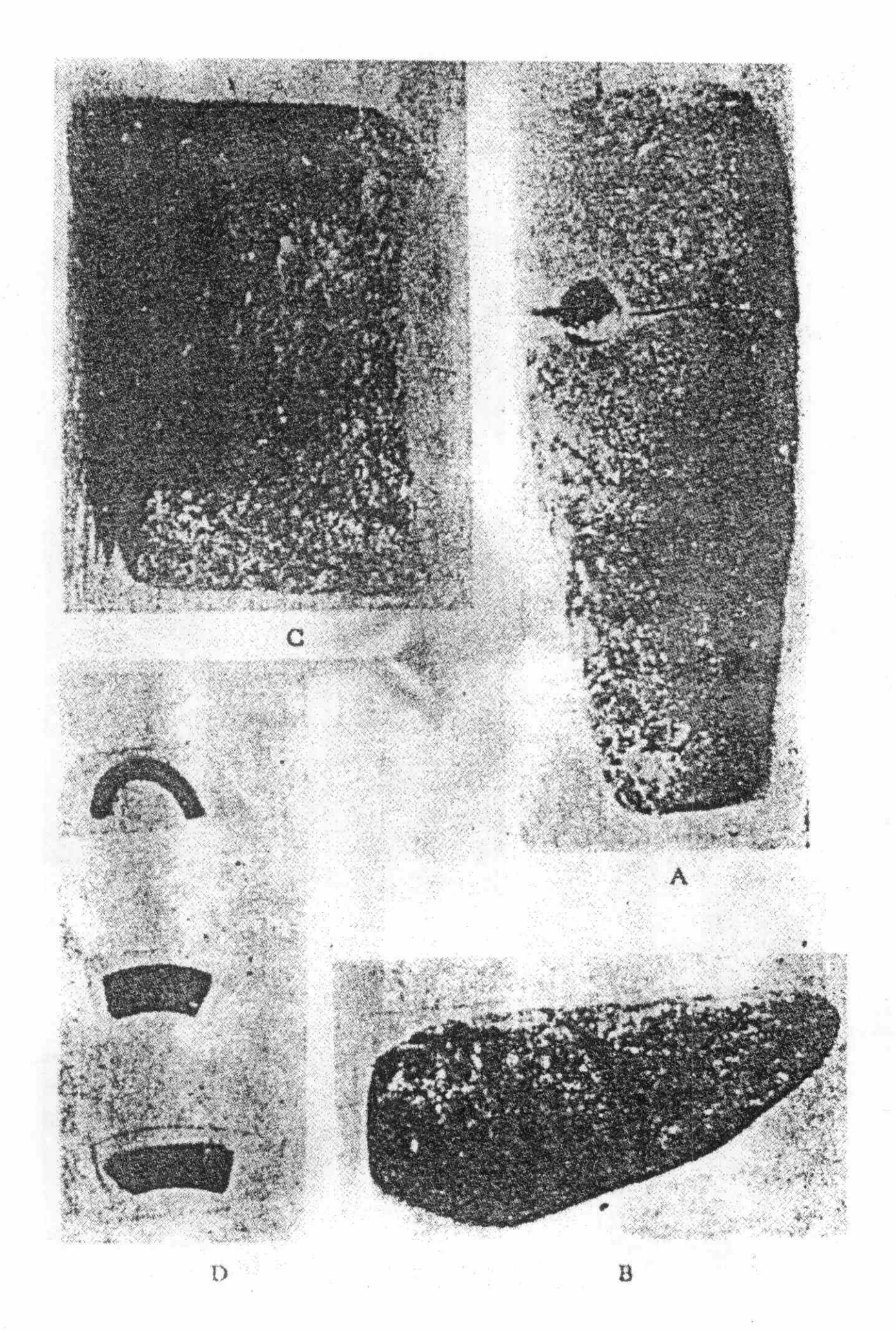
按庙属考古工作，近三十年有极大之进展，潮安发见贝丘遗址[1]，潮阳新石器遗址亦多[2]，饶平尤为重要，兹不缕述。揭阳、兴宁所出巨大石戈石磅，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此文为第一篇本地区之新石器考古记录，聊复存之，以供参考。

单行本初版于香港，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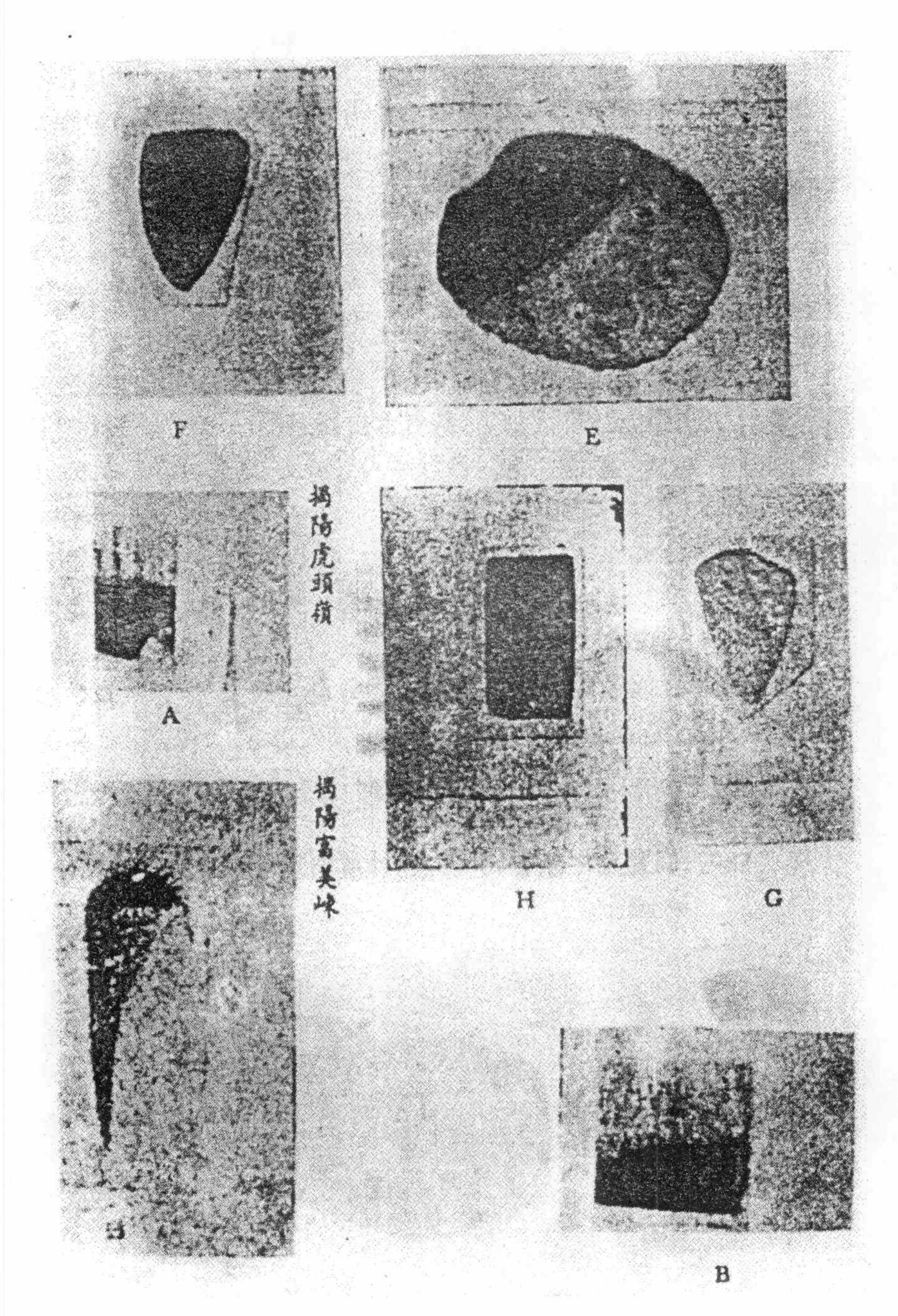
后收《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

① 《考古》，196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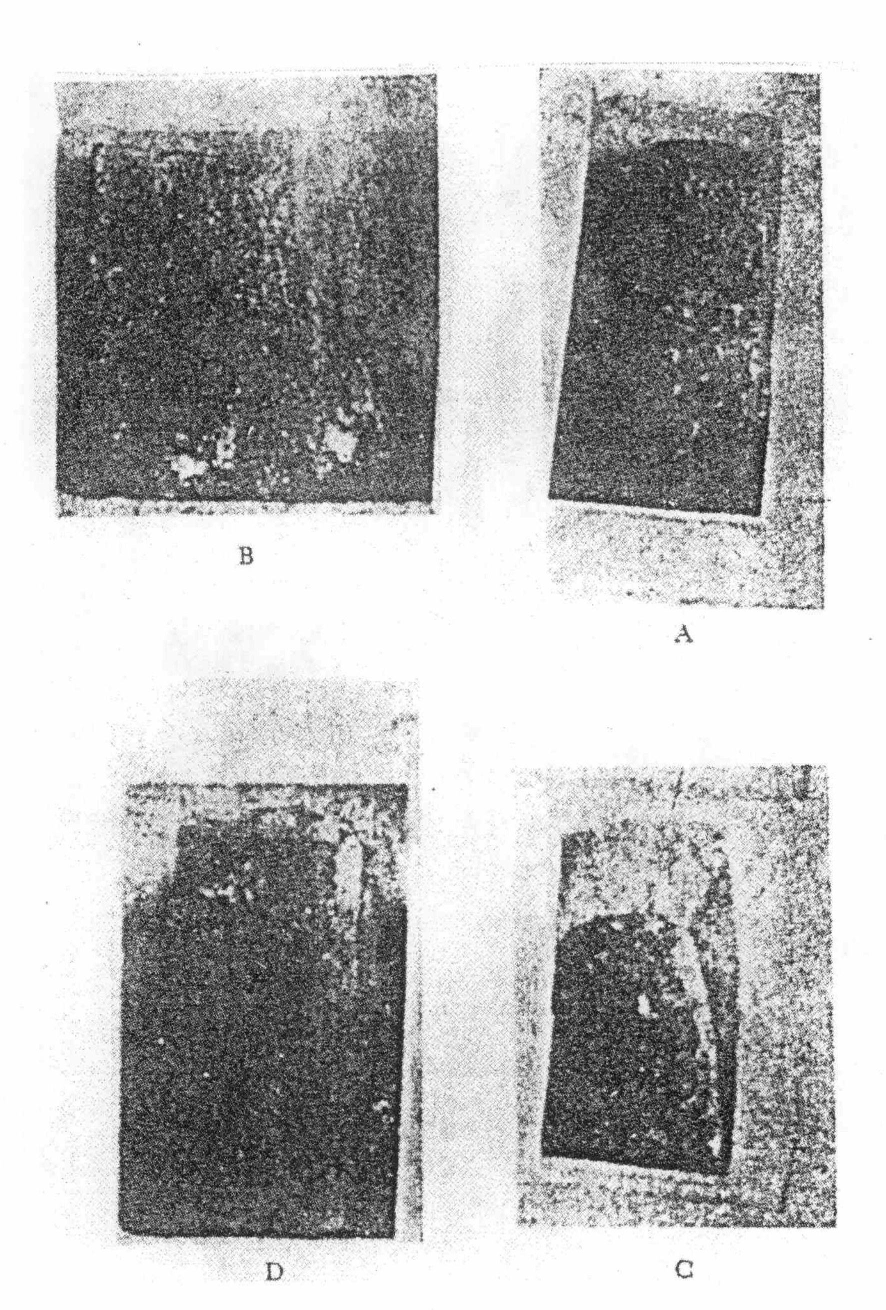
② 《考古通讯》，19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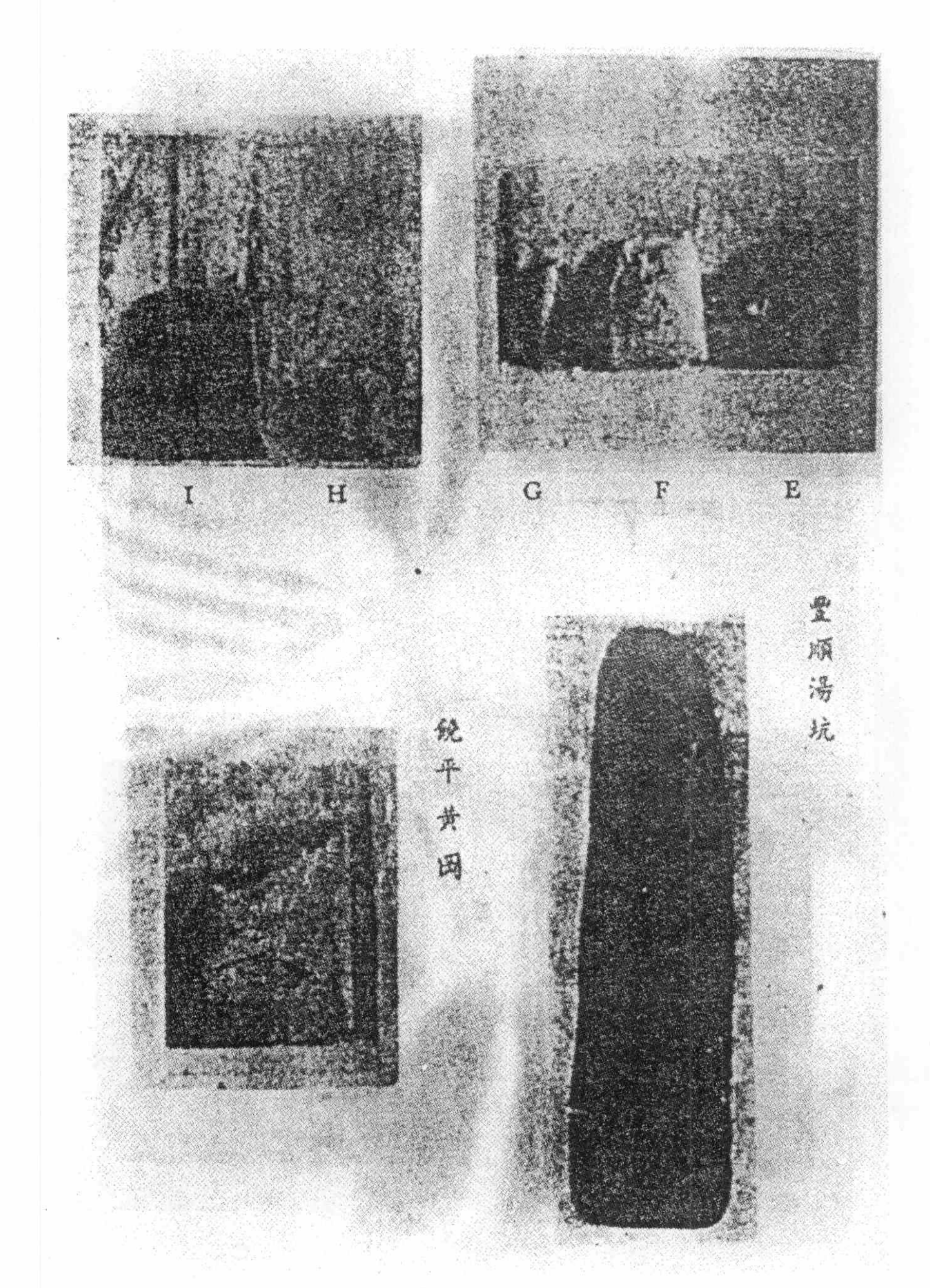
石器图版（一） 揭阳崇光岩（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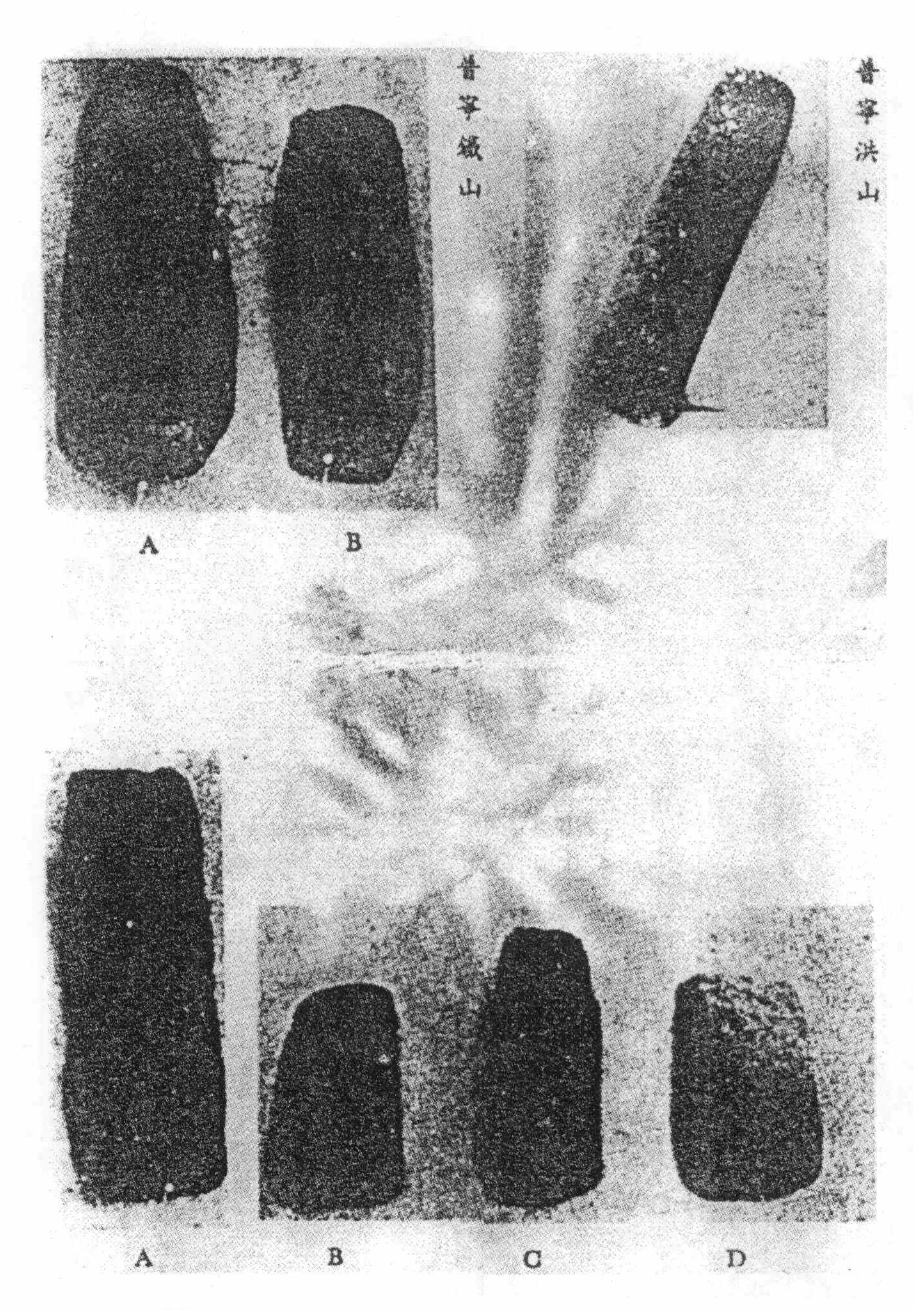
石器图版（一） 揭阳崇光岩（E～H）；虎头岭（A～B）；富美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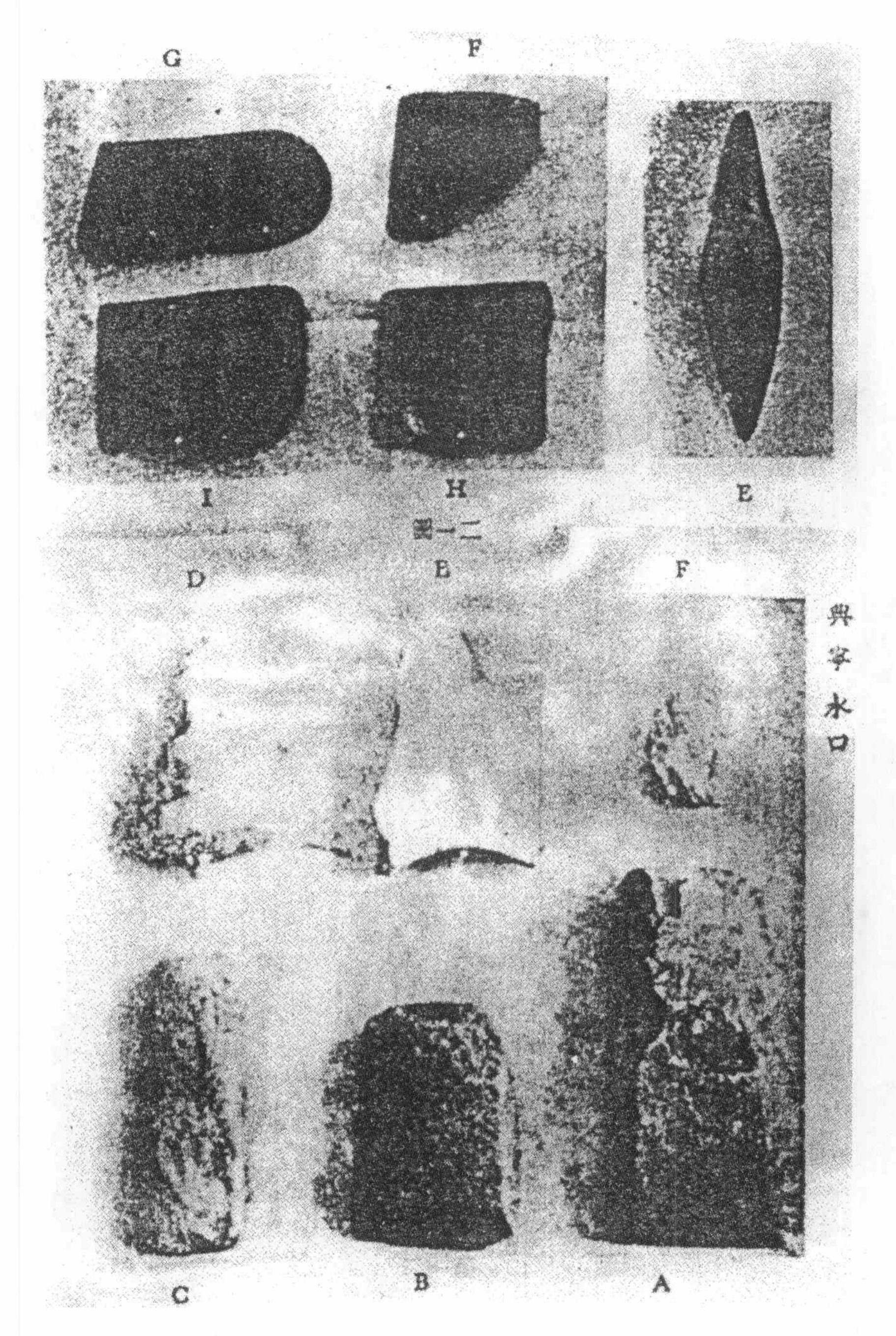
石器图版（二）　揭阳黄岐山（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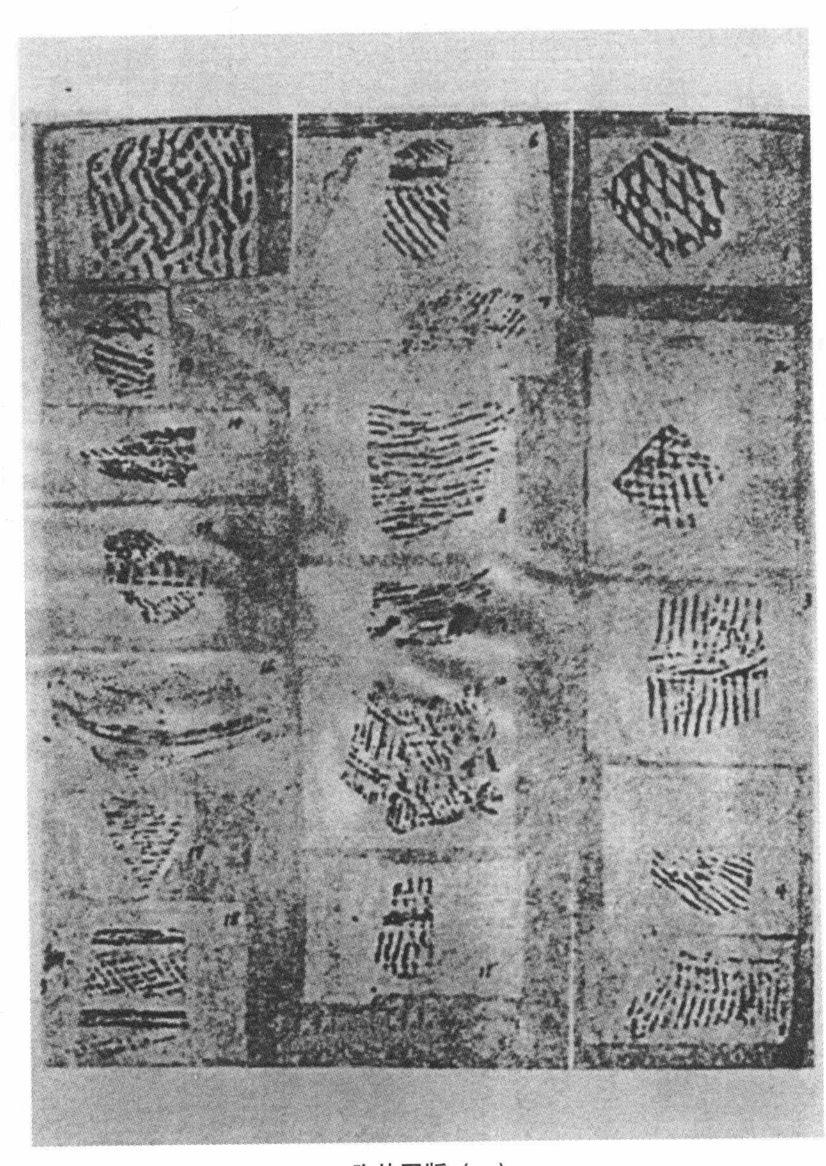
石器图版（二）　揭阳黄岐山（E～I）；丰顺汤坑；饶平黄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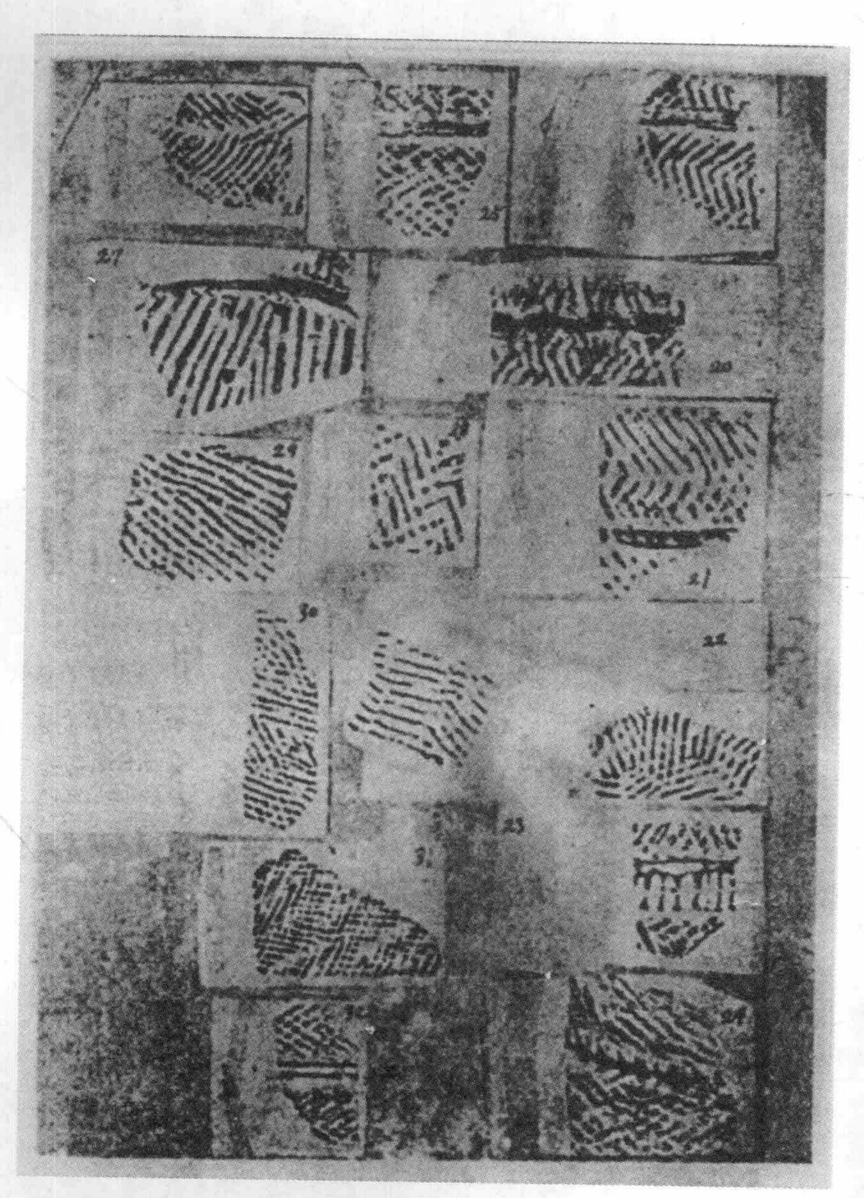
石器图版（三） 普宁洪山；铁山（A～B）；苦肠腹（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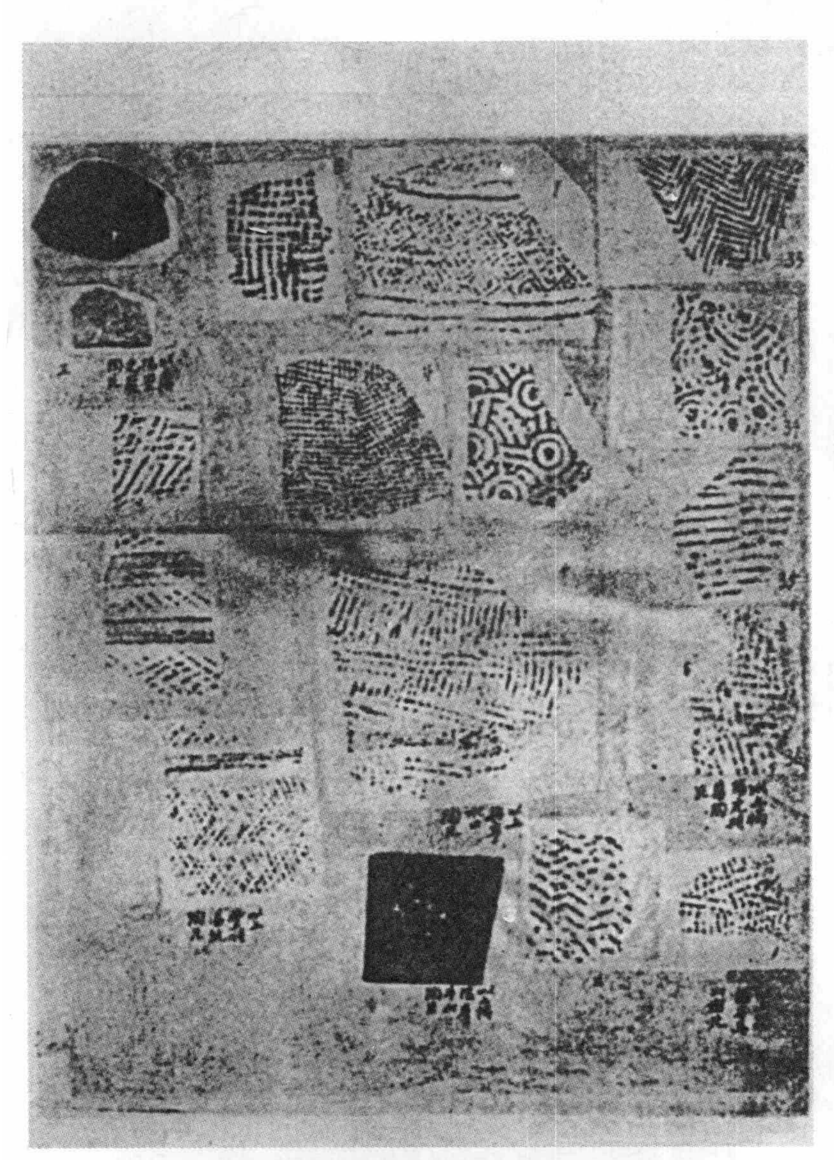
石器图版（三） 普宁苦肠腹（E～I）；兴宁水口（A～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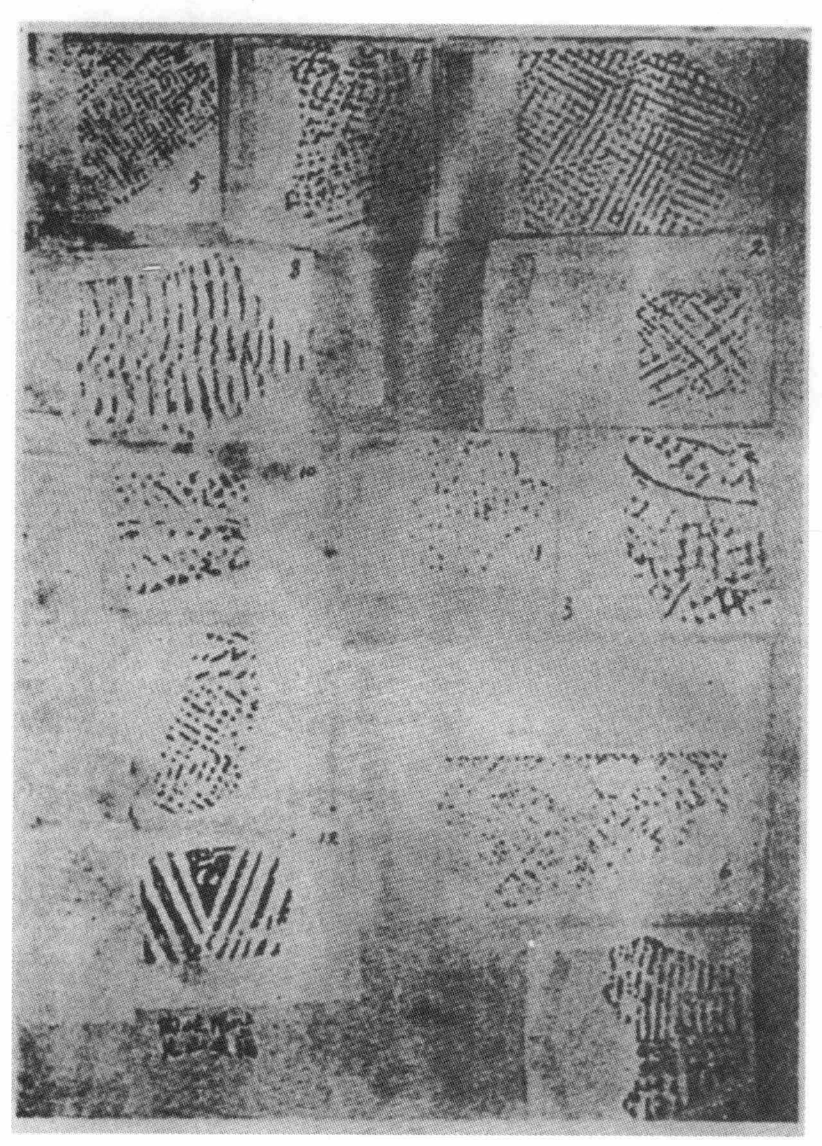
陶片图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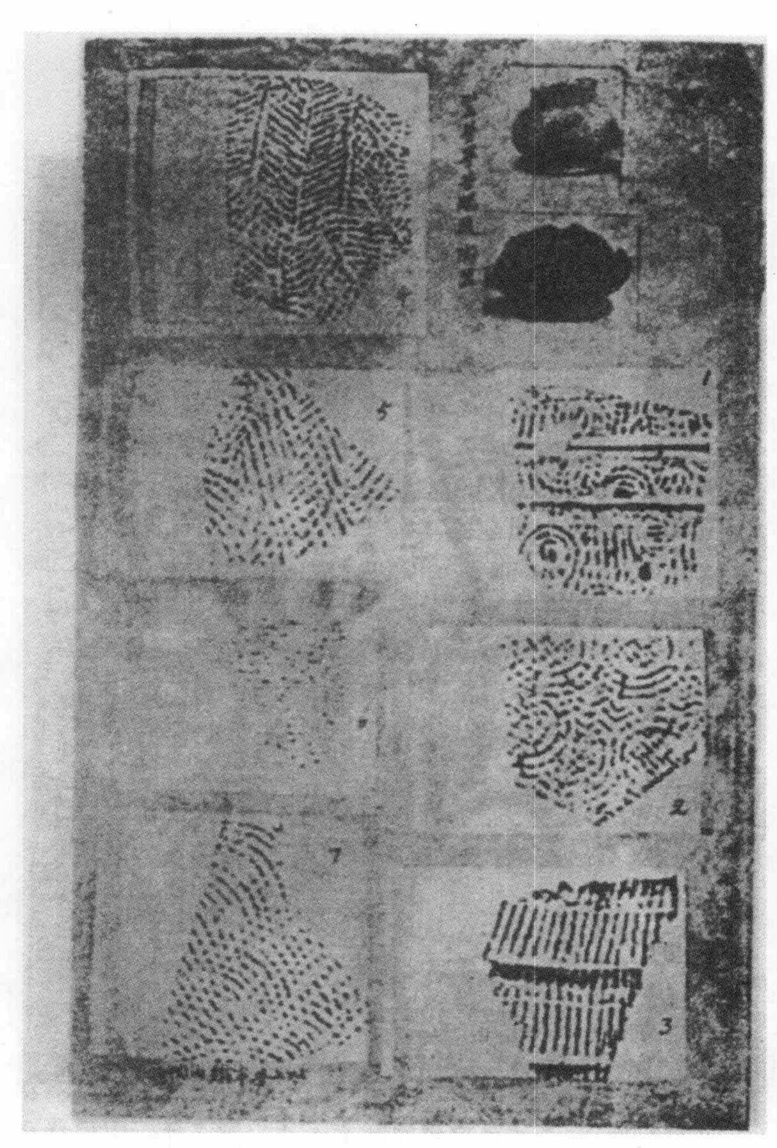
陶片图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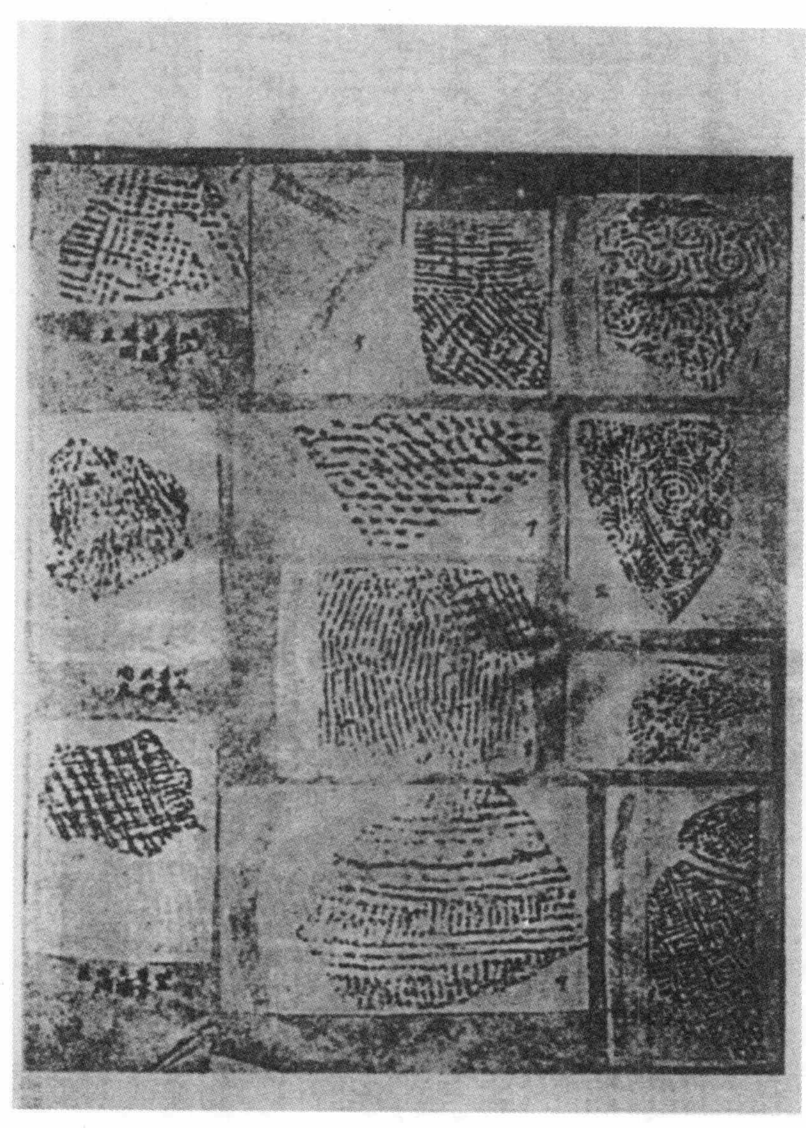
陶片图版（三）



陶片图版（四）



陶片图版（五）



陶片图版（六）

潮州宋瓷小记

谈中国陶瓷史者，每称及“广窑”，大抵指阳江所制而言。阳江窑起于南宋，至明时徙南海县石湾村。旧时所谓“广窑”，无异以阳江为代表，然广东东部与江西、福建接壤之韩江流域，设窑烧瓷，为时极早，惜乎言瓷史者多未之及。

惟程哲《窑器说》云：“广东窑出潮州府，其器与饶器类。”[①] 寥寥数语，无关重要。程氏书盖止论明瓷，于宋代潮窑产品，尚无所知。自 1922 年于潮安城西南羊鼻冈发现治平、熙宁时制水东瓷佛，上有漥书“潮州水东”及“匠人周明”姓名字样，潮窑始为人所乐称道。水东佛像四尊，故友罗原觉著《谈瓷别录》特记其形制，以彰其事，文载《岭南学报》[②]。余以州人，且曾撰《韩山志》，韩山即水东窑所在地，故于潮窑原委，向略究心。薄有记录，1955 年夏旅东京时，为小山富士夫教授取去，由长谷部乐尔译为日文，载于陶瓷协会出版之《陶说》二四，该文屡见学人征引。近二十余年，考古工作之蓬勃，对潮瓷发掘益多，兹就所能记忆者，参以新知，以明潮窑之历史背景，撰为小记，藉供谈宋瓷者之采览焉。

① 《美术丛书》初集第三辑。

② 第五卷第一期。

一、窑址之发现

韩山去潮州城东一里，一名笔架山，以唐时潮州刺史韩愈曾登览得名。韩山迤东北三四里一带山地，产瓷土极丰，其地露出流纹岩层中，长石成分特富，伴生之石英，又每结集成簇；其岩石经风化后，石英易于析出，由长石变化之纯洁磁土，采掘淘洗，极为方便。故自唐、宋时，已有开采，如黄金塘、康厝山、白岭、猴伯岭，及飞天燕之磁土，皆有名于时，至今犹有人采掘，为烧瓷之用。北宋窑址即在此一带地区。故老相传，自韩山前山仔垒村至山后，宋时有窑九十九，窑长二丈八尺五寸，夙有“百窑村”之目，潮州城厢附近，居民每于其他掘得碗罐之类。西人斐利（Malcolm F. Ferly），曾调查福建、广东古窑址，亲至笔架山采集磁片，所得甚夥，著有《中国古代窑址》（An Ancient Chinese Kiln-Site）一文[1]，称其平生在中国所见之古代窑址，以笔架山窑址为最大，残片遍布几及一英里而外，河边积土十余尺均与陶片结合。1954 年 3 月，因韩山学校建筑校舍，发现宋代窑址。经勘查结果，据称“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属窑址，并在笔架山东约一公里多整窑址地区，发现砖砌窑口一个，宽约 1.50 公尺，砖被火烧，变成红褐色，内部砖满黏褐色釉。又在笔架山拾回各种瓷片。此古窑遗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2]。

曩者，余于《韩山志》与《潮州志》二书中，尝考查瓷土之产地及窑址所在之村落。瓷土除笔架山极为佳良之外，大埔高陂一带，距韩江之东岸约十里亦产磁土；其中以山坪、雷公坪之土质最良，故高陂制陶业异常发达。其他产地，尚有丰顺之横居山阳坑墟、饶平之九村，而惠来梅林之陶土，向亦负盛名。潮州窑址之分布甚广，而乡村之名称亦冠以陶窑之文字者亦夥，例如：

潮安县　百窑村（即水东窑）。

南窑村（现在竹蜡，离县城六里，在意溪西南）。其他桑浦山间，昔时亦有瓷窑云。

饶平县　砌窑村（宋代属于海阳县太平乡，后为宣化都大港之瓷窑村）。

---

① 载《亚细亚杂志》，1940。

② 载《文物参考资料》，1954（4）。

澄海县 陶畲村（县北三十里处）。

丰顺县 畲前寨（距县城七十里处）。

惠来县 北溪窑山（县志载称：在县西北六十里，山名员墩，临一小涧，庵美角乡人，搭茅屋水碓，舂泥陶碗，备乡邑器用）。

大埔县 窑子里（南接大麻）。

青碗窑（西连黄坑村，为高陂、同仁两区交通之要地）。

碗窑溪（区署南边约十里）。

窑脊村（溪口附近）。

碗窑村（余粮坑附近）。

近年发现之古窑址，大抵即在上述区域之潮安县境。

二、窑名之考证

水东北宋瓷佛像座，四围有铭文。治平四年（1067）像云："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为父刘用母李二十娘，阖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三十日造，匠人周明。"共六十三字。又熙宁三像文字略同。"水东中窑甲"一名，颇值得研究。"水东"即指韩山一带之地。韩山在潮州城东，宋时人又名东山①，以靠韩江东岸，故名"水东"。余曾于韩山麓废关帝庙内，发现清顺治间潮镇总兵郝尚久所立庙碑，题额曰："溪东关帝庙碑记。"清初碑记称"溪东"，与此北宋佛像称"水东"，正相符合。"中窑甲"者，考韩山后临韩江滨一带村落，北宋时有"白瓷窑"之名。潮州城内开元寺有"潮州静乐禅院政和四年(1114)"铜钟，其上款识舍钱人姓名，中有一行云：

> 白瓷窑住弟子刘满、王长、慎德、邝一娘各舍钱五贯文，各祈平安。

政和为徽宗年号，后于治平。其地名曰"白瓷窑"，即因窑址所在而取名。《永乐大典》潮字号引元《三阳志》："郡以东，其他曰白瓷窑，曰水南。"明黄佐《广东通志》记庄典墓在韩山东白瓷窑，郭大鲲墓在郡城笔架山白瓷窑。庄典墓址在今韩山后，近黄金塘。合此三条，可知宋、明时所称之"白

① 见王象之：《舆地纪胜》。

瓷窑”，正当今窑址发见之处，以其擅制白瓷，故以此为名；后人讹白为百，遂有“百窑村”之称。[①] 嘉靖郭春震修《潮州志》谓：“海阳县东厢统五村：曰东津、水南、南窑、仙田、恶溪。”光绪《海阳县志》有地名“南窑村”，谓“即今竹蹈，距城六里之涸溪西南处”。观最近查勘宋代窑址，在笔架山至涸溪塔山麓四五里之地，竹蹈正近涸溪，旧称“南窑村”，以证“中窑甲”之名，则宋时可能就窑区所在，以划分中部及四方各村落，故有“中窑”、“南窑”之称；至“白窑村”则为其总称也。于此可见宋代潮州窑址之广，及瓷业发达之程度矣。

三、潮窑之衰落

潮窑盛于宋，周明所造佛像，技巧之精，即其明征。惟入元以后颇衰弱，制作亦大不如前。最大原因，以予推测：宋时潮窑集中于笔架山，为取磁土便利之故。笔架山地带，当宋时，许氏、刘氏两盛族住居于此，有“山前许、山后刘”之目。许氏之先，自泉州迁潮。有许申者，大中祥符初，举贤良，仕至广东转运使。孙开义，官明州观察使，广南西路兵马都监。曾孙珏，娶太宗曾孙女德安县主，一门鼎盛。山后刘氏居桃坑及东津，至今尚为巨族。刘氏之先，有曰嵩者，自唐末偕清海军节度使至广州；子颖，移居于潮。其后有曰允者，登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知化州、桂州。允子昉、景。昉官荆湖南路转运副使，直龙图阁。景知台州、南雄二州。昉子四人，景子九人，皆显仕。造佛像之刘扶，其父名刘用，其子名刘育，泐钟之刘满，皆住百窑村，当系其族人。许、刘二氏俱宋时潮州巨室，当元兵来潮，韩山前后，颇遭蹂躏，居民星散。[②] 水东瓷业，或因此而中落欤？

四、潮窑在瓷史上之地位

北宋瓷器有长文者不多，有备记窑名、制造年月、供奉人及塑像匠工姓名者尤少。如此治平、熙宁佛像，实为仅见。[③] 瓷器铭文最长如余姚唐大中四年瓷壶，有铭四十三字。

---

① 近日发见窑址共数十处，余以为百窑村之“百”字，仍是约辞。

② 钞本《韩山许氏族谱》载其事甚详。

③ 瓷器上刻画年月文字及匠者姓名者，晋器有之。见《程史》“晋盆杅”条，惟不记窑名。

潮窑出品，有北宋英宗治平四年时物，后于江西景德镇瓷仅六十余年（景德1004—1007）。胎质莹白，釉作卵青色，色制介于定窑与景德窑之间，已如是精致，则其设窑可能更早。前潘氏抱残室藏瓷杯，牙白色釉，杯身锥拱花卉，杯内有底款“宣和内府”四字篆字，据谓系潮州出品。[①] 如是，则潮窑在当时亦为进御之物。1954年，潮安北郊发现两窑址，有青黄釉碗及莲花纹圆瓦当，共三十二件，与西安大明宫所出圆瓦当相同，故可定为唐代之物。[②] 又刘景墓经于1958年由广东省博物馆加以发掘，随葬品有影青缠青花白胎青釉瓷碗，为宋潮州窑之典型制作，又圆形盖面作墨书“五谷龙”三字之陶盒，素面无花纹，胎色灰白而不釉，火候极高。[③] 小山富士夫引仁和寺本《唐本草》“白瓷屑……广州良，余皆不如”句，至欲改广州为“潮州”[④]，以潮州之白瓷，在北宋时已有其极高之成就故也。笔架山之瓷片，亦有雕刻莲瓣之碎片，陈万里亲临其地考察，加以仔细分析，认为瓷片种类虽有青釉、黄釉等，但以白釉及影青二者为主，水东窑之产品，大致如此。[⑤] 潮瓷最引起人之兴趣者，为近宋龙泉型之双鱼瓷碟，一般已目为潮安产品。附图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品，标明出自潮安，屈志仁君近日在中大举办之东南亚贸易瓷研讨会中宣读论文，亦提出龙泉与潮瓷有密切关系之见解。以予所知，此类双鱼青瓷碟，1956年曾在长沙发现[⑥]，与此完全一样。据称在湘南桂阳于1955年曾出土有二十余件，如是湖南此一批龙泉双鱼碟，可能来自潮州。[⑦] 惟查龙泉县金村出土之南宋龙泉青瓷中亦有双鱼洗[⑧]，则此类瓷碟，自应属于南宋。潮安城南洪厝埠出有梅子青双鱼碗碎片，究在何代？其划有皇祐及治平年号之压锤，出土地点乃在城北郊竹竿山古窑址。洪厝埠则在城南，其他原为南山寺，据嘉靖《潮州志》：“南山寺即广法寺，在南厢一里，洪武间建。”[⑨] 则洪厝埠之遗物，恐难及于北宋，潮之双鱼碟，与浙江龙泉，孰先孰后？仍待研究。潮州梅子青间有开片之冰纹，观治平四年九月佛像，冰冻开

---

① 有图，见《广东文物》第二辑。

② 《考古》，1964（4）。

③ 图见《考古》，1963（9）。

④ 《中国陶瓷》上，36页。

⑤ 《文物参考资料》，1957（3）。

⑥ 图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8）。

⑦ 南宋初，潮州水东人刘昉官潭州安抚使，必带有潮人来湘。

⑧ 见朱伯谦等：《龙泉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文物》，1963（1），图十二。

⑨ 陈万里谓南山寺建于宋绍兴，未详所本。

片，微近哥窑，则此种开片技巧，北宋时水东窑工，已惯用之。

唐代青釉凤头壶残片，据冯先铭云：近年于潮州韩山及广州西村窑址，屡有发现，凤头壶为吸收波斯作风之制作，泉州海上贸易，唐宋甚盛，故广东潮州亦有发现。[①] 此类凤头壶如果为本地产品，合北郊发见之莲花纹圆瓦当二事论之，唐代潮州瓷器与外地最少已有相当交往，瓷业发轫甚早，故北宋中期，水东窑制作遂有此种成就，非偶然也。

附　徐让《陶瓷史上古潮州》（节录）

昔日曾为“御赐品”

广东陶瓷工艺，历史悠久。晋代的广东白瓷，就曾经作为帝王的“御赐品”，赏给大臣诸葛恢。晋陶渊明《搜神后记》，也有关于广东白瓷用作驱邪的记述。事虽属于志怪，亦足说明广东白瓷在晋时已很有名。去年（1954）粤东潮州地区所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百窑村、洪厝埠、凤完埠、竹竿山四处，对于广东的陶瓷史，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龙泉窑”与“三王坝”

潮州南郊春社楼附近的洪厝埠，除了有“青釉带黄”的六朝期瓷片出土之外，还有一系列釉色浓淡不一的器物，从这些器物的胎质、造型、釉色各方面，用类似式方法排列起来，它的发展是由“青釉带黄”而到“杏黄”、“草绿”，最后是“梅子青”。这类“梅子青”器物，是和现代一般人认为“龙泉”、“哥窑”之类的器物同属一种类型的。市上的这类器物，过去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何处所烧，只从釉色和器物内底的“双鱼”来判断是“龙泉”、“哥窑”器[②]，而洪厝埠出土的“梅子青”当中，就有一块碎片，碗内底有残存突出的鱼，因为破碎的关系，只有鱼一条，原来该是“双鱼”的，这个发现，很耐人寻味，就是说：在广东方面，市上所称“龙泉”、“哥窑”，其实是潮州的产品。潮州“梅子青”和浙江“龙泉”器，细分起来，釉色和暗花虽然相同，但潮州较“龙泉”稍微闪黄；胎质则“龙泉”带白，潮州带灰；火候的坚实程度是相等的。又潮州“梅子青”间有开片（即冰冻纹），“哥窑”也有开片，“龙泉”则无开片，这也是互有异同的地方。市上的古董商，还有一种

---

① 《文物参考资料》，1958（2）。

② 南宋浙江处州章氏兄弟同造窑，兄造者名“哥窑”，弟造者名“章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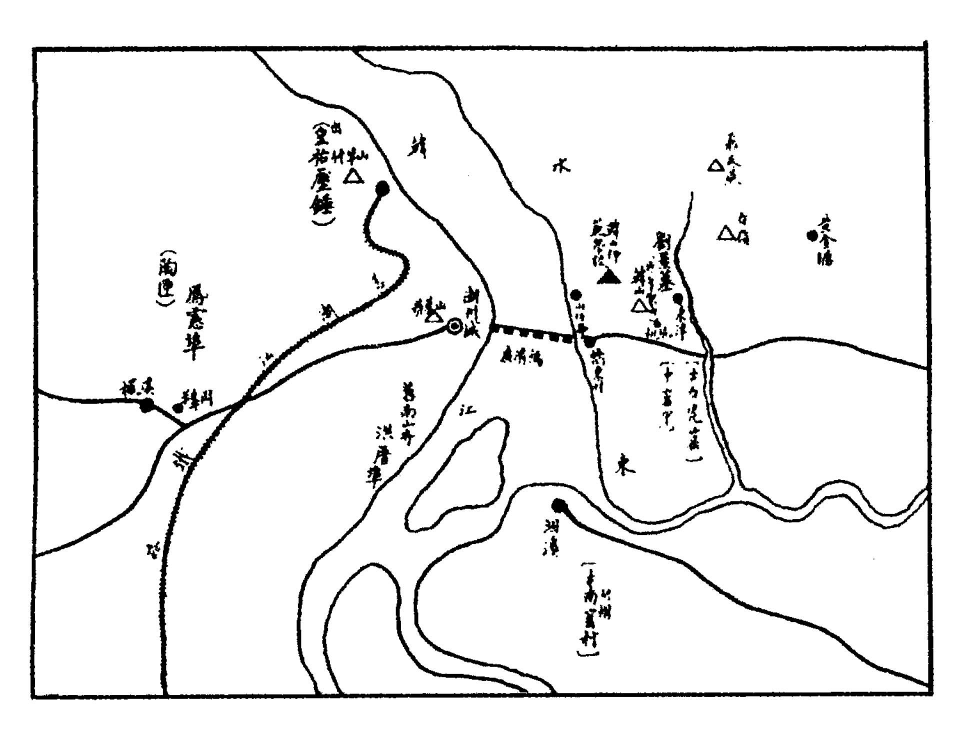
分别，是将这类古瓷中有铁色护胎釉的才叫“龙泉”，没有的则称“三王坝”，现在由洪厝埠古周的发现，说起来“三王坝”也其实是“宋潮州”。

潮州北郊两古窑

潮州市北郊窑上阜的韩江大堤工地上，发现了两个可能是北宋时代的古窑。形制是斜坡式的；在火口里面，是一条斜坡的火栈；后为拱顶的穹窿窑室，内有气窗、烟筒。这种结构和现在广东各地的瓷窑不同，是南方烧柴的古窑特点。离窑上阜一里多的竹竿山，有厚达一公尺的制陶瓷工具的压锤、匣钵、渣饼等堆积物，其中的两个压锤，划有“皇祐二年”（1050）、“治平丁未年”（1067）等字，可以证明竹山陶瓷遗址最低限度是北宋的古窑。如从出土瓷片来看，还可能上至唐代。又竹竿山和潮州西门外八里路的凤宪埠，出土的匣钵划有吴、许、莫、蔡、张、余等陶工姓氏，这种情况，只有在福建宋代建州窑址才发现过，可能为南方古窑的特征。[1]

原载《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

① 《大公报·新野》，1995。



潮州水东窑址图

说明：飞天燕、白领为磁土产地。桥东村宋代许氏居此。桃坑、东津自宋以来刘姓所居。山仔垒附近旧称拐窑村。韩山学校、胡芦山、竹竿山与百窑村并有陶瓷窑址发现。羊鼻冈即治平熙宁佛像（周明造）发现之地。枫溪今为潮州唯一瓷业中心。



治平四年九月像（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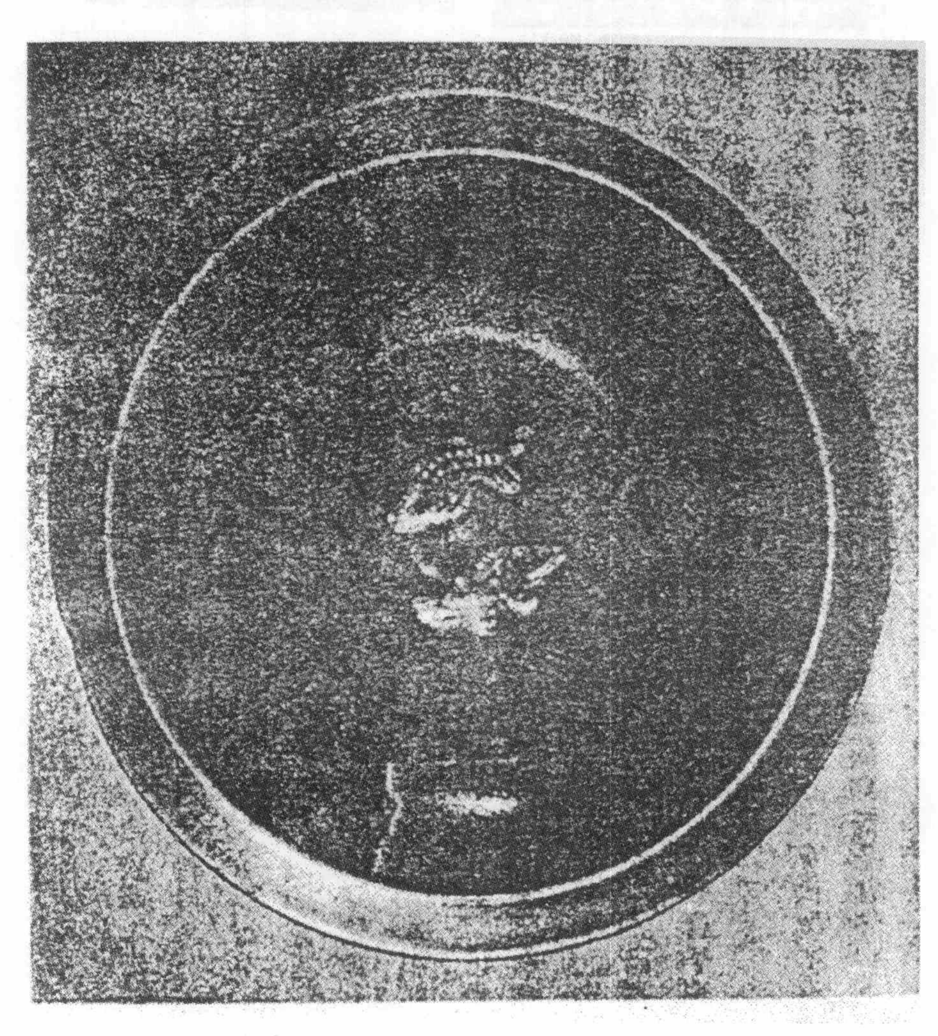
治平四年九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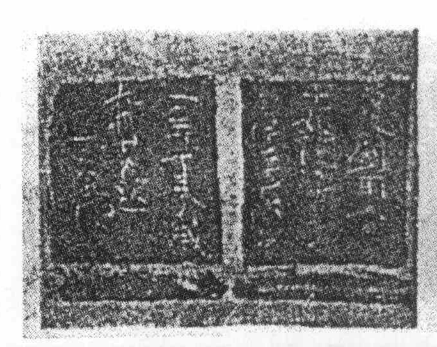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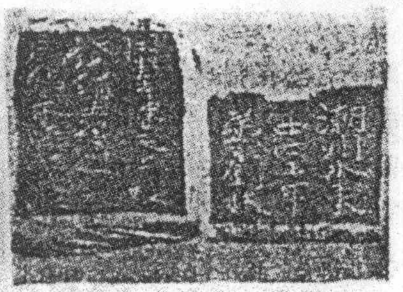
北宋佛像伴出之莲瓣香炉



熙宁元年五月像



潮安双鱼龙泉瓷碟（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宋治平四年瓷佛四面⿸厂⿱攵手书文字

制陶瓷压锤拓本　释文：皇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张世丑

潮州出土文物小识

此次广东省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南汉至清文物展览，展品中潮汕地区出土文物占有相当分量，循览之余，顿引起乡梓之思。虽诸位专家论著说明，周详精辟，已无遗蕴，然涉及史迹方面，尚有不少可以补充者。爰不揣固陋，略举数事，以供谈助：

一、南汉宫砚

广州东郊石马村南汉墓出乾和十六年砖，有瓷器多件（展品一—五）。王渔洋《池北偶谈》记其“故友陆汉东卿孝廉有小砚，是南汉刘鋹宫中物，有鋹宫人离非女子篆铭”。陆卿，饶平人，原名漾波。余家旧藏有其《回风草堂集》与《吴越百吟》合为一册，清初刻本，陆卿与渔洋以诗交往。渔洋深惜是砚，汉东殁后不知流落何许。此次展品有宋砚二（展品四十四、四十五），联想及此，因附记之。

二、王大宝铜镜（展品三十九）

镜在大宝墓出土，有铭文云：“临安府承父陆家真炼铜照子。”大宝于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廷试第二。时宋室南渡，初建都于钱塘，此镜必在浙所得者，当是临安府镜匠所造。大宝《宋史》有传，又明潮州知府王源亦为

其撰传。曩年见《王氏族谱》，载其建炎二年龙飞榜，主司本拟为第一，时车驾驻扬州，偶次名李易为扬州人，遂取易，以之居二，故其诗有云“对策丹墀中上游，天颜抚谕逊龙头”之句。潮州府城大街有坊曰“榜眼”，即为大宝置者，文革时已拆去矣。大宝封开国男，食邑海阳登瀛三百户，乾道六年四月十三日卒，御葬于登瀛神前山，登瀛领有今之龟湖。郭春震嘉靖《潮州志》：“登瀛都，统龟湖、山洋、曲湾三村。”

此次展品又有揭阳渔湖及黄岐山出土之宋代铜镜（展品四十），则必为当地铸造。潮剧《荔镜记》演陈三（泉州陈伯卿）磨镜故事，宋镜形状，可于展品观之。

三、桃坑刘氏与笔架山窑

广东潮州宋墓有纪年者以1958年发掘乾道八年之刘景墓最受人注目，彭如策有文记之。[①] 曾广亿《陶瓷》一长文引《广东通志》卷六十三称：“刘景为广东潮阳县人。”按景乃刘允之子。嘉靖《潮州志》七《人物志》：“刘允字厚中，海阳人。子昉，龙图阁学士；景，举贤良方正。孙纹、渭、滋、渔、少集，皆绳绳继美。”吴颖顺治《潮州志·科名部》：

> 海阳刘允，默子，绍圣四年第三甲。
>
> 海阳刘昉，允子，宣和六年第三甲……
>
> 海阳刘少集，昉孙，乾道八年第四甲……

往年曾见钞本《桃坑刘氏族谱》：“刘景，海阳人，赐爵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刘渔，景次子，荫官食邑三百户”。昉与景俱为刘允之子。《夷坚志》卷十四“开源宫主”条记其事云：“刘允，潮州海阳人。……（临绝前）呼二子昉、景。……潮人陈安国尝叙其事。昉后更名旦，……知潭州，景尝知台州。”又同书庐陵人张敦梦医条，记其侨寓潮州，与提举刘景事。据上诸记载，刘景为刘允之子，当是海阳人。宋初潮州领海阳、潮阳二县。《宋史·地理志》：“宣和三年，新置揭阳县，绍兴二年，省揭阳潮阳并入海阳”。故刘景当为海阳人，作潮阳者非是。据《刘氏族谱》，刘氏族居韩山（笔架山）后之

---

① 见《考古》，1963（9）。

东湖，其地方称桃坑，刘氏蔚为盛族。允子昉、景，昉子四人，景子九人，皆一时显仕。

潮窑所以集中于笔架山，以其附近白岭出产瓷土之故，北宋有治平四年（1067）款佛像铭云："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为父刘用……造，匠人周明。"潮州城内开元寺之"静乐禅院"政和四年（1114）钟款云："白瓷窑住弟子刘满……舍钱……祈平安。"白瓷窑为地名，在笔架山，刘扶、刘满疑皆刘允、刘景之族人，笔架山窑所在地，为桃坑刘氏聚族之区，故有刘姓多人制造供养。倘以刘景作潮阳人看待，则显违事实。惜《桃坑刘氏族谱》抄本，经乱久佚不可复问，兹就记忆所及参以旧作《潮州宋瓷小记》补述于此。

四、关于吴六奇与郝尚久

诸展品以大埔湖寮墟出土吴六奇墓诗铭（辅助图片五）最有史料价值。其殉葬遗物已见杨豪简述①，墓志铭之额泐刻康熙六年七月十四日谕祭，铭辞出杨旬瑛手笔，旬瑛福建人，进士，任广东巡按御史。② 书丹者杨钟岳，澄海人，著有《搴华堂文集》，梁佩兰选阅，并为撰序，康熙壬申刻本。篆额者罗万杰，揭阳人。甲申后祝发入山，著有《瞻六堂集》，余家旧藏为乾隆乙酉馀轩刊本，前沈德潜序，称其人格可与熊鱼山、方密之、金道隐比伦。其次女嫁吴六奇之子启镇，故称为姻弟。六奇有子十一人，皆与当时权贵结为姻亲，如启师即聘海澄公黄梧之女；又有女适潮州镇总兵刘伯录。伯录，辽阳广宁人，顺治十年以都督同知任潮镇总兵。

志多记六奇征讨功绩，如钟凌秀、张文斌等征抚之事，可参吴颖顺治《潮州志·兵事部》"钟凌秀之变"、"张文斌之变"诸条。六奇归附清在己丑之冬即顺治六年（1649），时清兵南下。《清史稿·尚可喜传》云："七年正月，尚可喜克韶州，下英德、清远、从化诸县，明将吴六奇等迎降。二月师陈广州……复招潮州守将郝尚久、惠州守将黄应杰，皆以其城降。"六奇与尚久同时降清。继而尚久杀车任重，九年，结寨金山顶。此墓志云："潮将郝尚久据潮以叛，清藩统帅至讨。"尚久以顺治十年三月，正式叛清奉永历正朔，自称新泰侯。王昶撰《陆振芬传》亦称曰新泰侯。吴颖"郝尚久之变"条所

---

① 《文物》，1982（2）。

② 《广东通志》四十三《职官表三十四》。

记亦同。[①]《清史稿·耿继茂传》："（顺治）十年，潮州总兵郝尚久据城叛，继茂与端南将军喀喀木、总兵吴六奇合军讨之，围城逾月。城将王立功为内应，树云梯以登。尚久入井死，余贼尽歼，潮州及饶平、揭阳、澄海、普宁诸县悉平。"是役六奇与有功焉，故墓志特表之。

六奇早年与查伊璜之事，见《觚賸》、《聊斋志异》、《香祖笔记》，已近小说家言。此墓志记其一家子女及姻亲关系，足为地方志征献之助，故略为考证以供参考。

郝尚久事迹，《明季潮州忠逸传》为立专传，余弱冠于溪东关帝废庙搜得尚久于辛卯（顺治八年）所立之碑记，自署籍贯古汴守潮州等处总兵官，盖与六奇同降清后所建者。此碑省州县志均不载，全文收入拙作《固庵文录》中。

原载《广东出土五代至清代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

① 乾隆《潮州志》作"新泰伯"，误。

潮州历代移民史

——民族志之一章

中原人民之南移，或以屯戍，或以避乱，或则迁谪而留住，或因勤王而播迁，要不出此数因。潮州古属荒陬，瘴海连天，鳄鱼野象，所在为害。意其地一如今之南洋群岛，人稀地旷，宜于殖民。

自宋迄明，南来者多，日臻繁盛。洎清初严禁通海，筑界迁斥，沿海各地，悉为废墟，民始有内徙者。历史上大量移民，自中原南来可考者，有如下数：

(一) 秦　《史记·南越王尉佗传》，秦时已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汉书·高纪》，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群，使与百粤杂处。考《史记》徐广五十万人守五岭，揭阳岭为当日戍处。《方舆纪要》，揭阳山在县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三支，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亦曰揭阳岭。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留家揭岭，或以为即此山。又有谓揭阳令史定即其后，顾无确证，然此即中原人士最早居潮州者也。

按：秦之开发岭南，三十三年发逋亡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为南海郡，以遣适戍。其先越叛，使尉屠睢南来，以监禄凿渠通道，时发卒五十万，分五路。一军据镡城（湖南黔阳），一军守九疑（湖南宁远），一军处番禺（广州），一军守南野（江西南康西南赣江南岸），一军守余干（南昌东余干县）。而越人皆入丛薄中，秦师大败，屠睢被杀。后始皇

遣赵佗为龙川令，击越，谪徙五十万戍五岭，三郡遂获控制。至三十四年筑南越地。据《尉佗传》，任嚣谓佗欲兴兵绝新道。苏林云，秦所通越道。考南康有揭阳，即五路军所屯南野之塞，史禄所家，是否为南康之揭阳，抑曾至今潮州境，年远代湮，莫由详悉矣。

（二）汉 武帝元鼎五年，余善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①]，可见其时中原戍卒八千人来揭阳，盖由闽遵海来潮者。[②]

（三）吴 揭阳曾夏率众拒吴，所部数千人。[③]

按：汉末安成长揭阳吴砀，拒吴不敌，突走。大埔《温志》谓曾夏即砀还揭阳所号召以抗吴者。考砀据攸县，在湖南中部，去潮之揭阳尚远。吴时赣有揭阳，夏所籍之揭阳，是否南海之揭阳，尚难遽断，然其部曲数千人，分布区域，疑当远及赣边。查《宋书·州郡》义安户1 119，口5 522，使此数为实，宋时潮地仅千户，则夏所领人数，非限于潮之揭阳明矣。

（四）晋 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全义招县。《南越志》：义招县，昔流人营，此五营之兵，皆当时流人也。

（五）唐 总章二年，陈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五千六百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④]，此为福佬之祖。开元二十一年，唐循忠于潮虔福间检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因奏置汀州。此三千余户，为中原人民徙入较迟者，当为客家之祖。

唐末随王潮自中州来者亦夥。中和元年八月，寿州屠者王绪聚众五百，陷光州，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邽审知应之。光启元年，绪悉举光寿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转掠江洪虔州，遂入闽，陷临汀漳浦，有众数万。绪前锋将擒绪，

---

① 见《汉书·闽粤王传》。

② 东汉移民人数无可稽考，然以永和与元始人口比较，南海郡增十五万人左右，平均每县可增二万人，揭阳处荒陬，疑无此数也。

③ 见裴注引《会稽典录》。

④ 《饶平大巷陈氏族谱·陈政传》，《漳州志》同。

奉潮为将军。景福二年五月，陷福州，拾月，为福建观察使。是时光黄寿州之民，多充潮将，随之入闽[1]，其时因避乱而南徙者尤众，大率扶老携少以行。

（六）宋 《宋史·文天祥传》，景炎元年，天祥出江西，收兵入汀州，十月，取宁都于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皆自江西起兵来会。此赣人之入闽也。二年，天祥自兴国兵败，元军破汀关。闽赣义兵，相率随帝室播迁，辗转入粤。当日巨姓南迁者，有吉水徐氏[2]、宁都谢氏[3]、颍川陈氏。[4]

中原人民之南徙，约如上述。清初，郑氏称雄海上，清廷于滨海各县，迁界徙民，如澄海全县毕裁。于是民多内迁。抗战时间，潮汕陷落，有资产者多迁入自由区，或北徙兴梅，远则至贵阳、重庆、昆明，然为数甚少。穷困者流转道路，或尽鬻田产，徒步入闽赣，或至桂林。此近岁移民之大概也。[5]

本州境内移民，则以南山移垦一事最为足述。当民国十七年，共党盘踞南山，二十一年独立第二师大举围剿，暂著其地人民离境。至共党敉平，为善后计，成立南山移垦委员会，将昔日离境之人民移回，举行登记，并发给移垦证。时分惠来、流沙、云落、两英四处登记，自民二十二年七月起，至二十四年四月止，登记人数共 44 728 人。于是南山恢复旧日之繁荣，其后因有管理局之设焉。

至于户口增减，与移民关系甚大，兹略论之。刘宋时户 1 119，口 5 522。是时义安郡领县五：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包括今闽之漳浦、漳

---

① 《崇正同人系谱》云：沈氏五代时，其族有从王潮入居福建汀州，又吴氏云，散处中州，其后有随王潮入闽，皆其例。

② 《和平徐氏谱》，载元年南下豫章，道隆起兵勤王死之，德隆随宋帝度岭南下，卜居龙川乌龙头。

③ 《崇正同人系谱》云：宋景炎间，江西宁都谢新随文信国勤王，收复梅州，长子天祐家于梅之洪福乡。

④ 《崇正同人系谱》云：陈氏郡望颍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室播迁，有陈魁者，率其族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宁化上杭，其曾孙孟郎、二郎、三郎，由闽迁粤之程乡，散布于大埔，兴宁、长乐、龙川等处。

⑤ 据三十三年七月调查，潮民入闽，迁徙平和、诏安、云霄、南靖、永安、上杭，难民数达十万人，以朝安、澄海、揭阳为多。其入赣者，据三十二年五月九日，粤赣当局合组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登记，总数七万余人，其中以揭阳、普宁、丰顺、潮阳为多，大埔、海丰次之。其中分配，为自动集资垦殖者仅万余人，自动谋工商业者二万余人。难民散布于泰和北门华侨垦殖场、永昌南侨公司、沙村、白沙、冠朝、河东郭家祠。其挈家入桂橡者，有结茅住于穿山，为人佣作，仅三数家耳。

州，粤之大埔、梅县，及第五区全境，仅有千一百余户，可见地旷人稀。惟考汉时南海郡，户 19 613，口 94 353，而苍梧户 24 379，口 146 160，交趾户 92 440，口 746 237，九真户 35 743，口 166 013。交趾比南海多四倍弱，南海户数反在苍梧、九真之下，知汉时粤西南部，与安南广西接壤之处，人口最多。证以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雒四十余万口，及东汉苍梧广信人物之盛，可审其故。至粤东南角，即潮州一带人口，实为最稀少也。平帝元始时，南海户 19 613，口 94 353。时南海县六，平均每县可 15 726 人。经王莽之乱，至永和五年，南海户 71 477，口 250 282。较元始时户增 51 864，口增 156 029。时南海分七县（番禺、揭阳、博罗、中宿、龙川、四会、增城），平均每县可二万二千三百余人。潮之揭阳，户口绝不及广府之盛，然较《宋志·州郡》所列之口数仅 5 522，多三倍以上。疑当日多半流民，未经土断，故户不满二千也。

隋户 2 606。此户数不知何时调查，如当大业初，则其时已省绥安人龙溪，海宁不久亦废，并人海阳，州境较刘宋时为缩，而户口增多，将及一倍。唐开元户 9 327，元和户 1 955，《新唐志》载户 4 420，口 26 745。开元户口，较隋增逾四倍。时潮境更缩，旧时绥安、海宁均分割，只余海阳、潮阳、程乡三县十六乡，而户口激增，疑有数因。自隋整理户籍，往时土断未行之弊始革，强豪浮客，均获著籍，此其一；唐武德初，潮属俚帅杨世略来归后，土著始为编氓，此其二；陈元光所带府兵来漳潮者，据《陈氏族谱》载，有五千六百名，时分四行台，其一自南诏抵揭阳，则增加之户数，一半为陈氏戍卒，此其三。惟畲蛮负阻山谷，虽以陈元光亦不克平定，则当时必无编户。《长汀志》载唐昭宗乾宁元年，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此洞蛮即长汀东南与大埔程乡交界处之畲民。即此一隅之畲民人数，已与《新唐志》全潮人数相埒，诚堪惊人。此可见唐时闽潮间土著为畲民也。元和时，潮州人数，据《元和郡县志》所载，仅 1 955 户，较开元时减 79%。其故安在？考天宝十四年，全国 891 万户，经安史之乱，至乾元三年，仅 193 万户，五年之间，减少 78%。与潮州户开元元和间之比差相似。以全国论，固由于锋镝死亡，与离居荡析。而潮州当日兵事，只有开元二十六年刺史陈思挺之叛，大历十年哥舒晃与节度使伊慎战于潮阳。时地方未经重大兵燹，不得为户口锐灭原因。窃疑天宝以后，方镇肆暴，岭南与中枢脱节尤甚，私设簿籍，隐漏户口，而大姓荫户，闾吏匿报，大乱之后，图籍散佚，荒远之地，鞭长莫及，莫之谁何。元和户数之锐灭，其故殆由于此。自宋以降，户口增减，已详《户口志》

中，兹不具论。

台海去潮一衣带水。清初郑氏踞台抗清，潮属滨海各县，多举兵勤王。而名公巨卿从渡台者，若辜朝荐随郑经移台，其子文麟，即生于台，长始还潮。故台中潮人，向来为数不多。至今全台操潮州语者，有189 900人，占全人口3%。[①]

至潮人之移殖南洋群岛者，为移民史一大事。据统计，同治八年至十一年，汕头出口共101 261人，光绪三十年至民十二年，实际出口共52 069人，就中以民六年73 000人为最多。盖其时南洋橡椰有价，垦殖利多，商场畅旺，故州人咸趋之也。民二十八年，因抗战时期，人民及儒属避地南徙故，实际出口又越62 233人。三十三年，州境沦陷，交通梗阻，其经揭阳县出口者仅二十人耳。复员后，出口人数虽略有缺乏，外移之数，亦大不如前矣。详《户口》、《侨况》二志。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三十七期，汕头，1947

① 据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侨声报》郑启中调查。

福　老

福老初非潮州土著，大率来自福建，而间接徙自晋豫，与客家同为中原遗族，惟客家播迁于山岳地带，而福老则循海岸线由闽迁粤，《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漳徭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中略）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谓之由陈元光将卒始也。按就其来自河南而言，则曰河老，就其处于福建而言，则名为福老，今漳潮尚自称曰河老，而他省及客家则称之为福老也。

叶钧云：内地流人侨家者，闽人谓为犵佬人，粤人谓之客人。按犵佬为溪峒。五溪蛮自湘入粤，与福老来自闽者，迁徙异地，其说实非，或疑福老即獦獠音转，黄山谷《青草湖诗》云："蕉林追獦獠。"《坛经》也有"獦獠"二字，盖唐宋人，对湘粤人的贱称，尤与福老无与，又福老之佬，或以为即狫字，含有鄙视之义。晋时北人同视南人，每呼为獠，徐松石《元史·萧乃台传》，有刘大僚、邓大僚，以大僚即大佬，佬本字作老，从人者，当属后起，粤人称人均为老，盖古俚语，如外江老、上海老、广东老，至如老师简称曰老，头目曰头老且具尊重之义，老与兄父公，今均为称人推长之美词，特有雅俗之分。至若俗称荒伧曰大老，读阳上声，亦犹通语之乡巴老，谓其老于乡里耳。獠为族名，不得谓即佬也。至老字读 LO，则以闽音读豪为歌，已见宋人笔记，即东坡诗亦歌豪合用矣。潮州古属闽，十道志，寰宇记，俱言潮古闽越地，《舆地广记》亦云：潮州春秋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汉初

无诸为闽越王[①]，潮地东部亦属焉。晋义安郡，领县有绥安、海宁，即闽之漳浦龙溪地。《方舆纪要》：义安郡以绥安为郡治，梁时亦治绥安。[②] 则今之漳浦，六朝为全潮之道府，唐时潮州两度属闽[③]，则闽南之民，其初亦潮人也。

中原故族，入闽始于晋之南渡，唐林谞《闽中记》：永嘉之辞，中原仕族，林、黄、陈、郑、罗先入闽[④]，《姓纂·二十一侵·林姓下》：晋安林放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福建通志》：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今福州曰晋安，泉州曰晋江，均以晋时徙得名。

《崇正同人系谱》：林氏秦汉以降，聚族于河南光州，在永宁三年，林世荫守晋安，因家于是，为入闽之始。《西河林氏族谱·林文迪序》：晋元帝东渡，以禄为招远将军，合浦太守，还即晋安之温陵，因居焉。

潮州自秦时，史禄留家揭岭，汉余善以八千兵至揭阳，中原人士，入处于潮，秦汉已有之，然以永嘉之乱，南来者为多，晋时徙入潮州，有潮阳范氏[⑤]，此潮州氏族可考之最古者。

唐时中原氏姓迁入者，有潮阳洪氏，来自莆田。[⑥] 大颠之先世，则来自颍川。其成群而南下者，厥为陈政、元光父子率领戍卒。考其自带兵，前后二批，首批府兵五千六百名，镇于绥安故地，次批军校五十八姓，为政兄敏、敷所领，屯梁山外云霄镇，时立四行台，其一自南诏下游直抵揭阳。

《饶平大巷陈氏谱·陈政传》云："泉潮间，蛮獠啸乱，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与府兵五千六百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并赐医士李如刚偕行，出镇于绥安故地，旋退九龙岭下，顾其地势险固，可耕可守，奏请援兵。朝命二兄敏、敷领军校五十八姓南下。咸亨元年，奉母同行，至浙之江山，不幸二兄俱故，诸侄沦亡，公迎其母，葬其二兄暨诸侄于蒲城，由是尽得其父之兵，合姓五十八进屯梁山外之云霄镇，建宅于山之火田村，营城置堠。"又《陈元光传》云："立行台于四境，一在泉之仙游乡松洲堡，上游直抵苦竹镇（苦竹镇，今龙岩县治），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堡（安仁南

---

① 越王勾践，七世初自立为闽越王，秦以其地为闽中郡，至汉高帝五年，复立为闽越王。

②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

③ 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天宝元年至十年，称福建经略使。

④ 《书录解题》引，又漳浦《林志》同。

⑤ 《潮阳志》云：范思禹十世祖昌谷，仕晋郎官，始开榛莽于潮阳者。

⑥ 洪良缵《岐北续修谱序》：洪氏祖，在福建兴化府莆田镇前涵头上，祖瑀，唐中宗时，知潮州府，遗一男适，适遗一男圭，字大丁，赐进士工部郎中，授潮州府知府，因见潮邑山水之胜，创立龟山，后迁嘉定岐北，为洪氏之始祖可证。

诏，今诏安县地），下游直抵揭阳，一在常乐里佛潭桥，直抵沙澳里大母山（常乐佛潭沙澳大母山，今漳浦县地）；一在新安之大峰山河人清宁芦溪太平堡，上游直抵太平镇（新安大峰清宁芦溪太平，今平和县地）。

此当日所领兵数及屯戍情状，至其援军五十八姓诸将，据《陈谱》载，宋理宗追赠受荫人名如下①：

陈克耕（元光父），李如刚（医士，妇彦氏），许天正（前锋将宣威车，妇姚氏），马仁（殿前都检点，妇韩氏），李伯瑶（定远将军，妇丘氏），欧哲（宁远将军，妇尤氏），张伯杞（丁荫封，妇徐氏），沈世德（军谋祭酒，妇吴氏，漳浦志作黄世纪），郑时中（府兵长史，妇阴氏），杜孔著（行军司马，妇令孤氏），魏有仁（行营赞善，妇孙氏），朱秉英（粮储主薄，妇卢氏），卢如金（妇翟氏），刘举（妇司马氏），涂本顺（妇瞿氏），欧真（妇朱氏），沈天学（妇李氏），张公达（妇詹氏，漳浦志作光达），廖公远（妇曹氏），汤知（妇杨氏），郑平仲（妇上官氏），涂光彦（妇曾氏），吴桂（漳浦志作贵，妇雍氏），林章（妇陈氏），李牛（妇方氏），周广德，戴仁，柳彦深等，以上十六人，皆府兵校尉。陆明（妇麦氏），苏道，欧阳传惠，司马仲章，杨永，詹英，曾仲规，萧闰，胡宝，赵瑞，蔡或，张耒，叶清，颜伯矩，柯敦颐，潘节，钱仲先，魏仁溥，郑业，余良，朱参，罗幼僯，姚洁，余充，郑惠，汤公简，韩器，吴弼，王华，陈叔章，王一中，张本仪，林走非，陈马，詹次孙，梁文，何德，方子重，赵伯恭，庄肃鸾，唐宗礼，陈实，邹牛容，丘安道，冯俊水，江延兴，石子尊，韩求，李彪，郭鱼，曹敦厚，李仙客，高盛，钟汝兴，徐睦，翟怨，汪子固，韩翘，洪有道，章鳌，宋用，李宏，杨珍，王祐甫等，以上六十四人，皆任府兵队正。

章敦复（妇金氏），汪乃君（妇王氏）等，三百零八人，皆任府兵火长。②

今潮之望族，若许氏、李氏、卢氏，皆当日随从之胤③，冠平以后，占籍

① 康熙《漳浦林志·丛谈》引，陈元光家谱亦载，从元光来闽，有婿卢但道、戴君胄及医士李始，前锋将许天正，分营将马仁等五人，军谋祭酒黄世纪等五人，府兵校尉卢如金等十六人，又从唐侯来者五十八姓及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与饶平《陈谱》同。

② 漳浦《林志》引《西潮蔡氏谱》，从陈政人闽者，又有蔡长眉，为漳蔡氏之祖。

③ 许陶随元光平寇，封昭应侯，见韩江许谱，李伯瑶助平蓝雷，封辅胜侯，见《李氏谱》卢震助李诱蓝雷。

漳潮，福老之民，即以此为主干。元光本河东人[①]，其部曲亦然[②]，如许天正，亦太原人[③]，河东人民大量徙潮，盖始于此。考闽、潮语与山西方言多组合，如潮音特殊声母之 b、g 二音，出于山西之 mb、ng。mb、ng 二特殊音，仅见于山西之归化、太谷、文水、兴县、平阳等地，瑞典高本汉，以为闽语 b、g，与北方之 mb、ng，当有历史关系，不知闽潮语之 b、g，即因陈元光戍卒徙来，此尤足证陈氏所挈河老之为河东，而非河南也。唐代河东来潮者尚不止此。如释维俨，本绛县人，来潮阳事惠照禅师于西山，而东津刘氏亦于唐末自河东来潮云。[④] 唐末王潮入漳，从来者，多中州人民，后辗转入潮。[⑤] 其为王室之胤者，如潮安汤头王氏，即其一例。[⑥] 其他自固始迁来者，唐初有东津薛氏[⑦]，宋有柳冈陈氏云。[⑧]

自宋以来闽人多迁潮，而仕宦占籍者尤众，以莆田最多，蔚为望族，兹略举之。

南安林氏 林从周，其先西河人，自南安（即泉州）徙潮州（当来自五代），为海阳著姓（见余靖《林从周墓谒》）。

晋江陈氏 陈坦，福建晋江人，元符中，知海阳，占籍为秋溪陈氏始祖（见府县志，不注出处者下同）。

莆田黄氏 黄詹，莆田人，建炎进士，潮州通判，后知军州事，家潮阳。

莆田郑氏 郑徽，莆田人，南渡偕子诚来潮，卜居隆井都。

福州林氏 林绍坚，福州人，绍兴进士，入籍潮阳，再迁澄海蓬州富沙。其弟廷璧，潮州通判，占籍揭阳渔湖都。《崇正同人系谱》云：至正间，有林

---

① 《元和姓纂》：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朱翌《威惠庙记》，亦云元光河东人；《漳州志·陈政传》，谓其渡云霄，指江水曰："此水如上党之清。"漳州名始此。又《大巷陈氏谱》，政父字克耕，隋末义安郡丞，太宗时曾率精兵五万取霍邑临汾，均为元光及其先世为河东之证。

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谓元光将卒，悉河南人；温廷敬撰《许申传注》，此河南当作河东，唐宋光州属淮南不属河南，元始改隶河南。果元光为光州人，当称淮老，不当称河老。

③ 《许氏谱》：天正望出汝南。温撰《许传注》云：《姓纂》汝南自许劭、许慎后，无闻，惟太原一支自云许劭后。天正为元光偏裨，元光将卒已皆河南东人，则天正亦当为太原人，故望出汝南，其说是也。

④ 《刘氏谱》云：世居河东，唐末刘嵩子颖，始居于潮。

⑤ 《崇正同人系谱》：吴氏世居渤海，散处中州，其后随王入闽，入于潮嘉等处，吴六奇即其胤。

⑥ 《宋史·王大宝传》：其先由温陵徙潮州。《汤头王氏谱》：其先世自闽王审知其玄孙坦，始由泉州徙漳浦，移饶平黄岗，复迁海阳登瀛，又四传而至大宝。

⑦ 盛端明《薛壅墓志》：远祖光州固始人，垂拱间，有参寇事于闽漳者，遂家于漳，后始迁东津。

⑧ 《潮阳志》：陈汤征河南固始人，淳祐潮阳令，家于潮阳之直浦乡。

积福者，世农莆田，其第三子名梁懋，官潮州主簿，遂家焉，是为林氏入潮之始。

莆田方氏 方骥之，莆田人，淳熙潮阳尉，侨居惠来，为惠来方氏始祖。

莆田陈氏 陈愉，莆田人，嘉定知潮，家于潮阳濠浦。

龙溪萧氏 萧洵，龙溪人，端平间潮阳令，卜筑南侨，为潮阳萧氏始祖。

莆田魏氏 魏廷弼，莆田人，嘉熙知潮。占籍潮阳。

兴化蔡氏 蔡规莆，兴化人，淳祐间知潮，澄海丙门蔡氏始祖（见《济阳族谱》）。

莆田丘氏 丘世乔，祖成满莆田人，咸淳中，潮州安置，家海阳（见《丘氏族谱》）。

晋江洪氏 洪璞，洪适孙。绍兴中，授闽泉州晋江尉，遂家焉。裔孙贵生，自晋江迁丰顺阳田布心，为洪秀全先世迁粤始祖（见《洪氏宗谱》）。

宁化张氏 张衍，淳正时中宪大夫，自宁化迁上杭，其七世孙淑芳，端宗朝移居潮州竹竿山下，寻入兴宁，大埔张氏亦出此派（见《崇正同人系谱》）。

上杭郑氏 孝宗时，郑清上杭梅溪巡检，遂家焉。其后分籍惠、潮、嘉各属（同上）。

宁化刘氏 黄巢之乱，刘祥奔走宁化县，传十余世，至宋中叶，有开七者服官，移家潮州，寻迁居程乡（同上）。

庐陵彭氏 彭延年，江西庐陵人，元丰知潮州，延年第四子钱从潮阳，隐揭阳浦口占籍。

龙游袁氏 袁琛，浙江龙游人，元丰谪潮，因家焉，墓在今潮阳灵步百井坪，潮、揭、澄三邑袁氏始祖。

常州丁氏 丁允元，常州人，淳熙知潮，占籍海阳，为仙田丁氏始祖。

道州周氏 周敦颐裔孙梅叟，湖南道州人，淳祐知潮，占籍潮阳。

为数无多，亦皆同化于福老。宋末闽人随宋帝来潮，实繁有徒，如镇平邱氏、揭阳谢氏、海阳程乡江氏，即其例。

邱氏 《客家研究导论》引刘士骥《梅州邱创兆堂记》云：梅州邱氏始迁祖文兴，文信国参军。先世由中州迁闽，信国勤王师起，与谢翱同仗气入幕，信国北行，与翱同归闽，道梅州北，今镇平县文福都，因卜居焉。

谢氏 《灵光集·谢翱轶事》：揭阳梅都翔龙厦乡永思堂谢氏有始祖翱公木主。《谱》载祥兴元年，翱公来潮之室母氏妈，生子怀壶，已八月。冬十一

月，潮阳溃，公与妻子避居伺士村。元末子孙居移翔龙，怀壶公生子二，长东山公为桃山祖，次西河公为翔龙祖。潮阳隆井都九曲水，有翱墓。

江氏　《崇正同人系谱》：江万里，江西都昌人，弟万载、万顷，俱官要职，宋亡，其子孙避兵，迁闽家汀州，其后有迁广东澄海、海阳、程乡。

或谓福老有新旧之分，其来自莆田者为旧族，来自漳东者为新族，亦不能辨，约而论之，福老族之构成，不出如下四者：

（1）隋唐以前，福建区域之旧潮人。

（2）陈元光所领之戍卒。

（3）隋唐末王潮南来之中州仕族，及宋末从宋室南迁之赣闽士民。

（4）谪官之占籍。

元明以后，闽人迁来尤众，且多沿海岸西迁，惠属海丰惠阳，广属东莞南路之雷州以至海口，均有福老民族足迹云。①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四十四期，汕头，1948

① 民国《儋县志》：天后宫清初为福潮会馆，可见闽人迁海南远在明以前。嘉庆《雷州志》：海康英风社，有潮阳村，郑姓世居，必以潮人迁徙得名。

古海阳考

《周书·王会》言八方所献，“海阳大蟹”。潮州府县《志》皆以为潮州海阳县贡献之始。明郭子章《潮州革考》言海阳县名最古，援《周书》此语为证。吴颖修《府志》依郭书为说。其后林杭学、胡恂、周硕勋诸《府志》，暨张士琏《海阳县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①] 皆仍之。

今录张《县志》以示例，其言曰：“周成王十四年，东越海阳贡蚌蛤。《汲冢周书》云：‘成王定四方贡献，东越蚌蛤，瓯人蝉蛇大蛋，海阳大蟹。’注云：‘东粤瓯人皆交州属。’盖自汤定南越献令之后，大蟹始著于海阳，亦献令之一端也。”[②] 按《周书》原文“东越海蛤”，不作“蚌蛤”。孔氏《传》：“东越则海际；蛤，文蛤。”又《志》引注：“东粤瓯人皆交州属。”《周书》云：“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③] 孔《传》：“东粤，瓯人也。交州蛇为上珍。”（瓯一作欧。）下句一作“北交州，蛇特多，为上珍也”。何秋涛曰：“北当作比，比，近也。”是张《志》引文亦误。秋涛又曰：“《王会》此篇，瓯人次于东越干越之间，则其非珠崖交阯之瓯，灼然可见。《注》又云：‘交州蛇为上珍’者，引以证食蛇之事耳，非谓此瓯人即交州之瓯也。”言甚明核。而张《志》以为交州属，尤谬解《注》而妄著论。《周书》，海阳次于瓯越之后，会稽之前，是海阳地必近会稽。而《志》被之潮州，又潮地秦前隶东越，非

---

① 《集成》盖据林《府志》。

② 《张志》八《事业·杂记》。

③ 依俞樾读，见《群经平议》七。

臆说而何？下文言南越，又似以南越赅东越，益纠结而不清矣。

惟潮州，北有梅岭之障，与中州未易交通。谓僻在恶溪之海阳县（今潮安），周成王时而有“盈车大蟹”之贡，殊难置信。潮州海阳县，晋始置，厥名起于后世，尤不得指为《周书》之所云。然则《周书》之海阳，当别有其地矣。

孔晁《注》曰：“海水之阳，一蟹盈车。”不云地名。王应麟《补注》曰：“《史记》：苏秦曰，楚东有海阳。”苏氏语本见《楚策》。《策》云：“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海阳，鲍《注》云：“海之南耳，非辽西部也。”与孔《注》同以为泛称之名。然苏氏举其名，与巫郡、苍梧对称，则为专有地名无疑也。刘伯庄言：“楚并吴越地，东至海，海阳盖楚之东南境。”亦未能确指其所在。吴师道引卢藏用曰：“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矣。”程恩泽不主卢说，而以为潮之海阳，云：“《地理通释》，楚威王六年，败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左传》，楚奄征南海。则自春秋以来，楚已跨及蛮越矣。若仅以今扬州府泰州当之，似不足以尽其疆域。”[①] 予观苏秦所言楚四境之地，皆举其著。东之夏州即汉阳，若以为潮之海阳，则去汉阳殊远。虽楚疆域甚博，然较黔中之与巫郡，洞庭之与苍梧，甚不相称。《左传》：“楚庄伐陈乡取一人以归，谓之夏州。”是也。海阳又在夏州东，若云其地如汉之揭阳县，跨有豫章南境，则当云“东南”，于“楚东”二字，犹未尽合。

然则其地果何在耶？间曾博考众说，惟何秋涛最为评核。其言曰：“海阳后为楚地。……当在今江苏扬州府常熟县北，萧刘尝于此置海阳县，属南徐州晋陵郡。所以知其然者，……《吴越春秋》云：‘越王追奔，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欲入胥门，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头云云，子胥乃与种、蠡梦曰：越如欲入，更从东门，我为汝开道贯城以通汝路。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入海阳。于三道之翟水，乃穿东南隅以达。越军遂围吴。’《吴越春秋》汉人所作，其时近古，于古地名当不舛错。所云海阳在吴之东，正常熟之海阳也，与楚东之形势正合。凡苏秦所言列国地名，皆举其最显著者。《王会篇》之海阳，即此无疑矣。若晋徐州广陵郡有海阳县，当在今江苏扬州府境。刘宋广州义安郡有海阳县，即今广东潮州府海阳县治。此二海阳，虽在楚东南，然未见于周秦之书，盖名起于后世，非其地矣。又汉辽西郡有海阳县故城，在今直隶永平府滦州西北。其地在东北陬，非楚之东南境。或以为此篇之海阳，

---

① 《国策地名考》七。

果尔，则不应列于瓯、越之间矣，其说非是。”[①]《王会篇》、《国策》之海阳，何氏所考，得之矣。

《史记·高祖功臣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又有海阳斋信侯摇毋馀。《注》云：“以越队将从（高帝）破秦，入汉（《潮中杂纪》‘汉’作‘关’），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七百户（《史记》作‘百’）。六年三月庚子封，九月薨（《史记》无九月语）。”此海阳旧无注释，后魏郦道元始以为在辽西，其《濡水注》云：新河故渎，自右北平昌城来。东出，合封大水，谓之交流。又东出海阳县，合缓虚水。又合素河水。又至九澨口，皆为二，一南注海，一东径海阳县故城南。高帝封摇毋馀为侯国。《魏土地记》曰：“今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者也。”《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海阳县，故郦氏依以为说。其后《清一统志》十四《永平府》二、钱大昭《汉书辨疑》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八、沈钦韩《汉书疏证》三等皆从之。

唐司马贞为《史记索隐》，又别为说曰：“毋馀，东越之族也。海阳亦南越县，《地理志》阙。”[②] 按：此文言毋馀为东越族，下文忽言南越县，又用“亦”字，于文理不顺，疑或有误（“南”字似当作“东”）。然后人因《索隐》有“亦南越县”语，遂以为毋馀必封潮州之海阳。罗泌《路史·国名纪二》云：“海阳见《王会解》，汉之揭，亡馀所封。见今潮之海阳县，潮旧谓南越地，二越之间尔。”是直以为汉之揭阳矣。郭子章撰《潮中杂纪》，言：“海阳之名，始于摇毋馀，盖秦以来有此县矣。”[③] 于是潮州府县《志》皆以毋馀为“封爵之始”。[④] 书之于《职官》[⑤]，祀之于名宦。[⑥] 而摇毋馀者，俨乎潮州官员之元祖矣。

考潮州沿革者，亦因《索隐》而言海阳为南越县，秦时已置焉。阮《通志》曰：“考封摇毋馀，在高祖六年。毋馀乃东越之族，以都尉击秦。都尉亦是秦官，疑即秦时海阳之都尉，当时即以所治封之也。”[⑦] 又光绪《嘉应州志》二曰：“或曰，海阳，汉初属南越，高帝何得封侯？不知此乃虚封，如象郡、

---

① 《王会篇笺释》上。

② 《史记索隐》六。

③ 见《古今图书集成·潮州府部汇考》引。

④ 吴、林、胡三《府志》，雍正、光绪《海阳县志》并同。

⑤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及诸《潮州府志》、《海阳县志》皆有之。

⑥ 顺治《潮州府志》十二《古今文章》郭子章《请从祀名宦议》云“海阳侯摇毋馀，从汉高帝灭秦、破项，为东越功臣之最”云云。故旧《志》载潮州名宦祠，祀有海阳侯摇毋馀。

⑦ 亦见光绪《海阳县志》一《沿革》，光绪《嘉应州志》三十二《丛谈》。

桂林、南海，高帝时尚属南越，遥虚以封吴芮耳。然则武帝开南海郡六县，何以无海阳？此殆开县时并诸揭阳也。海阳之名已久，所以晋人复因而置县耳。”又三十二《丛谈》曰：“《元和郡县志》：‘晋置义安郡海阳。’意者当废于后汉，在晋复立耳。”又光绪《海阳县志》曰：“海阳侯封于汉，《索隐》又明言‘海阳南越县，《地理志》阙’，不得谓西汉时无海阳也。故阮《通志》又引《太平寰宇记》云，‘潮阳本汉晋海阳也’，乐史之言必有所据。是亦未尝专据《地理志》断西汉为无海阳也。”于是世以秦汉间南海郡有海阳矣。

以海阳在辽西或南海，二说均未的。谓封于辽西，则地太远，虽云“越境而封，亦间有之事”[①]，然毋馀子孙世居余杭，自与辽西无关。且《索隐》言“《地理志》阙”，则此海阳非属辽西郡甚明。若谓为潮州之海阳，则“晋始置为县。且其时地属赵佗，高祖安所取而封之？”[②] 谓为虚封，然《汉书》明云千七百户，非封而何？至其据《寰宇记》“潮阳”条，“潮阳本汉、晋海阳县地”一语，执以为汉南有海阳之证。然检《寰宇记》百五十八“海阳”条，但云：“县本汉揭阳县地，晋立郡于此。”[③] 又“潮州”条云：“亦古闽、越地，秦属南海郡，秦末属尉陀，汉初属南越，后属南海郡，东汉因之。”[④] 绝不言汉有海阳县。岂有言海阳事，略于本条而反详于他条乎？所谓“潮阳为汉、晋海阳县地”，“汉”字必为衍文[⑤]，乃执为证，诬矣。《南越志》：“海阳县南十二里即大海。”[⑥] 又《郡县志》：“南滨大海，故曰海阳。”此海阳县之形势及其得名之由也。海阳处海陬，极瘴毒之恶，宋时尚为毒蛇窟宅。《宋史·五行志》，乾道十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况远在秦、汉，其害当益难究诘。岂有以开业之功臣，而封于蛮貊之地哉？《舆地广记》：“海阳县，汉揭阳县地，属南海郡。东越王余善请以卒八千击南越，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即此地也。后置海阳县，为义安郡治。”盖古地志无以秦、汉南海有海阳县者，而《索隐》“南越”一语，非有所本，实未足信。遽依为说，亦见其乖离而已。

前两说，梁玉绳亦并以为非，而别依《国策》吴注引卢藏用，谓在扬州海陵。然《国策》之海阳究非汉县，周寿昌驳之是也。

---

① 周寿昌语。

② 梁玉绳语，见《史记志疑》十一。

③ 《元和郡县志》三十五亦同，又《御览》百七十二引《十道志》同，乐史盖袭此。

④ 此语亦见《十道志》。

⑤ 又使汉时有海阳。其地亦必不如今日之狭小。

⑥ 《寰宇记》一五八引，又《舆地纪胜》一百《广南东路》引。

愚意毋馀所封，当在今江浙间，如何秋涛所说江苏常熟之地。《越绝书》二："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去县五十里。"又云："通江南陵，摇越所凿以伐上舍君，去县十五里。"是摇地本在吴。郑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十"摇氏"条云："勾践之后，东越王摇子孙，以王父字为氏。《汉功臣表》：海阳侯摇无馀，本越将，以都尉击项籍。千七百户，谥齐侯（按脱一信字）。子哀侯昭襄生康侯建，建生襄侯省（《史》、《汉》'襄'并作'哀'，此误），六世孙不更未央生贤，爵关内侯。世居余杭。"《姓觿》三"摇"注引《姓考》云："勾践之裔，抟越王摇后，因氏。《千家姓》云：会稽族，《汉书》有海阳侯摇毋馀。"此摇氏非封于辽西及南海，而在江浙之明证也。徐广曰："摇，东越之族也。"毋馀盖越摇王后，故封于楚东海阳，子孙世居余杭。楚东之海阳，不见于汉地志，故《索隐》云"阙"，亦相应也。

由是言之，古楚东海阳，实处今常熟东南滨海之地。自《周书》、《史记》、《吴越春秋》，其地望皆指此。后世以为在辽西或南海者，殆因同名牵涉而误矣。

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六—七期合刊，北平，1937

复收入《潮州丛著初编（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1938

附一 与郭伟川函

伟川如晤：

摇毋馀封侯一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

> 海阳齐信侯摇毋馀，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籍，侯，千七百户。三月庚子封，九月薨。（位次）三十七

考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中以越将受封者，毋馀之外，又有下列四人：

> 阳都敬侯丁复，以越将从起薛，至霸上，……破项籍叶，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位次）十七
>
> 齐合侯傅胡害，以越户将从破秦……以都尉击项籍，侯，六百户，

功比台侯。（位次）三十六

终陵齐侯华毋害，以越将从起留，……击臧荼，侯，七百四十户，从攻马邑及（英）布。（位次）四十六

煮枣端侯革朱，以越连敖从起薛，别以越将入汉击诸侯，侯，九百户。（位次）七十五

诸人位次，以丁复第十一为最高。其从汉时之官职，有将、队将、户将、连敖之别。连敖者如淳云："楚官，《左传》楚有连尹、莫敖，其后合为一官号。"摇毋馀盖以队将从破秦。越人喜以毋为名，华毋害与摇毋馀正同一例。由是观之，此诸越将，当为勾践余裔。

司马贞《索隐》："（海阳）亦南越县，《地理志》阙，毋馀，东越之族。"以此毋馀为东越之族。《汉书·惠帝纪》："三年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秋七月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应劭曰："摇，越王勾践之苗裔也，师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东海，在吴郡东南滨海。"师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据此，惠帝初年赵佗已称南越王矣。广东之海阳当为揭阳县地。《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

安道侯揭阳定，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自定降，侯，六百户。

是表明言"南越揭阳令"，是揭阳为越境可知。东越之摇毋馀，无由封于南越，故知海阳不得为南越县。《水经·濡水注》别称摇毋馀所封在辽西，王先谦《补注》云：

小司马谓（毋馀）越人，宜封越地，未必然也；果在何地，则不敢臆决耳。

亦不以《水经注》说为然，余曩年以为在楚东之海阳，名见《楚策》，或较近理，故钱穆《史记地名考》即采取余说。

《汉书·地理志》辽西郡领县十四，二曰海阳，郦注引《魏土地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者也。"故郦氏以毋馀封于此，西汉时惟辽西有海阳县。诸越将所封邑，丁复封阳都，在琅邪，傅毋害封贳，在钜鹿；革朱为煮枣，在冤句（山东）；华毋害封终陵，未详所在，皆去越地遥远，则毋馀封之

辽阳，亦非无可能也。

此颂

时祺

选堂　白　1994年9月14日

原载《华学》创刊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附二　《南阳集》序

伟川兄集其近年所著论文若干篇，题曰“南阳集”者见示，折衷群言，辨析精当。余特赏其论潮属文化应溯源于秦，不宜轻承旧志从汉元鼎讲起之说。考赵佗为龙川令，事在始皇之时，三十三年，秦兵方南屯五岭，揭阳令史定于元鼎六年降汉，则赵佗时已有揭阳县，当时承自秦制。

观五经富出土铜刀有二柄上镌有“秦”字，足证秦戍卒之南下，已及揭境。秦人置县之制，友人史念海有《秦县考》一文详论之，此可申证伟川之说者一也。伟川论赵佗本以中原名宦远来岭表，其上书文帝，自称“蛮夷大长”，彼固非南方土著，以处蛮夷之地，故亦以蛮夷自居。其上表言：“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伟川谓是时赵佗建国，土著已从平原退处人山是也。而各地蛮夷均自称为王，以近年考古资料证之，南越墓出银带上有“王”字，揭阳中夏村战国墓铜矛镌“王”字。西江流域铜刀以刻双钩“王”符号为其特征。饶平浮滨出土大尊陶器，肩部及其他部位镌“王”字者凡四件。此即闽、粤称王之佐证。蛮夷称王，比比皆是，不仅西瓯、长沙为然。故佗之称王，原有其历史背景，此可申证伟川之说者二也。

至于秦汉以来，揭阳县地所在及其沿革，仍有待于详考，他日容续论之。

伟川嘱序其书，因就所见，揭橥二事，以备商榷，尚望究心地方史事者共论定之。是为序。

1993年5月

原载《南阳集》卷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

海宁考

一、沿革

古义安郡于晋安帝义熙九年分东官郡立，领县五，一曰海宁。海宁，吴时始为县，属高兴郡，晋武改海安。《晋书·地理志》："高兴郡吴置，有海安。"注："海安吴曰海宁。"

《宋书·州郡志》："东官太守领县六，一曰海安男相，吴曰海宁，晋武改名，太康地志属高兴。"

至义熙析东官郡为义安郡，海安乃分而为二县，属东官者仍名海安，其属义安者改为海宁。

《宋书·州郡志》："义安太守有海宁。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南齐·州郡志》东官之海安与义安之海宁分而为二。

历宋齐梁陈，海宁相沿属于义安郡，为领县之一，《隋志》义安郡领县五，仍有海宁。唐初省海宁为潮阳县地[1]，海宁自此遂废。

---

① 阮元：《广东通志·沿革表》。

二、海宁地望

海宁所在有二说，一谓为漳州之龙溪，一谓在潮属之惠来。

（一）陈天资《东里志》云："海宁今龙溪。"又云："开皇十年，析海宁置龙溪。"[1]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沿革》："梁时析海宁置龙溪县，以属南安郡，即闽之漳州府龙溪县。"此一说也。

（二）阮《通志·古迹略》引旧《府志》云："海宁废县，晋置，在惠来县西"。此又一说也。

考《隋书·地理志》，海宁县有龙溪山[2]，《元和郡县志》："潮阳县龙溪山，今名海宁岭，在县西南一百七十里。"[3]《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云："海宁县在潮阳郡东六里，西接东官县界。"《清一统志》谓"在郡东"，盖因此误。阮《通志》按云："海宁属义安，义安今潮州，时其址与东官毗连，故《南越志》云西接东官也。"今按：《南越志》为最古记载，其言海宁西与东官相接，为惠来地无疑。则第二说是，而第一说非也。

三、海宁与惠来

考惠来置县在嘉靖三年。因正德七年间，御史熊兰疏请立县，至是遂析潮阳之惠来、西头、大泥、隆井（三分之一）四都，又析海丰龙溪一都置县，以惠来为名。乾隆《海丰志》："嘉靖三年，析龙溪六图之地为惠来县。"[4] 是惠来县所属有龙溪，原为海丰地。据《元和志》，海宁岭在潮阳西南百十里，以此计之，海宁故县应在今惠来与海丰接壤地。海宁岭一名龙溪山，而海丰有龙溪都，都名龙溪，必因山以为名。考漳州又号龙溪，与此同名。旧府志以海宁为漳州之龙溪者，殆以同名牵涉而误，斯不可不辨也。雍正《惠来志》于海宁县一字不提，故撰此文，以裨其缺。

---

① 《东里志》书成于明万历年，时惠来犹未设县。

② 《南北史补志》同。

③ 阮《通志》引此文下有"以故县得名"语。

④ 雍正《惠来志》同。

附　惠来未置县前沿革表

汉		南海郡揭阳县地。
吴		高兴郡海宁县。
晋	武帝时 安帝义熙九年	高兴郡海安县。 东官郡海安男相、义安郡海宁县。
南朝	宋齐梁陈相仍	义安郡海宁县。
隋		义安郡海宁县。
唐		潮州潮阳郡潮阳县、循州海丰县。
五代		潮州潮阳县、祯州海丰县。
宋		潮州潮阳县、惠州海丰县。
元		潮州路潮阳县、惠州路海丰县。
明	嘉靖三年置	潮州府惠来县。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五十四期，汕头，1948

潮州滨海地带之冲积

潮州滨海斜地，及韩江下游，多属冲积层。昔时潮州之地幅，当不若今日之广大。沧海桑田，转变有自。据海定施丹冲积造陆计算，海岸线每经 60 年向外伸张 1 英里，丁文江则谓每 69 年扩展 1 英里。自意溪至澄海外砂出海口，直线里程为 24 英里，以丁氏 69 年扩展 1 英里计算，需时 1 650 余年。则意溪以南之冲积地，当晋惠帝永康二年（公元 301）以前，犹是汪洋大海也。

考《韩江闻见录》，乾隆丙午丁未间，潮城有人于东堤浚井丈余，发见土中有大海船桅。今之东堤在城内，于古当为堤岸，则其地滨海无疑。又载，嘉庆庚辛间，筑韩山书院，于意溪上数里许氏田掘得多量海蛎。田上之山号海角山，由山名可知此地在海之角。此又足证古时海至意溪，则今冲积层于古为海明矣。又晋置海阳县，在海阳山下，《寰宇记》引《南越志》云："县南十一二里即大海。"亦可为证。考晋海阳县旧城所在有二说：

（一）谓在鸭潮，《舆地纪胜》引《潮阳图经》云："州治旧在鸭湖。"鸭湖无考，今潮安三区有鸭背乡、鸭头洋，疑以地在鸭湖之背得名，则当在龟湖一带。《闻见录》谓海阳故城在今之龟湖。是也。

（二）谓在凤山，郑昌时云："志称海阳故城北二十里海阳山，亦号凤山，是彩凤岭也。察汉以前，鳄溪下流皆溟渤，则此二十里内为沃壤，建城于此宜也。今为上流积水湖，是曰龟湖，萃泥沙焉。然发土者，犹时见古城砖器物。又城东门之址，沿存在彩凤岭下。"

以上二说，虽无定论，然海阳县建置在晋义熙九年（公元 413），则当日

去城所在地南十里许，即为沧溟固可推知。

潮阳县治亦有足考。《元和郡县志》云："潮阳故城，在今县城西北。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分东官郡置义安郡，潮阳属焉。在大海之北，故曰潮阳。贞元九年（公元793）移于今里。"潮州《吴府志》云："旧县城在今治三十五里临崑山之麓，里人犹称其地之疆为官厅岭。"唐时县治今亦久废夷为民田，潮阳《唐志》云："旧城唐置，疑即元和所置，其城广袤，至北关外，环社稷坛而西，底于桂桥河，转接于今城之南垣，其北有故濠迹，西有墙基。惟东西距河而止。"考义熙九年至贞元九年，凡距376年，以海岸伸展率计算，约伸展5.45英里，倘因滨海县治距海口3英里计，则晋时和平以东，即为海澨，而唐时县治东迁10英里，盖以榕、练两江之冲积土地加速增长故也。

他如澄海之东陇，今东距盐鱼港出海口5.37英里，若上推384年，当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澄海县时，固面临汪洋之地，非如今之深入。[①] 又相传南砂乡创自大宋元符年间，今之溪当时尚为内海也。[②]

是海阳、潮阳、澄海之设治，皆为滨海地区伸张，人口滋生之后果。至若汕头港口，据1908年英教士黎德尔所绘潮州地图，其北岸尚作斜平状。及1925年，韩江治何处之韩江下游图，则所谓金山堀地向南突出，增陆可0.4平方英里。此又显而易见之现象也。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三十五期，汕头，1947

附　汕头释名

汕头旧称沙汕头，在澄海蓬州郡。澄海《李（书吉）志》云："沙汕头地临大海，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滨海村落，多以沙汕为名。海丰有汕尾，饶平海山有东汕头，澄海苏湾有汕头仔。汕头仔又名南砂。

据《南砂林氏家谱·杂记》云："父老相传，其乡古为海底，平处名汕头仔（即南砂），高阜处名大汕头（即江墘、内厝、内蚁、外蚁、弓兜等乡）。亦犹今之汕脚，高处为汕，深处为海是也。浮聚之后，高处为乡、为埔、为

---

① 依海岸伸展率384年可增地5.5英里。

② 见《南砂林氏家谱》。

园，底处为田、为洲，深处为溪。”据是，俗以海旁之高地为汕也。按汕头义为以簿取鱼。《诗》：“南有嘉鱼，蒸然汕汕。”《传》：“汕汕，樔也。”《尔雅·释器》：“樔，谓之汕。”郭《注》：“今之撩罟。”《说文》：“汕，鱼游水貌。”今濒海犹多设簿栅以捕鱼，知“汕”亦指捞鱼之所。澄海有两汕头。顺治《吴志》但载苏湾北汕头，而蓬洲沙汕头无之。南砂乡创自宋元符间，其由来已久矣。鮀浦有沙汕之名，始见于明翁万达《与姚巡按》书云：“济何跨揭之鮀浦，其地西北距蓬洲所城，为海、揭下流。洲西二溪，夹而入海。岸有沙汕头，脊出横激，巨浪滔涌拍天。”刘子兴《海壳蚶蛎场碑记》云：“豪民某等占据鮀浦之沙汕坪海壳蚶蛎租。”盖指溪东港、厦岭港、牛田洋海面，以沙之积聚而名也。乾隆周《府志》：“康熙五十六年，建沙汕头炮台。”蓝鼎元《澄海县图说》云：“在海中则有大莱芜、放鸡山二炮台；在各港则有溪东、沙汕头、三湾、东湖、平洲、山头子、东陇、盐灶诸炮台。”又《潮州海防图说》云：“澄海出师，不过沙汕头。”又云：“港澳虽多，沙礁暗阻，风涛不测，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沙汕头简称“汕头”，始见于此，自清初已为船舶必经港口矣。

沙汕头古盖为渔村，澄海未置县前，为蓬州都，地属揭阳延德乡。明初为夏岭村地，蓬洲守御所辖之。《方舆纪要》：“蓬州守御千户所，旧在揭扬阳县东南九十里滨海。洪武二十年置所于下岭村，以扼商彝出入之冲，二十七年移建于西埕村。”明李龄《赠郡守陈瑄荣擢序》云：“揭邑有沿海而村曰夏岭者，以渔为业，出入风波岛屿之间，素不受有司约束。”[①] 下岭、夏岭今作厦岭。天顺七年，夏岭贼魏崇辉攻劫沿海。嘉靖四十二年，许朝光剽掠牛田洋大海之滨。沮洳之宅，寇氛既恶，乃于是岁析揭阳之蓬州、鮀江、鳄浦三都，置澄海县，自是沙汕头遂属澄。康熙三年巡界，三都均迁斥，至七年展复。八年澄海复县，仍属澄。康熙时建炮台为海防要隘，而商船多停泊焉。（按：汕头始设关在同治三年，而《全国统计提要》谓汕头嘉庆设海关，其说误。）澄海《李志》：“嘉庆十四年六月，海盗朱渥入沙汕头港，焚劫商船。”又云：“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商贾巨富，卒操奇赢，舆贩他省，千艘万舶，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陇、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航捆载而来者，不下千万计。”可见未辟埠前汕头地位之重要，盖自复界后，与暹罗帆樯络绎，遂日趋繁荣也。

---

① 《李宫詹遗稿》。

咸丰八年，辟潮州为通商口岸。[①] 至同治纪元，始于汕头开埠互市。[②] 汕头于明代但称沙汕，清康熙时曰沙汕头，继简称汕头，嘉庆时称沙汕头港，同治后开埠称汕头埠，至民国十年设汕头市政厅，乃称汕头市云。

汕头居韩江三角洲西南角之尖端，值西溪之尾闾。陆地面积 369 平方华里。[③] 地质至为简单。自汕市澄海一带，均为现代冲积层，角石则全属花岗石，大小不一。宽度自数公分至二三公尺，花岗石风化甚深，剥蚀作用进行颇烈，其中之长石，受风化作用后，不少变为高岭土（磁土），惟不甚适用。

汕头附近，港湾分歧，沙滩甚少，岛屿星罗。从地形论，属于泛降岸线。盖中国海岸，自舟山群岛以南，大体上均属于此类。惟近代则颇有上升趋势，角石公路沿途上升浪蚀阶地之痕迹，处处可见。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两广地质调查所研究员周仁沾君来潮考察地质，曾发见此种现象，以潮阳海门间之了哥岭一带，最为显著。今海门之莲花峰灯塔，即建筑于此种阶地之上，高出海面约十公尺。此种上升浪蚀阶地，九龙半岛，香港之长洲、浅水湾、利玛群岛，与澳门附近，均曾见之。据陈国达氏意见，粤省泛降海岸，曾有部分逆向运动，乃近代（第四纪末朝）地质之事（约四十万年）。由此知南中国海岸，并非属于单纯下降型，而系复式岸线，即当海岸泛降，可能有迟慢或局部之微小隆起，插于其间。并指出自泉州至汕头沿海，为有名之地震带，如宋治平四年及民国七年二月十三日之大地震（震带达五十余万里），均足证明此间系地壳弱带，同时属于近代地壳运动类型。至此等复式岸线之成因，则系出于块状断层活动之影响。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三十三期，汕头，1947；第九十三期，1948

又见《固庵文录》，1989

① 中英《天津条约》订立于 1858 年 6 月 26 日，即咸丰戊午五月十六日。1860 年 10 月 24 日互换。其第十一款略云："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照通商五口（指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无异。"

② 见光绪癸卯二月初六《岭东报》。

③ 民国十年汕头市区测量委员会测，见《新汕头》。

清初潮州迁界考

清初郑氏踞台抗清，滨海各省，风鹤屡警。满人苦于应付，爰发迁异之议，行坚壁清野之策。沿海一带、庐舍为墟，尤以潮州受祸为最照。此事于清初史实关系綦重，而读史者，多予忽视。中央大学教授谢国桢，始撰为《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麦应荣继之，有《广州五县迁海事略》之作，虽征引晐博，惟于吾州迁界之事，则略焉弗详。本馆总纂饶君宗颐，有见及此。爰钩稽往籍，辑为斯篇。发当日之痛史，补旧志之阙文。用特公诸海内，世之治清史者，幸留意焉。《方志周刊》编者附识。

顺治三年（鲁王监国元年），郑芝龙降清。先是芝龙曾居台湾，其子成功未忘明室，翌年，起兵鼓浪屿，破同安，占厦门金门诸岛，踞闽沿海之地，张煌言、张名振相继归附。顺治七年（监国五年），成功入潮阳。八年入南澳（监国六年），鲁王入厦门。翌年，鲁自去国号。五月，永历帝（时即位七年）封成功延平郡王。顺治十二年，成功奉鲁王居金门。顺治十三年，成功将黄梧以海澄叛，清封海澄公。十四年三月，黄梧献平海策，请发郑氏坟墓，于江、浙、闽、粤沿海居民迁内地，设立边界布防[1]，始发迁界之议。或云其策为方星焕所献，王沄《粤游记略》云："倡为迁海之说者谁欤？辛丑余从蔡襄公在淮南，执政遣尚书苏纳海等，分诣江、浙、粤、

① 详《台湾外记》。

闽，迁濒海之民于内地。蔡公曰：'此北平酒家子方星焕所献之策也。'其兄星华，官至漳南太守，星焕从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其主因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船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所用焰硝，以及柴帛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滨海之居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划地为界，乃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执政遂布新令，其说得行也。"

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奏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入内地[1]，是为迁界之始。时苏纳海同侍郎伊里布，奉命赴江南、浙江、福建会勘督迁。康熙元年壬寅，命吏部侍郎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同平南王尚可喜、将军王国光、提督杨遇明等，巡勘潮濒海六县，建墩台七十有三。三年甲辰，遣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侍郎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复勘，令再徙内地五十里。海阳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潮阳迁去直浦、竹山、招收、沙浦、隆井五都，附郭、峡山、举练三者之半；揭阳迁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饶平迁去隆眼、宣大、信宁三都；惠来迁去大坭、隆井二都，惠来、酉头、龙溪三都之半；澄海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洲、鳄浦、鮀江六都，仅存苏湾一都。增筑墩台八十有四，各设栅栏，以严出入。[2] 康熙八年正月，以巡抚王来任、总督李率泰先后疏请，始稍展界，纵民采捕。[3] 二十二年十月，遣吏部侍郎杜榛等，勘测闽粤沿海边界，招民开垦，始开海禁。当日潮属各县迁斥复界情形，兹分述于下：

海阳：康熙三年，冢宰伊里布等，再巡勘海阳，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尔时与迁之民，流离琐尾，少者转徙他邦，老者死填沟壑。甚而掺掺女手，执钵街衢，青春子衿，混迹佣竖。一二壮悍者白日袖刃奋食。康熙七年，抚院王来任绘流民图上流，蒙恩依议复界，督院周有德合力奉行，而哀鸿始集。[4] 自三年严海禁，迁民内地，南桂以下堤斥界外，遇洪水，冲决尤甚。上莆、南桂、龙溪都，田地尽遭淹没。

---

① 《台湾郑氏始末》。

② 见阮《通志·海防》、周《府志·兵防》。

③ 《海防总论拟稿》。

④ 海阳《张志》。

八年展界，乡老许重晦、生员卢继尚、林振秀集数都民力，始行修筑。[①]

澄海：三年再行巡勘，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洲、鳄浦、鮀江六都，存苏湾一都。五年，迁去苏湾，全县毕裁。建墩台戍卒守之。康熙甲辰，奉诏沿海滨民斥入内地。幸都督许公乞为转奏，自南洋至南砂十余里，缓斥三年。及丙午，有司迫迁，吾乡圮毁，人神俱迁。时斥居于意溪，情惨难状。[②]县城，嘉靖四十五年，张濬兴砌。康熙二年，因滨海寇患，三次迁斥。七年展复，八年署县通判阎奇英始依旧重建。[③]

潮阳：康熙元年正月，勘边界，迁居民入内地，招收、沙浦、隆井、竹山、附郭等都共迁六十二乡[④]，三年四月，再迁直浦、峡山、举练等共一百二十四乡。斥地后，民穷蹙，日啸聚为盗。自巡抚王来任、总督周有德先后奏准复地。惟达濠海岛仍为界外。[⑤]

揭阳：康熙七年，遣内大人狄堪等七员，会同总督周有德、提督杨过明、平藩尚可喜，带兵马一万七千余，由惠经揭之桃山巡勘，议撤排栅，改设各泛墩台。八年，民治复业。[⑥]

惠来：康熙元年四月，斥除沿海地三十里，移民入内地，迁去田地四十顷四十二亩。自潮阳交界和平寨起，至本县浮埔、靖海所驿后止，建立，东北自潮阳交界坑起，至本县南门外墩止，南自南门外起，至海丰交界吊旗山止。八年春，始展复旧界，开垦田地。[⑦]

南澳：康熙二年，廷议，徙民内地，俾寇无所掠，势将自困，遂悉徙粤、闽、浙江、山东之在界外者。降者接踵，澳地遂墟。[⑧]（按：明洪武十二年，徙澳民于内地。永乐二年，拨澳民回籍耕种。七年，迁澳民于苏湾，墟其地。至康熙三年，再行遗弃。徙民于南澳，为第三次，时南澳属饶平信宁都。）八年，诏展界。至二十三年，以界外弃地给民耕种，始复旧业。[⑨]

初，巡抚王来任巡界，具疏请展界，不许。逮康熙七年，还京，旋病且

---

① 海阳《卢志·建置略》。
② 《南砂林氏家谱》。
③ 澄海《李志》。
④ 计466户、男妇2 679丁口。
⑤ 潮阳《周志》。
⑥ 揭阳《刘志》。
⑦ 惠来《张志》。
⑧ 《齐志》、《忠孝堂集》。
⑨ 《齐志》。

卒，遗疏极言其状。同时御史杨拥廷，亦条奏利害，诏可之。至八年二月，诏复迁海居民旧业。

《香山县志》云："自元年以来，大臣岁来巡界，以台湾未平故也。是年前总督李率泰遗疏，请宽两广边界。康熙七年，迁民结党为乱，巡抚王来任遗疏请展界。先是迁者委居捐产，流离失所，而周李余党，乘机剽掠。巡抚王来任，安插赈济，存活甚众，旋病且卒，遗疏极言其状。及御史杨拥廷条奏，诏可之。遣都统时某、副都统鲁某、户部侍郎雷某等，会同平藩尚可喜、总督周有德巡勘，议撤排栅，改设各泛墩台。"

麦学程《遥识篇》云：康熙七年正月十三日，王巡抚病危，遗疏请复村。北京自春徂夏大旱，五月初六日至初八日，太白画见，但星微体暗，术雨亦在此时，命各衙门大放囚狱，十五日令准复村。八月，总督、藩、提同往惠潮展界。[①]

按：康熙四年，闽浙总督李率泰在任病卒，遗疏请宽两广边界。[②] 至展界执行者，为周有德（康熙六年两广总督），继具奏者为王来任，事见阮《通志·宦绩》。

《粤游纪略》云："从惠州始由界外行至潮州，东抵分水关闽界而还。所至民皆扶老携幼，张乐焚香，欢声动地。其还也如之，则有负耒而拜者矣。以予所观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骷髅枯骨，隐现草间。粤俗乡村曰墟，惟存瓦砾；盐场曰湿，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厉浅涸，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沟塍久废，一望污莱，良可措也。向所谓界者，掘地为沟，广不盈丈，插竹引绳以表之；或过山则绕山，址为沟，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许为界者，民间畏同陷井，侧足不前，而愚懵无知，往往误入其中。是时所司，尚有以出界坐辟、爰书请者，皆贫弊村竖，往拾蚌蛤之属，为吏所掩护者，命出之。所司持之曰：'此未开界之犯也。'公曰，今界已关矣，立命出之，因叹八年之间，冤狱殆不可胜数矣。"可见迁界之惨酷情状。

兹就潮属各县顺康之际户口表列于下：

① 见麦应荣文引。

② 李氏、王氏上疏俱见《榄屑》，兹不录，王氏两次上疏。

县别	年　代	户　口	年　代	户　口	年　代	户　口
海阳	顺十七年	73 839	康元年	30 182	康十一年	42 389
澄海	顺十七年	60 282	康元年	38 055	康十一年	24 104
潮阳	顺十七年	32 134	康元年	20 509	十一年	22 349
饶平	顺十七年	49 088	康元年	27 617	康十一年	37 951
揭阳	顺十七年	48 577	康元年	27 106	康十一年	34 121
惠来	顺十七年	31 211	康元年	11 841	康十一年	12 742
普宁	顺十七年	10 486	康元年	51 390	康十一年	91 390
大埔	顺十七年	15 012	康元年	15 017	康十一年	15 012

观上表除普宁、大埔外，海、澄、潮、揭、饶、惠六县为迁斥县份。海阳于康熙元年比顺治十七年少 43 657 人，至十一年增多 12 207 人。潮阳，康熙元年比顺治十七年，少 11 625 人，至十一年增 1 840 人。揭阳，康熙元年比顺治十七年少 21 471 人，至十一年增 7 015 人。惠来，康熙元年比顺治十七年少 19 370 人，至十一年增 901 人。澄海，康熙元年较顺治十七年少 22 227人，至十一年续减 13 951 人。（按：《澄海志》，顺治十四年十一月，郑成功陷鸥汀，屠居民六万余人。杭世骏《岭南集》云：八堡避贼者七万余，同日被屠。然顺治吴《府志》载十七年，全澄户口仅 60 272 人。《古今图书集成》38 067，谓鸥汀邻村八堡而有七万人，乃溢辞耳。）普宁，康熙元年比顺治十七年，增 40 954 人。大埔无增减。普宁人口反有增于前，自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元年，相去仅一年，而户口之数悬殊若此，殆因迁斥之故，普宁则康熙元年比顺治十七年增四万余人，盖以其非迁斥区，而人相率迁住也。

考当日广东迁界，东起饶平，西迄钦州[①]，以潮为最甚。夫迁界为坚壁清野之计，以防郑氏，然郑氏既得台海，按地开垦，自率自给，即竹邑一带垦田数十甲，亦颇自足，故迁界于郑氏，实无大损，徒害沿海生灵而已。

附年表

顺治十八年　有旨迁界。

康熙元年　吏部侍郎科尔坤等巡勘海、潮、揭、饶、惠、澄六县，令徙内地五十里（《海阳志·杂录》）。

四月　以王国光、沈永忠、杨遇明驻潮州等处，会同平南王尚可喜及督抚商権具奏，军务亦公同酌议（《东华录》）。

八月　以江南、浙江、广东濒海地方，时为海寇侵犯，令移民内地，因谕户部连给迁民田地居屋，并着该督抚躬临其事（《东华录》）。

二年十一月　侍郎科尔坤勘明潮州近洋六厅县，所有蛋民，悉徙内地，一切田园庐舍，概行拆毁，地方文武，严其出入，以杜海寇（《蛋族年表》）。

三年三月　再巡界，遣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侍郎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复勘令再徙内地五十里、增筑墩台八十有四，各设栅栏，以严出入。[②]

八月　先是碣石苏利抗迁沿海地方，其党陈烟鸿据靖海，余煌据神泉，王国光督师由潮达惠来，至靖海围剿，利败死（《惠来志》）。

五年正月　裁澄海县归并海阳。时澄海仅存苏湾一都乃归并海阳（《澄海志》）。

七年七月　潮阳展界，知县张宏美令民归故土垦殖。（《潮阳志》）

八年三月　复设澄海县。先是巡抚王来任疏请四事，请亟复迁民，及御史杨继建条奏，奉旨遣大臣会同平南王尚可喜、总督周有德勘复（郝《通志》）。

诏展界，纵民得采捕近海，澳民乃复故土（《南澳志》）。

复潮阳地，广东巡抚王来任，血疏垦请，周有德继之，奉旨展复，惟达濠海岛仍为界外，为丘辉所据（《潮阳志》）。

二十三年　开海禁（郝《通志》）。

命吏部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巡视广东福建界外弃地，给民耕种，澳民尽复故业（《南澳志》）。

---

① 详道光《钦州志·纪事》。

② 阮《通志·海防略》。按，墩台详周《府志·兵防》。

附迁斥都名表

县别	康熙三年迁斥范围	备考
海阳	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	《海阳志·杂录》作迁龙溪、上莆、南桂三都，东莆、秋溪、江东、水南四都之半。
潮阳	迁去直浦、竹山、招收、沙浦、隆井五都，附郭、峡山、举练三都之半。	先后共迁百八十六乡。
揭阳	迁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	
饶平	迁去龙眼、宣化、信宁三都。	南澳岛信宁都全境尽弃。
惠来	迁去大坭、隆井二都，惠来、酉头、龙溪三都之半。	共迁去田地四十□顷四十二亩。
澄海	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洲、鳄浦、鮀江六都。	仅存苏湾一都，五年全县毕裁。

编者按：顺康之际户口表，所征引数字，散见之广东《金志》、潮州《吴志》、《周志》、海阳《吴志》、潮阳《周志》、揭阳《刘志》、饶平《刘志》、澄海《李志》、普宁《萧志》、《古今图书集成》中。但此户口数字，何其少邪？虽明清之际，干戈扰攘，亦不致如斯之尠。夷考当日，其所谓丁口者，系指成丁应役之男子，与食监课税之大口女子，实编而言，此吴《府志》所称，除逃绝及老幼免编外之实编人丁者是也，盖其时徭役频繁，赋税重敛，人民多避役与税而短报耳，故其数字多不实，是以康熙末年，户口编审未见增加，因谕嗣后编审人丁，以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为额，其新增之丁，永不加赋之令，故户口始稍见增。至乾隆间，始行保甲法，于是老弱男女，及奴隶贱民，咸均载册籍。户口数字，始称完备。事见新修《潮州志·户口志》中，余不具述。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三十一、三十二期，汕头，1947

海阳山辨

张士琏雍正八年《海阳县志》八《事集·杂记》，志海阳县转饷之始云："秦始皇帝使南海尉屠睢伐百粤，以史禄转饷。凿渠海山下，通粮道，并收灌田之利，民称'灵渠'。"考吴颖顺治十八年《潮州府志》、林杭学康熙二十三年《潮州府志》、胡恂雍正十年《潮州府志》，俱有此条，文并同。是张《县志》盖采自诸《府志》也。《古今图书要成·职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潮州府部·纪事》、卢蔚猷光绪二十六年《海阳县志》卷二十四《前事略》又卷四十六《杂录》亦有此条。以上诸书，皆以史禄凿渠在潮州海阳县海阳山下，故载是说。

今按：潮州海阳县海阳山，郭子章《郡县释名》云："海阳县名最古……今城北二十里有海阳山。"《明一统志》八十云："海阳山在海阳县境，因南有大海，故名。"阮元道光二年《广东通志》一百六《山川略七》云："海县有海洋山①，在县北二十里，高四十八丈，周围三里，南望大洋。晋名县以此。"② 上诸记载，大致相似。惟阮《通志》据《纪胜》作"海洋山"。考《纪胜》一百《广南东路·潮州·景物下》，"海阳山在海阳县"。《清一统志》二百四十四引并同，又《广东图说》三十三："海阳山，城西北二十里。"皆作"海阳"。是作"海洋"者误也。

---

① 据《舆地纪胜》。

② 据《广东舆图》。

考海阳县，晋置。其称县曰“海阳”者，《明一统志》八十云：“海阳县，本汉南海郡揭阳县也，晋属南康郡。义熙中，置海阳县，为义安郡治。以南滨大海，故名。”是或因海山南望大洋，而置县则近海阳山，故取山名以为县名耳。[①] 是山处绝徼，濒大海，荒僻辽敻，固不需粮道以资交通。谓史禄凿渠于此，于理似未合。

《方舆纪要》一百三别载：“史禄（按原作“越”，非。）转饷，留家揭岭。”或谓即今揭阳县西一百五十里分抵兴宁、海丰界之揭阳山。温仲和曰：“非也。禄转饷必自北，面南之境，何能深入百越。”[②]《水道提纲》记揭阳山之形势云：“（揭阳山）有龙川县东南之天柱山，又南为大梧山，又南为永安县东北之紫帘山、鸡公嶂，又东为天云岭、为排岭，又东南为北琴江、北岸山，又东为嵩螺山，又东稍北为瘦牛岭、为飞泉岭，其东南为贵人山、龙发山、双山石母山，其北为揭阳山。连峰相接为五岭，极东南之秀。”此可见揭阳山脉所属之广。其西北复岭重冈层岩峭壁，联绵盘亙，与五岭之系接。此揭阳山，尚非史禄足迹所能至。况海阳山远在海区，高不满五十丈，周仅及三里。其非史禄所到之地，明矣。

《史记・主父偃传》严安上书云：“（秦）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逃遁。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汉书・严助传》淮南王安上书及《严安传》俱作“尉屠睢”，无“佗”字。《索隐》分佗及屠睢为二人，梁玉绳曰：“《南越传》，无尉佗攻越事，乃尉屠睢也。”[③] 按：《淮南子・人间训》正作尉屠睢，其言当日攻战之事甚详。文曰：“（秦）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一作成）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以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高诱《注》：“镡城在武陵西南，接郁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南海；南野在豫章；余干在豫章。”屠睢五军所到，核以今地，当在湖南南境，广西东境，广东北境、中境、西北境及江西西南境。是

① 光绪《海阳县志》四《舆地略三》：“海阳山去城北二十里……距城西北十里曰阳山。其地名海区，依山面野，南尽平原，或疑置县当于此。”盖晋时置县恰近海阳山也。

② 见光绪《嘉应州志・考》。

③ 《史记志疑》三十四。

其时兵力犹未及于大庾东南，故守南野之界，而结余干之水也。海阳处南越极东南之境，西北有梅岭、揭岭之障。汉出师入东粤，出梅岭者，由赣、汀入。[①]《舆地广记》："汉，闽越反，武帝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是其证。屠睢之师屯于豫章，正在梅岭之外，何能深入海阳哉。是又史禄凿渠通道，非在潮州海阳之别一证也。

然则"海阳山"、"灵渠"，果何在也？考高诱《人间训注》："监禄，秦将，凿通湘水、漓水之渠。"全祖望《困学纪闻笺》："监禄者，史禄也，渠乃零渠。"[②] 依是知在桂林境矣。唐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谓之漓水焉。旧说，秦命史禄吞越峤而首凿之。"[③]《御览》六十五引《临桂图经》云："漓水出县南二十里柘山之阴，西北流至县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为二水。昔秦命御史监史录（按：此作"录"与《困学纪闻注》同，疑当作"禄"）自零陵凿渠，出零陵下漓水是也。"（按：《太平寰宇记》与此略同。）《唐书》四十三上《地理志》云："理定有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按理定本称兴安，至德二年更名理定，唐属桂州，亦桂林地。又《宋史》九十七《河渠志》云："灵渠源即漓水，在桂州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而南。其初乃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越者。"又《舆地纪胜》一百三《广南西路·静江府·古迹》云："'秦凿渠'，在兴安县，即秦御史史禄所凿。"[④] 由是言之，史禄所凿之灵渠，实在今广西兴安县[⑤]，即秦桂林郡、汉零陵郡。与潮州海阳，绝无涉也。灵渠即湘水，漓水之源。湘水盖出自海阳山，与漓水本无关。其引湘通漓者，史禄力也。王先谦曰："史禄通漕分湘流入漓是矣。"[⑥] 又范成大、全祖望亦谓禄作灵渠，派湘流而注之漓。

阳海山者，《汉书·地理志》云："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又有漓水。"《说文》云："湘水出零陵阳海，北入江。"是也。《续汉郡国志》"阳海"作"阳朔"。《水经·湘水篇》："湘水出零陵阳海，东北过零陵县东。"郦

---

① 陈寿祺说，见《左海文集》。

② 翁元圻辑《纪闻注》十二《考史》。

③ 《文苑英华》，又见光绪《广州府志》七十五《前事略》引。《舆地纪胜》一百三《静江府·碑记》，此文题无"桂州"两字。

④ 《舆地纪胜·静江府·景物上》别有"灵渠"条。又《清一统志》三百五十六："灵渠，《宋史·沟洫志》或谓之'秦凿渠'。"

⑤ 《一统志》：渠在兴安县西十里。

⑥ 《汉书补注》。

道元《注》云："即阳朔山也。"[①] 又《漓水篇》："漓水亦出阳海山。"郦《注》："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漓之间，陆地广百余步，谓之始安峤，峤即越城峤也。"按：越城峤即鱼孟威所谓"吞越峤而首凿之"者也。《衡州图经》："湘水阳海发原，至零陵而营水会之，二水合流。谓之潇、湘。"[②]《元和郡县志》三十六《桂州全义县》云："湘水出县东南八十里阳朔山下，经零陵郡西十里。"[③]《太平寰宇记》："阳海山……属兴安县，一名阳朔山。其山自永州零陵县西，迤逦冈峦，边亘不绝。此山即湘、漓二水之原。"按上诸书，所举阳海山所在之郡县，或称"零陵"，或称"始安"，或称"全义"，或称"兴安"，颇不一致。考零陵郡，汉元鼎六年置。东汉为始安侯国，吴归命侯甘露元年，始置始安郡。兴安县，即汉始安县地，隋置临桂镇，唐析置临源县，改曰全义。宋改曰兴安。其称郡名者如《汉书·地理志》，《说文》止作"零陵"。其称县名者，《水经》用汉县名，故称"始安"。《元和志》用唐县名，故称"全义"。《寰宇记》用宋县名，故称"兴安"。名号虽殊，而究同一地也。

诸书言"阳海山"，言"阳朔山"，亦同一山。《清一统志》："阳朔即阳海之殊名，非今阳朔县之阳朔山。"考《元和郡县志》："阳朔县本汉始安县地，隋开皇十年分置朔县，取阳朔山为名。"盖汉时称阳海山，晋后又称阳朔[④]，唐宋以降，专称"阳海"，而"阳朔"之名，遂为阳朝县之山所掩有矣。《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郭《注》云："今湘水出零陵营道县阳湖山，入江。"[⑤] 郝懿行曰："今本作阳湖山，讹。"是阳海，又曾字讹为阳湖也。

是山又或作"零陵山"。《水经·湘水注》："应劭曰：'湘出零陵山。'盖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县北，县故零陵之南部也。"校云："'零'下近刻衍一'陵'字。"《清一统志》三百五十五《桂林府》按语云："零陵乃汉时阳朔山所在之郡。应劭盖云湘出零陵郡之山，非阳朔外又别有零陵之称也。"考《元和郡县志》三十六："阳朔山即零陵山也。"其考证曰："此云阳朔山即零陵山，殆因前人有湘出零陵山语。然彼以郡县名统称，犹言零陵之山，实非是

① 《水经注》三十八。

② 《舆地纪胜》五十六《荆湖南路·永州·景物下》引，又同书卷五十五《衡州·景物上》"湘水"条文同，惟不云引《图经》。

③ 《舆地纪胜》一百三《广南西路·静江府·景物上》同。

④ 《元和志》按语。

⑤ 李善注《江赋》引此注作"阳朔口"。

山本名‘零陵’。”今按：《汉书·地理志》“长沙国临湘县”下应劭曰：“湘水出零山。”（据百衲本）是应氏原语，固作零山无“陵”字也。《元和志》、《一统志》按语，谓山非本名零陵，乃以郡县统称，说殊未的。予按：《舆地纪胜·静江府·景物上》有“零水”①，夫有零水，必有零山。亦犹有漓水②，则有漓山也。③ 零山当即阳海之殊名，《水经注》引应劭语可证。其名“零陵”者，当为后来转讹。此又是山名称之一歧也。

“阳海”又作“海阳”。鱼孟威《重修灵渠记》：“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是其例。《明史》四十五《地理志·桂林府》：“兴安，府北县，有海阳山，湘水出其北。”《清一统志·桂林府·祠墓》有海阳祠，云：“在兴安县海阳山下……雍正十一年重修焉。敕封‘安流襄绩海阳山神’，御书‘阳阴灵源’扁额。”又《舆地纪胜》一百三《静江府·景物上》“漓水”条，引《舆地广记》：“漓水湘水，二水皆出海阳山。”又引《唐书》：“桂有漓水，出海阳山。”予检《舆地广记》三十六《广南西路上·兴安县》，有云：“（县）有阳海山，漓水，湘水二水皆出一山而源。”不作“海阳”而作“阳海”，知《纪胜》之作“海阳”，盖误眷也。考是山古地书并作“阳海”，窃疑作“海阳”者，或由于后来传讹。李商隐《文集》有《祭海阳文》，疑即指此。是则是山讹称为海阳，自唐已然。《古今地名大辞典》有“阳海山”“海阳山”二条。于“阳海山”下云亦作“海阳山”，是直以“海阳”为“阳海”之别名矣。此地名传讹为实之例，无足怪者。

由上诸论证观之，知桂林之阳海山，亦名“阳朔”，曾讹为“阳湖山”；又曰“零山”，曾讹为“零陵山”；又别以“阳海山”讹为“海阳山”。

夫桂林阳海山，固史禄凿渠所在地也。其名称淆乱已如此。而潮州旧志，不辨“阳海山”、“海阳山”之别，见史传有“史禄凿渠在海阳山”语，遂以为海阳县之海阳山。是尤以讹传讹。自吴颖以下诸书，皆踵其讹，未能考证。苟不订正其妄，则其误将不知伊于胡底也。

原载《禹贡》（半月刊），第六卷十一期，北平，1936

复收入《潮州丛著初编》（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1938

---

① 在兴安县西北八十里，出郁金山下，南合漓水。

② 漓水，详金武祥《漓江杂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③ 漓山，见《寰宇记》及《舆地纪胜》。

揭岭揭阳山辨

揭岭为秦五岭之一，置戍所。裴渊《广州记》，大庾、始安、监贺、桂阳、揭阳为五岭。《元和郡县志》：五岭有揭阳。《水经注》，五岭不数揭阳，而以大庾为最东之岭。温仲和曰：汉揭阳一县，地兼有今潮州九县，嘉应一州平远、镇平两县之地，正与汀赣交界。由大庾之东，穷至于海，为汉揭阳地。

自北而来，虔赣与汉揭阳县相接之地，皆复岭重冈，深林丛谷，即嘉应镇平、平远、长乐、兴宁、汀赣相连之界，其山皆可以揭岭统称之。[1] 李勋曰：《府志》秦始皇戍守处，在飞泉岭。《方舆纪要》：揭阳山南北二支，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上曰揭岭，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禄留家揭岭，或以为即此山也。盖秦皇置戍，虽以一山，其曰揭岭者，当为揭阳山、瘦牛岭、飞泉岭、贵人山，以及猴子崇、巾明独等处之总名。[2] 此揭阳岭及秦汉揭阳地所属之范围也。考晋南康郡统县五，其一揭阳。盖其以南海郡揭阳地为曾夏所据，历十余年，故于南康别置揭阳县。南康亦旧揭阳所辖境也，《宋书·武帝纪》：永和三年正月，南康揭阳蛮反，郡县讨破之。《番禺志》：区金，南海人，宋孝武孝建末，客揭阳，会齐武帝在潜，起义师，讨豫章贼。《崇正同人系谱》：赖硕，晋末避居南康，寻迁揭阳赤竹坪，家焉。揭阳后改虔化，今江

① 《求在我斋集》。

② 《说映》。

西宁都。此晋宋时之揭阳，均在南康也。南康揭阳，亦有揭阳山。《南史·齐武帝纪》：帝仕宋为赣令，会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不从命，南康相沈萧之絷上郡狱。族人萧顾祖，门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余人，起义避难揭阳山。是其地。康熙《漳浦志》："梁山名梁岳，在县南二十里八都境，其峰曰莲花，相传齐武帝所赏，名齐帝石。考《南齐书》，武帝初举义兵，避屯揭阳山，惟时漳浦未建，梁山固揭阳境。"[1] 按：《漳浦志》盖误，《齐书》武帝居揭阳山，乃在南康，与潮州之揭阳无关，至以为漳浦，殊属悬揣。此揭阳山讹传之地，尤不可不辨也。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五十二期，汕头，1948

① 亦见"齐帝石"条。

《金山志》序

金山，一名金城山。其以“金”或“金城”名是山，昉自何年，今无可考。郡县志仅云，山旧为金氏所居而已，而未云及得名之年也。予按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潮州图经序》云：“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旧属于金氏。”《纪胜》所引《图经》，为唐或北宋时书。以此推之，是山得名之始，已在唐或北宋之前，其遐远盖莫得而计矣。旧时地志，言金山者，率与城东韩山混。阮《通志》以《舆地纪胜》引大观《九域志》云“金城山有韩木”，遂疑金城山别名“韩山”。

不知潮州亦称金城，此云金城山，殆谓金城中之山也。光绪《海阳县志》则以金山有郑伸《建韩文公祠记》，更谓“金山”称“韩山”，必以韩祠得名。是又过于臆度。凡此皆是山名称，为旧《志》引述之讹，有不可不辨者。至若是山往昔形势，古地志虽有可稽，而语焉不详，不足以尽其实。《明一统志》曰：“金山东临鳄溪，西瞰大湖。”《广舆记》亦云：“金城山在府治后，西瞰大湖，一碧万顷。”大湖或谓即今西湖，予谓大湖非西湖，而实西湖前之别一湖也。西湖，俗所称北濠者也，唐为放生池。宋庆元间，林嘌浚。开庆元年，林光世续浚。明万历间，王一乾又疏拓之，始成湖。其始盖韩江滨一小潭耳，未足为大湖也。《古今图书集成》谓湖山在府治西，前连鳄溪。[1] 是古湖山与鳄溪相接。而大湖在金山西，西湖在湖山前，则西湖固与大湖通，

---

① 疑本林杭学康熙《潮州府志》。

而大湖又与鳄溪通也。往予游金山，跻山巅，览山川远近景物。西瞻湖山，指古林嘌、林光世、王一乾之所疏凿放生池遗址，去韩江咫尺，中有田塍房舍之隔，而潭水多错聚其间。意其地古或尽为湖泽也。且以金山位于西湖东北，鳄溪西南，西湖古与鳄溪通，则金山当居二水之中，而韩江抱其前，大湖扆其背，又意旧时金山之形势如此；及读地志，知曩昔金山，后瞰大湖，益信予意不妄。

去岁辑《韩山志》既竣，颇欲以余力志金山胜迹，附此意以质考古之士。曾稍事裒辑，得遗闻轶事，暨诗文若干篇。会同邑黄仲琴先生有《金山志》之作，以志稿属予补录，因将所辑附入，并为推论金山在昔形势，及其名称之可辨者，归以质之。民二十年四月。

原载《潮州丛著初编》，广州，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1938

韩山名称辨异

山以韩名，从昌黎韩文公愈之姓也。公刺潮时，曾即是山为亭，而手植橡木于亭隅，故后之人，称亭为“韩亭”①。木为韩木②，从而名山曰“韩山”，山下之水曰“韩江”③。

山据潮安县城东，初名东山。王汉《金城山记》云：“韩文公曾即东山为亭，以便游览。”④ 王汉，大中祥符间知潮州军州事，是此山之名东山，当在北宋之前。王大宝《韩木赞》称：“东山有亭，唐韩文公游览所。”王象之《舆地纪胜》亦云：“东山在州东，韩昌黎文公旧游览。”大宝、象之，皆南宋人，则是似于南宋初，此山仍作“东山”之称。然旧府县志皆载有陈尧佐、刘允《韩山诗》。尧佐，咸平二年倅潮；刘允，绍圣四年进士。以是推之，韩山得名，已远在北宋时矣。大宝、象之之称“东山”，特袭用故名耳。盖自陈尧佐题诗，“韩山”之名始著于世，其后丁允元建韩祠于山麓，而名乃益显焉。

韩山名称，地志载述，率多乖缪。谨条辨于下，用释疑悟云。

---

① 《舆地纪胜》一百：“韩亭，旧址为揭阳楼，唐韩昌黎登览地也，俗呼曰‘侍郎亭’。”按：梅尧臣《宛陵集》有《送胡都官知潮州诗》云：“自昔揭阳郡，刺史推贤侯。……更寻贤侯迹，书上揭阳楼。”即此，余别有考。

② 《夷坚续志·后集》：“昌黎韩文公谪潮州守，从乡中带一木种，栽之潮州隔江山中，其叶厚而长，开花白如柑橘实，人称之曰‘韩木’。”

③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韩江在府城韩山下。”

④ 见光绪《海阳县志》三十《金石略一》。

韩山与东山

《舆地纪胜》一百："东山在州东，韩昌黎文公故游览之地，亭榭多建于此。"又云："韩山与州山相对。"

宗颐按：《舆地纪胜》韩山条云："韩山与州山相对。"别有湖山条云："湖山与韩山对。"是其所谓"州山"当指湖山。湖山，今之西湖山也。《纪胜》以"东山"、"韩山"分为二，盖未明"东山"即"韩山"，故复出耳。

又按：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十六（下简称周《府志》）："东山一名竹篙山，在县北三里，高四十六丈，周围五里。"又《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四："丰顺县有韩山，在县西少南三十里，高五百丈。"皆与此山同名而实异地。

《明一统志》八十："东山在潮阳县治东，与韩山相接。上有一巨石，有七孔，若北斗状，中一孔，出水，不盈不涸。又有二峰，曰'双旌石'，唐韩愈游览之地，亭榭多见于此。"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潮阳县东山在城东，其相接者亦曰'韩山'，叠嶂层峦，参差奇胜。"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三："潮阳县东山，在县东三里，与韩山相望。叠嶂如层云，多砂石，无草木，其中有窦，状如北斗，曰'七星石'。石七孔，中孔有水，不盈不涸。按《一统志》，山上有二峰，曰'双旌石'，韩愈游览之地，亭榭多见于此。"

《广舆记》十九："东山，潮阳，与韩山相接，上有巨石，七孔若北斗状。又二峰曰'双旌石'，韩愈曾建亭于此。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八（下简称吴《府志》）：潮阳县东三里曰'东山'，与韩山相望。……唐昌黎、宋文山尝游其地。"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一百六（下简称阮《通志》），潮阳县东山条，引《舆地纪胜》曰：《图经》云："州东山之肩，有二峰，曰'双旌石'。"又引黄佐嘉靖《广东通志》云："韩昌黎曾游于此。"

宗颐按：嘉庆《潮阳县志》二："东山在龙首山东三里，高百丈，绵亘六十里，接连莲花峰。"《广东图说》三十三："潮阳东山，城东三里，有紫云岩，石室，帘泉，怪石屹立。山外海汊，磊石为门，夙称天险，为县东屏嶂。"所言潮阳县东山之形胜如此，不云"与韩山接"也。予历其地，询山居之民。亦不闻有云韩山与相接者。

考韩山亦名东山，与潮阳县东山名同，而地复相近。故地志载述东山者，辄以相混。如上诸书所言潮阳东山形胜，皆误引韩山之记载以为潮阳之东山也。《舆地纪胜》："东山在州东，韩昌黎文公故游览之地。"其所谓"州"者，即指"潮州府治"。是此之"东山"，即为"韩山"。凡《纪胜》载潮州景物之例：其在府治者，则曰"居州之某处"；其在属县者，则曰"居县之某处"。如仰斗亭云"居州东山之腹"，就日亭云"在州治后"，此言景物之在"州治"者也。龙首山则引《元和志》云"在潮阳"，水帘亭云"在潮阳县东山"，此言景物之在属县者也。其对于在"州"者，与在"县"者，地名虽同，而称述有例可求，固明晰而有别。撰地书者，不加细察，率妄据引述，牵合傅会，与事实益乖离矣，是以不可不辨！

又按：吴《府志》及《图书集成》谓"潮阳县东山与韩山相望"。考《舆地纪胜》称，"东山在州东"，又称，"韩山与州山相对"。疑《府志》据此，遂误"州山"为"东山"，因而谓其与韩山相接，亦当蒙《纪胜》此语极讹，惟误"相对"为"相接"耳，至《方舆纪要》、《广舆记》则当是承《一统志》之误。

又按：《舆地纪胜》"双旌石"条引《图经》云："州东山之肩，有二峰，故曰'双旌石'。"所谓"州东山"即"韩山"也。《明一统志》、《图书集成》、《广舆记》、阮《通志》，皆误以《纪胜》双旌石条系于潮阳县东山。周《府志》十六、嘉庆《潮阳县志》二，潮阳东山有双旌石。吴《府志》："潮阳东山有双旌石，以张许庙见玄旗故名。"似潮阳东山，亦有双旌石者。予躬历其地，遍访弗得，问居民，咸谓从无是石，岂府县志亦与《图书集成》等同误耶？又李调元《南越笔记》四："潮阳东山有二峰曰'双旌石'，昌黎曾建亭于此。"盖袭《一统志》，不足据。

韩山与金城山

《舆地纪胜》一百引《元城志》云："金城山有韩木，韩退之所植也，不知名，土人以岁开花，为登第之兆。"

阮《通志》一百六《山川略》七："谨按：《舆地纪胜》引大观《九域志》云，'金山有韩木，不知名，土人以岁开花，为登第之兆'，则韩山又名'金城山'矣。"

光绪《海阳县志》四《舆地略三》："谨按：宋王汉《金城山记》云：'韩文公曾即东山为亭，以便游览，人呼为侍郎亭。'又《舆地纪胜》：'金城山有韩木，不知名，土人以岁开花，为登第之兆。'以今考之，金城山在城中北境，韩山则隔江而东，不相及也；岂韩山又一名'东山'，一名'金城山'耶?"

宗颐按：阮《通志》引《舆地纪胜》金城山条作大观《九域》，与《舆地纪胜》作《元城志》不同。考《宋史·艺文地理类》，无《元城志》一书；而"元城"二字与"九域"二字形似，今本《纪胜》之作"元城"，或误刻耳。

又按：金城山居城北，即今金山也。《纪胜》引《九域志》："金城山有韩木。"然韩木实在东山，即今之韩山，《通志》、《县志》据《九域志》此语，因谓韩山又名"金城山"。考《纪胜》载《旧图经序》曰："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故属于金氏"，是金城即潮州也；而所称金城山，犹言金城之山也。《九域志》谓金城山有韩木，非谓城北之金城山有韩木，乃谓金城之山有韩木，盖韩山为潮州城之山，故得云尔。《通志》、《县志》皆以金城山为韩山之别名，非也。

韩山与金山

《舆地纪胜》一百，金山石刻："金山有《始开金城山记》及《韩山祠记》、《郡守题名》，并刊于石。"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金石略一》："《舆地纪胜》别载金山亦称韩山。象之，宋人，论必有据。金山之称韩山，必以韩祠得名。"

宗颐按：《舆地纪胜》所举金山石刻，其《始开金城山记》，即王汉所记者；《韩山祠记》、《海阳县志·金石略》以为即郑伸公祠记。余考“韩山”二字，故时常用为纪念韩公之称，郭之章《韩公二祠沿革》引《三阳志》云：“韩山书院地在州城南昌黎庙故址。”是城南书院，昔尝称为韩山书院。而元至顺四年吴澄《韩山书院记》有云：“潮城东隔水有山，潮人称为韩山，后取城东之韩山，以号城南之书院。”依是知“韩山”二字，实为纪念韩公之称，虽地不在城东之“韩山”，亦得以“韩山”称之也。金山文公祠，《纪胜》称之为“韩山祠”，犹城南书院之称为“韩山书院”也。《海阳县志》以《韩山祠记》即《文公祠记》，说甚是。

又按：《海阳县志·金石略一》称：“《舆地纪胜》别载金山亦称‘韩山’。”又称：“金山之称韩山，必以韩祠得名。”余考《纪胜》实无是言，县志所举，殊误，其云金山以韩祠名为“韩山”，尤属臆测。韩山在城东，金山在城北，迥不相及，绝无名称互用之理。

原载《禹贡》(半月刊)，六卷十一期，北平，1936

《韩山志》自序

山岩之为志者，盖地志之旁支，山经之流裔也。在昔充之集吴兴之名[①]，宗测撰衡山之记[②]，征诸坟典，是其权舆，亦有曰疏与图，则又此科之系。[③]

言其总著，纂述亦夥。康乐有居游名山之志[④]，刘澄有山川古今之记[⑤]，虽简袠沦佚，体例蒙昧，然紬后儒援据之余绪，亦可窥其源本之编制，大都文士丛缀，词客杂纂，匪有义类，可资研绎者也。爰逮唐宋，乃有专书，部居分别，配隶驯精，则以地志之例，兼及人文之载。山志之体，斯为备焉。[⑥]潮州韩山，陪县城之东，昌黎之所游观，诚斋于焉题咏。元明以还，兴造日众，亭庙馆榭，逦倚嶕峣，山水增灵，林泉获幸。于是谪宦游寓之客，洪笔丽藻之士，陟远寻幽，劚奇剔怪，镌铭木舌之舍，著句鸑鷟之章，洞宗涬溟，雕镵岩壑，瑰诡惠巧，吁何其盛！惜乎释地征文，犹未纂为专袠。虽司马有

---

① 《寰宇记·江南东道》引张充之《吴兴山墟名》。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作张元之。又云晋吴兴太守王韶之撰。

② 《隋书·经籍志》有宋居士《衡山记》一卷。《南齐书·高逸传》：宗测曾游衡山，著《衡山记》。章宗源曰：《隋志》宋当作宗。按此书《文选·江淹杂体诗》注，《艺文类聚·地部》并引之。

③ 《御览·香部》引有竺法真《登罗山疏》。《寰宇记·淮南道》引有陶宏景《山图》。

④ 谢灵运《游名山志》，《文选》注、《艺文类聚》引之。又有《居名山志》，《水经·渐江水》注引之。

⑤ 《御览·州部》引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隋志》多永初二字。

⑥ 唐《王屋山志》、宋《赤松山志》，皆纲提领絜，而旁采人物文章，颇近地志之体。

韩祠沿革之考[①]，学正有东潮胜概之集[②]，而疏缺未备，研讨靡资，履绚何人，代之愧矣。予闲居多暇，稍事搜括，辄用刺陈编，访遗耇，搜残竭于废宇，揽奇迹于穷谷，采辑撰记，星纪一周，居然成卷。考是山北出黄田之岭，而南尽韩水之汇，峘岌之所居，广袤盖三十里，其峰有三十二，其湖有四，其村大小一十又三。岩窟之间，厥上唯壤，草木丛茂，山水明秀，故居民成聚。自宋以降，望族辈出，若桥东许氏、桃坑刘氏、东津薛氏、梁氏，皆子姓蕃茂，而各以科第文章，显烁于畿宇郡国。乃知是山之所为美，非唯由退之之留迹，亦其土居人士嘉德文采休曜英馥之召之也。故并采生长山间之名贤鸿哲，陈其行迹，著之于编。后之游览乎是山者，欲考韩公之遗事，征前代之耆献，其于吾书，或有取焉。

志为载事之书，故以事为类次，夫其综萃文献，义通乎传记；剬辑故实，例涉乎政书。条目浩博，辨析宜精。而志山川者又有图经之全例[③]，其于义类，自亦不容纷舛也。是书为编凡二：曰正编，曰副编。为类凡七，属正编者四：曰地理，曰胜迹，曰建置，曰人物。属副编者三：曰金石，曰文辞，曰撰著。正编者，盖史迹之记述，旨期证要，义取考实。副编者，盖志料之理董，则意存晐博，用资征验。正、副畛分，简繁斯别。实斋有言：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则尤不可。[④]夫山岩非朝廷州邑之比，自无律令典例之足征，而史料有实事载籍之分，固应示志书文苑之别。今师其意，略加变通，撮机要为正编，纳浮辞于副帙，判文事于两途，别资料于正志，义有师资，例匪臆创，谨论厥要略，觊与学者商榷焉。

是书分类之次第，盖有明晰之系统。兹试论之：夫物事发生，自然环境盖其因素。有地斯有物也，故首地理。地必增饰而后美，因人而后传，高贤兴建，时为名胜，学士咏觞，动成故实，故次胜迹。舆梁学舍，虽为州郡民人而设，亦是岩壑林泉之丽，故次建置。岳渎清淑，挺为英秀，扬厥善绩，足资推表；又卜筑寓贤，题咏游士，增美山川，亦宜彰著，故次人物。至若镌墨宝于贞石，发文藻于鸿笔，陈轶事于坟典，山岩文献，赖以有征，史料

① 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

② 刘琯：《东湖胜概集》。

③ 徐霞客：《鸡足山志》跋语。

④ 《方志立三书议》。

攸存，掇录宜备，故次石刻、文辞、撰著。昔徐霞客撰《鸡足山志》，标由天及人之旨，辨类至精，取义良善，今之编纂，实奉为圭臬焉。

此志弱冠所著，全书经乱沦失，不可踪迹；仅录序例，以存少作之一斑云。

原载《固庵文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

潮州之有韩文公祠，由来久矣。祠址迁建，不止一处。恽敬《潮州韩文公庙碑文》曰："潮州韩文公庙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军州事王涤始建，苏文忠铭之，今城南书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军州丁允元迁城南庙于城西（按'西'字当作'东'），即忠祐庙也。"[①] 余按城南书院、忠祐庙二祠，皆历年久而名著称者。

然前乎此之韩祠，盖别有刺史堂、金山、圣者庵三祠焉。考韩祠凡五迁，其初在刺史公堂后，宋咸平二年，陈尧佐始辟。郭子章云"陈文惠倅潮，辟王室东为祠"者是也。次迁于金山，至和甲午，郡守郑伸建，自为记泐石。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谓"金山有《韩山祠记》、《郡守题名》，并刊于石"者是也。又次迁于州城之南七里，郑昌时《韩江闻见录》谓为圣者庵故址。即恽氏所云"元祐五年王涤建，苏文忠铭之"者也。淳熙己酉，丁允元又迁于韩山麓。即恽氏所谓"忠祐庙"者也。元至正丙午，总管王翰以圣者庵故祠遭兵火，鞠为茂草，乃择地于城西南，前临方塘，后依小金山，曰大隐庵者迁焉。即恽氏所谓"今城南书院"者也。自刺史堂、金山、圣者庵三祠废，而忠祐庙与城南书院二祠，益为世所称。彼三祠者，遂无闻焉。是祠沿革，明郭子章曾为《韩公二祠沿革》一文以志之[②]，而语焉不详。恽氏《庙碑》仅

① 《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四。

② 顺治《潮州府志·古今文章》。

称城南书院、忠祐庙二祠，且误合圣者庵、城南书院二祠为一，尤考之未周。是皆不足以尽悉是祠迁建之颠末。今刺取志乘，旁以碑记为证，撰成斯篇。俾留心粤东文献者，知所考览焉。[1]

宋元间韩祠之兴废

宋咸平二年己亥（公元999），通判陈尧佐，始辟韩文公祠于刺史堂正室之东。

陈尧佐《戮鳄鱼文》："乙亥岁（按：乙亥当作己亥。宋真宗元年为戊戌，尧佐倅潮，辟韩祠在二年，正为己亥也。乙己二字，形似易讹），余在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韩词》，载鳄鱼事以旌之。"[2]

《舆地纪胜》一百："陈文惠公为韩公祠，为文以招之，曰《招韩词》。"

《宋史》二八四《陈尧佐传》："通判潮州，修孔子庙，作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

《广兴记》十九："韩公文庙，府治后。"

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四："韩文公祠，即昌黎伯庙。宋咸平中，通判陈尧佐，始建于金山麓。苏轼《碑》中称'庙故在刺史堂后'。（按：苏碑原文作'刺史公堂'，此脱一'公'字。）刺史堂，即今镇署。其地后依山麓，当即指此。"[3]

按：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引《三阳志》称："宋咸平二年，陈文惠公倅潮，辟正室之东为韩公祠。"据此，尧佐辟韩祠，实在咸平二年。《海阳县志》仅云咸平中，盖未详也。尧佐所建之祠，据郭氏言，乃在正室之东。按正室即刺史公堂，苏轼《碑》所谓"庙始在刺史公堂后"者也。今合郭苏两氏之说观之，是祠址，当在宫署内公堂后座之东。顺治《潮州志》九："思韩堂在府治后，宋知州孙叔谨建。堂东亭曰'叠翠'，陈尧佐书。北曰'独游'，今废。"叔谨，宝庆三年知潮州，后尧佐二百二十余年。其筑思韩堂，或因尧佐韩吏部祠旧址。果尔，则吏部祠南宋时已废矣。

---

① 潮阳、揭阳、澄海皆有韩祠，兹所不论。

② 见乾隆《丰顺县志》八《艺文》，乾隆《潮州府志》四十一同。

③ 顺治《潮州府志》九："潮州府旧署，在金山之麓。通衢置堠，唐韩愈有《路旁堠》诗。"

又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顺治、康熙、乾隆《潮州府志》，雍正《海阳县志》，均云韩公祠在河东韩山，宋咸平中，陈尧佐始辟为祠。是以尧佐所辟韩祠，在韩山矣，甚谬。（后人碑记，如许锡龄康熙十六年《韩文公祠堂记》，谓祠在州东三里，韩山之阳，宋咸平中别驾陈文惠公尧佐建立，亦误。）

至和元年甲午（1054），郑知州伸建文公祠堂于金山。十二月为记刊于石。

《明一统志》八十："韩文公庙旧在金山。"

光绪《海阳县志·金石略》："《郑伸文公祠记》：'至和甲午岁，建文公祠堂。知州事郑伸、权监押史□、签判陈□[①]、知县欧阳景、推官雷应昌落成之，时十二月知吉记。'……右刻在金山南面独秀峰前。正书。谨案，《宋史·陈尧佐传》：'通判潮州，作孔子庙、韩吏部祠。'……郑伸所建，想沿其址。惟王汉以大中祥符间，始开金山，尧佐判潮，在咸平二年，核计岁月，尚在其前。当时金山榛莽未辟，或疑未必即有祠堂。然据苏文忠《碑》称：'韩庙旧址，在刺史公堂后。'刺史堂，今为总镇署，金山正在其后，王汉《金城山记》所谓'其地逼近廪库'是也。据此与《舆地纪胜》所载合。知苏《碑》所称故祠，盖即指此。特《舆地纪胜》称'韩山祠'，不称'文公'，差异耳。然《舆地纪胜》别载金山亦称韩山，象之宋人，论必有据。金山之称韩山，必以韩祠得名。则韩山祠，即文公祠，亦不足疑也。"

按：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引《三阳志》云："陈文惠倅潮，辟正室东为公祠，寻迁于金山。"是韩祠实初在正室之东，而后迁于金山也。按今金山有郑伸始建文公祠堂碑，则迁祠者，当为郑伸无疑。《县志·建置略》谓"尧佐所建韩祠在金山之麓"，又《金石略》谓"郑伸建韩祠，乃沿尧佐所建韩吏部祠故址"，说殊未当。余谓郑伸所建韩祠在金山，而尧佐所建者，则在刺史堂正室之东。与金山无关。郭子章所引故《志》，即其确证。而苏轼《碑》云："庙始在刺史公堂后，民以出入为艰。"其所谓"公堂后"者，当指官署内公堂之后座。以州治所在，故民有出入

---

① 此缺字，据《筑城碑》，当系陈应。《筑城碑》末云："圣宋至和二年乙未岁二月初吉，虞庠博士知郡事郑伸磨崖识之。侍禁权监押史职殿直监押师永安佐著签署判官陈应推官雷应昌。"碑初载吴《府志》九，其后林、胡、周各《志》并载之。

之艰也。王汉《金城山记》："金城距州治二百步，而闾阎占其南。"果如《县志》所言，则韩祠处山麓，已在郡署之外，民亦何致艰于出入？且王汉以大中祥符六年始开金山，而尧佐倅潮，则在咸平二年，先王汉已十四年。尧佐所建韩祠，果在金山，则王汉《始开金城山记》中，何无一语言及，是皆可证尧佐所建韩祠，与金山无关也。依上述地址及年代之辨证，知郑伸所建文公祠，非沿尧佐故址。又考尧佐建祠，在真宗咸平间，郑伸建祠，则在仁宗至和间。至和后于咸平，则尤为郑伸建祠金山，在尧佐辟正室东为祠之后之证。与郭子章所引故《志》"寻迁于金山中"事正合。

元祐五年庚午（1094），知州王涤迁城南七里。期年，庙成，苏轼撰《碑》。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元丰七年（1084）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

《舆地纪胜》一百："昌黎伯庙。韩愈元和中，贬潮州刺史，至今庙食。皇朝元祐五年，封昌黎伯。庙旧在州后，今移水南。"

《韩江闻见录》卷九："志称：'宋知州王公涤，移刺史公堂后文公庙于此。'抑余又闻故老云：'王所建庙，在州南七里，今圣者庵也。后毁于火。'"

按：王涤，字长源，莱州人。元祐五年知潮州。[①]

又按：《王忠文公集》二十七有《寄曾潮州诗》，其题目略曰："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曾潮州者何人，集中既未明言，旧府县志亦不载。考十朋殁于乾道七年（1171）。[②]则此诗当为乾道七年以前所作。乾道七年前，潮州郡守曾姓者，有曾楷，

① 阮《通志》三百三十八《宦绩录八》、周《府志》三十三《宦绩》并有传。

② 汪应辰撰《墓志铭》云："乾道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三上章乞致仕，乃诏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命下而公薨。"据是十朋之卒，正在乾道七年。

治平间任。[1] 曾造，乾道元年（1165）任。[2] 曾汪亦乾道间任，在曾造之后。[3] 楷，爵里及治绩无考。造，赣州人，其在潮政绩，惟顺治《潮州府志·官师部》载其曾建放生池而已。汪则以首创广济桥墩著名。三人者府县志皆无传。其修韩祠事，末由详悉。曾造，《放生池记》称“其莅兹邦政事条举，期年而治”。与此诗题所云“到郡未几，修韩祠，建贡闱，可谓知化本”者，颇相合。然遍检《忠文公集》，绝无与曾造往复之文。谓十朋所赠诗曾潮州为造，殊无确证。至于曾汪，则《十朋集》中有曾知郡汪答书二通。[4] 其一云：“昔游宦于乐成，最留心于乡校。”又云：“龙虎成名，功实归于常衮。”隐然以曾汪治绩比之常衮退之。虽不明言其书寄汪于何处，以是语推之，当为汪在潮州时十朋与往复之札也。唯汪在潮曾否重修韩庙，亦迄无实证。谨志疑于此，以俟博识者详考焉。

又按：诗题所谓“首修韩文公庙”者，当即指修王涤所创城南祠。盖其时韩山祠犹未建也。

宋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知州丁允元始建昌黎祠于韩山。

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阳志》：“淳熙己酉，丁允元以溪东之山，乃韩公登览之地，手植木在焉，乃建庙于其地。”

刘克庄《潮州修韩文公庙记》：“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韩山，夷石为庙。”

《明一统志》八十：“韩文公庙……宋迁韩山，封文公为昌黎伯，赐额忠佑。”

按：丁允元，字叔中（一作牧仲），常州人。淳熙中，以忠谏谪潮州。[5]

---

① 见阮《通志·职官表》。

② 《放生池记》云：乾道乙酉，守臣曾造来守是邦。乙酉即乾道元年。

③ 周《府志·职官表》列曾汪于宋敦书之前。敦书，乾道七年任知府。据是汪任知府当在七年以前也。阮《通志·职官表》，汪乾道七年任广南东路转运使。疑汪即以潮州军州事转官转运使也。

④ 见卷二十及二十三。

⑤ 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绩录八》、周《府志》三十三《宦绩》有传。

庆元五年己未（1199），知军州事沈杞建盍簪亭于州南七里韩祠故址。

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六《古迹略一》："盍簪亭在城南书院。谨案，郭子章云：'沈杞即墟创亭。'其称曰墟，盖指州南七里之故址也。"

按：沈杞，字廷幹，常州人。《吴府志》四《官师部》有传。据阮《通志》十六《职官表七》，杞实于嘉泰年间知潮州军州事。

淳祐三年癸卯（1242）知州郑良臣因盍簪亭地，改祠堂，建斋舍，以课诸生，匾曰"城南书庄"。

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淳祐癸卯，郑良臣以韩公有功于潮，书院独缺，相故地而开创焉。外敞二门，讲堂中峙，匾曰'城南书庄'，后堂匾曰'太山北斗'，公之祠在焉。"

按：郑良臣，福州人。淳祐二年（1242）任知州。（郭棐《粤大记》、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绩录八》、吴《府志》四《官师部》、周《府志》三十三《宦绩》并有传。）

又按：黄佐嘉靖《广东通志·陈圭传》云："曾新原道堂，匾其前楹曰'书庄'。"顺治《潮州府志·官师部·陈圭传》亦云："修建原道室，署曰'书庄'。"是皆以匾"城南书庄"者为陈圭，与郭氏《沿革》所载异。

淳祐五年乙巳（1245），郡守陈圭即祠址建南珠亭。

顺治《潮州府志》九："南珠亭，宋太守郑厚建。"

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六《古迹略一》："南珠亭，在城南书院。宋淳祐间，知军州事陈圭建，祠本郡九贤，取韩愈别赵德诗意而名。"

按：陈圭，字表夫，兴化人。（阮《通志》二百三十六《宦绩录》，吴《府志》四《官师部》，周《府志》三十三《宦绩》并有传。）

淳祐十一年辛亥（1251），郡守刘希仁以韩山之韩祠地湿屋老，捐俸倡修，属郡文学吕大圭掌其事。已而去官。

宝祐元年癸丑（1253）季秋，新庙落成。

刘克庄《潮州修韩文公庙记》："淳祐辛亥，刘侯希仁……属郡文学吕君大圭修废，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刘侯去。众曰：'役巨费阔且奈何?'会臬使吴侯燧，行部全侯昭孙至郡，各助楮三千；倅樊君应亨、海阳令王君衢翁各半之。仕于州与游于校者皆有助。吕君又裨以俸金。自门及奥，轮奂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糜楮四万，以宝祐初元季秋落成。"

按：宝祐元年，新建韩山韩文公庙。据刘克庄《记》，倡修者刘希仁、佐其事者吕大圭外，尚有臬使吴燧、上阁外补全昭孙、临川樊应亨、温陵王道翁诸人。刘希仁、全昭孙，里籍俱无考，阮《通志》十六《职官表》七仅载其淳祐间曾知潮州军州而已。[1] 樊应亨，阮《通志》、周《府志·职官表》皆云抚州人，淳祐间官潮州通判。王道翁、吕大圭，据潮州西湖山石刻《陈炜题名》，皆清源人。吕又名圭叔，王又名宏道。（按：阮《通志》、周《府志·职官表》，宋海阳县令有王衡翁，宝庆间任。光绪《海阳县志·金石略》，宝祐甲寅（1254）《陈炜题名》按语云："王衡翁，见阮《志·职官表》，惟载衡翁宝庆中知海阳县事。宝庆无甲寅，据此知甲寅乃宝祐二年。阮《表》误也，当从石刻订正。"按：《县志》卷九《职官表》一仍列衡翁于宝庆间，又卷三十三《列传一》，据雍正《海阳县志》，亦谓衡翁宝庆间任，修南堤，与按语乖忤。作宝庆者自是疏忽。以衡翁为知县当在宝祐年间，语甚明核。予按湖山原刻所署年号正作宝祐甲寅，而王衡翁乃作衢翁，《县志》作衡翁，实讹。《潮州西湖山志》亦依《县志》作衡翁，未能辨正。吴《府志》九录此题名作王道翁，道字不误。）至吴燧，旧志皆无考。此记可补其阙。

元至元十五戊寅（1278），州南韩庙，经兵燹后，亭院无存。二十一年甲申（1284），重建韩山书院，祀孔子及诸贤，而以韩祠附。

吴澄《潮州路韩山书院记》："愈潮州刺史，其后潮人立庙以祀。宋元祐间庙徙州城之南七里……皇元奄有此土，室屋灰烬于兵。至元甲申，韩山书院重兴。即庙之故址，为先圣燕居，先师衮郕沂邹四国公侍，而韩子之专祠附。"

---

[1] 周《府志·职官表》有希仁而无全昭孙。

按：郭氏《韩公二祠沿革》云："至元戊寅兵火后，亭院无遗。迨廿一年甲申，复建书院，山长以一员主之。寻立夫子燕居室于公祠之前。"所言至元间重建韩祠之始末如此，而未言建者为何人。惟下文云："城南祠，元至元间，郡守王用文创祀。"则似建者为王用文。考《明史·陈友定传》，用文盖王翰，仕元为潮州路总管。周《府志·职官表》，王翰为潮州总管，在至正二十五年。郭氏以王用文为官在至元，实误。是说光绪《海阳县志》曾辨之。

泰定三年丙寅（1326），郡长亚中马合马，委教授何民先重建韩山韩祠。

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阳志》："淳熙己酉（1189），丁允元又迁于州东韩山之麓……庆元丁巳（1197）赐今额，己未（1199）进封公爵。泰定三年，郡长亚中马合马委教授何民先重建。"

按：亚中马合马。周《府志》无考，据此可补其阙。何民先泰定间潮府教授，见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至顺二年辛未（1331）夏，总管王元恭（按：阮《通志》作允恭）**以州南韩祠营缮多缺，命韩山书院山长陈文子计其费，撤旧构而新之。五月经始，九月落成。三年壬申（1332）七月，临川吴澄为之记。**

吴澄《潮州路韩山书院记》："至顺辛未夏，总管王侯至。（按：此文录自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一《金石略二》，查同书十九《建置略三》亦有些文，于此句下多"偕其长阿里涉、其贰师赖哈蛮协谋"十四字。）命山长陈文子计其费，爰撤故构，新韩祠燕居。位置相直，宽袤齐等。后有深池，广十丈许，备土实之，建构堂其上，匾曰'原道'……夏五月经始，九月落成。海阳县长忻都实董其役。"

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至顺辛未夏，郡守王元恭议改创新祠，迁公像于燕居堂之后。以天水先生赵公德、文惠陈公尧佐坐堂上左右配享。两庑之东西，则以前代贤守王涤、李迈、丁允元、廖德明、郑良臣、林寿公、陈圭从祀，所以表有功也。书院之前，复创故南珠亭，祀本郡九贤，所以崇有德也。书院后有池，广十余丈，深亦丈余，复僦工填塞，建堂于其上，匾曰'原道'。堂之两庑，辟二斋，西曰'由道'，东曰'进学'，以为诸生肄习之

所。董是役者，海阳宣差忻都、山长陈文子、直学郭宗苏。”

按：王元恭，字敬居，蠡州人。至顺二年为潮总管。[①] 忻都，大德间任同知。[②] 陈文子、郭宗苏，旧志无考。

又按：光绪《海阳县志》十九《建置略三》称，韩山书院，至顺四年总管王元恭拓建。考至顺止三年而已。《县志》谓四年殊误。

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城南韩山书院毁于火，祠亦废。

按：刘嵩《重建韩山书院记略》：“韩山书院，故在城南外七里许。至正壬辰火，遗址鞠草，名存实亡。”考王元恭所构韩祠，实在书院内，书院既毁，祠亦必废。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冬十一月，总管王翰迁州南七里之韩祠于城西大隐庵。明年春正月落成，晋安刘嵩为记。由是州地七里之韩祠遂废。

刘嵩《重建韩山书院记略》：“丙午岁，灵武王公以江西省左右司郎中兼郡守事，追修故典，相其地非礼法之所，乃毁城西大隐庵而迁焉。经始是岁冬十一月，迄工明年春正月。”

顺治《潮州府志》九：“鸢飞鱼跃亭，元王朝建。正统三年，知府王源修。在韩山书院前。”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六《古迹略》：“鸢飞鱼跃亭，在城南书院池中。元至正间，总管王翰建。戴希文诗：‘西郭云连沙树晚，前池风荐水花凉。’即谓此也。”

按：王翰，庐州独山人。至正二十五年（1365）潮州路总管。[③] 据刘嵩《记略》，王翰重建书院，赞之者有同知骆希仲，通判逯文约，推官周泌，经历黄庄、黄英，知事赵祐，教授林仕猷，太史元学宾戴世昌，山长吴期诸人。

又按：光绪《海阳县志》十九《建置略三》：“王翰迁书院于大隐庵，

① 阮《通志》二百四十一，《宦绩录十一》有传。

② 见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③ 事迹见《明史·陈友定传》、阮《通志》二百四十一《宦绩录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宦绩》。

在至正三十四年。”考至正仅二十八年，《县志》谓三十四年，殊误。

又按：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云：“城南祠，至元间，郡守王用文创。祀韩文公、赵天水先生、陈文惠公。”郭氏误王用文于至元仕潮，辨已见前，至称其创祀韩文公庙。光绪《海阳县志·金石略二》言：“其云创祀者，以由州城南始迁大隐庵始也。若仍故址，安得云创。”按：自王翰新建韩祠于大隐庵，而州城南七里之韩祠废。然大隐庵之祠，仍名城南，故人每与州南七里之祠混。

自此以后，潮州韩祠，仅有韩山、城南两处而已。

明以后韩山城南二祠之沿革

韩山祠

明永乐十三年乙未（1415），知府雷春、训导邓祐重修。

按：永乐十三年重修韩祠者，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谓为知府雷春、训导邓祐。然周《府志》二十五《祀典》，仅举雷春，而不及邓祐。阮《通志》三十一《职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雷春，福建汀州人，永乐七年（1409）任知府。至明代潮州训导，无邓祐名。据郭氏文，可补其阙。

宣德二年丁未（1427），佥事顾立重修，教谕袁均哲记。

按：明宣宗二年（1427）重修韩祠者，郭氏《韩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阳志》谓为顾立。考阮《通志》二十《职官表十一》，顾立，余姚人，监生。宣德元年（1426），任按察司佥事。郭氏又云，教授袁均哲作记。考袁氏《记》今无传。检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一《陈察附传》：均哲，建昌人，宣德五年（1430）任海阳县教谕。依是知袁氏以五年庚戌到任，而撰记当在丁未后也。

正统四年己未（1439），知府王源增修。海阳丞江仪凤建“泰山北斗”亭于庙前。八年（1443）四月，源撰记刊于石。

王源《增修韩祠之记》："正统元年（1436），巨飙作，挠韩祠。堂庑亭榭，瓦木尽拔，几成荒墟。源廓其规制，岑缉宫围，夷置阶陀。海阳丞江仪凤，又益'泰山北斗'亭于当途。"

按：郭氏《韩公二祠沿革》谓王源建祠，在正统己未。己未为明英宗四年。考王源撰记泐石，则在八年（1443），相去四年，据是王源盖于四年建祠，而八年始刻石记其事也。

又按：王源，字启泽，龙岩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宣德十年（1435）知潮州。事迹具《明史·循吏传》、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绩录二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宦绩》。江仪凤，开化人，正统间任海阳丞。[1]

天顺五年辛巳（1461），参政刘炜重修，并立韩文公祠石坊，自为记泐石。

刘炜《重修韩文公庙记》："今幸备员广东，得拜祠像……惜堂宇萧颓，门庭荒落，不能不为公所慨。少间，潮之缙绅，同知余佑、通判许纲、义官黄尚年、郭吾辈，闻余兴此，即罗拜于前，而曰：'存此举，佑等素心也，但未有倡之者耳。'于是城之耆彦陆英、陈鼎，郡庠生方舆，邑庠生戴明，咸率先以总其事，就各捐资鸠工。□日立石扃以表门楣，易栋梁以新堂殿，辟廊庑以便祀祭，重灰土以坚故基。复构旁所，以乐余享。"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天顺五年，参政刘炜立石坊，题曰韩文公之祠。"[2]

按：刘炜《记》称"立石扃以表门楣"，即《图书集成》所谓"立韩文公祠石坊"者。炜重修韩祠泐石之年，据碑记所载，为天顺五年辛巳，与《府志》同。惟郭氏《韩公二祠沿革》，独异其说，谓刘炜重修韩祠，为天顺壬辰（1472）。考英宗复位，改元天顺，自丁丑迄于甲申在位共八年。以干支之名，合年数推之，八年中，不应有壬辰。疑壬辰或为壬午之讹。盖炜立石在辛巳冬十二月，迟算一月，则为壬午。谓修庙在壬午，

① 见光绪《海阳县志》十《职官表二》。

② 顺治《潮州府志》三同。

说犹可通。

又按：刘炜，慈溪人。《明史》、阮《通志》三百四十四《宦绩录十四》、周《府志》三十三《宦绩》有传。余佑、许纲，旧志俱无考。

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御史徐瑁重修，侍讲江朝宗记。

翁方纲《粤东金石略》："苏轼《韩文公庙碑》，明成化二十年春三月重刻于石。提举广东市舶前翰林侍读学士古渝江朝宗撰记，叙重建祠宇刻石之事，云苏《碑》经兵燹倾圮，弗立二百年。"

按：徐瑁修庙，周《府志·祀典》不载。瑁，直隶永平人，进士。[①]江朝宗，字东之，四川巴县人。景泰辛未（1451）进士。[②]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知府叶元玉重修。正德十年乙亥（1515），按察副使林廷玉记其事。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五《祀典》："韩祠，宏治十七年甲子，知府叶元玉重修。"林廷玉《重修韩文公祠记》："正德四年（1509）春，余……以按察使董岭南学政。三月，抵潮试士。视学毕，谒文公庙，见其创制崇广……因叩孰惟是图，时张守时泽进曰：'前守叶廷玺也。'"

按：叶元玉，字廷玺[③]，福建清流人，成化辛丑（1481）进士。以户部郎谪潮州，《福建通志》有传。考周《府志·职官表》，元玉为潮州守，在弘治十三年（1500）。张时泽为守，在弘治十八年（1505）。[④] 是元玉修此祠，适当其去官之年。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知府郭春震重修。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嘉靖二十五年，知府郭春震修，土垣易以石，额曰'泰山北斗'。"[⑤]

---

① 见阮《通志》十八《职官表九》。

② 事迹详阮《通志》二百六十《谪官录二·黄谏附传》。

③ 周《府志》误作廷璧。

④ 阮《通志》三十三《职官表四》同，惟张时泽误作张时济。

⑤ 顺治《潮州府志》七同。

按：郭春震修韩祠事，郭氏《韩公二祠沿革》、周《府志》十五《祀典》亦载之。春震，字以亨，江西万安进士。嘉靖二十四年任知府。周《府志》三十三《宦迹》有传。

万历三年乙亥（1575），副使金湘重修，郡人刘子兴撰记。县丞柴钲泐之于石。

郭子兴《重修韩文公庙碑记》："万历二年（1574），藩大夫松涧金公饬备于岭东，展谒公庙，瞻慕久之……遂檄郡县葺而新之。既逾年，讫工。郡守汪君属兴为记……其勤于程督，则县丞柴君钲。"

按：刘子兴此记，泐石之年，为万历三年乙亥，与郭子章所称乙亥正合。金湘，浙江东阳进士。万历元年（1573）任海防兵备道。[1]《记》中所称郡守汪君，其名宙，江西弋阳进士。万历二年任。[2] 柴钲，仁和人。[3]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知府金时舒重修。林熙春撰记。

林熙春《重修韩祠碑记》："金公始欲专其力于韩庙，会藩臬人贺，以资望当行，乃属守陈公应堂、丞桂林杨君可成、别驾刘君昭、理豫章黎君道灿。相与协谋曰：'今日之事，民力竭矣，经费余实任之。第日人粤人虔，时不可失，谁与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及相君力也。'檄署邑令皖城阮君以临，宣令而布之民。仍与参车张文栋、□□□，父老林逢器□□役，自春三月经始，于五月讫工。自原道堂以及庙门，莫不坚完。自一览亭以及曲水，莫不爽垲。材无杂瑕，工无浮食。材无□绌，民无□劳。适金公虔旋，辄偕郡邑落之。"

按：金时舒，字邦泰，福建晋江人，进士。万历二十四年（1596）任潮州知府，后升海防分巡道。[4] 陈应堂，福建泉州南安进士。万历三十

① 见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

② 见阮《通志·职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③ 见光绪《海阳县志》十《职官表二》。

④ 见阮《通志》三十三《职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六年（1680）任潮州知府。[1] 杨可成，临淮举人，任海防同知。黎道灿，南昌举人，任推官。俱在万历二十四、二十六等年。[2] 刘昭，字建明，四川富顺贡生。万历三十四年（1606）任潮州通判。[3] 阮以临，字象原，桐城人。万历三十六年，由普宁知县摄海阳令。林熙春《城南书庄草》云："岁在丁未（1607），古皖象原阮公以天子命来侯吾潮之普宁，戊申，摄海阳令。"考戊申为万历三十六年，而光绪《海阳县志·职官表二》谓以临三十七年（1609）任，与此异。以临，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绩录二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宦绩》并有传。

崇祯三年庚午（1630），知府黄日昌捐俸重修。六年癸酉（1633）正月，自为记泐石。（据碑刻）

按：黄日昌重修韩祠，周《府志·祀典》不载。日昌，字源简，福建晋江进士。崇祯三年知潮州。阮《通志》三十三《职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绩录二十一》有传。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知府黄廷献（按：周《府志·祀典》作廷献。《职官表》作廷猷，《职官表》误）**重修。而以唐进士天水先生赵德配享，列像于祠堂之左。**

康熙《潮州府志》三："顺治十四年，知府黄廷献修。吴颖题额曰'百世师'，仍于城南行祀礼。以天水赵德配享。"

按：黄廷献，辽东人。顺治十二年（1655）任潮州知府。[4] 吴颖，字见末，号茧雪。江南溧阳人。顺治十五年（1658）以刑部郎中出守潮州。[5]

---

① 并见阮《通志》、周《府志·职官表》、《潮州职官名记碑》。
② 见周《府志·职官表》、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一《金石略二》。
③ 见周《府志·职官表》。
④ 见阮《通志》五十《职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⑤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宦绩》有传。施闰章有《潮州知府吴君墓志铭》，见《愚山文集》二十，又见《碑传集》九十。

又按：光绪《海阳志》二十《建置略四》“韩祠”云：“入国朝，在城南者，顺治十四年知府黄廷献重修。以唐进士赵德通判陈尧佐配。”以廷献所修祠为城南，殊误。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知府林杭学重修。郡人曾华盖撰记刊于石。

曾华盖《重修韩公祠及广济桥碑记》：“潮有韩祠非一日……岁在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刺史果庵林公祖下车……以庚申秋捐吉鸠工，至今春告成。□□植之，蠹者易之，墉之圮者饬之，丹黝之漫灭者增饰之。自堂宇门庑，以及文昌阁曲水流觞之属，莫不次第修举。”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康熙十九年，林杭学重修。祠故有官埔田地八十三亩七分，年带租银一十八两二钱，坐饶平县漳溪社金屋厝岭等处，又守邑魏绍芳捐俸一十五两，邑人翰林杨钟岳捐俸十二两，买揭阳县杨钟元户内下田七十一亩。年带租粟七十石，官民米二石零八升，坐落盘溪都大白寨等处，为每年香火之资。”

按：魏绍芳，直隶文安举人，康熙三年（1664）任巡道。[①] 林杭学，字宇武，江宁人，康熙十六年知潮州。[②]

又按：钟岳有《募韩祠缘田序》称：“丙午冬（康熙五年，1666）与当邑缙绅，各捐资，卜吉，再塑再修之，使僧董其事。”是为韩祠驻僧之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仲秋，巡道鲁超题“功不在孟子下”一额于庙内，今尚存。

按：鲁超，号谦庵，会稽人。副贡生，康熙三十一年由通政出为惠潮道。后擢广东布政使。[③]

同年，知府张克嶷以祠为僧典守，不合儒道，乃易民人。嗣以民不谨，逐去，仍属之僧。

---

① 见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② 阮《通志》二百五十八《宦绩录二十八》、周《府志》三十三《宦绩》有传。

③ 阮《通志》二百五十六《宦绩录二十六》、周《府志》三十《宦绩》并有传。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宦绩》："克嶷由庶常历部曹知潮州府事。始至，谒昌黎祠。有僧来迎，询为守者。笑曰：'昌黎有灵，岂能容此。'立驱之。"又二十三《祀典》："祠初招僧典守。康熙年间，知府张克嶷易民人。嗣以不谨，逐去，仍属之僧。"

按：张克嶷，字伟公，山西闻喜进士。康熙三十四年知潮州。①

四十六年丁亥（1707），大中丞范时崇重修。十月，潮州知府江都许锡龄将去任，撰《韩文公祠堂记》泐于石。

按：大中丞范公重修韩祠事，仅见许锡龄撰《祠堂记》，他书皆不载。范时崇，奉天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任巡抚。② 许锡龄，江苏江都人。岁贡生，康熙四十五年任知府。③

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秋八月，知府渝州龙为霖于羊城得退之书《白鹦鹉赋》，归而摹泐于是祠之东壁。

按：龙为霖，字雨苍④，四川巴县人。雍正十年（1732）任潮州知府。⑤

乾隆二十四年丁丑（1759），知府周硕勋重修。徙祠内大士像于祠左，以康进士赵德、宋知军州事丁允元、通判陈尧佐、清学使惠士奇配祀。重立苏轼撰《韩文公庙碑》，惠潮嘉兵务道梁国治书字。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五《祀典》："僧于祠左奉大士像，朔望妇女焚香络绎。知府周硕勋、运同马兆登、知县金绅佥议建小庵于山麓，徙大士象居之。"⑥

---

① 阮《通志》二百五十八《宦绩录二十八》、周《府志》三十三《宦绩》并有传。方苞有《潮州知府张君克嶷墓表》，见《望溪集》，又见《碑传集》九十八。

② 见阮《通志》四十三《职官表三十四》。

③ 见阮《通志》五十《职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职官表上》。

④ 见《雨村诗话》十一。

⑤ 阮《通志》二百五十八《宦绩录二十八》、周《府志》三十三《宦绩》有传。

⑥ 依据光绪《海阳县志》大士庵虽徙，仍在韩祠左。

按：周硕勋，湖南宁乡举人。乾隆二十一年由廉州府调任潮州。[①] 马兆登，乾隆间盐运使司运同。金绅，字尔佩，浙江山阴人，举人，乾隆二十一年任海阳县知县。[②]

嘉庆二年丁巳（1797），海阳县令韩异又葺治之。

按：恽敬《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云："潮州韩文公庙有二，其一在城南……其一淳熙中，知军州丁允元迁城南庙于城西，即忠佑庙。自前明至本朝，春秋祀事，皆行于城西。嘉庆二年，知海阳县韩君异葺治之，阳湖恽敬为碑文邮之潮州。"韩异修韩公祠，府县志并失载，今据恽氏《碑文》补入。

十六年辛未（1811），知府温承志重修韩文公祠之门额（据碑刻）。

按：温承志，山西太谷人。贡生，嘉庆十一年（1806）任潮州知府。[③]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海阳县知县史朴重修。[④]

按：史朴，直隶人。进士，道光十七年（1837）任知县。[⑤]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广东总督张之洞巡潮，檄知府巴陵方功惠动帑大修。移祠左大士庵于山坡，拓宽界址，而翼以亭阁，山麓架石桥以便往来。其规模瑰丽倍于昔。[⑥]

---

① 见阮《通志》五十《职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②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三《列传二》有传。

③ 见阮《通志》五十《职官表四十一》。

④ 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建置略》。

⑤ 见光绪《海阳县志》十一《职官表上》。

⑥ 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建置略四》。

二十八年壬寅（1902），方功惠撰《记》，书而刊诸石上。

民国十五年（1926）五月，潮安县长刘侯武募千金重修。韩山师范学校校长惠来方乃斌撰《记》，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崇清刊于石。

十八年（1929）二月，韩山师范学校校长将祠改建为附属小学，辟教室二，办公室、成绩室各一间。

二十五年（1936）四月，潮安县长辛煋桥恢复祀典，定岁春秋分后三日致祭。广东民政厅厅长林翼中作《记》，刊于石。

城南祠

明永乐间，指挥赖洪重修。增塑宪佥梁公像。

《韩公二祠沿革》："永乐甲申，增塑宪佥梁公像，指挥赖洪重建。斯院前有池亭，扁曰'鸢飞鱼跃'。"

《献征录》："梁观没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韩山书院祀之。"

按：韩山书院即城南祠[①]，梁观，永乐十六年为广东按察佥事，分巡潮州。[②]《沿革》谓永乐甲申塑梁公像，甲申乃永乐二年，时梁公犹在。疑甲申为甲辰之误，盖永乐二十二年也。

正统三年戊午（1438），知府王源重修书院前"鸢飞鱼跃"亭。[③]

天顺七年癸未（1463），参政龚毅市地拓之。[④]

嘉靖间，教谕陈寀建原道。邹守益为《记》。

邹守益《记》云："虞山陈君，原习自太常卿贰，谪署海阳县之教事，恻恻思进诸士于道……乃请于前郡守山阴王君袍，深以为然。始与郡丞萧君世

① 吴澄《韩山书院记》云："取城东之韩山，以号城南之书院。"此城南书院名韩山之故。

② 阮《通志》二百四十五《宦绩录十五》，周《府志》三十三《宦绩》并有传。

③ 顺治《潮州府志》九。

④ 《韩公二祠沿革》。

科、郡倅陈君硕，计赀庸而授厥事。既先后代去，功未用就。今郡守莆田丘君其仁继至，亟谋诸郡丞，刘君秉鉴，力图厥终。胥相葺祠宇，复侵田，以树风声。鼎建原道堂，辟斋舍，以居诸士。”[1]

按：城南祠自元王元恭拓建，仍旧为韩山书院。吴澄《记》云：“建堂其上，扁曰‘原道’。两庑辟斋舍，馆诸生。”则陈察之建原道堂，盖沿前规。陈察，常熟人，海阳教谕。王袍，字子章，浙江山阴进士，嘉靖二年任知府。邱其仁，字主静，福建莆田进士，嘉靖九年任知府。刘秉鉴，安福人，嘉靖间同知。陈硕，晋江举人，嘉靖间通判。并见周《府志·职官表上》。萧世科，无考。

万历五年丁丑（1577），巡道副使夏道南重修后堂，曰“明经馆”，潮阳林大春书。[2]

按：夏道南，余姚进士。万历五年海防分巡道。[3]

十一年癸未（1583），知府郭子章重修，名堂曰“浩然堂”。

《韩公二祠沿革》：“城南祠，虽集诵读，裂为蓬荜。予守潮，命海阳典史林汝瀚督工修葺，以光俎豆……查匿田八十四亩，上之巡道副使郑公岳，批发祠中。并祠前塘租，永为修葺之资。郑公来祀，扁其堂曰‘三代遗英’（对联不录）。后仍为明经馆，子章扁其堂曰‘浩然堂’（对联不录）。浩然堂左右官房，为斋宿所。前门内贮二碑：一刻苏文忠公手书《韩庙记》，元总管灵武王那木罕立，碑阴刻元至正丙午《重修韩山书院记略》，晋安刘嵩记，张泰书。一刻吴临川澄《韩庙记》，碑阴刻文信国题双忠庙《沁园春》。门前仍扁‘韩文公祠’，门外新砌屏扁曰‘泰山北斗’，潮阳林大春书。庙中原有文公并赵天水二土像，子章以其似浮屠，敬为藏之，易以木主。”

按：子章，字相奎，泰和进士。万历十年，任潮州知府。[4] 郑岳，山

---

① 康熙《潮州府志》十二《艺文》。

② 《韩公二祠沿革》。

③ 见周《府志·职官表上》。

④ 周《府志·宦绩》有传。

东长乐进士，万历九年海防巡道。林汝瀚，福建侯官人，万历十二年海阳典史。[①] 戴潞《藤阴杂记》载：京师土地神，俱祀韩愈。赵瓯北有《谒祠长歌》，句云："幸未改塑浮屠像。"注："潮州有公像，作浮屠形。郭青螺易以木主。"即本此文。

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署巡道曾弘重建。[②]

《韩江闻见录》："城南书院，国朝顺治四年巡道曾公宏，又题额曰'昌黎过化'。"

康熙十二年癸亥（1683），巡道仇昌祚、知府林杭学重修，改明经馆为原道堂。昌祚为《记》。[③]

仇昌祚《重建韩文公祠原道堂碑》："潮州府韩文公祠后，旧有'明经堂'一匾，藏久颓圮。数十年来，无复议及修举之者。予奉简命，监守是邦，奋然起修复之志。检涩囊得若干缗，兼谋诸府县同志，共得若干缗。卜日兴工，起于某，竣于某。落成之日，乃更'明经'之旧名，而易以'原道'之新额，盖因韩子之有原道论也……爰伐贞珉，揭诸亭表。"[④]

按：昌祚，山西曲沃贡生。康熙十八年由同知升巡道。

嘉庆三年戊午（1798），知府韩义重修。[⑤]

按：韩义，乾隆五十五年知海阳县[⑥]，后升知府。[⑦]

又按：康熙三十年，巡道史起贤于城东蔡梦悦祠别建韩山书院，城南祠之韩山书院遂仍名城南，专为海阳生童肄业之所。院凡三楹，前为文公庙，中为讲堂，后祀文昌。同治十年，巡道张铣重修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奉文改为学堂。[⑧] 入民国，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校。庙祀日废。

---

① "瀚"字，周《府志》、《海阳县志·职官表》皆作"翰"。见周《府志·职官表》上。
② 康熙《潮州府志》三《学校》。
③ 光绪《海阳县志》十九《建置略三》刊于石。
④ 康熙《潮州府志》十五《艺文》。
⑤ 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建置略四》。
⑥ 见《凤台记》刻石。
⑦ 光绪《海阳志》三十三有传。
⑧ 见光绪《海阳志》十九《建置略三》。

附录一　韩祠著述考

叶氏性谈氏伦《韩祠录》三卷[①]

未见　（道光《广东通志》一百九十《艺文略二》注曰“存”）

《四库全书总目》六十《史部传记类存目二》：“《韩祠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叶性、谈伦同编。性里籍未详，官潮州府同知。伦，上海人，天顺丁丑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然是编前有翰林院检讨盛端明《序》，称性编《录》未成，以述职北上。伦时为潮州知府，因续成之。考书成于正德甲戌，上距天顺丁丑已五十八年。且作《序》之端明，为弘治壬戌进士，上距天顺丁丑亦四十六年，与伦似不相及。即伦老而尚序，亦不应七八十岁尚为知府，后乃忽至九卿。疑为别一谈伦，名姓偶同也。其书首载韩愈道像，及韩山书院、鳄鱼、韩木诸图。次《唐书》本传，及愈谪潮州时所作诗文。次记祠制、祭仪，乃后人碑记、诗赞。末载赵鼎《得全书院记》、陆秀夫《马发祠记》，以皆在潮地，故并录之。其《南珠亭记》一篇，则又以潮之人物代兴归于愈云。”

按：此书《四库提要》据盛端明《序》称，叶性编《韩祠录》未就，谈伦续成之，因题叶性、谈伦同编。道光《广东通志》及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亦皆以叶、谈著录。今从之。叶性，闽县举人，正德间潮州府同知。谈伦，四川邻水人，正德八年潮州府知府。并见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一《职官表》。此之谈伦，与《四库》所称天顺丁丑进士之谈伦，姓名同，而实各为一人。

又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八《史部》有谈钥《韩祠录》六卷，又《附录》一卷。著者姓名，称谈钥，而不及叶性，与《四库》异，而卷数亦不同。二书或不类，惜未见其书，莫能详之。虞山钱曾《述古堂藏书目》三，有《韩祠录》六卷，不著撰人名姓。疑即《千顷堂书目》所收者，但阙《附录》一卷。又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一亦有《韩祠录》，不详撰人及卷数，未审即此书否。

---

① 光绪《海阳县志》二十九《艺文略》。

王氏思《韩祠录》

未见

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韩祠有二，一在河东韩山，一在城南……二祠沿革，近志未备，即王翰林思《韩祠录》亦未载。"

按：据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韩祠录》叶性、谈伦所编外，尚有王思撰。王思，正德九年以言事谪潮州三河驿丞。谈伦则正德八年为潮州知府。二人官潮州，年相接。似王思《韩祠录》，即谈伦所编者，与《四库》著录同书。考《四库》称谈伦续编叶性《韩祠录》，成书于正德甲戌为明武宗九年，亦即王思谪三河之年。时王思初到官，谓其即为知府编纂未完之书，亦足成理。果尔，则《韩祠录》盖历叶氏、谈氏、王氏纂辑始成。然郭子章《韩祠沿革》，举此书著者姓名，不曰叶性，不曰谈伦，而曰王思。岂仅举完编者姓名，而略始编者与？今姑两存，用俟再考。

郭氏子章《韩公二祠沿革》

存

此文初见载于顺治《潮州府志》十二，其后各府县志皆载之。乾隆《潮州志》四十一录此文，多删节。题作《韩祠沿革》，盖简称也。文颇长，其末附载《告韩公文》并韩祠田塘租谷，殊嫌冗蔓。惟屡引及《三阳志》。不特宋元间韩祠建置事迹，赖以有征，即久沦之古志，亦藉以尝其一脔，则不能谓无裨于考史也。

附录二　韩亭考

韩亭，旧址为揭阳楼，唐韩昌黎登览地，梅宛陵所谓"更寻贤侯迹，书上揭阳楼"是也。[1] 俗呼为侍郎亭。[2] 或以其在韩山上，称韩山亭，又简称韩

---

① 《送胡都官知潮州诗》。

② 《舆地纪胜》一百。

亭。[1] 咸平二年，陈尧佐倅潮，登韩山，有诗曰："侍郎亭下草离离。"似咸平中是亭犹在。大中祥符三年，王汉为潮州军州事，重辟金山，自为《记》云："韩公曾即此山为亭，以便游览，人呼曰侍郎亭。今亭已久坏。"明亭已自大中祥符间颓圮矣。《明一统志》称："韩亭元延祐中张处恭建。"然宋孝宗时，杨诚斋有《题韩亭诗》。溯此而上，哲徽之际，刘允有"惆怅昌黎去不还，小亭牢落古松间"句（允绍圣四年进士，故云哲徽间人）。是亭自王汉之后，废而复兴者屡。至元延祐，又有修造之举。刘子兴《重修韩庙记》："庙左有亭曰侍郎，宋景炎间毁于兵燹。"似此亭在景炎前尚存。郭氏《韩祠沿革》引古《三阳志》言："元至正甲申，郡守张弼建思韩亭，知事张宗元记。"阮《通志》曰："韩亭亦名思韩。"是韩亭至正（1341—1368）间又有修建矣。自明以来，废兴莫由详考。清乾隆时，亭尚存。郑昌时《侍郎亭诗》注："亭在韩祠左，多木棉花。"其胜概可知。同光之世，亭又鞠为茂草，迄今竟无修复之者。

按：《纪胜》一百云："韩亭在州衙。"别有"侍郎亭"条云："侍郎亭在州东山，又曰韩亭。"是宋时名韩亭者，有二也。

又按：阮《通志》云："韩亭亦名思韩，后人沿讹有谓思韩堂在东山者，然亭与堂有别也。"按：思韩，堂名，见《舆地纪胜》所引《潮阳旧图经》，盖北宋时建者。

附录三　韩木考

韩木为韩祠一胜迹，潮州八景有韩祠橡木之名。今木已朽矣，而州人想慕者，久而弥殷。今辑录前贤记载于此，以存故实。其词赋歌咏，详见鄙著《韩山志》中，兹不具。

（一）潮东山有亭，唐韩文公游览所也。亭隅有木，虬干鳞文，叶长而傍棱。耆老相传，公所植也。人无识其名，故曰韩木。旧株既老，类更滋蕃。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试春官，邦人以卜登

[1] 顺治《潮州府志》、郭子章《沿革考》云："唐韩愈刺潮之日，尝建揭阳楼。故《图经》以为今之韩亭，即其地，是必有据。"

科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华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最盛者崇宁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五载，人材未遇，或时运适然。[①]

按：此文撰者，顺治《潮州府志》十二、雍正《海阳县志》十一皆作王大宝。康熙《潮州府志》十二，误“宝”字为“宾”。其后雍正、乾隆二《府志》及《古今图书集成》，皆沿其讹。予别有考证，详《潮州艺文志》卷十一“王元龟遗文”条。绍圣四年进士，海阳三人，张参、刘允、陈洵仁；潮阳二人，杨献章、陈仲达。崇宁五年进士，惠来三人，林经国、郑民宪、夏侯履道；海阳一人，郭瑶臣。至宣和六年进士，海阳二人，刘昉、张希傅；饶平一人，张昌裔。[②] 王尚书所谓登第最盛之崇宁五年、宣和六年，今可考者，不过兹数人而已。

（二）韩文公曾即东山为亭，以便游览，人呼为侍郎亭。渡恶溪，陟峻岭，嘉葩美木。亭已久坏，惟一树独存。[③]

（三）韩木，《图经》云：邦人以此卜登第之祥。其奏名多寡，视瑯花之繁稀。有无亦如之。[④]

（四）潮州韩文公祠，有异木，世传退之手植。去祠数十步，种之辄死。有题文公祠者，云“韩木有情春谷暖，鳄鱼无种海潭清”者是也。[⑤]

（五）昌黎韩文公谪潮州守，从乡中带一木种，栽之潮州隔江山中。其叶厚而长，开花，白如柑橘实，人称之曰“韩木”。宋时科举年，潮士每以此觇科举之事。开一花则次年一人登第。开五七花，则五七人登第。此亦可谓之瑞木也。[⑥]

（六）予尝校士（韩）山祠，求韩公手植木不可得。今山中橡树，特其所遗种耳。详子章《韩山校士录序》。序曰：“癸未秋月，予偕二三僚友，苍梧何君、石门梅君、滇南王君，聚诸文学诸生，讲业韩山之阳。日亭午，振衣

---

① 王大宝《韩木赞》节录。

② 俱见周《府志》二十六《选举表》。

③ 王汉：《金城山记》。按：此树即韩木。

④ 王象之：《舆地纪胜》一百。

⑤ 周紫芝：《竹坡诗话》。亦见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四、《图书集成·职方典·潮州府外编之三》。

⑥ 《夷坚续志·后集》二。

山椒，求《志》所称韩木，不可得。予惟鲁桧秦松，今尚蓊翳，岂唐之枝而潮独遗？稍倦，坐翠微。父老折木枝，并进其实。予熟视，橡也。以视三君，三君曰：‘橡也。’橡凡植，在在著地，潮人何神其名曰韩木？且韩子奚取焉？父老曰：‘不然。潮无橡，橡始韩子。韩枝橡兹山，移其种之地，不橡也。故名曰韩木。木花于春，簇簇附枝而桃，邦人以卜科举兴衰。’”①

按：此文见顺治《潮州志》十二。《校士录序》，见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艺文》。考林熙春《谭艺录序》曰：“忆壬午、癸未之间，先师郭司马守潮，曾镌《韩山校士录》。予实《录》中橐下桐也。”② 壬午、癸未为万历十年、十一年，即子章知潮之年。

（七）唐昌黎韩公，以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岭南，为潮州刺史。既去，潮人祀公于郡城之东江浒山麓，有祠在焉。祠之中，轮囷盘屈，老干而无枝者，又有木存焉。迄今阅千百年，潮人于橡树之苍苍矗矗，如虬龙之攫拏而不可方物者，名为韩木。相传斯木为韩公刺潮时所手植，故不曰橡木，而曰韩木也。③

（八）潮城之东有双旌峰焉。峰之下，有树一株，曰橡木。桃其花，而红白。并簇簇附枝，郡人以之卜科名。峰为韩公刺潮故游处，木乃公所植。潮人不忘公，故号其峰曰“韩山”，木曰“韩木”。闻乾隆甲子岁，橡木花稠，是科潮人科甲特盛。今存古迹。有故干盈尺，且化石，作漆光色。为大埔李明经诗捷所取，略作立体，奉为韩公像。庚午辛未，余司事重建韩山书院及修公庙于双旌峰麓。李拟以此木奉于院中书楼，题为橡木楼。以闻当道，未果行。李尝属余题咏，余有句云：“花开八代文章丽，干倚南天星斗高。”盖据其花繁以符者为言，又云：“飘香几阅科名盛，化名不知霜雪深。”则纪故干之实也。④

（九）橡久不花。乾隆九年，岁次甲子，花忽盛开。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士民欢忭，咸称文明之兆。是科中谢文在第二十人，国朝乡榜以甲子

---

① 郭子章《韩江韩山韩木》篇节录。

② 文见《城南书庄草》七。

③ 张玿美：《韩木记》。按：文见雍正《惠来志》十八《艺文中》。

④ 郑昌时：《韩江闻见录》一。

为最。[1]

按：此事周《府志》、光绪《海阳县志·前事略》并载之。谢文在二十人，俱详周《府志》二十七《选举表下》。

原载《潮州丛著初编》，广州，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1938

① 林大川：《韩江记》一。

郝尚久《潮州溪东关圣帝庙碑记》跋

清初郝尚久立溪东关圣帝庙碑，在韩山麓猛虎岗下关帝废庙内。高五尺一寸，广二尺八寸，篆额曰“鼎建潮州溪东关圣帝庙碑记”。横列双行，行六字，字大二寸五分，无题目。碑文凡十六行，行三十二字，字大一寸一分，正书。四十年前所见，碑尚卧废址蔓草中。

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海阳县志·金石略》，郝氏此碑俱失载。碑中所记，足资考证者有三事：

（一）郝尚久之籍贯。 尚久事迹，顺治吴《府志·兵事》，乾隆周《府志·征抚》，曾著其事，而语焉不详。温丹铭先生《明季忠逸传》为立专传，惟于尚久之籍贯出身，略而勿道。此碑末署古汴，乃知为河南人。据《明清史料丙编》，顺治四年五月，“两广总督李成栋揭帖”，载尚久初隶成栋麾下，与杨大甫、张道瀛、梁得胜、闫可义、张月俱为栋协副总兵，入闽转战广东。此其出身之可考者。又《东明闻见录》，《行在阳秋》，尚久均作“尚文”，据此碑可勘正“文”必为“久”字误。

（二）陆振芬任惠潮道之年代。 是碑言徙关帝庙之议，出于兰翁陆公。陆翁即惠潮道陆振芬，《碑传集》七十八王昶撰《振芬传》云：

> 振芬字令远，顺治六年进士。会两粤未平，廷议破格用人，令随大兵进讨，振芬奏对称旨，特命为惠潮巡道。是年十二月，师克南雄；七年三月度大庾岭抵韶州府，巡抚李栖凤倾兵倚毗，……同总兵郭虎等，

由省城至惠州府，剿抚归善海丰诸寨，……至海丰，薛进抗守不下，振芬与镇兵驻五坡驿，总兵班某兵亦自羊蹄岭合攻之，两日城遂下，……八年抵潮州任。[1]

据是，振芬虽于六年受命为潮道，至八年始莅潮就任也。

（三）至所言龙翁班公，即班志富。顺治吴《府志》卷七“平远寇变”条记：“顺治八年冬十一月，班志富徇镇平县，赖其肖降，从征平远。”又“郑成功之变”条云：“（顺治）八年春闰二月，总兵郭虎帅兵至，群盗遁去，时巡道陆振芬、知府薛信辰以次。……五月，郭虎之广州，以总兵班志富代之，……十年五月，以郝尚文（久）乞援至。……”乃知碑文所记之班公，当即为总兵班志富。

此碑署辛卯仲冬，即顺治八年（1651）。光绪海阳《卢志》以其年代浅近，不加收录。记往年曾过洛阳关林，知关圣祀典，自明以后益隆。清人入关，崇奉更甚。顺治二年乙酉五月甲午，遣官祭关帝君。[2] 三年复祭[3]，流风所被，郝尚久以顺治六年己丑镇潮，亦复重修关庙。此碑文向曾录存于行箧中，原石已不可踪迹，故附于后，以备乡邦征文考献之助云。

附：郝尚久《潮州溪东关圣帝庙碑记》

关圣有言：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迄今天下学士大夫，以至妇女孺子，类能尊而敬之。盖精诚所郁，金石矢坚，历始卒如新者，总不以间关废兄弟，不以离乱废君臣；此其所以英雄直诣圣贤，亘古而犹神也。予介胄从戎，二十有载，所至必尸祝圣容，其峙如者山岳，澄如者川流，炳如者日月星辰矣。己丑春，奉简命镇潮；潮之中，有山魑木魅，啸雨啼烟，凭阻播虐于潮区，匪朝伊夕。今仗神庥，渐次而扑灭之，无烦再讨。是岁夏，有揭之白塔，仍为丑逆啃聚，敢抗颜行，予乃卒所部协援剿灭，龙翁班公，大举直捣其穴，俾无噍类，人心加额，从今可安枕也。因见关圣宫宇，能遍寰区，岂复与寇地竞此一坯之土。虽然，在天之灵，不临恶坏，而贞淫淑慝之别，

---

[1] 亦见《春融堂集》，阮《通志》二百五十六《宦绩录二十六》、《清史稿·列传三十四》有振芬传。

[2]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六。

[3] 同上，卷二十六。

肯效泰山于林放哉？遂与共事班公、兵使者兰翁陆公，议徙庙于溪东韩山之麓；苍翠接眉睫，而斐亹于虬龙虎豹间，庶几神得所栖依焉。佥怂恿曰善。于是鸠工庀木，廓庑咸备，土木征费，不劳公帑；庶民子来，阅月而庙貌告竣。呜呼，余不敢独攘己功，而凡有至心者亦能求。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一念精诚，可质关圣而勿忒。后之君子，顾瞻庙庭，即当计靖乱安民，思所以垂不朽者，尊而敬之，更求而光大之可也。予武人，曷能文？特一言勒石竖之，以示永永。记落成月岁，辛卯仲冬吉旦，钦命镇守潮州等处地方总兵官，古汴郝尚久撰记，督造副中军楚黄张士奇书勒。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九十五、九十六期，汕头，1948

恶溪考

恶溪为韩江旧称。所指地域，叠有变迁。昔为全江之总名，今为支流之专号。苟不讨其别，将无以明其实。故特草成此篇，究心粤东地理者可考览焉。

韩江上下游之水，古曰恶水，又名恶溪。

《太平寰宇记》百六十《岭南道》：“梅州程乡县恶水，即州大江，东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险恶，多损舟船。水中鳄鱼，遇江水泛涨之时，随水至州前。”

柳宗元《愚溪对》：“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中之者温屯呕泄。藏石走濑，连盘縻解。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抑噬焉。故其名曰‘恶溪’。”[①]

《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四：“韩江，……亦曰‘恶溪’。唐韩愈《潮州刺史谢表》云‘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是也。”

按：韩江上游曰“汀江”，自福建入境，至大埔三河坝，合梅县之梅溪，始名韩江。柳宗元所谓闽有水名曰“恶溪”，盖指汀江而言。乐史所谓程乡恶水，东流至潮州出海，则合梅溪及韩江下游而言也。宗元唐人，乐史宋人，是唐宋时韩江上下游统称为“恶水”矣。

---

① 《柳柳州全集》四。

以地产鳄鱼，或称为鳄溪。

《舆地纪胜》一百《潮州·景物上》："恶溪有鳄鱼，韩退之作文逐之。陈文惠公尧佐网得，为图记其状。"又《纪胜》一百《潮州·景物下》："鳄溪以鳄鱼得名，旧传为恶溪。"

其水处潮汀之交，下流滨海，上据万山，地势险恶，舟行甚苦。故自梅州（即今梅县）之小河、松源溪、梅溪，以及海阳（即今潮安）之溢溪（即意溪），皆有"恶溪"之称。

《舆地纪胜》一百二《梅州·古迹》："恶溪在州之东六十里，导源自汀之武平溪。溪有七十二滩，急流湍险，上下百余里。舟难至滩，谓之'入恶'，过摊安流而去，谓之'出恶'。"（按：光绪《嘉应州志》云："此条所云'恶溪'，当即指镇平小河。"）

《明史·地理志》："程乡南有梅溪，即兴宁江之下游，一名'恶溪'。"（按：光绪《嘉应州志》云："安济庙，昔号为恶溪庙，今仍称为梅溪宫。"可知梅溪、恶溪，名殊而实一。）

光绪《嘉应州志》十七："按《舆地纪胜》，载梅州程乡县古迹，……云：'安济王行祠在城东隅，其庙在恶溪之滨。'……今考嘉应州之东，有镇平小河，与松源河皆源出武平。是象之所言'恶溪'者，即此二河也。然《纪胜·潮州·景物上》'鳄溪'注云：'今程乡松口，俗号恶溪庙，安济庙乃其所也。'此即所谓'其庙在恶溪之滨'者也。所以后人留题诗，又有'古庙岩岩镇恶溪'之句，是明以松口之松源河为恶溪矣。"

《元丰九域志》九："海阳有恶溪。"（按：《舆地纪胜》一百有"恶溪水"，注云见《九域志》云。）《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潮州府海阳县恶溪，在城东北，一名鳄溪，亦名意溪……韩江经此，合流而南，则又韩江之别名矣。"

温仲和曰："恶者，谓是溪滩石险恶，瘴雾毒恶，及鳄鱼狞恶。"[1] 此殆恶溪得名之由来欤。

按《舆地纪胜·梅州·古迹》："恶溪在州之东六十里，……有七十二滩。"周去非《岭外代答》言："南方凡病曰'瘴'，有'冷瘴'、'热

---

① 《潮州西湖山志》说同。

瘴'、'痖瘴'。"刘恂《岭表录异》谓："鳄鱼身上黄色，有四足，修尾，形如鼍，口森锯齿，往往害人。"[①] 观此诸记载，可以知古时是溪滩石险恶，瘴雾毒恶，及鳄鱼狞恶之状。

唐时，韩江但名恶溪。观唐人诗，可证也。

殷尧藩《寄张明府诗》："春草正萋萋，知君道恶溪。"[②]（按：张名元素，唐初潮州刺史。）

韩愈《泷史诗》："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布杀侬。"[③] 又《潮州谢上表》："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④]

李德裕《过恶溪夜泊芦岛》诗："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⑤]

其后潮、梅之间，居民日众，瘴雾之毒恶已开，鳄鱼之狞恶他徙，即滩石之险恶亦渐平矣。于是恶溪之泛称渐失，而其各支流之专名乃著。其经镇平者，曰镇平小河。

王之正乾隆《嘉应州志》："小河，河北之水，在城东四十里。发源武平，经镇平县，至柚树溪，会平远诸水；至白渡前，入州境；出严子渡泛，会梅溪。"（按：《读史方舆纪要》："程乡县锦江南流五十里有小溪。"即此。）

出松源者，曰松源溪。

王之正乾隆《嘉应州志》："松源溪，河北之水，在城东南一百里。自松源来，出松口下店，会梅溪。"（按：吴兰修《南汉纪考异》："梅口镇……梅溪所经，松江合之。"梅口即今松口，松江即松源溪。）

在梅州者曰梅溪。

按《文献通考·征商》篇："梅之梅溪，深村山路，略通民族。"是梅溪

① 张华《博物志》九、沈括《梦溪笔谈》二十一《异事》亦记鳄鱼甚恶，可参看。

② 《全唐诗》。

③ 《韩昌黎集》六。

④ 《昌黎集》三十九。

⑤ 《李卫公别集》二。

之名，宋时已著称矣。光绪《嘉应州志》四云："疑此水（按：即梅溪）自唐以来，即有二名，如《明史·地理志》之说。唐宋以其地远恶，迁谪有苦之，故恶之名特著。明以后，诸恶已除，故梅之名独显。"

在海阳者为溢溪，或称意溪。

《明史·地理志》："潮州府，海阳。倚南滨海，有急水门。东有鳄溪，一名恶溪，亦名韩江，又名意溪，东入于海。"

康熙《潮州府志》二："鳄溪，一名恶溪，亦名澺溪。"[①]

按：意溪原作溢溪，见梁梦剑《修东厢堤记》，盖取义于泛溢。作"意"者本无义，以与"溢"同音，故俗书为"意"耳。亦有作"澺溪"者，见康熙《潮州府志》、雍正《海阳县志》"韩江"条，及吴震方《岭南杂记》，则是蒙"意"而讹。[②] 溢溪、意溪，本为水名，后乃假以号其地之村曰"意溪村"[③]，堤曰"溢溪堤"[④]，书院曰"意溪书院"[⑤]，则转为其地之代称矣。

盖恶溪本为通名，地域广泛，殊难确指。其支流既各有专名可用，而通名遂为所掩盖矣。故自宋以降，不复以"恶溪"为韩江上下游之总称。

光绪《嘉应州志》："恶溪……自海阳恶溪而上，至梅州大河小河，皆有'恶溪'之名。"又云："不独梅州南之大江称恶溪，而源出武平者，并有'恶'号。不独与宁江之下流称恶溪，而委在海阳者，亦有'恶'名。正不能专之某某处也。"

然恶溪以多产鳄鱼著于世，特名"鳄溪"。后之人则又以此转谓"恶溪"为"鳄溪"之别名。是以其地有鳄鱼掌故流传者，"鳄溪"之名乃得以存。"鳄溪"之名存，则"恶溪"之名亦复存焉。

---

① 康熙《潮志》皆作澺溪。

② 府县《志》"韩江"条作"澺溪"，又别有"意溪"条。同一书中，而同地名互歧，足证"澺"乃"意"之讹。

③ 《广东图说》三十二：海阳县东厢都，城东三里，内有小村七。曰蔡家园，一名意溪。

④ 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六《古迹略》载鳄溪书院在溢溪堤。

⑤ 见《海阳县志》十龚崧林《意溪书院记》。

松口有恶溪庙，庙有鳄鱼余骨。王象之因谓其地为“鳄溪”，亦曰“恶溪”。

《舆地纪胜》一百《潮州·景物上》：“鳄溪以鳄鱼得名，旧传为恶溪。韩公《刺潮谢表》云：‘过海口，下恶水，涛流壮猛。’是自广惠而循潮，顺流而下。今程乡松口，俗号‘恶溪庙’，乃其所也。庙有鳄鱼余骨，尚存。”（按：此专以“松口”为“恶溪”。）

梅县东南三十五里，有鳄骨潭，俗传陈尧佐戮鳄鱼，弃骨其处，故或谓其水曰“恶溪”。王之正《嘉应州志》：“鳄骨潭，在城东三十五里。梅溪东流过郑均两山，矗起，河身稍狭，里许，方出口。水涨则湍急，舟不敢行。相传宋通判陈尧佐戮鳄鱼，弃其骨于各处深渊鱼穴中，以示戒，因名。《明史》讹作‘恶溪’。”①

欧阳修《太子太师致仕赠司空兼侍郎文惠陈公神道碑铭》：“潮州恶溪，鳄鱼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鸣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鳄患并息。”②

> 按：陈尧佐驱鳄地，王之正以为在嘉应州鳄骨潭，顾祖禹则以为在海阳之意溪。③ 考尧佐《戮鳄鱼文》云：“己亥岁，……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万江村，曰硫磺，张氏子年始十六，与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鳄鱼尾去。……余闻而伤之，……命县令李公讼（吴《府志》十二作诏）、郡吏杨勋（吴《府志》作勋），挐小舟操巨网驰往捕之。……既而鸣鼓，……斩其首而烹之。”考硫磺为今丰顺地，非在梅州，或海阳之意溪也。王《志》及《方舆纪要》并误。④

潮安县北溢溪（即意溪）有鳄渚，韩文公曾驱鳄其地。俗因名其水曰“鳄溪”，曰“恶溪”。其误者则专指此地为“恶溪”。

《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四：“按韩江入海阳县境，又名鳄溪。”

《广东舆图》：“意溪，故名恶溪，在县东五里，韩昌黎驱鳄鱼于此。韩江则总名也。”

---

① 光绪《嘉应州志》四云：“《明史》不误。”

② 《欧阳文忠公集》二十。

③ 见《方舆纪要》一百三“恶溪”条。

④ 蒋超伯《南漘楛语》：“愈刺潮州，作文驱鳄，西徙六十余里，仍复为害。后有刺史以毒法杀之，鳄害遂绝。其人姓名无考。”今按：即尧佐，惟时为通判，非刺史耳。

雍正《海阳县志》二："意溪一名恶溪，以鳄潜水中，多伤人物，故名。"

按：韩公驱鳄处，自来传说，皆谓在潮安城东之意溪。意溪亦称鳄渚，《舆地纪胜》引《潮阳图经》云："曰'鳄渚'者，以韩公驱鳄之旧。"据此，意溪为韩公驱鳄之处无疑。顾韩公《祭鳄鱼文》，仅云"投恶溪之潭水"，《旧唐书》一百十一《韩愈传》则云："愈初至潮阳，询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鱼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尽涸，徙于故湫西六十里，而鳄鱼不为患。"① 是则以韩公驱鳄处，为郡西之湫水。郡西湫水，或因李德裕化象潭，谓即今潮安县城西湖山下之西湖。乾隆《潮州府志》云："化象潭在郡之西湖。唐李德裕谪潮，携二玉象，至恶溪，跃入潭中，时作光怪。"陈梿《罗浮志》四："李德裕……南迁至鬼门关，逢终南，怒索二象。……德裕俛首不予。至鳄鱼潭，风雨晦冥，玉象自船飞去；光焰烛天，金象从而入水。德裕至朱崖，饮恨而卒。"按：德裕失象事，道光《广东通志·杂录》引李石炎《博物志》亦云"至鳄鱼潭"。旧志谓此潭在今恶溪。考刘恂《岭表录异》，别载："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一时沈失。"鳄鱼滩，光绪《嘉应州志》四云：疑即嘉应之蓬辣滩。凡此皆疑似之说，未有确证，殊不足以为据。按宋林光世《浚湖铭》，首四句云："凤凰山朝，鳄鱼潭空。祝网旧址，地不满弓。"凤凰山在今潮安县东，光世以与鳄鱼潭并列，则鳄鱼潭当在潮安县境无疑。惟不知为潮安恶溪之别名欤？抑恶溪别一潭水之欤？又《罗浮志》谓德裕南迁，先至鬼门关，次至鳄鱼潭，又次至朱崖，说亦怪妄。考鬼门关，《舆地纪胜》一百四《容州·景物》注曰：《旧唐书》云：'在北流县之南，有两石相对，俗号为鬼门关。'……唐宰相李德裕贬崖州日，经此关，因赋诗云：'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在何处，光度鬼门关。'"是此关乃德裕贬崖州时所经之地。鳄鱼潭，苟确在潮州之恶溪，则德裕南迁路线，当先至容州，次至潮州，然后至崖州也。按：《资治通鉴》二四八："大中元年冬十二月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

① 《新书》百七十六《传》同。

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①]又《旧唐书》德裕本传：“大中二年，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三年正月，达珠崖郡。”《南部新书》卷戊亦云：“以二年正月贬潮州司马，其年十月，再贬崖州司户。”[②] 是德裕徙崖州实在贬潮州之后。况鬼门关，《纪胜》明谓为德裕贬朱崖地所经之地。则当无过容州先于贬潮州之理。此足证《罗浮志》之谬妄矣。按：西湖为韩公驱鳄处，旧志从未有言。而宋时潮州《放生池记》[③]、许骞《重辟西湖记》，亦皆不载。考是湖在潮安县西北一里（周《府志》作二里），宋庆元间，林嵘浚。开庆元年，林光世续浚，乃成今湖。始在唐时，仅为放生池耳。湖处湖山下，西北冈阜环绕，地甚浅隘，长仅一千七百三十七步，宽一百六十步[④]，又去韩江颇远，无长流巨浸，与之贯通（西湖今与三利溪通，然三利溪浚自宋知州王涤，唐时未有也）。使韩公驱鳄确在是处，则《唐书》谓鳄鱼徙于旧湫水西六十里，将何可徙耶？且西湖之西北，池塘杂错，其近意溪者尤夥，鳄鱼亦可涵淹卵育于其间，固不必指其涵淹卵育之所必为西湖也。依是，知西湖为韩公驱鳄处，其说实难为定论。

谨按：《唐书》明谓鳄鱼产于郡西之湫水，又明言鳄鱼徙于旧湫西六十里，则当韩公驱鳄时，恶溪必有小流在郡城之西，以与湫水相通，而后可徙六十里也。间尝考其山川，意溪与西湖间以韩江为界，而北堤障于韩江之西。自北堤至于西湖，地卑洼尽田野，潭水多错聚其间，盖古时河道之胜迹，犹有存焉。陈珏《修堤策》谓“北堤筑自唐韩文公”。考韩文公驱鳄，在莅潮之数日，筑堤当在驱鳄之后。是驱鳄时犹未有北堤也。以此推之，凡今郡西北堤下山圩之田塍池沼，盖为故时水道之遗。则是谓恶溪当有小流西绕郡城以与湫水通者，是说固确然有据矣。而以证之《唐书》所谓“鳄西徙六十里”，亦相吻合。

又按：《广舆记》十九：“金城山在府治后，西瞰大湖。”《明一统志》八十：“金山东临鳄溪，西瞰大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湖山在府治西，前连鳄溪。”是古金山之西，湖山之东北，

① 《唐大诏令集》五八亦载此。

② 诸书所言德裕贬官年月虽互异，而其贬潮在贬崖州之前则同。

③ 旧志以此文为真德秀作，或曰，非是。

④ 见《绅耆公建周侯德政碑记》。

有大湖泛滥其间，而鳄溪之水，又西流至湖山前也。所谓郡西湫水，疑在此处。其地当在今西湖之北，鳄渚之前。意者，韩公驱鳄，即投豚羊于此。至祭祝则在恶溪中之洲，此洲当为今意溪村。以此地旧有鳄渚之名证之，可信也。夫自唐去今已千百年，陵谷变迁，河道移徙，欲确求其地之所在，难矣。顾以《图经》及史传为证，则我说虽不中，或亦不远耳。

又按：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六《古迹略一》云："鳄溪即恶溪，在城东北，为韩文公驱鳄处。"盖专指意溪。又载李德裕《过恶溪诗》于此条，不知德裕诗，非作于海阳之恶溪（予别有辨），而恶溪亦非是所独有也。意溪乃恶溪之一段，谓之即为恶溪，谬矣。

凡今所称之"恶溪"或"鳄溪"，皆古时恶溪之一段。古之恶溪为总名，今则变为分名。作总名用者，其地域广，其所指泛，为一水之通称，不得专指某某处也。用为分名，则其地有限矣，其所指有定矣。故名难同，而地实迥异焉。盖地名演变之大例如此，言地理者，当分别而观之，庶不致于舛误云。

附一　韩江得名考

郭子章《韩江韩山韩木》篇云："自韩公过化之后，江故名'恶溪'改曰'韩江'。"[①] 是江称曰"韩"者，盖由韩愈而得名也。《邱氏族谱》载刘昉（海阳东津人，宣和三年进士，官龙图阁）《赠刺史莆阳邱君与由梅州乞养归隐》诗，有"名德重韩江"之句，则韩江之名，北宋已著称矣。按：故时所谓"韩江"，仅以名韩山下之江，《方舆纪要》一百三"韩江在府城东韩山下"即在明证。若今统括江上下游总名曰"韩江"者，则殊非昔之畛域云。

附二　化象潭辨

《府志》："郡之西湖，唐李德裕谪潮，携二玉象，至恶溪入潭中。"如志言，化象潭为恶溪之一潭，亦即西湖。按：恶溪潭水众多，谓化象潭为恶溪

① 见顺治《潮州府志》十二《古今文章》。

之一潭，自无可议。若必其为西湖，则恐未然。李石炎《博物志》、陈梿《罗浮志》，皆谓德裕失象在鳄鱼潭。林光世《浚西湖铭》："凤凰山朝，鳄鱼潭空。祝网旧址，地不满弓。"西湖者，唐放生池，此云"祝网旧址"，即西湖也。审林氏语，以"祝网旧址"与鳄鱼潭分别为言，则鳄鱼潭不得为放生池之西湖甚明。古鳄溪即恶溪别名，梅县有鳄骨潭、鳄鱼滩。以是例之，鳄鱼潭为恶溪之潭水，不当专属之西湖也。今知鳄鱼潭既异于放生池之西湖，则德裕失象所在，其不得为西湖也亦明矣。《罗浮山志》载德裕南迁，至鬼门关，逢终南索二象。至鳄鱼潭，二象化去。德裕至朱崖卒。此说可为二解：其一，德裕南贬。先至容州，次至潮州，又次至崖州。其二，鳄鱼潭不在潮州，而在容州至崖州途中。按：第一说殊误，《恶溪考》中有详辨。至第二说，以潮州方面记载观之，鳄鱼潭自是指潮州恶溪之潭水。与其谓鳄鱼潭在鬼门关，以应《罗浮志》之说，不如谓《罗浮志》所记有舛误，为近实耳。《恶溪考》已略论之，犹有未尽，故复辨之如此。

附三　安济王考

潮安所祀神，以安济圣王为最尊。潮安人称神曰老爷，于安济圣王则称曰大老爷。所以冠大字者，示其于诸神中为尤尊显也。旧《志》："相传神为蜀汉永昌太守王伉，诸葛征蛮，伉守城捍贼，殁为神。前明滇人有宦于潮者，奉神像至此。"[①] 耆老所传，则此神乃明时南关外谢姓宦游云南奉祀于潮者。黄仲琴先生曰："明云南监司有王伉，所祀或此人，未必永昌太守之王伉也。"按：两王伉皆宦于滇，出处相同，所祀为谁，今难臆断矣。神又称曰王公，王公者，王伉公之简称。其名安济圣王者，周《府志》曰："安济，其封号也。"[②] 又曰："滇人奉王伉神像至潮，号安济圣王。立庙镇水患，遂获安澜……宋沈存中有《彭蠡小龙记》：熙宁中，出师南征，小龙负舟护军，仗有司以状闻，封济顺灵王。……证诸沈《记》，安济、济顺，盖从其类。"[③]

按：安济王庙，又名青龙庙，故周《志》释安济之义，以为得之于龙，窃谓非也。《舆地纪胜》："梅州有安济王行祠，在城东隅。其庙在恶溪之滨，崇宁三年赐额。"又云："程乡松口俗号恶溪庙，安济庙乃其所也。"温仲和

① 周《府志》十五《寺观》、光绪《海阳县志》十《建置略四》同。

② 卷二十五《祀典》。

③ 卷十五《寺观》。

曰："南宋以前，当以溪流险恶，而求安济。故祀此水之神，以安济为名，而或封侯，或封王，又素著显灵之验也。"[1] 是安济庙，不独潮州有之，梅县亦有之。名曰安济，乃以镇水患而名，谓取义于龙，误也。潮安之安济王庙，跨南堤，当韩江之滨，临水为庙。疑昔时此庙本祀水神，故名安济，如梅州安济王行祠者。其后别祀王伉，复仍安济之旧名耳。此庙亦名青龙古庙，潮人所谓青龙，实指青蛇。吴震方《岭南杂记》："潮州有蛇神……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虬结，长三尺许，苍翠可爱。闻此自梧州来。"潮俗每遇此蛇出现，即以为神，以石榴供其攀援。石榴者，潮人所目为红花，瑞木也，故取为奉神之具。青蛇随处有之，故潮安庙宇称青龙者，不一而足。惟安济王庙之蛇神为尤灵，且安济王又最为潮人所崇奉，故青龙古庙之名独著。曰古庙者，神庙之通称，例如韩山古庙、关帝古庙，非谓青龙庙之名，较安济王庙为古。以《舆地纪胜》证之，安济王祠之名，已著于宋，则青龙庙之名当不能古于安济王庙矣。青龙庙乃后起之号，人以加诸安济王庙，为别称耳。安济王，潮人皆崇祀之，而少能道其神之由来，故略为考证。倘亦留心民俗者所乐闻欤。

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六至七期，北平，1937
后收入《潮州丛著初编》，广州，1938

① 《嘉应州志》十七。

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

一

潮州与琉球之交通，始自隋炀帝之世，阮氏省志、潮州府县志俱失载，惟明陈天资《东里志》云："大业四年遣虎贲中郎将陈棱等自义安浮海击破之。"

此事备载《隋书》，文凡三见。

（一）《流求国传》云：

大业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因到流求国，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人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䵶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1]

（二）《陈棱传》云：

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棱率众登岸。

（三）《炀帝纪》云：

大业六年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

---

① 《北史·流求传》文同。

按：《东里志》系此事于四年，盖误读《流求国传》文，因《传》记三年事，下连言明年，又接陈棱击流求事，中间不书明年月，陈氏因误以陈棱往流求在大业三年之明年，乃系于四年，非也。

隋时之潮州，自文帝开皇十年罢义安郡，省阳海县，而于郡廨置义安县，以属循州，至开皇十一年，于义安郡立潮州，时领县六，海阳（今潮安），潮阳，海宁（今惠来，一云漳州，非是，见拙作《海宁考》），绥安（今福建漳浦），义招（今大埔），程乡（今梅县），是时辖境及于福建。至十三年省绥安县[①]，炀帝大业三年罢潮州，仍为义安郡。时领县五，海阳、潮阳、万川（义招）、海宁、程乡，乃不再奄有闽地。则大业六年陈棱兵自义安出发，必自海阳动程。是时之海阳，包有饶平、南澳一带，故《东里志》云："其自义安浮海，即必维舟岛屿，隆南青深四澳，皆所经历。"惟当日隋兵是否曾经南澳，则殊难断定耳。

《陈棱传》云"发东阳兵"，此语颇费解。因东阳郡在浙江金华，吴置。梁、陈称金华郡。隋平陈，废金华郡。大业三年，复置东阳郡，领金华、永康、乌伤、信安四县。自潮州出海，而发浙南之兵，道途遥远，于理似为不宜。考《隋书·地理志》，义安郡，梁置东扬州，后改曰瀛州。及陈，州废，平陈，置潮州。《寰宇记》作东阳州，如此处所称东阳，乃用义安旧名，则所领仍是潮州兵也。

二

陈棱所至之流求，中外学人考证纷纭，冲绳及台湾二说凡有争执，顾鄙意冲绳说为胜。兹就当日由义安郡至流求之时日及经过岛屿，略为疏说。

（一）时日

《炀帝纪》谓"陈棱于二月乙巳出兵"，《棱传》谓"泛海月余而至"，《流求传》谓："棱自义安浮海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鼊屿，又一日至流求。"是由高华屿至流求航程仅三日，自义安至流求全程逾月，假定以一月十五日计，减去三日，则由义安泛海至高华屿，需时一月又十二日。《流求传》于至高华屿句上，语有省略，故不详记日期，似当日由潮州出发，途中遇风，诸

① 《清一统志》说，《漳浦志》作开皇二十二年。

多阻折。自饶平之拓林经基隆宫古岛，至流球之那霸，水程 714 海里，《流求传》谓自建安郡（福州）东水行五日至流求，福州至流球，海程 390 英里，论者谓此即朱宽往航冲绳之日数，是自闽往流球，与自潮航流球，其时间相差甚巨，以航程之长推之，则陈棱兵由海阳界出发，盖为可能，惟二月正逆节季北风之时，途中必有停泊，故濡滞如是之久。

《福建通志》载隋开皇中遣虎贲将陈棱略澎湖地，其屿屹立巨浸中，环岛三十有六。按《陈棱传》不载此事，《隋书》棱以大业三年拜武贲，不应于开皇时为虎将，则此云开皇，当为大业之误，疑是一事而非二。或析言之，恐非。抑棱自义安至高华中间为期一月，或者曾经澎湖也。

（二）经过岛屿

高华屿　有谓即澎湖西南之花屿（藤田丰八说），有谓即南澳岛（和田清说）。如依《陈棱传》，则自潮州至南澳，航行须月余，殊无是理，南澳说可不攻自破。又有谓即台湾基隆口外之澎佳屿，丁谦疑即宫古岛或八重山旧名，均难断定。惟以流球为冲绳岛，则花屿之说又不可言，宫古与高华音尚相近。

䵶鼊屿　主流球为台湾说者，谓䵶鼊屿即澎湖东北之奎壁山。清《澎湖厅志》云：奎壁山原名䵶鼊，以形得名，论者执此为证。主流球为冲绳说者，驳之，谓陈棱与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如以每舰战兵百人，须百余舰，奎壁山周围二里十九町，屿岸皆为沙滨，暗礁极夥，绝不容此多量战舰泊碇，故定䵶鼊屿应即今冲绳那霸口外之久米岛，久米为䵶鼊音讹，䵶鼊二字，见《文选·吴都赋》刘注，龟属。沿海岛取状于龟，以之为名者至夥，䵶鼊犹言龟鳖，无须肯定其必为奎壁山也（梁嘉彬说）。

丁谦《隋书四裔传地理考证》云："义安今潮州，由潮州往流球为先经八重山，次经宫古岛，乃至那坝，那坝彼国所都地也。"按以䵶鼊屿为那坝外久米岛，于地理当无大误。张其昀曩撰《对日和约中之流球问题》，近汪诒孙作《流球与中国之历史关系》，二文均证实丁说，兹不赘。

凡棱自潮州征流球途路所历可考者大致如此。

附案：法人圣第尼、德人里斯，倡流球为台湾与冲绳之总称，荷人希勒格著《古流球国考证》，谓明代以前，所谓流球，但称台湾。日人藤田丰八、市村瓒次郎二博士和田清教授，均主隋代流球为台湾。秋山谦藏则主流球为冲绳。或为折衷之论者，谓《隋书·流求传》所记事物属于冲绳者七，属于台湾者五，如秋山谦藏学士是。两派争辩，以台湾论

者较占优势，详加藤三吾《流球之研究》，其结论谓自隋至元，均以台湾为流球。又币原坦向《南方文化建设》一书，其结语亦谓隋代流球为台湾南部之一部分。吾国学者于台湾说颇持异，均主隋代流球确即冲绳，详梁嘉彬《流球史论正谬》，其说晚出，辨证益密，可参看。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六十七期，汕头，1948

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

柘林现在是潮州市所属饶平县辖下的小镇，在明清历史上为海防要地，与南澳对峙，和黄岗、大埕相犄角，形势险要。明时设柘林寨，为海上门户，其地一带称为柘林澳。嘉靖丁未（二十六年，1547）郭春震《潮州府志·地理志》云：

柘林澳：暹罗诸倭及海寇常泊巨舟为患，今调拨潮碣二卫军士，更番哨守，益以募夫，以指挥一员领之。水寨：凡舟之过秋溪及樟水港者必由之。洪武初，置石城，造战舰以拒番舶。今官军往来防御，以夏秋为期。①

郭氏在这段记录的后面复加上一番备倭的议论，指出领饷金募海夫不足，复益以东莞乌船子弟兵之数百。复论该地无法遏止为乱之原因有三："一曰窝藏，一曰接济，一曰通番。"所谓"通番"，"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因而不靖劫掠"②。

《明史》三二四《暹罗传》："嘉靖元年暹罗、占城货船至广东。市舶中官午荣纵家人私市，论死如律。"当日禁绝通番如是之严。春震是篇他书屡加以

① 《潮州志汇编》，70页。

② 同上。

转录，足见其重要性。[①]

嘉靖时，番舶已经常往来，知暹罗与潮人之移殖交流，由来已久。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卷一〇三）饶平大尖峰下云“柘林澳在其南，暹罗、日本及海寇皆泊巨舟于此”，即抄袭郭志之说。

万历二年陈天资修《东里志》云：

> 洪武二十六年，置水寨，兼哨柘林。洪武二十七年，置大城守御千户所。（倭）寇海边，自澄莱（莱芜）至广东千余里，咸被其害，至是命安胜侯吴杰率武职于沿海以总备。仍置寨建所，于是有东陇之水寨，柘林之东路，而大城所亦因以建置焉。（传钞本）

洪武初，只在柘林东路置哨而水寨则与大城所同时设立。水寨在东陇，郭志所谓樟水港，即指澄海樟林。明泰和杨彩《南澳赋》云：“柘林樟林，苍苍郁郁。”柘林、樟林每联称在一起。1972 年在澄海县东里和洲村出土远洋木船，舷板上有下列字样：

> 广东省潮州府领□字双桅壹佰拾伍号蔡万利商船。[②]

红头船有单桅和双桅，此即当日出洋的双桅渔船，为蔡万利商号所造者。柘林造船业亦盛，至今尚然。水寨去柘林约一日程，洪武三年指挥俞良辅筑城周不及二里[③]，而大城所即大埕城所，为洪武二十七年百户顾实创筑，高二丈七尺，周围六百四十三丈，城之四门，各建城楼，规模宏伟，东面城垣至成保存完整，四面城门尚在。柘林东路于嘉靖时改为寨，刘忭《饶平县志》云：

> 嘉靖四十五年改东路为柘林寨，东路之兵，时聚时散，海寇伺其往来，以为肆掠，民无宁岁。提督吴桂芳奏募民兵一千七百一十六员名，领战船大小四十五只，以指挥一员统之，建牙于天妃宫之东南，屹然一巨镇焉。

---

① 如《东里志》、吴颖顺治《潮州府志》。

② 《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123 页。

③ 见《方舆纪要》。

寨址位于镇东北小山岗之山，营房已废，寨墙尚存。《东里志》云：

象头山在柘林，旧有天后宫。嘉靖初，镇守东路官，即庙树栅为营，戊戌（十七年，1538）同刘晴川（魁）与知县翁湘湖（五伦）行部至此，有诗。（不录）

今天后宫后摩崖有玉湖书“披云洞”三大字，这是柘林寨见于志乘的记录。由设一哨进一步而设寨，经过许多地方官的倡议与经营的。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饶平知县益阳罗胤凯议云：

窃惟柘林前金门一道，上据白沙墩，下距黄芒、南洋，外跨隆、南、云、青四澳，内则延裹黄岗、海山、钱塘、樟林等处多村，闽广货舟所经，……每有番舶据海劫掠……连年官府雇募黄芒等处兵夫三百名，协同官军驾船屯聚……往往海滨骚扰，然必以柘林兵夫易之，安知柘林兵，不为黄芒之为乎……

嘉靖乙卯（三十四年，1555）知县应天徐梓有建海八议，略论：“沿海多设备倭官军，故于宣化（都）柘林之东北，特建大城备倭之千所户，而今则无益矣。”以其“隐处内地，去柘林十里之遥，海寇登岸劫掠，尚不知闻……而柘林地方，旧尝设一指挥以守之矣，为今之计，宜设一员于南洋……分一员柘林，以大城官军为主，而以某处募兵若干翼之”[①]。

在嘉靖正式设寨以前，柘林自明初以来只有指挥一名，而兵额及战船都无明文规定。这一期间，倭寇为患频仍，海上寇盗活动加剧。兵夫所以御寇，往往摇身一变而为寇。嘉靖四十三年，柘林海兵谭允传等以缺额称乱，进犯东莞，即其一例。柘林原仅有极薄弱的设防，称乱的活动分子往往以柘林为攻取据点，故柘林遂成为海上往来的重要交通站。

潮州沿海的军事活动，在明代是寇乱最多的时期。万历十年潮州知府泰和郭子章著《潮中杂纪》卷十即为《国朝平寇考》上下篇，记载详尽。拙编《潮州志·大事志》系年纪要，存其大略。兹举其与柘林有关的事件，列出

---

① 具详《东里志·公移》议地方一项。

如下：

嘉靖五年（1526） 柘林民吴大与吴三聚众驾海舟十余艘劫杀惠潮。

嘉靖二十三年（1544） 李大用船近百艘合攻东路官兵并柘林，下岱乡民竭力守御。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八月东莞何亚八寇东路柘林，协守指挥马骧、东路指挥张夫杰不敢迎战。

嘉靖三十三年 亚八弟亚九肆掠海上，是年六月初六日攻柘林，千户夏琏死亡。

嘉靖三十四年 柘林海兵谭允传作乱，广东提督吴桂芳平之。

万历元年（1573） 林凤初遁钱澳求抚，自澎湖九奔东番（台湾）魍港，为胡守仁所败，是年冬凤犯柘林、靖海、碣石。①

万历二十六年（1598） 四月，闽中盗引倭大艘十余，入犯柘林、碣石，惠潮副使任可容剿之。②

隆庆元年 李锡为福建总兵官，海寇曾一本至闽，锡出海御之，与大猷遇贼柘林澳，三战皆捷。③

以上诸役以林凤事件最为著名，事详《明史·凌云翼传》及《菲律宾史》。《潮中杂纪》言："林凤拥众数千，为官兵所逐，因奔外洋，攻吕宋玳瑁港，筑城据守，且修战舰，谋胁番人，福建巡抚刘尧海遣人谕吕宋国主集番兵击之，至是又从外洋突入广。云翼……与福建总兵胡守仁兵合……追至淡水洋……凤走外夷。"

林凤的名字，一般谈中国殖民史者都耳熟能详，不必深论。在嘉靖三年（1559）至万历二年（1575）这段时间，由于倭寇的肆虐，入潮阳，侵大埔，海上若干首领人物大都诱导倭寇为乱，像许朝光会倭攻海门，略黄岗、蓬州；林国显导倭寇上里（林凤即其族人）；吴平导倭陷大埕所，据南澳；平党夥林道乾、曾一本，无不挟倭以自重，失败而远遁外洋。官方参与此次战役经过，详《明史·俞大猷传》及《洗海近事》一书。吴奔安南，道乾至浡泥，略其地，号曰道乾港，聚众至二千人。④ 成为开拓外洋之历史人物。自吴平、林凤辈兵事平定以后，明廷乃于万历四年，因闽巡抚刘尧海之奏，而有南澳镇副

---

① 《明史·凌云翼传》。

② 黄佐：《海上事略》。

③ 《明史》二一二《李锡传》。

④ 《明史》三二三记道乾淡水洋扬帆直抵浡泥，攘其边地营港，即此婆罗洲之汶梨。

总兵之设，柘林的军事地位遂逐渐为所取代。《明史》二二三《吴桂芳传》："（吴）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阳江奔安南。……平党林道乾复窥南澳，时议设参将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险而腴，元时曾设兵戍守，戍兵即据以叛，此御盗生盗也，不如戍柘林便。"故先于柘林设寨，然只有常备兵一千七百一十六名，何以御海上狂飙之聚？故不十年而改于南澳设镇。当日请设海防的重要文件，《潮中杂纪》卷五奏疏加以钞存，十分重要，固取与此有关者略加介绍，以供治海防史者的参考：

（1）提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吴桂芳《请设海防参将疏》："倭寇海贼出没无常，先年议设南头、碣石、柘林三哨兵船分地防守，立法虽善，但原无口朝除将官专管，每哨止委指挥一员，管督官卑权轻，号令不肃，以致兵无忌惮，得恣猖獗。近日柘林哨兵之变（亦指《谭允传》事）可为永鉴……臣等欲并三哨之兵而稍减其数……特设参将一员，总领……名曰督理广州惠潮等处海防参将。"

（2）吴桂芳《请设沿海水寨疏》："请添设守备一员领兵一千二百名，住扎潮州柘林，以严东界门屏之守。"

（3）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刘尧诲奏《请设南澳副总兵疏》："照得海贼林凤开遁外洋，不知向往。……今欲为两省久安计，必先治南澳……今宜得一总兵，领水兵三千人，专守南澳，而兼领漳潮二府兵事。……且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时贼人许朝光所造，雉堞濠堑屹立雄镇。……不惟海寇驻足无地，抑且逋贼出没不便，虽从此以为久安可也。"

南澳既设镇，初置副总兵，而柘林照旧有守备一员，互为犄角之势。南澳有四澳，孤悬海外，南宋淳熙七年沈师犯南澳，杨万里自广至潮，讨平之。宋季帝昰避元兵，曾驻此地数月，今有太子楼遗址。郑和下西洋舟经南澳，黄省曾《西洋朝贡录》云："南澳又四十更至独猪之山。"独山或即刣猪澳。《东里志》："宰猪澳，一在深澳东。戚继光从此间关道破吴寨穴。"潮语宰猪的"宰"字，读为透纽。上述诸事，足见南澳，虽为蕞尔小岛，久已著名于史书。柘林寨的遗物，现存有风吹岭东麓雷震关口上的石刻。其文如下：

崇祯十三年季春立

盘诘　奸细

缉获　盗贼

管柘林寨事都司曹

楷书字大如斗，令人触目惊心。盖此处为重要关隘，由海路登陆必经之途径，故设防以备不肖之徒。

风吹岭巨石林立，南澳镇总兵官员多摩崖刻石镌名其上，有第二任总兵晏继芳及梁东旭等题字："闽广达观　万历丁丑（五年，1577）季夏之吉闽粤副总兵晏继芳。""天水一色　万历甲戌季冬　黔南梁东旭。"[①] 又雷震关巨石碑刻著下列题记："协镇广东黄岗等处地方副总兵官吴讳启镇招抚各岛伪镇官兵人民万数在此登岸。"

两旁小字略记："……予自癸亥之岁莅任斯土，觉夫海波不扬，兵民安乐……康熙庚申岁协镇吴招抚之功所致也。是其功之上佐朝廷，下庇军民者大矣。但功大宜传，年久恐湮，爰敢勒石，以垂不朽云……立。"

庚申是康熙十九年，是时清兵平达濠，潮州底定。吴启镇是吴六奇的儿子。六奇所著《忠孝堂集》有招抚南澳杜（煇）吴（陞）两镇书多篇。六奇时为饶平镇挂印总兵官。据《潮州志·职官志》潮州镇四黄岗协副将，吴启镇、康熙十四年任，十七年又任，二十年继之者为沈阳许登联。[②] 是十九年黄岗协镇正是吴启镇。此巨碣为纪颂吴氏招抚的功绩。考湖寮出土康熙六年《吴六奇墓志铭》称："丈夫子十有一，长启晋，次启丰，嗣职镇守广东饶平等处地方总兵。次启镇，邑庠生，娶甲戌进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罗万杰公次女。"启镇妻即是罗万杰之女。碑云"各岛伪镇官兵人民，在此登岸"，可能亦包括降清的南澳前明总兵陈豹、吴陞、杜煇等人，当日归顺清室的海外反动分子，都要从柘林的雷震关登岸，关外即面对汪洋大海，形势险要，万夫莫开。这一片石的纪录即是柘林在海防史上的地位重要见证。可惜立石的人名不清楚，从旁款所言"癸亥之岁莅任斯土"，癸亥是康熙二十二年，如果勒石是饶平县知县，二十二年癸亥莅任者当为颍州刘忭（忭尝修《饶平县志》），尚待核实。

风吹岭上的摩崖石刻群，新印《饶平文物志》大概多有记录并附图片，可以参考。上举晏继芳的摩崖原文记"万历丁丑"即是五年；而《文物志》作"九年辛巳"，显为笔误。九年的南澳副总兵则是于嵩。于嵩于万历十一年建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碑今尚存于深澳的碑廊。

---

① 此据《文物志》录文。按南澳《陈志》，"梁东旭，崇祯二年任副总兵"，与此年代不符。

② 见《潮州志汇编》，1147页。

我于本年二月三日（元宵前三日），至饶平柘林考察，由该镇穿过宋白雀寺古刹，又登元至正癸巳（十三年）的镇风塔，在风吹岭、雷震关上，凭吊石碣遗迹，低徊者久之。与柘林相去百里之遥的三百门港，位于汫洲与海山的交界，当年林风带领徒众多人即从此三百门港上船出海。现在，三百门港正在开发为新的城市，回顾海上活动的历史故事，发思古之幽情，令人神往。

最近澳门举办“东西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向我征稿，窃念谈中外关系史者多知林凤等攻犯柘林，而柘林所在，其历史形胜，向不明了，因取柘林为题目，草成此一短文。不贤识小，聊备商榷。记起南澳万历九年任副总兵而倡修《南澳志》的于嵩有“题柘林”五律一首云：

地险壮嵬峨，行穿翠霭过。潮平两岸阔，云密万山多。剑舞吞牛斗，旗摇剪薜萝。年来经几泛，瀚海息鲸波。[①]

附缀于此，以殿吾篇。

又按：浙亦有柘林，为异地同名。《明史》三〇二《日本传》：“（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倭）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又云：“浙西柘林、乍浦……皆为贼巢，前后至者二万余人。”证之《明史·俞大猷传》：“贼犯金山，大猷战失利，时倭屯松江、柘林者盈二万。”此为另一柘林。

1993年2月于香港

原载《潮中杂纪》附录，香港潮州商会，1993

① 《东里志》艺文。

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

郑成功据台时，借南澳为跳板，进兵江南，潮人随他迁台的甚多，想不到几百年后经间历史关系的葛藤仍未切断，宗族伦理观念之深入人心，正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从汕头市乘小艇向东行三小时即抵达南澳，这是一个蕞尔小岛，面积只有 106 平方公里，在历史上却对东南沿海地区起了重大的桥梁作用。眼见逝川白浪滔滔，不知淘尽几多英雄人物。被浓雾销闭着的危峰果老山，俯瞰汪洋无际的碧海，猎屿、青屿环抱有如襟带，镇慑云、深两澳的交界。横跨南北的雄镇关，气势雄伟，不问而知是历来兵家必争的形胜地。远在郑和下西洋时候，南澳的名字已登上航海针路的记录。[①] 屹立雄镇上的石城为海寇许朝光所造，嗣后吴平、林道乾出没外洋，都窃据其地，故福建巡抚刘尧诲奏请“为闽、粤两省久安之计，必先治南澳，领水兵三千人专守，兼领漳、潮二府兵事”。于是遂有南澳镇副总兵之设，肇始于万历四年（1576）。当时即物色曾供职于卫所而富有海防经验的人物来充任。首任副总兵是北直昌黎人白翰纪，由雷州卫指挥升任。第二位是晏继芳，来自漳州卫，饶平风吹岭上有他的摩崖“闽广达观”四个大字；第四任是倡修《南澳志》有名的于嵩，他由杭州卫指挥来此，深澳的碑廊，尚有他在万历十一年立的《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碑文，这是关公尚是侯爵，还没有升上帝座。深澳又有规模宏大的

① 见黄省曾：《西洋朝贡录》。

郑芝龙坊，芝龙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莅澳任总兵，十七年升为福建都督，以后即由他的部将陈豹接任，陈于康熙元年降清。陈豹前后镇守南澳，与金门、厦门首尾为犄角之势，奉晚明正朔历二十余年之久。在明、清易代之际，沿海军事部署全在他控制之下。郑成功出师北上，是以南澳为基地，作为跳板。请看下在几椿重要的大事：

顺治三年 忠孝伯行驸马都尉事郑成功莅南澳，收集士卒数千人。

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 监国鲁王自金门移跸南澳，越年幸金门。

顺治十五年 延平王郑成功会师浙海，鲁王在南澳。

顺治十六 郑成功全师北指，张煌言抵瓜州，成功攻镇江，克之。迁鲁王于澎湖。

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 三月，陈豹降清。杨金木起为镇将，数月去这。郑成功部吴升，挂观武将军印，旋由杜煇继任南澳总兵。

康熙二年 十一月，清总兵吴六奇招降杜煇，授以清广东水师提督。

康熙二十二年 施琅入台湾，郑氏亡。

陈豹被迫降清，据说起于郑成功的猜忌，南澳长官相继叛去，郑氏自戕其臂助，终告失败。吴六奇《忠孝堂文集》载有招抚南澳杜（煇）吴（陞）两镇文书多篇，他委实花了不少“统战”工夫。当日潮州方面六奇任饶平镇总兵，康熙六年去世。他的儿子启丰嗣职。另一儿子启镇两度出任黄岗协镇，在柘林的雷震关上有康熙十九年巨石刻碑“启镇招抚各岛伪镇官兵人民数万在此登岸”的记录，字在如斗，令人触目惊心。可见吴六奇一家在当地举足轻重，影响之大，近年大埔湖寮出土《吴六奇墓志》更可说明这一事实。

满清入关，统治能力本来非常薄弱，对沿海施行“迁界”政策，更是怯懦无能的表现，受害区域北起山东，南迤江、浙、闽、广，“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生灵涂炭，庐舍为墟。由顺治十二年到康熙二十三年，先后五次颁布海禁苛令，历时二十九年之久。整个海岸线变成“荒原废垅”，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荷兰人于天启二年（1622）已占领澎湖，立足于台湾共四十年，开辟了闽南和海上商业路线。由于迁界的自我封锁，对外完全隔绝，造成中国对西方认识的阻碍与误解，拖缓了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的抬头。

我游南澳，参观“海防史博物馆”陈列的东西，馆方介绍我看一幅有关南澳总镇府署金漆贝雕画屏风的放成 40.64 公分彩色照片，整个屏风宽 6 公尺，高 3 公尺，上面绘制三面环的南澳镇城内当日的主要建筑和郑芝龙坊贵

丁街的仪仗队，亭阁中官兵饮宴、乐坊演唱景色，缕金着色，光彩夺目。屏风背面书写康熙三十八年孟夏曾华盖撰写的《麟翁周镇台寿序》，文长一千二百字。是时海宇敉定，南澳镇总兵是直隶龙门人周鸿升，为庆祝他的六十寿辰，故制造这幅屏风，表扬他的军功劳绩，撰文者曾盖是海阳人，康熙九年庚戌进士（不是武进士），著有《鸿迹猿声集》等，广东图书馆藏有其书。

这类的屏风制作，在 18 世纪非常盛行，欧洲人称之为印度罗曼多（Coromandel）式。荷兰东印度公司惯于经营这些漆屏运往欧洲，印尼的万丹（Buntan）即其贸易站。当时徽州、福州都出有名的雕刻家。[1] 这是 17 世纪以来中外交流习见的工艺品。赠送屏风颂寿的风气，清代非常流行，我们看《红楼梦》贾母八十大寿，亲朋即馈以十六架围屏祝寿。这一南澳周鸿升总兵祝寿屏风照片，原由法国工程师雅克·马兰德君所赠，南澳当局要我托人向其商量转让，他没有同意。其实，法京博物馆尚有同类的屏风多件，不是十分稀奇的东西。南澳孤悬海外，由于陈豹扼守其地，没有受到清人“迁界”的破坏，从这屏风镂刻当日该镇关隘、街道、庙宇、各种风物形气色色的现状，清初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记得抗战胜利之翌年，我回汕头主持修志工作，在揭阳黄岐山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物。我后来携带陶片到台北帝国大学，和日本考古学家金关丈夫、国分直一两教授交流探讨，那时陈奇禄兄还是学生。日人未完全撤退，值魏道明当政，草山仍是一片荒凉，百废待举。我又在南方资料馆搜集有关资料，顺便到屏东南部的潮州郡调查，方才知道该地住民全部都说客家话，不懂潮语。后来于新竹县图书馆见到一本日文书名曰《呜呼忠义亭》，是记述为清室殉职的客属人物，然后了解施琅入台，继而助清兵平定朱一贵的多是客属人，而说潮语，从郑成功来自海阳、潮阳、饶平的人们在清代后期几乎全被视为反动而归于淘汰。

我在南澳听说近时有数万台湾人士来此寻根，明末镇总兵于嵩所建的关公庙，粉饰一新，香火顿时复旺盛起来。郑成功据台时，借南澳为跳板，进兵江南，潮人随他迁台的甚多，想不到几百年后彼此间历史关系的葛藤仍未切断，宗族伦理观念之深入人心，正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回想我为研究历史初次去台旅行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时序的推移，许多年青后辈逐渐据上高位，

① 荷兰国家博物院藏中国款彩的《汉宫春晓》六曲屏风，即其著名之一件，详周功鑫所著论文，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下册。

衰病的故交相继凋殂，不是“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而是旧日的山上搭起了华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转瞬即逝的历史事实，还值得回头去一顾。

本年八月，“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将在南澳举行，来函邀请参加，不能分身前往，因草此文，聊当芹献。

原载《潮学研究》（三），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

潮民移台小史

一

潮州去台湾一衣带水耳，海上交通为时甚早。隋炀帝时遣虎贲陈棱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浮海击流求。魏源《圣武纪》云：大业中，陈棱至澎湖。而法人 Hervey do Sdint-Dong 亦谓隋之流求即今台湾。后人多从其说。果尔，则潮台发生关系，已肇自隋时。[①]

明嘉靖四十二年，惠来海盗林道乾勾结倭寇，剽掠海上，俞大猷追击之，林遁至澎湖，又至打狗。[②] 而吴平、曾一本、林凤诸渠魁亦曾逃窜至台湾。是时潮州滨海无赖之徒，随之逋逃者，度必有之。至清初，郑氏据台抗清，攻略潮属滨海各县。《海上闻见录》载："成功谋举义，而兵将战舰百无一备，往南澳召募。"则南澳乃郑氏兵源之地。今居留台南高雄一带潮人，多南澳籍，非无故也。其时名公巨卿渡台者，若海阳辜朝荐。当郑经之立，朝荐与宁静王，泸溪王诸宗室自厦门渡海，留台六年，至康熙七年卒。其子文麟，即生于台，及长始返潮者。台南延平郡王祠，从祀两庑诸臣，有兵科给事中辜朝荐，今其牌位犹存。可见当日潮人从郑氏移台者，盖繁有徒矣。

---

① 此事迄未有定论，惟核其往来里程，似指冲绳，详《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载《方志周刊》六十七期。

② 打狗即高雄之打鼓山，事详《澎湖厅志》。

台湾孤悬海外，奸人既视为逋逃薮，而荒山朊朊，游民则目为拓殖之乡。盖以郑氏之招徕，于是挈眷而趋者日众。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清靖海将军施琅既平台，郑氏降。翌年设海防同知于鹿耳门，申海锢之令。以潮惠之民多通海，特悬厉禁，而闽人私渡者日多。康熙二十五六年后，潮人亦继至焉。移民初至台南，其滨海肥沃之区，已为闽人所据，乃之下淡水溪平原地带，辛勤开垦，所居成聚。迄康熙六十年，潮属之程乡、镇平、平远、大埔籍客家人，与福建之永定、武平、上杭诸县籍民助清军平朱一贵，壮丁即有一万二千人以上。三阳、饶平、澄海之潮籍人，及嘉应属之女丁不与焉。尔时自潮移台人数之夥[①]，盖尤盛焉。旧凤山县属十四里中，其村庄多存潮惠名号，如：

赤山里有寓潮埔，
仁寿里有程乡庄，
港西里有潮州厝、揭阳庄、海丰庄及两大埔庄，
小竹里有潮州寮，
观音里有海丰庄，
港东里有潮州庄。

又所凿溪有揭阳溪、客厝沟、海丰溪（俱在港西里），圳有寓潮埔圳（在赤山里）、海丰圳（在港西里），街有潮州庄街（在港东里），皆因潮惠人居住而得名者也。[②]

二

雍乾之际，潮人多移殖台北新竹，举其荦荦大者。

乾隆十六年，镇平人林洪、吴永忠、温殿玉、黄日新、罗德达等于上下田寮地营垦老头份、二份、三份、四份、五份、河唇、中肚、新屋下望更寮各地，各招流氓数十名开拓。

三十年，镇平人吴有浩，聚百名秦茄苳坑附近，垦成后中东兴、下东兴、

① 《潮州镇访问记》，载《方志周刊》八十二期。
② 见庐德嘉：《凤山采访册稿本》。

桃仔园三庄。

三十六年，镇平人徐明贵九十名，移民于上东兴、枫树坑、瓦窑三庄。

三十八年、三十九年，饶平人林钦堂开垦员山。（按：《新竹县采访册稿本》有《员山子番子湖塚牧碑》。文略云："立合约人林钦堂、曾日辉为代众给埔以便牧牛事，（中略）番仔湖田嵌上埔地一所，土名员山仔，界址注明垦单，议定估银一百五十元，（中略）约内垦单系林钦堂收存，永为牛场云云，乾隆四十一年七月立。"此碑在新竹县东十里头重埔，高四尺八寸，正书，据此知员山一带乃潮州人所开拓，此碑为重要文献，故备录之。）

五十九年，镇平人十余户在新埔建庄[1]，又海陆丰人移垦亦多。[2]

新竹本土番地，自郑克塽时，王世杰以运饷有功，特许开垦。继其后者多潮惠人，筚路蓝缕，苦心营垦，拓荒之功，贡献至钜。今新竹、大溪、中坜、竹东、竹南、苗栗诸郡，几全操客语，惟桃园较少，皆潮嘉之移民也。据昭和元年调查，新竹州各郡潮州嘉应二府人数：

籍贯及人数 / 地属	潮州府	嘉应府
新竹郡	15 800 人	27 800 人
中坜郡	5 900 人	29 500 人
桃园郡	600 人	2 900 人
大溪郡	3 500 人	10 700 人
竹东郡	9 700 人	13 700 人
竹南郡	3 200 人	26 900 人
苗栗郡	9 500 人	43 200 人
大湖郡	5 400 人	13 600 人

而新竹竹北堡旧时村庄有两埔庄[3]，当缘大埔县人居住而得名也。

居留台湾潮州府人数，以台中州为最多，新竹次之。而台中一州，以东势郡为最，据昭和元年调查，共 20 400 人，次为员林郡，共 18 000 人，又次为丰原郡，共 9 100 人。统全台诸郡，以东势之潮州府人为最多。[4] 考《台湾通史·罗冠英传》云："广东潮州从祖某来台，居彰化东势角庄，庄据大甲溪

① 以上移垦事迹，详日人管野秀雄著《新竹州沿革史》附录"住民之沿革"。

② 详连横：《台湾通史》三十一《王世杰传》。

③ 一在县北十七里，户 42，丁 347 人；一在县北 76 里，户 49，丁 341 人。见《新竹县采访册》。

④ 嘉应州人在台中亦不少，丰原郡有 5 200 人，东势郡有 8 700 人，能高郡有 9 600 人。

左，群山环抱，中拓平原，居民多力穡尚武。”是冠英之祖，盖自潮迁东势也，东势之开拓，始于杨廷理。嘉庆十七年，设噶玛兰厅，廷理任通判。时西势之地，民垦已定，而东势未辟，自浊水大溪南至苏澳凡十六社，均属荒芜。廷理乃招漳、泉、粤人开垦，计有 2 583 甲。[①] 东势潮嘉人数之多，殆是时被招往开垦者。

潮嘉人在台南州者，则以旧嘉义郡人数最夥。据昭和元年调查，计潮籍 7 400人，嘉应籍 5 800 人。考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乱，其南路以庄大田为盟主。是时六堆义民助清师福康安，统率各村民人为官兵先导，分队堵击，镇平曾中立功为最，而嘉应李安善，死事尤烈。[②] 五十三年乱平，以粤庄攖城有功，乃改诸罗为嘉义。知嘉义之得名，实缘潮嘉人之故也。

三

募民开垦，向为治台重要策略。[③] 郑氏时代，行屯田之制，开拓荒芜，故泉漳潮嘉之民多赴之。至光绪元年，台省于厦门、汕头、香港设招垦局，立章程，保护应募者，予以便宜，日给口粮，人授地一甲。然是时海路已畅，冒险谋生之徒，多改辙趋南洋群岛，遂鲜有移台。[④]

据最近调查，全台操潮州语者有 189 900 人，占全人口百分之三[⑤]，而日本昭和元年末（民国十五年），统计全岛潮州府人数，共 134 800 人，突增 55 100人，则抗战胜利以后所迁往者也。

附民国十五年（昭和元年）台湾在籍潮嘉二府人数调查

籍贯及人数 / 地属	潮州府	嘉应府
台北州	1 800 人	1 900 人
新竹州	51 800 人	168 300 人
台中州	54 700 人	38 300 人

① 亦见《台湾通史》。
② 详温仲和：《嘉应州志・丛谈》。
③ 荷人入台时，福建沈铁上书陈六策之一。
④ 当日潮嘉人移台湾，多先经厦门办理手续，详黄钊：《石窟一征》。
⑤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侨声报》郑启中调查。

续前表

籍贯及人数 地属	潮州府	嘉应府
台南州	11 300 人	7 100 人
高雄州	12 800 人	76 900 人
台东厅	200 人	76 900 人
花莲港厅	2 100 人	3 500 人
澎湖厅	100 人	…………
合计	134 800 人	296 900 人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八十六期，汕头，1948

台湾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

自高雄市乘车南行，经屏东、西势，即为潮州站，其地于日人时代属高雄州。高雄原辖屏东、潮州、东港、恒眷四郡。而潮州郡则辖有潮州庄、万峦庄、内埔庄、竹田庄、新埤庄、枋寮庄、枋山庄，凡七庄。台湾收复以后，改行区乡镇制。潮州郡易为潮州区，仍属高雄县，并于潮州庄设潮州镇，火车经过置站于此。考清代潮州庄亦为汛地，属下淡水营管辖。旧设外委一，兵四十名，同治八年以后裁存二十①，光绪时存兵五名。汛地在潮州庄街东三十里，租民房五间为之②，此高雄之潮州镇沿革概略也。

此次游览台湾，南至高雄，因偕廖少东君至潮州镇，访问潮州人移殖经过。现潮州镇内操闽语者五分之四，操客家语者五分之一，而潮州全区则操客家语者几占五分之四，其中万峦乡全部属客家，附近旗山区之美浓乡，屏东区之高树乡，东港区之佳冬乡，恒春区之满州乡，客家亦众。据日人时代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昭和三年）调查，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高雄州潮州郡内潮州梅县籍民人数如下：

地属	籍贯	人数
潮州庄	潮州府 嘉应州府	2 200 人 600 人

① 见连横：《台湾通史·军备志》。

② 见光绪二十二年卢德嘉撰《凤山采访册》，此书仅有稿本，笔者系在台湾博览会文献室钞录。

续前表

地属	籍贯	人数
万峦庄	潮州府 嘉应州府	1 100 人 6 600 人
内埔庄	潮州府 嘉应州府	………… 14 400 人
竹田庄	潮州府 嘉应州府	………… 5 900 人
新埤庄	潮州府 嘉应州府	500 人 3 500 人
枋寮庄	潮州府 嘉应州府	………… 100 人
枋山庄	潮州府 嘉应州府	………… …………

现高雄县下操客语者约十万人左右。

潮州镇潮州国民学校校长为张君启宽，其人操客家语，云本台应州镇平县东厢堡人。其祖父于八十年前始迁台湾，迄今三代。又言郑成功时，客家人尚少来台，大量迁台约为二百五十年前事，至则居新竹高雄山地与平原中间之硗瘠地带，从事养殖。万峦乡客家人，每年多回嘉应州省视乡里，至今客家语言风尚仍保留不替，虽经日人五十年统治，仍不致被其同化云。

西势亦属潮州区，全部操客语者有内埔乡，内有韩文公祠。祀昌黎伯之风，以广东之潮州人为最盛，此庙盖亦潮州人移殖所建也。又有庙曰忠义亭，极宏伟，康熙六十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为粤庄义民建，雍正十一年重修，乾隆二十年监生黄其兴，侯欲达、赖安仲相继修，迄光绪二十年，江永日等复修建，今石刻犹存。粤庄义民盖指康熙六十年佐清兵荡平朱一贵之潮属客家人。忠义亭内有匾额，录康熙六十年觉罗满保题奏，记是役经过甚悉。节录如下：

凤山县属南路下淡水，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垦田居住。潮属之潮阳、揭阳、海阳、饶平数县，与漳、泉之人语言声气相通。而潮属之程乡、镇平、平远三县，则又有汀州之人自为守望，不与漳、泉之人同伙相杂。

（康熙）六十年四月廿二日，贼（指朱一贵，下同）犯杜君英等在南路淡水槟榔林招竖旗，抢劫新园，北渡淡水溪，侵犯南路营，多系潮之

三阳及漳、泉人同伙，而镇平、程乡、平远三县之民并无入伙。三县义民内有李植三、侯观德、涂文煊、邱永月、黄思礼、刘魁材、林英泰、钟国虬、林文彦、赖君奏等，几谋起义，誓不从贼，纠集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合镇平、程乡、平远、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县人之，共一万二千余名，于万丹社竖大清旗号，庄民侯观德指画军务。遣艾凤礼、涂延尚、邱若瞻、兵克用、朱元位等，率众剿平笃家贼人。刘庚甫、陈展裕、钟沐纯等，率众剿平姜园贼人。遂分设七营，排列淡水岸，连营固守，每营设立统领二人。先锋则刘庚甫为统领，带一千三百余人，驻守阿缑地方。中营则赖以槐、梁元章为统领，带一千三百余人，驻守万丹地方。左营则侯欲达、涂定恩为统领，带一千五百余人，驻守小赤山地方。右营则陈展裕、钟贵为统领，带三千二百余人，驻守新园地方。前营则古兰柏、邱若瞻为统领，带六千一百余人，驻守水流冲地方。后营则钟沐纯为统领，带一千五百余人，驻守搭楼地方。巡查营则艾凤礼、朱元位为统领，带一千七百余人，驻守巴六河地方。又以八官仓廒贮谷一十六万石，国课重大，遣刘怀道等又带乡壮番民固守仓廒，拒河严守，一月有余，不容贼伙一人南渡淡水。……六月十九日，贼众败逃，搜得朱一贵，收军四府。……闰六月初二日，侯观德、李植三等率三千人，护送圣旨牌位至台湾府，奉入万寿亭。……分别奖赏，各给以外委都司、守备、千把。又前后捐赏银九百五十两，米三百石，谷一千三百石，彩绸一百疋，制“怀忠里”匾额旌其里门。又拔李植三、侯观德、丘永月、刘庚甫、陈展裕、钟沐纯为营中千把……

据《疏》知康熙六十年，潮属镇平、程乡、平远[①]、大埔及福建之永定武平上杭各县人在下淡水一带，壮丁有一万二千人以上。考自郑成功略潮州，沿海各县人从之者甚众，陆续移台，实繁有徒。当日潮属三阳、饶平等县移民人数，必亦可观。惟以与漳泉人同伙朱一贵，卒为清兵所戳，自此遂告式微。故今高雄潮州一带居民，几纯操客语，而操“汕头”语者绝少也。[②]

高雄一带客家人自称为六堆人。六堆之取义，即由于助讨朱一贵时，分前、后、左、右、中、先锋六队（堆犹言集团也）。忠义亭中所祀牌位有“平

① 嘉应州至雍正十年始置，是时三县仍属潮州府。

② 有则为新近赴台营商或就业者，屏东后壁林糖厂主持者为潮人，故比年潮人往屏东高雄者甚众。

北六堆忠义烈士神位”、“六堆历代忠勇义士神位”等。乾隆时赐六堆人以褒忠牌，故凡六堆人所住乡村，皆悬此牌于门首。乡筑堡，辟四门，榜曰褒忠门。而佐平朱一贵之李植三、侯观德诸人，县志特为立《义民传》云。[①]

自朱一贵平后，殖台客家人又屡佐清兵荡平叛乱。乾隆元年总督郝玉麟题准：台湾北路大甲西等社凶番肆逆，有义民赴难。乾隆五年总督德沛题准：雍正十年北路番不法，南路奸匪吴福生等乘机纠众，义民侯心富等先于康六十年朱一贵案内立功，至雍正十年复率众九百余人渡河应援，乡众出力，功授千总。乾隆十年总督马尔泰、巡抚周学健议剿捕匪犯吴福生等，并北路凶番，义民亦立功。其事亦其揭载忠义亭中。

又《凤山县采访册·义民传》云：“义民率粤之镇平、平远、嘉应州大埔等州县人渡台后，寓县下淡水港东西二里，列屋聚廛，别成村落，两里设里正副共四人，应公差，通音译。课稽奸匪，来往内地，但由县给义民照。”并列乾隆五年给札一百四十二名，六年给札二百十二名。

此事为粤台二省历史关系极重要之事迹，而吾粤志乘皆未之及。兹就此次实地调查，参以台省志书所载，书其梗概，以备考史者之一助，至潮人移台，容再为文论之。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八十二期，汕头，1948

① 见《凤山县志》。

《潮州丛著》自序

方志之体，昉自典书。杜郑两家，斯其胎息。尔乃博综政制，囊括文物，丘陵原隰之殊，风土人伦之细，靡不具载，以垂典训。自非鸿博，难为遍征。故宋后地志，数逾千万（现存者五千八百余种，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寻厥佳记，戛乎其难；且夫辑为通史，必借专书。志材已病其猥多，专文固难与毕载。究其一端，蔚为宏著，资详裨简，庶尽其全。诚地志之要删，亦专门之绝业也。予少耽丛残，志存乡献，平居访眘，时有嘉获。前岁冬与纂省志，窥览所隶，苴缀弥多，虽复甯写成篇，而诠弟犹未。今春简暇，稍事整比，爰取数篇，刊为一帙。世变方亟，东门已芜，际故里之垂墟，哀斯文其谁托？傥有同好，踵是广搜，抚兹蕞品，敢云嚆矢，聊充敝帚之享，更俟渊雅之正云尔。

本书承罗香林先生之嘱，列为“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隆情盛意，谨此志谢。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 潮安饶宗颐自序

原载《潮州丛著初编》卷首，广州，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1938

广东潮州旧志考

广东潮州之有志，或曰：明弘治间知府车份所修五卷，实其權萮也。[①] 然予稽诸史籍，乾道、淳熙之际，盖犹有书名可考见者。[②] 明文渊阁所庋《潮州府志·图志》共六部[③]；而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引《潮州图经》，则又有二种焉。是潮州虽处禹域极南之地，其有方志，盖已昉自赵宋之世矣。惜夫旧籍湮没，存目无征，遂使后之人误以《车志》为始；而未知车氏之前，更有志书也。兹广为蒐集，勒成斯编，粗存辜较，并加疏证，用备研讨旧志者之助耳。

方志之书，名目綦繁，兹所称述，厥名有五：曰"记"（如王中行《潮州记》），曰"图志"（如《文渊阁书目》所载《潮州图志》），曰"图经"（如《舆地纪胜》所引赵师岌《潮州图经》），曰"府志"，又或简称曰"志"（如《千顷堂书目》中雷春永乐间修《潮州志》），其名称虽有歧异，而义例实未有不同者也。予考《千顷堂书目》所列明代潮州方志，皆称曰《潮州志》；惟清吴颖所修者，独作《潮州府志》。按：潮州之置为府，实肇于洪武元年。自废

---

① 康熙《潮州府志·凡例一》："《潮州志》修于明弘治中郡丞车份。"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首，录《车份志叙》，附按曰："《潮志》自明弘治以前，无可考矣。"

② 《宋史·艺文志三》有王中行《潮州记》一卷。中行，揭阳人，淳熙十二年，曾知东莞县。又顺治《潮州府志》四官师部："常祎，邛州人，曾修潮州图经。"考祎为郡守，在乾道年间。

③ 《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暑字号，旧志有《潮州府志》一册，《潮州图志》二册，又《潮州府三阳志》二册，又《潮州三阳志》二册，又《三阳志》一册；卷二十往字号，新志有《潮州府并属县志》一册，共六部。谨按：所谓"三阳"者，即海阳、潮阳、揭阳也。

路为府，方志乃有“府志”之称；而其简称曰“志”者，盖沿宋代旧规也。乾隆《潮州府志》言潮州之有府志，车份实创其例[1]；然《文渊阁书目》中，有潮州府新旧志各种。是“府志”之名盖已权舆乎明初矣。

《文渊阁书目》所载各《潮州志》（见上注），皆未言修于何时。考《书目》卷首有杨士奇正统六年《题本》，称各书自永乐十九年，由南京取来移贮文渊阁，则此数志者，当为永乐十九年以前所修辑也。其所谓《潮州三阳志》，则必修于宋宣和以后，盖宣和三年，析海阳置揭阳，潮州始领有三县也。至各书为何人所撰，《文渊阁书目》并未著录，今亦不可考矣。谨附记于此，不更别录于后云。

兹编采录之例，特限于州；其属各县之志，率不列入。至于排比之先后，一依修纂之年代云。

宋

《潮州记》一卷　王中行撰。

佚

谨按：此编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卷三，又见于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考《千顷堂书目》无其名[2]，书之佚盖已久矣。潮州方志最古而可考惟此，然书仅一卷，当为粗具雏形之志书也。

《潮州新图经》　失名。

佚

王象之《舆地纪胜》一百：“《潮州图经》教授陈宗御序。”

谨按：此书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有著录。其撰著人未详而陈宗御序，今亦不可考也。

《潮州图经》　常祎修。

佚

① 见卷三十一《职官表》。

② 《千顷书目》仅录其《增江志》四卷，而王中行则作王仲行。

王象之《舆地纪胜》一百："《潮州图经》郡守常祎序。"

谨按：顺治《潮州府志》称：祎曾修《潮州图经》(见上注)。

而《纪胜》载有其序文二节，兹移录于下："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旧属于金氏；曰'凤凰山'(下当有阙文)，一水缘溪而出(按：《舆地纪胜》一百《景物》类凤水条引《图经》云：在凤凰山下，曰'凤水'者，以凤凰山一水缘溪而出。所引《图经》或即此序。是语足弥其夺漏也)；曰'鳄渚'者，以韩公驱鳄之旧；曰'揭阳'者，盖有取于古之旧县；曰'潮阳'者，盖有取于今之郡名。"

又曰："太平兴国间，始有联名桂籍者。"

此断章賸句，盖为乾道间祎所修《图经》之自序也。

《潮州图经》二卷　赵师岃修。

佚

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四官师部："嘉泰间，潮州刺史有赵思岃，字会时，开封人。"①

谨按：此《潮州图经》二卷，原著录于《宋史·艺文志三》。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据之采入，竟误题为"一卷"，并谬引《舆地纪胜》曰："郡守常祎序。"考祎为郡守在乾道年间，距师岌刺潮，先三十余年。师岌于嘉泰间修《图经》，不应祎为作序也。其以常序为赵书而作者，盖未知常曾自修《潮州图经》也。

明

永乐《潮州志》　雷春修。

佚

《千顷堂书目·地理类中》："雷春《潮州志》，永乐间修。"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一《职官表》："雷春，福建汀州人，永乐七年任知府。"

① 赵师岌，顺治《潮州府志》讹化"思岃"；康熙、雍正两《潮州府志》，并误作"师岃"。兹从《宋史·艺文志》。

正统《潮州志》　王源修。

佚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王源《潮州志》，正统间修。"

《万姓统谱》四十五："王源，龙溪人（龙溪当作龙岩），永乐初进士，为庶吉士，历官兵部职方郎中，广东潮州知府，所至有声。"

谨按：乾隆《潮州府志·官迹传》，不云"源曾修《潮州志》"。

景泰《潮州志》　沈声修。

佚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沈声《潮州志》，景泰间修。"

谨按：沈声，籍贯行实未详。

天顺《潮州志》　失名。

佚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潮州志》，天顺间修。"

谨按：此书撰人未详。

弘治《潮州志》五卷　车份修，盛端明辑。

佚

潮州府同知车份序："……弘治丙辰，余来佐潮郡，阅旧志而窃有疑焉。一日，潮士盛端明进见，余以其意语之，端明忻然，退而重为纂辑成编，以质于余，簿书碌碌，未暇也。近余以疾乞归，得以参之旧志，考正其讹谬，补其阙疑，为书四卷，汇分为二十篇，科贡、职官，别为年表一卷。……"（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车（今本"车"误作"东"）份《潮州志》五卷，弘治间修。"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一《职官表》："车份，会稽进士，弘治间任同知，创修府志。"

光绪《海阳县志》卷三十六："盛端明，字希道，饶平学，海阳人。……

累官至礼部尚书。”

谨按：此编，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亦有著录，惟题曰“府志四卷”，误也。旧以是志为车份所撰，然观车叙，乃份延端明纂辑；虽后经份稍为补订，而草创之功，固当属之端明也。又《车序》言此志共二十篇，其名今已无考。惟吴颖顺治《潮州府志》有述车《志·贪吏论》，乃知诸编中，《贪吏》为其一也。

然颖所引者，乃从郭春震志中迻录，非曾目睹其书，盖车《志》，清初已亡佚矣。

嘉靖《潮州府志》八卷　郭春震修。

佚

林庭㭿《序》：“林子续郭公渐斋读修潮志，……其凡例有八：首‘地理’……次‘建置’……次‘田赋’……次‘祠祀’……次‘官师’……次‘选举’……次‘人物’……终‘杂志’。比方类记，而义例以灿；灾祥附着，而天人以判……”（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郭春震《潮州志》八卷，嘉靖间修。”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宦迹传》：“郭春震，字以亨，江西万安进士。嘉靖二十四年修府志，重建文庙，有碑记。”

谨按：此志著录，见《明史》九十七《艺文志二》，又《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周硕勋旧志序，附以跋语曰：“《潮志》……迨嘉靖二十六年，太守郭春震重修之……縢蠹飘零，世亦罕见……”是嘉靖《潮州府志》，乾隆初已鲜有传本矣。道光《广东通志》录此书，亦题曰“佚”，乃作十二卷，与各书标曰“八卷”者异，未审何所据也。

清

顺治《潮州府志》十二卷　吴颖修。

存　顺治辛丑刊本。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吴颖，号茧雪，江南溧阳人。顺治十五年，出守潮州，时郡志修自前明嘉靖丁未，已百二十余年，颖搜罗残编，偕诸生邹（志作‘郭’，误）庆春等，重加修辑，辛丑志成。”

谨按：顺治潮州府志分十一部：曰“地书”，曰“赋役”，曰“祀典”，曰“官师”，曰“科名”，曰“人物”，曰“兵事”，曰“山川”，曰“古迹”，曰“轶事”，曰“古今文章”，都十有二卷。是时程乡、平远、镇平，仍属潮州，故志皆列入。其书为潮州知府吴颖所亲定，参稽考订者，有诸生杨闱、曾栋奇、陈士稼、邹庆春诸人[1]，而庆春搜讨尤力。颖于兵燹之后，乃能留意及此，网罗遗闻，编成卷帙，其存吾乡文献之功，不为不多也。

康熙《潮州府志》十六卷　林杭学修。

存　康熙丙寅刊本。

澄海县知县湘潭王岱叙：“……郡守林公守潮数年志事遂兴……与耆旧陈园公（海阳人，名衍虞），林介文（普宁人，名隽胄），两君笔削点定。草创稿成，复就佘（艳雪）、杨（钟岳）诸先生厘正之。……予适待罪澄海，与陈、林两先生为故交，因得窃窥其书，深叹马文班实，二者俱备。”

潮州府知府江宁林杭学《叙》：“……开局修纂，始于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越二十三年十月而志成，为修目二十有八。……”

谨按：康熙《潮州府志》，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有著录。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题曰：“知府林杭学修，郡人杨钟岳辑。”光绪《海阳县志》仍之。考此志撰稿，实出于陈衍虞、林隽胄两先生手，杨钟岳不过稍加厘正而已。钟岳是志序曰：“叨越敦请，辞不获命。”又曰：“不意两竖时侵，未能与诸生同人，汇帙而分门，删繁而举要；及志将告成，始得肆力一览观焉。”由此可知当时钟岳虽被总纂之职，实未能始终其事也。[2]

又按：陈衍虞所著有《序录》一卷，其文与是志各门小序，大同小异，盖即当时草稿，更加订定者也。此足证康熙潮志撰稿多出自衍虞手也。

---

① 杨闱字今鹤，大埔人。栋奇字砥慈，海阳人。士稼里贯俟考。庆春字豫来，海阳人。

② 府县志《钟岳传》不载其有修志事。

雍正《潮州府志》二十四卷　胡恂修。

存　雍正壬子刊本。

谨按：胡恂，浙江萧山人，贡生，雍正五年任潮州知府。癸丑重修郡志，成书二十四卷，列目三十，较吴、林两志，搜采参订，更为详备。乾隆《周志》，实取之为蓝本也。

乾隆《潮州府志》四十二卷　周硕勋修。

存　光绪癸巳重刊本。

谨按：周硕勋，湖南宁乡举人，乾隆二十一年，由廉州知府调任潮州。乾隆辛巳仲春，续修府志，至壬午季冬始竣事。成书四十二卷，分三十六门，皆手自纂定。其条目虽较旧志为详博，而义例实昝杂而寡法；且去取好凭臆断，实其所短，如赵德《昌黎文录》曾经大儒朱子鉴定，清嘉庆钦定《全唐文》亦有载入，实可毋庸置疑，而周氏竟以为赝质，刊而不录，皆疑古太过之病。至其迻录旧文，每率臆沾姢涂窜，而自谓为之剪裁润饰[1]，此尤乖于史法者也！

原载《禹贡》（半月刊），二卷五号，北平，1934

① 见卷首《例言》。

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

一、潮志纂修不始于明

潮州之有志乘，实肇于唐宋之世。然清代修志之官吏，颇昧于考史，误解滋多。如林杭学康熙《潮志·凡例一》云："潮志修于明弘治中郡丞车份。"

周硕勋乾隆《潮志》卷首载车份序文，附按语云："潮志自弘治前无可考矣。"

又同书《职官表》云："车份创修府志。"

此说实不足信。唐宋时已有《潮州图经》，见于著录。大中祥符三年，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新修诸道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不知潮志是否在其中。考明永乐时《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暑"字号记当时内府所藏潮志，计如下列：《潮州府志》一册，《潮州图志》二册，《潮州府三阳志》二册，又《潮州三阳志》二册，又《三阳志》一册。又同书卷二十"往"字号称："《潮州府并属志》一册。"共得六种，似多非完本。再征之史籍，宋时潮志名称，有"记"、"图经"、"三阳志"三类。三阳乃合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之总称。徽宗宣和三年，始析海阳置揭阳，在此以前潮州仅领二县。故《三阳志》必修于南宋以后。

二、宋时之图经

《潮州记》一卷，揭阳进士，东莞知县王中行纂，《北史·艺文志》载之。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收入“风土杂记”门，非是。考《永乐大典》潮字号云：“《潮州图经》，郡守常祎序。”同书引（宋孝宗）淳熙二年七月知潮州军州事常祎序略称：“潮旧有图经，兵火以来，散逸殆尽。……予郡事稍闲，因举是以属之教授王君中行。……予既锓板郡斋，君谓不可不序。”是王中行之《潮州记》即淳熙间邛州常祎所修之《潮州图经》矣。《夷坚志》卷七“刘方明（昉）”及“九月梅诗”注云：“左二事见潮人王中行教授所作《图经》。”即指此书也。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著录有《潮阳图经》，郡守常祎序，则书名作《潮阳图经》。该书同卷潮州风俗形势及景物上下凤水、鸭湖、鳄渚、桑浦山共引《潮阳图经》五条。

据常祎《序》，其前尚有《旧图经》，《纪胜》卷一百潮州古迹“思韩堂”下引《潮阳旧图经》一条，《大典》潮字号“学校”条亦引《旧图经》，当即此。唐宋潮州亦称潮阳郡，此所谓潮阳，乃郡名，非县名也。

嘉泰间，郡守开封赵思岁修《潮州图经》。见《宋史·艺文志》，而名作思岌。然《永乐大典》潮字号引端平二年黄梦锡《潮州图经·序》云：“淳熙二载，常侯祎方裒而集之，继阅二纪，赵侯师岁又从而修之。”即指此事，顺治、康熙《潮州志》其名皆作赵思岁，与《大典》同，可正《宋史》之误。

端平间，郡守叶观继修《潮州图经》，《永乐大典》引黄梦锡《序》云：

> 潮有《图经》，其来尚矣，昔昌黎文公，将至韶石，贻诗于郡使张端公曰：“愿借《图经》将入界，一逢佳处便开看。”则知诸郡图经，唐已有之。参诸旧序，具言一经兵火，散逸殆尽。淳熙二载，常侯祎方裒而集之，继阅二纪，赵侯师岁又从而修之。历年二十有五，孙侯叔谨檄梦锡偕同志编辑校定，仅成全帙，以岁数计之，自淳熙乙未至于绍定己丑，几六十稔，更三十政，纂修者仅三焉。端平改元之四月，郡侯圉观辍朝行而守兹土，……再令梦锡与唐曾林刚中点勘编修，续而新之。……始事于七月之望，迄成于闰月之晦。

此篇他志不载，仅见于《大典》，为即珍贵之文献，可以考知南宋时郡守孙叔谨叶观皆曾倡修，而黄梦锡且两预其役，此一事实，可补志乘之缺。

《舆地纪胜》卷一百，又载《潮州新图经》，教授陈宗衢《序》。阮《通志·艺文》据之著录，不知即黄梦锡所述之《图经》否?《大典》潮字号屡引《图经志》，如“归附始末”所引述及洪武元年三月事，又“户口”条亦及洪武，似永乐时修《大典》者所增，可知《图经志》，自宋迄元，递有增修也。

三、《三阳志》与《三阳图志》

《三阳志》之书久佚，《文渊阁书目》所记，谨存其名。其他志书间有援引，如吴颖顺治《潮志》载郭子章之《韩公二祠沿革》，乾隆间刘忭《揭阳县志》山川、古迹、庙宇亦屡引之。

《永乐大典》残存卷第五三四三、五三四五两卷潮字号二册，缺中间“五三四四”一册。检其目录，知即缺自“宦迹、人物、纪异、山川、宫室、保里、津渡、堤岸”各项，仅存“总图、历代序文、建置沿革、星分野、道里、归附始末、风俗形势、城池坛场、户口、田赋、土产、官制、公署、学校、古迹及文章”等类。此残册自苏联取回，现得影印流通，可谓奇迹。明以前潮州遗闻旧事，赖以保存不鲜，有裨于文献多矣。

《永乐大典》现存他卷，如六模之“湖”字，九真之“门”字，十八阳之“堂”字、“仓”字，一送之“梦”字下俱引《三阳志》，又“平理堂”条且引有《续三阳志》一条，诸如此类，倘加以集录，可成《三阳志》辑佚一篇。

《永乐大典》引洪武八年乙卯林仕猷《序》云：

> 潮郡乘曰《三阳图志》……自宋历元……其板藏于宣圣庙之万卷楼，至正末毁于兵。民间所藏全本仅有一二本。……（洪武）八年广东佥宪赵公……令邑长鲍与侃旁求博采，得其坏烂残缺之余以足成之，……锓梓以永其传。

此记洪武时补修及重梓《三阳志》之事甚详，所谓《续三阳志》者非耶?《文渊阁书目》所记之《三阳志》，殆必有指此者也。

四、《千顷堂书目》中之潮志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潮州志有下列各种：

(1) 雷　春《潮州志》永乐间修
(2) 王　源《潮州志》正统间修
(3) 沈　声《潮州志》景泰间修
(4) □□□《潮州志》天顺间修
(5) 东（应作“车”）份《潮州志》五卷弘治间修
(6) 郭春震《潮州府志》八卷嘉靖间修

考《文渊阁书目》“往”字号，新志有《潮州府并属县志》一册，不详何年。据杨士奇正统六年题记，称各书自永乐十九年由南京取来，移贮文渊阁者。雷春，汀州人，永乐七年任潮州知府，则所谓潮州之新志，倘即雷氏所修者欤。

由上知车份以前，尚有数度续修潮志。车份，会稽进士，所修《潮志》，今已亡，旧志载车《序》一篇，略云：

> 弘治丙辰，余来佐潮郡，阅旧志而窃有疑焉。一日，潮士盛端明进见，余以其意语之。端明忻然，退而重为纂辑成编，……为书四卷，汇分为二十篇。科贡职官，别为年表一卷。……弘治庚申，会稽车份书。

与黄目所载五卷正合。车《志》残文，可考者，有吴颖顺治《潮志》引其《贪吏论》一篇，又《潮阳志》杂志，钟元濬《乡厉坛誓文》内亦引车《志》一段。

五、现存之嘉靖《潮州府志》

嘉靖间知府郭春震所修《潮志》八卷，《千顷堂书目》著录之外，他书所记，颇多讹误。徐𤊹《书目》，误称弘治间修。《明史・艺文志》称“郭春”撰，脱一“震”字。阮元道光《广东通志》作十二卷，并云已佚。实则其书

仅八卷。此皆模糊影响之谈。

此郭《志》，国内仅南港中央研究院书库残存卷一壹册。日本内阁文库有完整一部，天壤唯此孤本而已。书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刊行，九行、行二十二字，白棉纸，题曰“万安郭春震校辑”。有丁未四月郭氏《序》云：“檄县丞叶文鼎刻于仰韩堂，少府龙溪陈君，令前都谏三山林君庭壆，咸同议襄成。”故卷首有庭壆《序》。春震字菊坛，官至云南按察属副使，事迹详陈昌积《龙津原集》卷五（嘉靖毛汝麒校刊本）中《菊坛郭公墓表》。

六、郭子章之《潮中杂纪》

《潮志》当万历之际，知府泰和郭子章曾议重修，未果。郭氏有《陆丞相墓辨》云：“余来潮二年，四境稍敉定，乡先生请予续郡志。”据此知郭氏有志未逮，惟捃拾旧闻，撰为《潮中杂纪》十二卷，《自序》略云：

> 潮州郡志，予先伯大父春震守潮时，集而刻之，今四十余年矣。此予来潮，博士叔与京手而授之，曰是书先人笔削稍严，其故颇略，春秋弥旷，子其卒之。子章敬诺。……年余日稍隙……下令搜十邑之故而来其籍……又搜之山穴残碑，故族半编，久之簏盈。……遂杂次其略。凡通志、前志载者不书，书其逸者新者若干卷，命之曰《潮中杂纪》，而托之剞劂。

《杂纪》原书未见，仅于此《序》，窥其概略。《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并著录之。郭子章全集号曰《春螺公遗书》二十三卷（有光绪八年刊本），今尚流传于世，内多有关潮州掌故之作。至吴颖顺治《志》录郭文尤多。如卷一之“象纬解”、“沿革考”为整篇，“物产考”及兵事部“封爵之始”，节录数条。又卷十二“古今文章”，载子章文《陆丞相墓办》外，若《韩公与大颠书》、《昌黎别传辨》、《韩公二祠沿革》、《韩江韩山韩木》诸作，皆极重要，殆采自《潮中杂纪》也。[1]

---

① 见吴颖：《顺治潮志·自序》。

七、后语

以上所述，为清以前《潮志》纂修事迹之概略。入清以后，志凡四修，顺治辛丑知府吴颖《志》，皆十一部都十二卷。[①] 康熙丙寅林杭学《志》十卷，为目二十八。[②] 雍正壬子胡恂《志》二十四卷，列目三十。乾隆壬子周硕勋《志》四十二卷，分三十六门，事增于前，而移录旧文，每擅沾媠自云"为之剪裁润饰"，致多失真。乾隆本最通行，其他三志人间亦不易觏矣。

光绪辛巳，惠潮嘉道刚毅知府张联桂与盐运司方功惠禀请重修，海阳翁兰为发凡起例[③]，迄无所成。民国州治既废，35 年胜利复员，广东第五区行政专员郑绍玄先生倡重修，以宗颐为总纂，嗣刘侯武先生卸两广监察使，赓续其事，馆费不继，至鬻字为给。而海外侨领佽助益力，暹罗余子亮、香港方继仁两先生于馆费及一切开销，支柱数载，该志稿得于扰攘艰难中刊行一大部分，可十八册，余遂中梗，亦事之无可如何者也。

1963 年 7 月，余旅读印度，10 月自锡兰、缅甸、高棉来泰国，诸同乡款待良殷，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先生以会馆馆刊编印之事垂询，并嘱略记历代潮州志乘修纂经过，为海外同侨作一报道，荏苒年余，未有以应。去岁，余历访日、美各大图书馆，所见珍籍，间有关涉潮州文献者，颇多新知。而嘉靖郭《志》，向以为亡佚者，今得寓目，尤为快事。兹趁暑期之暇，缀为短篇，命曰《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略近详远，钩沈辑佚，用补旧志纪述之缺漏，以见唐宋以来，名宦乡贤致力于地方文献之事业，不绝如缕，其精神对于后人之感召，有如斯也。

1965 年 6 月记于香港

原载《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

---

① 是时程乡、平远、镇平三县皆属潮，故在论述之列。

② 始事于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越年十月而书成。

③ 文载《湖西小庐文集》。

《三阳志》小考

——《潮汕文化研究》序

去岁11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假汕头大学举行，汕大因之成立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甚盛事也。余以州人获参预其役，更所忻幸。记曩年地方人士有纂辑《潮州志》之举，余尝谬掌其事。其时限于地域，囿于见闻，资料深感不足。迩岁海宇大通，秘籍稍出，所知略胜于前，以潮州最古志书之《三阳志》而论，得从《永乐大典》中“潮”字号窥其厓略，就中有关宋元史料，至为珍贵。故余于1965年复有《潮志汇编》之印行。《大典·三阳志》虽非全本，乃获流通于世，影响所及，陈香白君因有《三阳志辑稿》之作。

《三阳志》者，潮州旧志罕见载录，仅顺治志引用二事，盖吴颖未见其书。在此之前，万历间知府郭子章著《潮中杂纪》，其卷七书目类云：

> 《潮州记》一卷，宋揭阳进士王仲行撰，今亡。
>
> 《潮州图纪》二卷，宋知州事邛州常袆撰，今亡。
>
> 元《三阳志》七卷，元人著，今无刻本。郑布政旻家藏有抄本。

据此知《三阳志》实元人所著，有七卷流传本。又明初《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暑”字号，有关潮州旧志共五部，计：

> 《潮州府志》一册，又《三阳志》一册，又《潮州府三阳志》二册，

又《潮州三阳志》三册，又《三阳志》一册。

同书卷二十"德"字号新志又有一部书，名为：

《潮州府并属县志》一册。

文渊阁中秘藏书皆系实录，故兼记册数；而《三阳志》竟有四部之多，册数又复不同，想必不止一种。其中《三阳志》有称《潮州府》者，改路为府，分明为明初之作。考《千顷堂书目》，永乐间知府雷春有《潮州志》，文渊阁之《潮州府志》当即雷《志》。又据郑义永乐《潮阳志序》云："第以图志，附于《三阳郡志》之一，其所登载，弗克备举。"殆新志项下所称有"并属县志"者也。[①]

细察《永乐大典》，"潮"字号采用之书，最重要者，有《图经志》、《三阳志》，又有《三阳图志》，兹略记其引书之例如次：

"归附始末"下引《图经志》，又引《三阳志》。

"韩木"注下引《图经》、《方舆胜览》、《三阳志》。

在此之下方，引用各书名称先后则为：

(1)《三阳图志》：《潮州府志书序》……洪武八年三阳林仕猷撰。

(2)《三阳志》：《潮州图经序》……淳熙二年常祎序。

又端平二年……黄梦锡序。

(3)《三阳志》：《州县总叙》。

由上引明确记载，林仕猷《洪武序》乃从《三阳图经》中抄出，则《三阳图志》当作于洪武之后，或即文渊阁著录之《潮州府三阳志》乎？

林仕猷《序》云："《三阳图志》……自宋历元……靡不具载，百无遗一。其板藏于宣圣庙万卷楼，至正末毁于兵。大半虽存，已非完璧，民间所藏，全本仅有一二。"《三阳志》所记郡刊之书，其中有《新修潮州图经》、《古瀛乙丙集》一百二十五板、《古瀛丁集》五十板。此新修《潮州图经》、《古瀛乙

---

① 正统间知府王源亦修《潮州志》。但据《文渊阁书目》前杨士奇正统六年题本，王源知府在潮十年，已在其后，故非王源之志。

丙集》、《古瀛丁集》及《古瀛集》，盖皆常袆所辑。万卷楼在文庙，黄惟贤句云："潮州书楼天下稀，摩插云汉吞秋晖。"此万卷楼为宋时书板庋藏之所，规模可见。林序原题曰《潮州府志书序》，则其文中所言之《三阳图志》，谓三阳之图志，乃泛指潮州志书，非专指《三阳志》而言也。从常袆、黄梦锡两《序》，可证王中行即常袆图经之撰者，郭子章作王仲行，"仲"字应作"中"，其书均称曰"图经"，《永乐大典》所引之《图经志》当指常、黄所序之书，非《三阳志》明甚。香白以常、黄二《序》系于《三阳志》之前，是无异糅《图经志》与《三阳志》为一也！而《三阳志》有七卷本，必为元人所作，故书中屡屡采及元人文章，如元何民先、元熊炎等是。香白以林仕猷《序》视作《三阳图志》之《序文》，又谓"《三阳图志》宋、元均有之"，似误解林《序》之意，不悟其《序》原题分明指"潮州府志书"，故得奄有宋以来之著述，若以专指元之《三阳志》，何得有"府"之目？又复忽略林《序》之上分明揭橥《三阳图志》之名，明著其文之出处，《序》又称"佥宪赵公令邑长鲍与侃旁求博采，锓梓以永其传"。洪武当日所授梓者，乃宋历元潮州旧志经整理后之稿，香白泥于《图志》之名，谓鲍书即《三阳图志》之辑佚本，恐有未安。[①] 总结诸书所著录，《三阳志》应有下列各种：

(1)《三阳志》。

(2)《三阳图志》。分别见《永乐大典》征引。

(3) 元七卷本《三阳志》，郭子章著录。

(4)《续三阳志》，《大典》十八"阳"引一条，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

《三阳志》收采及洪武林仕猷之文章，与文渊阁著录标明潮州府之《三阳志》疑即是一书，故《三阳志》有元人所著者，又有更后出为明初人续修者。至于宋人之"潮州志书"应即是《图经志》，不得与《三阳志》、《三阳图志》混为一谈也。

作为文献学者，对于史源认识须掌握确切材料，方不至于误解而导致不确之判断。地方史足为国史之辅车，由于记载较为翔实，又富有亲切感，大有助于史学，自未容忽视。今举《三阳志》一书为例，考其原委，以见文献

---

① 辑佚二字，尤不符合事实。

学与史源学关涉之深，聊备商榷之资。值本届会议论文集杀青在即，杜教授来书督“序”，爰不辞固陋，覙缕陈述，未敢作为考寻史源之鼓吹，还望有以教之。

1991年4月22日于香港

原载《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潮州志汇编》序

方志，地方史也，亦国史之要删也。从事方志者，非从国史入，则所见也隘；治国史者，非自方志出，则所得也肤。良以桑梓之邦，耳目睹记，以参为验，于所接最亲切者尽心焉；庶乎著手之非难，而持论斯较可信。余自三十以前，颇留心地志之学，既于中山大学参预粤《志》之修纂，复于新修潮《志》，忝董其役，遭时多难，两无所成。向者囿于见闻，即古潮志之《三阳图志》，暨嘉靖间郭春震所修《志》，深以未获寓目为憾。去岁读书南港，始于插架见《郭志》残本；嗣如东京，悉内阁文库庋有完帙，友人日比野丈夫教授复影见示。因取嘉靖《志》合顺治《志》，益以《永乐大典》所收《三阳志》，及余所纂民国《志稿》，成一帙，用备省览。龙门书店以为合元、明、清、民国诸《志》为一书，无异方志之创体，慨允锓梓，以广其传，刊印既竟，爰略举所知，叙于其端。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卷一九一）著录潮州志书凡八种，言佚者四[①]，言未见者三[②]，盖只获见乾隆壬午周硕勋四十二卷本之《潮州府志》而已。阮《志》所采潮州资料之贫乏，从可知矣。然郭春震《志》实未亡佚，《图经志》亦部分保存于《永乐大典》中，兹得重为影刊；今人眼福，迈胜前贤，抑何幸也。蒲圻张国淦撰《中国古方志考》，著录宋元潮《志》七种。计

① 宋赵师岌《潮州图经》一卷，失名《潮州新图经》，车份《潮州府志》四卷，郭春震《潮州府志》十二卷。

② 顺治吴颖、康熙林杭学、雍正胡恂《潮州府志》。

《潮阳旧图经》、常祎《潮阳图经》、陈宗衢《潮阳新图经》[1]、赵师岌《潮州图经》、王中行《潮州记》[2]、《三阳志》[3]、《续三阳志》[4]，于《大典》十三萧“潮”字号，未曾见及，故有疏失。今考《大典》载淳熙二年常祎《序文》，言所修《潮州图经》，属教授王中行为之；是中行所记即常祎之书，故《夷坚志》卷七“刘方明（昉）”及“九月梅诗”注云“左二事见潮人王中行教授所作《图经》”，即指此也。又端平二年黄梦锡《序》，记赵师岌[5]以后，又有郡侯孙叔谨及叶观所修郡《志》，梦锡曾两预其役，此皆宜增补者。明初又有《三阳图志》之续梓，见《大典》所载林仕猷洪武八年《序》。凡此诸《志》，向所未悉，非《大典》之重出，孰能详之？《大典》潮字号所引潮《志》之名目有四：除《三阳图志》外，又有《旧图经》[6]、《三阳志》、《图经志》。考吴颖顺治《志》载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引《三阳志》一段，乾隆刘忭《揭阳县志·山川》“瘦牛岭”下引《三阳图志》，《古迹》“夹山湖”下引《三阳志》，又《庙宇》“天庆堂”下云见元《三阳志》，此似可补张国淦辑本之缺。[7] 至于《旧图经》者，《舆地纪胜》一百，“思韩堂”下引《潮阳旧图经》，或即其书。

《永乐大典》潮字号为卷第五三四三至五三四五，共三册，惜缺去中间五三四四号一册，自“宦迹”至“堤岸”各项，幸目录尚存，可以稽考。《大典》中所引《三阳志》虽非本足，然宋元遗闻佚事，多赖以保存。如“营寨”条可考元代兵制，郡东白瓷窑一名，可证瓷史。（按：潮州静乐禅院政和四年钟识，后列舍钱人名，有“白瓷窑住弟子刘满、王长、慎德、庐一娘”。此一条向来言潮瓷者俱未之及。[8]）叙畲民有“崎鬃、平鬃”[9] 二种（按：知《天

---

① 以上据《纪胜》。

② 据《宋史·艺文志》。

③ 据《文渊阁书目》。

④ 据《大典》十八阳引。

⑤ 《永乐大典》及吴林潮志皆作“赵师穷”。穷，古“会”字，见《集韵》十四卷。《宋史·艺文志》作“师岌”疑误。汲古阁刊吕渭老《圣求词》，有嘉定壬申赵师穷序，即此人也。《词综》卷十又误作赵师秀。

⑥ 见“学校”条。

⑦ 《古方志考》，618页；宋《三阳志》，有蒲圻张氏《大典》辑本。

⑧ 潮瓷，详《潮瓷说略》，长谷部乐尔译日文本，载东京出版《陶磁杂志》。又小山富士夫《中国名陶百选》内中国陶瓷概说记“百窑村”。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载《文物》，1957（3）。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文内潮州水东窑一段，见《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二期，1960。

⑨ 潮州畲民，参 *The Shê People of the Han River Region——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on Souther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下郡国利病书》说自此出），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另操一音，俗谓之“不老”[①]，并民族方言之新资料。“学校”条记宋时潮州之大成乐及乐工音谱，“古迹”条越王走马埒之考证，“济川桥”引《三阳志》备述元时是桥兴废[②]，皆明清志之所不逮。插图如韩木图，尤为矜贵。至于记述宋时潮州刻书板数，极为详悉。（举其要者，如《濂溪大成集》、《韩文公集》，有大字并考异及中字之分。考北宋大观初潮郡以昌黎庙香火钱刻《韩集》，事载《滂喜斋藏书记》。朱子《韩集考异》人校之本，另有潮本、蜀本、泉本。《大典》载陈知柔《读潮本韩集》诗，此谈韩集板本者，不可不知。又潮州《通鉴总类》千五百版，今中央图书馆藏宋沈枢撰《通鉴总类》，嘉定元年潮阳刊本存卷九[③]，当即是书。又林贤良撰《草范》五十板，则州人著作之镂板者。）徐信符氏曩称宋代粤东无刻书[④]，今以潮州一隅观之，斑斑可考如此，兹可补苴王静安《两宋刊本考》之遗，亦言汴宋板刻者所不可忽也。

嘉靖郭春震《志》，南港中央研究院书库残存卷一壹册。本书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完本影刊，内缺一叶，有佐伯侯毛利高标藏印。此志各书著录，颇多讹谬。除㶿《红雨楼书目》，误为弘治间修，《明史·艺文志》撰人作“郭春”，脱一“震”字。阮《通志》误作“十二卷”，实八卷耳。余读明陈昌积之《龙津原集》[⑤]，内有《菊坛郭公墓表》（卷五）称“其惠政，详所修潮郡志中”。可见其修成潮志，在当日极为人所称道。然以笔削精严，或病其太略。万历十年，郭子章知潮，欲续修未果；谨杂次所见，为《潮中杂纪》十二卷。春震，盖子章之伯大父也。[⑥]

观郭《志》“风俗考”殊为疏简，似未充分用《三阳志》材料。嘉靖以前，潮《志》累有纂修。据《千顷堂书目》，雷春修于永乐，王源修于正统，沈声修于景泰，□□修于天顺，车份修于弘治。车《志》勒成四卷，汇分二十篇，而“科贡”、“职官”别为年表一卷。郭《志》立“官师”、“选举”二

---

① 《大典》引《三阳志》云：“郡以东，其他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称之‘不老’。或曰韩公出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不复变，市井间六七十载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矣。”按不老，疑即北老。

② 《广济桥考》，载《史学专刊》一之四，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出版。

③ 参《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史类。

④ 徐信符《广东板片记略》（载《广东文物》）云：“宋代雕刻粤东寂然无闻。”观于《大典》，可知其不然。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广东书目潮州府只有七种。

⑤ 《龙津原集》，嘉靖毛汝麒校刊本，“中央图书馆”藏。

⑥ 见《潮中杂纪》序。

志，则体例视车《志》大有更张也。

郭《志》资料之可珍异者，如“杂志”记潮属各县明代之村名。“潮州卫”条，记屯田之事实。“榷盐厂”条，书广济桥榷盐制度与淮浙之异。“市集”条，记细绢与诸番贸易，及潮阳云葛之价格。（按：潮州以产布名，《唐书》、《宋史》、《寰宇记》、《九域志》俱载以蕉布为贡品。大埔角西泉寺钟款，书永乐至正统间，清远都黄兰保男女捐舍白布蕉布之数，亦可参证。）“柘林澳”条，记暹罗诸倭及海寇常泊巨舟为患，兼说明“通番”一词之意义，知饶平柘林港在明代海外交通地位之重要，而潮暹来往见之志书记载，实昉于此。

惟记叙人物，未臻详尽，后之览者难以细稽；故郭子章撰《韩祠沿革》，至不知元王翰与王用文即为一人。潮阳白牛垦，有灵武王用文汉隶题字，钱大昕为之《跋》，颇置辨诘。余曾见王翰《友石山人遗稿》[①]，尚有不少其总管潮州所作诗文，为志书所未采者。

顺治吴颖《志》十二卷，多用纪事本末体。“兵事记”一二二篇，“山川记”三十八篇，“古迹”三十九则，“轶事”五十三则，“古今文章”共一六一篇。据其“发凡”，是时车份《志》已不存，惟据郭春震志及《潮中杂纪》耳。若参用之各县《志》，则有林大春《潮阳志》，及吴光卿《续志》，郭之奇之《揭阳志》，李士淳之《程乡志》，及万历修之惠来、澄海、普宁《志》，崇祯修之饶平、大埔、平远、镇平诸《志》，与陈天资之《东里志》[②]，凡所取材如是而已。其论“转饷之治”条，误史禄凿渠湘漓同源之海阳山为潮州之海阳。“封爵之始”条，亦误东越之海阳侯摇毋馀为潮州。[③]“古迹”条，似误王莽县名之南海亭为亭台。“轶事”书《韩文公年谱》，韩郁注云：“潮阳灵山所刻。”然据朱子《考异》，灵山石刻乃张系所撰；其伪撰之昌黎《与大颠书》三首，东坡《杂说》暨陈振孙辨之至明。文既刻于唐时大颠禅师堂壁，则殆出后人所作。大颠与昌黎交往事，成为儒学史一大公案[④]，郭子章有文辩之，载于吴《志》。明清之际，考证之学未兴，方志家亦罕事考核；惟辗转稗贩，吴《志》亦复尔也。

吴《志》“古今文章”，征录颇多；然见闻拘墟，未能博采。余曾检读明

① 《友石山人遗稿》，钞本，余见之“中央图书馆”，有朱彝尊、钱大昕印记。
② 陈天资《东里志》，向有钞本。吴《志》采其“潮汐考”。
③ 《海阳山辨》，载《禹贡》，六卷十一期。《古海阳地考》，载《禹贡》，七卷《古代地理专号》。
④ 参钱锺书：《谈艺录》。详拙作《宋代潮州之韩学》。

人别集近千种，其有关潮州文献者，如陈察《虞山先生具庆堂集》（文有《海阳县学重梓“学史”序》，诗有《和盛希道登韩山高节亭咏》、《嘉靖丁亥夏将赴潮阳诸台寮饯诗》[1]），蔡清《虚斋集》（正德十六年刊，有《送郑仲平教谕揭阳序》），金幼孜《金文靖公集》（新淦金氏家刊本，首有成化四年潮阳李龄《序》），吴道南《吴文恪公集》（崇祯崇仁吴氏刊本，内《御虏议》记翁万达御敌事），王邦瑞《王襄敏公集》（隆庆五年刊，有《闻翁东涯去世》诗），顺德罗虞臣《司勋文集》（有《书翁仁夫惠谦卦图后》、《与翁东涯书》），陈道潜《淇园编》（有嘉靖三十一年翁万达《序》。），欧阳德《南野文集》（嘉靖三十七梁汝魁陕西刻本，有《答翁东涯薛中离书》及《刻薛先生〈约言〉序》、《祭薛东泓文》），蔡羽《林屋集》（嘉靖八年刊，有《与薛中离书》），尹昌隆《尹讷庵遗稿》（旧钞本，有唐伯元撰《中允是隆传》），陈文烛《二西堂诗文集》（万历甲申龙膺刊本，首有潮阳周光镐《序》），邹迪先《郁仪楼集》（万历甲辰刊，有诗《被谪揭阳尉》[2]），皆罕观之集，吉光片羽，倍觉可珍，故略记之，以为他日征文者之助。

自宋时常祎撰《古瀛集》，《舆地纪胜》云：“帙三，凡著述之关于州。”《大典》著其目而书久亡。郭子章曾集次韩愈、苏轼、文天祥、王思四人在潮文字，撰为《四贤潮语》四卷，有《序》见其《粤草》，《千顷堂书目》著录之。明时此类之总集、别集名目可考者，若大埔令吴思立之《天印山集》（目见《大埔志·艺文》，存饶相序），普宁教谕邓希父之《铁山稿》（有郭子章序），谪三河驿丞王思之《改斋寓潮集》（阮《通志》著录五卷），澄海典史周宏禴之《澄海集》（万历十一年谪潮，《脉望馆书目》著录），揭阳知县张明弼之《榕城集》（见《古瀛诗苑》，张公亮崇祯间知揭），皆以潮地名集。其时代与吴颖相接，惜乎吴氏未之采掇也。

其明人所作遗闻琐记，涉及潮事为吴志所未及者，如谈伦、叶性之《韩祠录》，俞大猷之《洗海近事》（记荡平海寇策划，《世善堂书目》著录，隆庆刊本，又道光二十三年味古室刊本），见载于《四库》；严尔珪（崇祯时潮州海防道）之《岭东记》、林庭机之《平曾一本叙》、霍尚守之《翁襄敏安边记》（南海人，有自序，载《广东文征》），名著于《千顷堂书目》。天启间，南澳把总安国贤之撰《南澳游小记》（十二卷，见《明史·艺文志》），崇祯间人之

① 《具庆堂集》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② 上列各明刊别集，除罗虞臣《司勋文集》藏于南港“中研院”外，其余自蔡清至邹迪先各集，皆中央图书馆所藏。

《惠潮兵纪》（四册见《全毁书目》），惜多失传；用著其目，以俟搜访。明时潮州为海上交通重镇，郭春震著《备倭小论》，言窝藏、接济、通番三事。郭吴两《志》，保留此类海防文献特夥，此则治明史者所宜措意者也。

顺治以后，因应功令，备《一统志》参考之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潮州知府，叠有修志之举，并皆成书刊行。门类因仍，转相蹈袭。胡恂之雍正《志》，今亦罕观[1]，惟乾隆志最通行耳。

民国三十五年新纂之《志》，以旧府属为范围，可谓创格。而着重实际调查与专家合作，此则大与前志异趣。故若干新立门类，延聘自然科学家撰稿，《地质志》出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气候》、《地形》、《水文》诸志之出于中国地理研究所，即其例也。新志原分三十门，沿旧志者只十之四；而撰写方法，复多所变通。若《大事志》，则采提纲旁注之法。《户口》、《交通》志，均侈列图表，颇异前规。赖众擎之力，事虽艰巨，稍有所成；而仓促付印，未能首尾检覆，虑多讹谬。原稿拟订五十册，而刊成十有八册。一志之中，原有数项，而刊出者或只一部分。如《物产志》，只印药用植物、矿物而已。故此书乃未完成之制，仅得目为长编，题曰《志稿》，非谦词也。然自乾隆迄今，多历年所，人事之纷错，政体之更长，华洋之接触，迥异畴昔，不可不书。况本志宗旨，略古详今，所补事实，至民国三十五年为止。以沿革而言，若南山管理局之设置，与民国十九年至三十五年乡镇之分并，今皆成为陈迹，赖本书记录，他日或可稽考。自知体例容有未纯，然以史料论，似亦不尽可废乎。

潮州地区，以语言之故，风俗、饮食、戏剧[2]、音乐，皆别具特征；而侨民海外拓殖，与南洋关系，尤为密切。比岁以来，韩江流域古物日有发见。若潮安梅林湖之贝丘，韩山竹竿山之唐宋窑址，脍炙人口。凡此均宜独立研究。[3] 本志对于上列各项，原有专篇，惜属稿粗具，未遑写定付梓，惟有期之他日耳。

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往日藏书，不可复问。而

---

①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未收胡恂《潮州志》。

② 潮州剧本现存明代资料，藏于海外有二种：一为嘉靖本《荔镜记戏文》，英国牛津大学、日本天理大学，各藏一部，吴守礼曾加校勘；一为《潮调金花女大全》，现藏东京。

③ 详拙作《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又《广东潮阳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载《考古通讯》1956（4）），他如《广东梅县大墓岌（岗）晋唐墓清理简报》（载《考古通讯》，1956（5）），《潮州北宋刘景墓清理》（载《考古》，1953（9）），《广东潮安北郊唐代窑址》（载《考古》，1964（4）），《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载《考古》，1961（11））各篇，皆重要文献。

余为学之方，日益旁骛，旧记都忘，何论新知。矧于煨烬之后，掇拾之余，集腋成编，取资异国；叹精力之将衰，惭韦编之莫就；姑存初稿，未遑删订。敢谓足以谀闻，庶不没其苦心，以俟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

1965年6月饶宗颐识

原载《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店，1962

《潮中杂纪》序

往岁忝任潮志总纂，深憾郭春震嘉靖《志》及其侄子章《潮中杂纪》二书，无从寓目。嗣于南港获见郭《志》残卷，喜出望外；洎得完本于扶桑，遂取与《三阳志》合刊于《潮志汇编》。又恨《杂纪》未能觅得，其后门人李锐清从东京谋得景本，前有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子章自序，字大如钱；全帙共十二卷，犹是万历间原刊本。前钤“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印，知其书清时流入东瀛。朱士嘉《方志综录》所未著录，诚可宝也。

《序》称：“凡通志前志载者不书，书其逸者新者若干，命之曰《潮中杂纪》，而托之剞劂。”其《志》在补黄佐嘉靖《粤志》、旧《三阳志》暨嘉靖《潮志》之所略。目录之后，校阅姓氏，自潮州府通判靖州梁义卿以次，至潮、揭、饶、澄、大埔、惠、普、平远各知县均具名，盖刻于潮郡署者也。子章博学好文，宦履所历皆有诗文草如《粤草》、《黔草》之类，多见于《四库存目》著录。子章《明史》无传，《江西通志》本传称“其于书无所不读，著述几于汗牛”。潮中是纪，仅其戋戋者耳。赣《志》谓其“出为湖州知府”当是“潮州”之误。

是书特色在保存史料，大量撮录当日官方文移，若卷二录《万历南澳敕》、卷五《请设海防诸疏》；又卷九《郡邑志补》，卷四《韩公二祠沿革》、《韩公与大颠书及昌黎别传辨》。前志略于古事，子章博雅，直益辨证特多。其尤出色者为卷七之《艺文志》，共分二类，上为《书目》，下为《碑目》。自吴颖顺治《潮志》迄乾隆周硕勋《志》，皆忽视金石纪录，而此书所列碑目，

万历以前潮属诸县石刻，悉具于斯，诚难能而可贵。至于书目，弥为珍异，其例先刊潮地名宦著述与所刊刻之书，多为他志所漏载，如称："元《三阳志》七卷，元人著，今无刻本，郑布政旻家藏有抄本。"幸《永乐大典》潮字号部分尚存，可以互证；又谓："天顺《志》，载事颇核，成化十三年《志》，不知谁著，止载海、潮、揭、程四县事，其字颇小。"《千顷堂书目》于潮志颇有著录，凡此均可补其不及。

潮中名宦寓潮时之著述，自宋陈尧佐有《潮阳编》，明王源有《韦庵守潮文集》四卷，王思有《寓潮集》五卷（时贬三河驿丞），均宜入《潮志·艺文》之"外编"。其涉潮州文献者，邻水谈伦著《韩祠录》三卷，钱塘于嵩著《南澳志》二卷，普宁教谕南海邓修贤著《铁山稿》二卷，一刻于郡署，一刻于南澳署，一则子章为序。前者《四库存目》著录，子章所著《韩公二祠沿革》必有取资于是。其非郡人著述而刻于郡署，举其荦荦大者，括苍何镗刻《韩文》，又刻叶子奇《草木子》，郭春震刻《一统志略》十六卷，同知泰和刘魁刻其同乡罗钦顺之《困知记》，通判梁义卿合《西京杂记》、《三辅黄图》刻为《汉图记》十二卷。私家刻本有《宋简录镌》、《欧苏表启》，刻存于郑旻家。潮中刻本，渊源甚远，《三阳志》述宋刻，历历可征，清季韩江书局盖又承其遗绪者。至于所记郡人著述，多向来之所未详，林异之《草范先生文集》，盛端明之《知微录》、《五行论》，是其例也，均宜补录。

曩年撰《韩祠沿革考证》，刊于北京《禹贡》杂志，仅据郭氏《韩公二祠沿革》，所见乃周硕勋节本，恨未见《潮中杂纪》所载原文。今见此本，至为欣快，日后拙作当据以直正充实。就中潮州城南书院，郭氏指出"城南祠，即《三阳志》所谓书院也，由元入国朝"。至"城南"二字，取自韩公《符读书城南诗》，亦为子章所揭出。而城南书院历史应溯元以上，据此可成定论。

是书有《平寇考》计上下二卷，于海疆夷氛平寇诸役，记述特详。饶平张琏之变，叙其擒获在五月十三日，证以闽广交界九峰仙石所镌"嘉靖肆拾壹年壬戌孟夏拾捌日俞大猷进征琏等首从俱就擒次月尽班师"之文，相差五日，而志其就逮则同，足以正《明史》言琏流寓三佛齐之讹。

其余琐事，如"杨主簿梦"条，记杨彩延平人，来南澳修志。石刻条，《南澳赋》下言明主簿延平杨彩撰，是此赋曾泐诸石。又记万历十一年嘉禾产南澳地，教谕邓修贤、主簿杨彩作《嘉禾颂》，杨彩事迹，赖以有征。又石刻著录：王锡爵撰《翁襄毅公神道碑》，与《明史》万达本传作襄毅正合，新印《翁万达集》据《明文海》附王文作襄敏，郭书刊行在明史纂修以前，距万达

之卒甚近，未必误刻。近贤考证应作“襄敏”者，似仍非定案。又物产志“茶”条云：“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由是观之，潮人饮工夫茶，非万历以前流行之风俗矣。

此书虽缺脱之字不少，且有挖改处（如书目王源文集下万历“十六年”数字），仍是万历镌刻原貌。宋明潮本，沦胥已久，得此不啻尝鼎一脔。爰商诸郭伟川君，谋诸剞劂，用广其传。潮州市文物馆收藏有沪渎苏乾英教授馈赠郭子章行书直幅，今并附载于本书之前。余近时著文论《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有关资料多取自郭氏此书，足见其史学价值之高，故作为附录，以供参考云。

1993年3月饶宗颐谨识

原载《潮中杂纪》卷首，香港潮州商会，1993

记康熙林杭学修之《潮州府志》

明代潮州《志》多次重修。《千顷堂书目》所载，有雷春（永乐时修）、王源（正统）、沈声（景泰）、□□□（天顺）、车份（弘治）诸《志》，仅粗具规模。迨嘉靖年间郭春震《潮州府志》八卷，体例始有可观。陈昌积颇称道之（见《龙津原集》内《菊坛郭公墓表》）。清顺治十八年辛丑，知府溧阳吴颖再修潮《志》，共十二卷，据该书“发凡”所记，其时弘治车《志》已在未见之列，只赖郭春震嘉靖《志》、郭子章《潮中杂纪》及陈天资《东里志》，加以潮属各县奉功令而修志，若潮阳有吴光卿续成林大春前《志》未付梓之稿本，揭阳有冯元飙《志》，程乡有李士淳《志》，纂者皆有名人士，十县之《志》均及时征到，得为采摭之资，故吴颖之《志》尚能翔实可据，所可惜者，元代《三阳志》及其前《图志》，皆沦劫灰，无从采摭。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知府林杭学继起重修潮《志》，其《序文》云：

> ……潮州有《志》，其来旧矣；自有《志》以来，坏而复修者亦屡矣。历岁郡城数经盗据，人物为之伤残，载籍为之散逸。自余承乏，拊循之暇，量其力之可为者，若学校、祠庙、署亭、桥梁之类，次第兴筑，焕然改观矣。独郡《志》一书，以军檄旁午，未遑修举，至是时属廓清。乃喟然叹曰：“是志不修，窃恐岁久而湮后难征也。”于是从缙绅先生暨各庠诸友，与郡之耆老而谋之，请于各宪，愿捐俸开局修纂。始于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越二十三年十月而《志》成。为条目二十有八，凡系于

潮而为史家吏治之所必考者，具是已……

康熙甲子秋九月，潮州府知府加正一品仍加六级秣陵林杭学撰。

是此《志》成书仅耗时十六个月耳，仓卒完稿。立条目二十八，以风俗、物产、古迹列艺文之前，仙释附属于寺观，既沿前《志》辟人物一门，而另分孝义至列女四类，皆有未妥，其余新增星野，形胜关隘水利附属于疆域，亦嫌苛碎，体例殊有可商。其他条目大抵沿袭吴《志》。艺文占六卷之多，因吴《志》“古今文章”而更多所增益。参看下面三《志》条目表，其承袭相因之处与得失之由，可思过半矣。

郭《志》八卷	吴《志》十二卷	林《志》十六卷
卷一　地理志	卷一　地书部　10篇	卷一　星野　潮汐　疆域形胜　关隘　水利附
卷二　建置志	卷二　赋役部	卷二　山川　建置沿革　城池
卷三　田赋志	卷三　祀典部	卷三　公署　学校　祠祀
卷四　祠祀志	卷四　官师部	卷四　贡赋　监政　驿传
卷五　官师志	卷五　科名部	卷五　兵防　兵事
卷六　选举志	卷六　人物部　列传245篇	卷六　职官
卷七　人物志	卷七　兵事部　记事122篇	卷七　选举
卷八　杂志	卷八　山川部　38篇	卷八　名宦
	卷九　古迹部　39则	卷九　人物 孝义　隐逸　流寓　列女
	卷十　轶事部　53则	卷十　风俗灾祥附　物产　古迹 丘墓　寺观仙释附　杂记
	卷十一　古今文章部	卷十一—十五　艺文　文部
	卷十二　古今文章部	卷十六　艺文　诗部

林《志》前有《序文》四篇，摘要如下：

(1) 康熙乙丑（二十四年，1685），分巡广东省驿传盐法道兼管水利按察司佥事杨佐国《序》云：……果庵林年翁以江左名流继昌黎守兹土……顾念圣天子……混一八荒，车书万国，特征各省郡邑方书，用志

一统，诚盛举也。而潮《志》时久人湮，煨烬多遗即间有父老记忆一二，无异白首宫人说天宝事耳。爰博访宿儒，旁搜断简，捐俸纂修，用成信乘。……

（2）甲子（二十三年，1684），翰林院编修佘艳雪《序》：今上御极之二十有三年，薄海内外，罔不率俾。台湾浴日之区，咸知稽首效顺……果翁林公祖以卓荦之才，来守是邦。其为治也，好整以暇，独于虎符未停之会，即留意蒐葺郡乘，旁采历年故实，敦请耆旧核尝纂修，以旧《志》颇杂，更定铨次，谋付剞劂，以成一郡完书。……

（3）杨钟岳《序》：……我潮郡《志》不知始何年。有明郡丞车公份于弘治间一修之矣。太守郭公春震于嘉靖间再修之矣。至国朝顺治庚子，郡侯吴公颖修之，去今二十五载，虽日月无几，而沧桑多故，复虞遗缺，无以登诸简编。果庵林公来守是邦，慨然以为己任，日与缙绅士夫考镜图经，搜罗掌故……念余八闽督学归来，计离潮忽忽十余年矣，风景不免殊观，见闻讵能周至，嘶无一得，何有三长，乃叨越敦请，辞不获命，窃向诸同人矢愿曰：综核古今，文与实副，庶郁为鸿裁，永传来兹乎。……不意二竖时侵，坐卧丘园之日多，积月成岁，未能与诸同人汇帙而分门，删繁而举要，及《志》将告成，始得肆力一览观焉。……

（4）陈衍虞《序》：国家混一寰宇，威振八遐。……圣天子益励精图治，特征十五国方书，以志一统……潮《志》续修于吴郡侯颖，将历三纪矣。……郡侯果庵先生筹之熟矣，先生笔挟风霜，义严斧钺，犹以事关对扬，谦逊不遑，爰咨之乡达，采之刍荛。缺则补，讹则正，芜则删，疑则核，幽则阐，逾年而《志》成。……先生条画已详，搦管者特踵其事而点染耳。……康熙甲子季夏之吉，八十五园道人海阳陈衍虞拜撰。

循上录诸《序》观之，林《志》乃因应当日修《一统志》之功令而属稿，急于成书，其凡例，仅言及车份、郭春震、吴颖三《志》，余皆未及。自言以十《志》为纲，分为二十八条，每条有《序》。序文皆雅丽可诵，想多出自陈衍虞润饰。艺文部分，凡例谓“前《志》所收虽主于严，……今广为收采，……然非巨篇鸿制及不关潮景潮事者，敢烦剞氏”，大抵杭学所重在文，故于此三致意焉。此书又有澄海知县王岱《序》，略称：“郡守林公守潮数年，志事遂兴……与耆旧陈园公、林介两君笔削点定，草创稿成，复就佘（艳雪）、杨（钟岳）诸先生厘正之。”今本无王岱《序》，然点定大体出自陈衍虞

之手可以推知。道光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此书题曰“知府林杭学修，郡人杨钟岳辑”。今观钟岳《序》文但云：“及志将告成，始得肆力一览观焉。”彼但过目审阅而已，非真主操笔政者也。

此《志》之条目及纂修经过略如上述，兹更揭橥每类记载之可称述而应予以注意者。

山川

分志各县之山川，撰写“小记”，每记及顺康时事，如“金山”条谓叛帅郝尚久筑寨。“西湖山”条记康熙戊午林杭学……代山主陈衍虞修建佛殿，己未主事塞楞格、郎中朱臣重建北帝殿，庚申潮镇马三奇同夫人李氏重建三官堂，八月知府林杭学率盐商移建关帝庙于漱石亭旧址之类。

“三利溪”条记顺治间郝尚久拓之，水涨决民居数百十间，九月大师克城，乃筑为直堤。

城池

府城内　记康熙戊午潮镇马三奇、守道仇昌祚、知府林杭学会议将西湖山周围置建灰城，十一县合力为之。

澄海县城　记康熙五年迁斥，七年展复。通判阎奇英重建樟林寨，新建围一百四十丈高丈四尺。

公署

揭阳县公署　记顺治十三年毁于海寇，暂移于按察分司。康熙十一年，知县张方圣重建。

程乡县公署　记康熙丙辰，潮州叛镇刘进忠焚库延烧大堂、后堂，康熙十六年大师克恢郡邑，知县王吉人重建。

祠祀

韩公祠　详叙顺治以后及康熙建置事情。

安济庙　言“乡人祈祷时，有青蛇屡见梁节上，饮酒食肉而独不伤人”。即青龙古庙之由来。

盐政

特别盐政一项，记榷盐、行盐、场盐。对广济桥盐商明代盐饷，尤为详尽。

驿传

详记顺治、康熙之际府驿留存银两与南工部匠饷银，皆经济史有关资料。

兵防

记南澳兵署诸卫所清初制度兵额兵饷，附清初潮州卫所屯田尤详。

兵事

此章十分重要。林凤之变条称凤“退至广州，随往吕宋国玳瑁港筑城据栽，且修饬战舰，谋胁番人复图内逞；闽抚刘尧诲遣谕吕宋国王捣巢焚船”。记崇祯十七年以后诸变，如黄海如之变、陈斌之变、刘公显之变、车任重杀官之变、郝尚久之变、郑成功之变，皆有关南明史材料。

续记部分，记六县迁地，陈豹、杜辉之降，王围光潮惠之捷，杨洪之变，丘辉之变，尤以刘进忠之变，最为有用。按：清初有人著《惠潮兵记》四册，见《全毁书目》，其书已失传。林《志》所记，足以征信。

其中林杭学自言：“丁巳……二月初九日，复泉州。郑经密召何佑等回，弃漳州出据门。进忠先令营将陈文彂至福省康亲王军前投占诚，授征逆将军。六月六日令士民剃头归正。时余为漳郡同知，以入观，阻留在浙，随大师恢复闽、粤。以六月中督饷，首先入潮，安抚百姓。嗣而新镇马三奇、又喇、赖二将军、达部堂等继至安辑，民庆更生。”林以漳郡同知有功升任潮州知府。所记极有史料价值。

职官

武职记清初镇守潮州总兵官、水师总镇达濠副将、饶镇总镇（即吴六奇）与所属黄岗、澄海协副将、标左营游击等职人名，甚为赅备。余弱冠著《广济桥志》收录《宁波寺碑记》，当时原名尚存，据拓本钞出碑后各地方文武官职衔人名，考证极为费力，今覆之本《志》卷六，其人名一一均可查出，足见其有裨于考证。

选举

《仕宦考》之下列出吴标以下诸名如下：

吴标　六奇胞弟，顺治十一年连州游击，十七年升江南江宁府提标中军参将。

吴汉　六奇从弟，大城所守备，升琼州游击。

吴启丰　六奇子，康熙四年，内袭职镇守饶平总兵官。康熙八年裁缺，改补贵州安笼总兵官。

吴启镇　六奇子，康熙十四年初任黄岗副将。

吴启爵　六奇子，康熙四年授二等侍卫加三级。

按本《志》人物，武功部分已为六奇立传，修志时吴氏已前卒，故于选举之末补其家族职衔，大埔湖寮出土六奇碑志，可与此互证。

丘墓

有一特色，即详记所在地、墓碣撰人，如：

王大宝墓　胡铨铭。

林从周墓　余靖撰碣铭。

参议林兴祖墓　大学士杨士奇铭，在韩山南。

陈廷策墓　修撰缪彤铭。

姚琼墓　陈子壮撰墓表。

王昂墓　苏葵铭。

太仆寺卿吴裕墓　吴宽撰神道碑。

郑一初墓　王栽仁有祭文。

知县吴继乔墓　冯元飙撰墓碑。

襄敏翁万达墓　大学士王伯爵铭。

今不殚烦为之列出，因诸碑碣文字可在作者文集中觅得，余靖、杨士奇、吴宽等《集》俱在，非难得之书，本《志》翁万达谥是“襄敏”，不若他书之误作“襄毅”，弥觉可贵。

林《志》以艺文卷帙最繁，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为重点所在。潮人自沐昌黎教化，有海滨邹鲁之誉，一向重视文学。南宋郡守常袆已编成《古瀛集》，其书名见元《三阳志》。《永乐大典》“潮”字号最后部分即为诗文，若干宋元有关文献，赖以保存，足补明清志书之缺略，与林《志》正可互参。林《志》艺文按年代先后为次，不再区别当地人士与仕宦者流；其选取标准，大致以有关地方建置、人文为主，所收皆一时巨匠。艺文小序略云：

> 经天纬地之谓文，又曰文者载道之器……至今日始多规模八家，气运升降之故，可得而知也。古今名宦词客，操不律觇潮山水者，珠霏霞灿，美不胜收；而乡之先生长者，振秀扬华，足追三代四唐之胜，汇而萃之。……所以征文献也。然不关郡事者，不敢滥登焉。

其著书旨趣如此。郡守顺治之吴颖，康熙之林杭学二人者皆能文之士，咸擅诗且以理学倡导，一时士大夫翕然从之游。吴颖《菜根堂记》云：“戊戌夏六月，予抵潮州，海舰初解，援兵四集未散，居民之居而尽有其地，盖潮自郝帅之变，焚略无算，追兵至而加甚焉……邑井萧然，细民欲乞一种菜之区而不可得。”又其己亥元旦诗云：“嘶马不停芳草短，哀鸿欲集远沙平，谁将姓

氏惊童稚，漫使文章溷老兵。”兵燹之后，文事重兴之难，形于楮墨，数百年后犹可想其仿佛。林杭学于刘进忠乱后来潮，海上初告敉平，粤东大师巡海南来者屡见其人，吴兴祚有题韩祠、巡达濠、巡南澳诗，杜臻、林杭学皆有和作。杭学癸亥六月陪吴兴祚又李抚台巡历南澳排律三十韵最为出色，文长不录，录其和巡达濠韵云：“积盗全销影，春临广漠场。遥看旌日暖，无复阵云黄。翰墨开山色，车骑染涧香。百年逢此日，人吏庆潮阳。”俨然是升平气象！

是时来潮官吏与寓贤，不少江南名士，如知府宋徵璧尚木，与华亭宋徵舆齐名。徵璧《潮州竹枝词》十首，郡邑《志》全录之。试录其二：“潮城风景亦堪夸，采葛家家并绩麻，甘蔗恰当丹荔熟，槿花还号佛桑花。”“丝素含悲墨客车，常将官舍比蘧庐，韩山漫说能栖凤，韩水何曾走鳄鱼。”澄海诗家谢元汴《题宋尚木郡伯亲览轩》句“独有韩陵一片石，相将疏影对斜阳”，推挹备至。徐乾学至潮州有《杂兴》之咏，其“无分晴雨穿高屐，岂是风流学晋人”句，久为人传诵。是时潮郡诗伯推陈园公为宗匠，本《志》载其《湖山祭诗文》，典丽高贠，藻采芬溢；又《滕司马恤商碑记》有关广济桥税务，又为经济史料可诵之宏篇。

潮州久沐周敦颐、朱子之教，理学师儒多与结缘，佳作缤纷，见采本《志》者尤多，举其荦荦大者：

元人之作，若吴澄撰《潮州路儒学记》，周伯琦作《马公祠记》，欧阳玄因赵鼎六世孙赵继清出为潮州推官为撰《得全书院记》以纪念故相赵鼎。入明以后，陈献章作《三利溪记》，推崇周濂溪，撰《程乡县儒学记》与《程乡县社学记》，论地方之学以扶世教为第一义。其后贤若张诩之《揭阳县学尊经阁记》、《射圃记》，湛若水之《新溪记》，咸于儒术三致意焉。王守仁开潮州理学之先路，王慎中撰《送陈员溪先生之任永定序》，谓潮自二杨首闻阳明学说于虔台，薛侃继之。阳明文章若《书黄梦星卷》、《批揭阳县主簿季本约呈》，皆有关潮州之作。邹守益为《原道堂记》，论尽性之义在昭伦、昭仪、昭政、昭养、昭文、昭用，立意尤为剀切。陈察以御史谪海阳教谕，盛端明为撰《虞山书院记》，论反求于心之旨，察所著《具庆堂集》中有关海阳县学之作已可补郡乘之遗。唐伯元《三贤祠碑记》，言郡丞车份修郡《志》，至论王源为人喜夸张，若此类毋乃责之已详乎，他书所未记，亦足以备掌故。

他若陈璘《南澳山种树记》，述万历丙子设澳为重镇兼及其时漳州、澄海、潮州卫所人物。崇祯间严尔珪《集诸生会课檄》、《再檄》，二檄之俪体文

字，时严氏官潮海防道，著有《岭东记》，见《千顷堂书目》，今已沦佚，赖此片羽，可尝一脔。本《志》艺文于郡人所作有关当地风化建置者，薛侃、翁万达、林大春、林熙春、王天性、黄一龙、黄锦、郭之奇、蔡承瑚、李士淳、谢元汴诸胜流，无非精骑不凡之制，足为后贤模楷。再以诗论，彭延年之《浦口村居好》，梁克家之《榕邑书舍九月梅花》，高启《咏韩子》："自古南荒窜逐过，佞臣元少直臣多，官来泷吏林相诮，天要潮人识孟轲。"原为读史二十二首之一。戚继光《督兵过潮州渡》："汗血炎方七见春，又随残月渡江津，行藏莫遣沙鸥识，一片浮云是此身。"直是振聋发聩之作。陈献章之《悼李龄》，杨慎之《半闲园为萧太史咏》，季本之《咏中离山》，汤显祖之《九月宴别奉赠任太府开宪潮阳》，徐熥之《谒陆丞相祠》，周弘禴之《抵澄海》，皆足为地方增重。弘禴于万历十一年谪潮为澄海典史，著《澄海集》，《脉望馆书目》著录，均有足记。杨闱《贺谢韶石公祖平平远寇》、《送程乡僧之京请藏》诗，有关地方文献。闱佐吴颖修潮《志》，出力尤多。艺文雕板有误刻者如撰《韩木赞》之王大宝，误宝为宾，此则无关宏旨，附为指出。

记1934年，余在顾颉刚先生主编之《禹贡》（半月刊）第二卷五期发表《广东潮州旧志考》，述清代潮州《志》历四次续修，康熙林杭学《志》十六卷，雍正九年胡恂《志》二十四卷三十目，乾隆二十七年周硕勋《志》四十二卷三十六门。为类踵增，胡《志》始终未能寓目。林杭学《志》，由清学部图书馆载入北京图书馆收藏，近时蒙柴剑虹先生代谋景印一部，不意六十年后，耄耋之年，始获快睹，为之惊喜累日，爰记其大要，以飨读者。

潮人崇尚文事，已成优良传统，林杭学此《志》"艺文"尤为典要。甚望有人为加标点，重新排印，供州人讽诵，可作"古瀛文苑"读，与陈珏之书并行。含英咀华，别开生面，扬州里之遗芬，必有好事乐意为之也。1997年5月记于香港。

原载《潮学研究》（六），汕头，1997

又收为复印康熙《潮州府志》代序，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0

《潮州先贤像传》序

亭林有言，士之求友也，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昔之撰次氏姓，记其言行，为《尚友录》者，其用意与此相仿。夫数千里之外，苟志意相契，追思怀慕，往往声应而气求。况夫钓游之地，桑梓之乡，前贤声光之所届，耆老提命之所被，其感召奋发，更何如耶？至于千载以上之人，邈焉莫及，仰止高风，徒深遐慕。故或图其遗像，悬诸座隅，仿佛旁皇，时若或见。庶几如日月之丽天，瞻仰而不坠。诗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尚友之意，不尤深且远乎。地方名贤之有像传，以张胜《桂阳先贤画赞》为最先。近日番禺叶氏、贵阳凌氏，或摹有清学者，或图黔中人物，以像合传，流布海内，扇扬芳烈，识者多之。予曩窃有志于此。民国三十一年，避地揭阳，以语邑宰陈暑木，访诸故家，得乡贤遗像二十余帧。维时寇氛压境，兵火仓皇，董理无暇。未几，予走桂林，兹事遂废。今年春，汕市民教馆长吴长坡，倡为先贤遗像展览之议。兵燹之余，故家藏像，诸多散佚。吴君辗转搜求，夺之蠹简丛残中，得七十余像，发其光华，以为普及之教，其用心可谓微矣。会之日，士女争观者，肩踵相接，浃旬不休。吴君感群情之向往，念征集之艰难，爰议先就像中遴其中若干刊为《像传》，以垂久远；而以其事谋诸潮州修志馆。时余谬董馆政，闻之跃然，喜宿愿之获践也。用为系以传略，溽暑键户，斟酌群书，汰繁正讹，阅月而功毕。吾州之学，启自赵德，惜乎图像无存，是编以年代先后为次，自唐大颠禅师至清曾右丞刚甫，凡三十人，并缀各传援据书目于卷末，备参

稽焉。曾怪近世教民之法，略近而详远，侈陈九州之博大，父母之邦，反漠焉若不足以措意。思古之情不发，怀旧之意未纾，数典忘祖，学者所为深屏营也。是书之刊，俾吾州前代巨人长德，于此一帙中，得以朝夕亲炙。申仰止之诚，偿尚友之志，启爱乡之心，长思齐之念，随在皆足发人深省。百世之下，倘有闻风而兴起者乎。是为序。

民国三十六年九月潮安饶宗颐撰

原载《大光报·方志周刊》第四十三期，汕头，1948

宋代潮州之韩学

宋世崇尚韩文，一如诗家之尊杜，蔚为风气，柳开号“肩愈”，石介著《尊韩篇》，北方之儒重倡尊王攘夷之说，欧阳修因之作《本论》。宋世文章，实以韩愈为中心，姑名之曰“韩学”。以各地韩集之刻本论，有潮本、京本、蜀本、杭本、饶本、闽本等，至朱子之《考异》为一大总结。

潮州当地从事韩学最早，唐时充任潮州乡校之海阳人赵德，在李汉结集韩文之前，已编选韩公文，以教于乡，名曰《昌黎文录》。宋吕大防、朱熹皆据其本以入校。《考异》称：“吕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此《外集》之文见于赵德书者。《滂喜斋藏书记》载大观初，海阳刘允以韩庙香火钱刊《韩集》，即以京、浙、闽、蜀刊本及赵德旧本为据。元《三阳志》所载有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一千二百板，中字《韩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此宋时潮本《韩集》之大略也。潮本久无传，陈振孙曾见之。若《与大颠三书》，《直斋书录解题》云：“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惟《东雅堂韩集注》引杭本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阳灵山禅院，宋庆历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书疑之，因之滁州谒欧阳永叔览之曰：实退之语。《考异》云：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陟）自书耳。

此三书东坡、放翁皆深辨之，放翁言：“尝得此书石刻，语甚鄙，不足信也。”如放翁言，宋时确有石刻。按元和十四年即韩公贬潮之岁，据《袁州谢

表》："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袁州刺史。"彼与大颠留衣服为别，当是本年十月间事。若此三书刻石在元和十四年，必出颠师亲手，颠师风格高峻，纵有贻书，何劳泐石？观南唐保大间泉州《祖堂集》所记："侍郎令使往彼，三请皆不赴。"可以见之。疑三书之依托，即由三请而生。直斋所见潮本无此三书，彼疑灵山旧无此刻。然放翁明云"得此书石刻"，当出宋人所为。灵山禅院者，据海阳许申撰景祐元年十二月碑记云："天圣七年诏改以护国禅院为开善禅院。"袁陟得此书，正在天圣灵山禅院赐号后十八年。东坡谓有"一士人……又诬永叔"，殆即隐指袁氏。欧公《集古录》跋尾称："文公与颠师书……其后书'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则非也。……颠师遗记虽云'长庆中立'，盖并韩书，皆国安重刻，故谬为附益耳。"是杭本注所称"元和十四年刻石"，明为谬妄。欧公所记，"长庆中立"，然于称韩公官衔有误，颇纠其违矣，谓为国（宋）初重刻，则近是矣。

东雅堂本廖莹中注引《考异》谓《外集》中《与大颠书》"诸本皆无之，唯嘉祐小杭本有之"。顾嘉祐蜀本刘煜所录者，并无《与大颠三书》。则始以此三书入集，实肇于嘉祐之小杭本，正在袁氏之后。刘允于大观初刻韩集，所据诸本中有浙本，浙本即是杭本。考北宋时杭本有二：一为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杭州明教寺刊本，时未有《外集》。一为仁宗嘉祐七年刊本，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言"以嘉祐壬寅所刊杭本是正"者也。小杭本当为后者，直斋云潮本无此三书，则所见之"潮本"必为刘允之大观本；而刘允所采之浙本，必为明教寺本而非小杭本可知矣。

方崧卿又注云："今（灵山）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东坡为潮州守王涤撰《韩庙碑》，在元祐五年，元祐在嘉祐后近二十年，重立之事，潮州地志无考。廖莹中注云，"灵山石刻，张系所撰，其间载韩问大颠云西国一真之法，何不教人"云云。张系未详何人。前此袁陟所见，只刊三书，不及韩公与大颠问答之语。后来乃有所谓《韩愈别传》者，今《灵山正弘集》所误题为《大颠别传》"孟简集"者也。考元《三阳志》碑刻一项内只有"韩文公像，方略刊"，及"《昌黎伯庙碑》，东坡撰并书"，并无灵山寺《与大颠三书》及问答、《别传》之石刻。康熙癸酉，本果撰之《正弘集》亦不记三书刻石之事。郭子章于万历十年知潮州府，著有《潮中杂纪》十卷，其书《艺文志》上记开元寺佛书，内有《大颠传》一书，又著录《心经注》，僧大颠注。考《正弘集》第一篇即为《潮州大颠祖师本传》，末题"大德五年辛丑住山比丘了性拜编"，郭青螺所见之大颠传或即此文，盖元时僧了性所撰。又《潮中杂

纪》卷四有《韩公与大颠书及昌黎别传辨》一文，郭氏从朱子之说，信《三书》为真。而于《别传》则谓“诬公太甚，不可以不辨”。略云：“夫以徐君平戏作之书，而今潮寺所刻者，诬为孟简，既诬作欧公跋，又诬作虞伯生（集）赞。而薛林桥序之首篇，亦无一语为韩公辨诬。是何视僧道高视退之过卑也！”是此《别传》果出于灵山石刻。洪兴祖《辨证》引吴源明语，直指为徐君平少时之戏作。宋四时志磐《佛祖统记》亦引苏轼云：“近世所传《退之别传》，深诋退之。……吾友吴源明云，徐君平见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志磐加以按语述云：“至若《别传》之辞，诚为凡鄙，是不能逃东坡之鉴也。”志磐此书成于理宗宝祐戊午，《别传》之妄，禅门宗匠，亦斥其非，无劳饶舌。原文题作《退之别传》，许景衡《横塘集》十五《答义仲书》，及刘谧《三教平心论》下引，均作《退之别传》。见于明觉岸《释氏稽古略》元和十四年下则作《韩子外传》，如郭子章言，彼所见潮寺所刻，正诬为孟简作，与《正弘集》同，而《正弘集》复误题作《大颠别传》，自出僧人妄改。宜其见讥于《四库（提要）》也。薛侨为揭阳薛侃之弟，曾事阳明，于此竟无所辨正。此题孟简作之《别传》，石刻今已湮灭，侨为制《序》，似明时又曾有刊本也。

《与大颠三书》及《别传》皆出好事者所为，宋明人记之，明确有据，宋时潮阳灵山僧乃屡为刻石，未详其故。

宋人亦以退之与大颠往来事，作为绘画题材。南宋四川双流人邓椿著《画继》，在“铭心绝品”中列举其同乡广都宇文时中家，藏有《退之见大颠图》。据《式古堂书画汇考》，水丘览云为《昌黎见大颠图》。《杭州志》：“水江南能画米家山，兼工写照。”即其人也。明教大师契嵩居武林灵隐寺，坐化于神宗熙宁五年，其《镡津集》中《非韩》共三十篇，已言及韩愈问大颠、三平击床事。水丘，杭州人，谅是所闻于契嵩者流，故图其事。契嵩与潮人屡有交往，《镡津集》中《送林野夫归潮阳序》，言及卢元伯，元伯即卢侗也。

《三阳志》所记石刻，有“韩有公像，方略刊”。方略，泉州人，建炎初知潮州。邵博《闻见后录》称：“旧于温城孔宁极家，见孔戣《私记》一篇，有云退之丰肥喜睡。……近潮阳刘方明摹唐本退之像来，信如戣之记。”孔戣与韩公交好，韩集中《论孔戣致仕状》、《孔戣墓志》、《海南神庙碑》皆涉及孔戣事迹。戣之所记必极可信。方明乃刘允之子昉，南宋官龙图阁学士，家在韩山后之东湖。方略所刊文公像，未知即出于昉所摹之唐本否？

韩公刺潮，为时仅八月，驱鳄鱼，置乡校，教化所至，潮人思之深，至名

其山曰韩山，水曰韩江，手植木曰韩木。宋咸平二年四川陈尧佐为潮通判，有诗云："侍郎亭下草离离。"而其诗题曰《韩山》，则咸平时其山已姓韩矣。南宋初杨万里过潮诗句："亭前树木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海阳王大宝亦有《韩木赞》之作。木实橡木，郭子章于《韩山校士录序》考证至详。东坡为王涤撰《韩庙碑》，称其"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昌黎为师"。嘉靖郭春震《潮志》，即假此数语为涤立传。其实不独王涤为然，历任州刺史、州倅，无不以韩公为师。韩以驱鳄名，宋人亦有《戮鳄》之作。陈尧佐之作《戮鳄鱼文》，即其著例也。尧佐摹仿韩公，显而易见，即韩公本人之作，唐人有谓其多由前贤脱胎者，契嵩《镡津文集》十六引余知古《与欧阳生论文书》称其"作《原道》则崔豹《答牛享书》，作《讳辨》则张诏《论旧名》，作《毛颖传》则袁淑《大兰王九锡》，作《送穷文》则扬雄《逐贫赋》，作《论佛骨表》则刘昼《诤斋王疏》"。知古，唐文宗时人。检《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只收其《谢段公五色笔状》一篇。契嵩所引，可补其缺。《驱鳄》之作，有谓似相如《论巴蜀檄》，当另有所本。段成式《酉阳杂俎》亦有《送穷文》。叶梦得谓："《毛颖传》仿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而少变。"周密举姚熔作《喻白蚁文》即仿《驱鳄》。特出文章之作，往往出于夺胎换骨。若乎《谏迎佛骨表》，余知古谓其仿刘昼。邵博则谓乃广傅奕之言。余尝举晋世蔡谟亦辟佛，有文云："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即昌黎"佛者夷狄之一法"之所本。古今文人，互相摹仿，昌黎亦从此中锤炼得来，不足为奇也。

两宋莅潮官吏，蜀士及闽贤为多，于昌黎崇奉最力。庆元以后，莅潮诸仕宦，不少为朱子门人，如通判廖德明是。故朱学亦传播及于潮。潮刊大字《韩集》中，有朱子《考异》，朱子著述亦在潮镌板（为《中庸辑略》、《朱子家礼》）。廖德明更以"遥碧"变名"拙窝"乞朱子书匾，并濂溪《拙赋》刻石，则又与理学结缘矣。元明以后，理学地位益隆，韩公在潮之地位遂与日月争光，此与仕宦理学关系尤为密切。余将于另文《宋代潮州名宦之尊韩与师韩》中详之。

综上而言，宋代潮州之韩学，可称述者，学有三端：一为潮本《韩集》之刊刻；二为名宦之尊韩，而多所兴建；三为大颠与韩公来往事，演为灵山问答。好事者假托《三书》及伪制《退之别传》，潮州禅门为之上石。第三点站在佛氏立场，意欲正韩与化韩，可谓韩学之反面。缁流之渲染，为韩学添重重公案。然契嵩之《非韩》不以佛拒儒，而以儒衡儒，持之以中道，其言曰："苟不以圣人中道而裁其善恶，正其取舍者，用庸人之私。"立论较为宽

博。至于宗门所记，欲抑韩以自高，事涉矫诬，反为不智。《三书》及《别传》出于好事之妄作，对韩公与颠师实无所加损。灵山泐石，未久而已磨灭，传讹日滋，不能不为之刊正，非好辨也。

又记：欧阳修于庆历元年时为谏议大夫，慕韩愈之斥佛老，著《本论》三篇。四年，左迁滁州，明年，经庐山入东山圆通寺，谒祖印禅师居讷（师出蹇氏，梓州中江人），与之论道，折中儒佛，蜀沙门祖秀特记其事作《欧阳外传》，苏庠及张浚为序。文中大旨具见《佛祖统记》四十五，释氏辈以欧公之见祖印，比之韩公之见大颠。作《欧阳外传》者，为祖印之同乡僧祖秀（秀住潭州得法于黄龙新禅师）。若《退之外传》则出于除君平之手。东坡谓据其友吴源明之言，洪兴祖从之，说必可信。因知《韩子外传》，一如《欧阳外传》，出于宋人佞佛者之所为，自是一时风气。至韩公之《答孟简书》据志磐《统记》，兼载孟简复书，有“彼杨墨老氏之书，于理偏虚，非中道要切，释氏之教则不然，大明善恶之异路”一段，亦是重要文献。以《韩子外传》嫁名于孟简，洵属无知。元华亭念常作《佛祖历代通载》于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韩愈到郡……因祀神海上，登灵山遇禅师大颠以下问答，全录《外传》，一字不易。其识见远不如志磐矣。

志磐称：“退之《与大颠三书》具存本集，……谓之妄撰，恐成过论。”朱子正同此说，惟疑有脱误。郭子章云：“明潮郡丞车份谓韩《答孟简书》云自山召至州郭，未尝言以书请之，则书为后人所托。潮阳林井丹又谓车太泥，可以造庐留衣，独不可以书遗之乎？海阳林东莆直指朱子之说，可以折衷欧阳、苏二家之论。”此为明时乡先辈之说。车份会稽人，弘治庚申以同知修《潮州志》五卷，时海阳盛端明为诸生与纂修事，车说或出盛氏之手。井丹为潮阳林大春，尝修《潮阳县志》，东莆即林大钦，有《东莆先生集》。诸家均未细辨潮本《韩集》何以不载此三书，亦未知陈振孙之论。其说可代表地方人士之意见，故附记之。

原载《韩愈研究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

——韩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

韩愈地位之受到高度推崇，起于唐季皮日休作《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只建议韩公宜配食孔圣庙而已。及石介著《尊韩篇》，列出十四圣人、五贤人，以为“吏部《原道》，自诸子以来所未有，可以上继孟、荀、扬、王（通）诸氏”。欧公著《本论》，效其辟佛，兼尊重韩文。至北宋中期，韩公在学术及文学上之地位，逐渐被肯定。元丰七年诏封昌黎伯。南宋庆元己未，复进封公爵。

韩公刺潮，为时仅八月，驱鳄鱼，置乡校，垂询民间疾苦，教化所被，潮阳之地遂有“海滨邹鲁”之称。[①] 潮人思之深，至名其山曰韩山，水曰韩水，登临之处曰韩亭，手植之木曰韩木。观咸平时，通判陈尧佐已有“韩山”之咏，则山川之被韩姓，北宋初已然矣。

唐代莅潮官吏，其中不少为佞佛之士，如常衮即其一也。代宗时，衮以翰林学士与开府鱼朝恩及大兴善寺不空暨义学沙门良贲十四人，奉诏主持新译之《仁王般若经》、《陀罗尼念诵轨仪》[②]，与韩公思想大相径庭。唐世潮州刺史，地方志官师部所载凡十人，祀名宦祠者六人，韩愈之外为常怀德、李皋、常衮、刘暹、杨嗣复，官阶不在韩之下。又以宰相身份贬潮者，常衮、杨嗣复外，又有李德裕，今皆为人所淡忘。惟韩愈深入人心，建有专祠，历

① 见陈尧佐：《送人登第归潮阳》诗。

② 《惠灵序》，见《大正藏》，第十九册，513页。

久而弥显。迹其渊源，大抵出于仕潮州诸名宦之提倡。

宋代韩学最盛之地区有蜀、闽两处。蜀士于韩公多有专门著述，如金堂人樊文霖，宣和六年进士，著《韩氏年谱注》，朱子《考异》引称曰“东蜀樊氏者”。南渡而后，高宗时，晋慈人文说著《韩集详注》，书今存北京图书馆，眉州青神杜莘老为之序。又淳熙三年丙申（1170）临邛韩谆著《韩集全解》，朱子《考异》引之，称为临邛韩氏者。故蜀士仕潮者多以尊韩为倡导，举其著例。

（一）宋咸平二年通判陈尧佐初立韩公祠。《三阳志》：“忠佑庙即韩文公庙也。尧佐辟正室之东为公祠。”尧佐撰《戮鳄鱼文》云：“已亥岁，予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韩辞》，载鳄鱼事以旌之。后又图其鱼为之赞。”此文载于吕祖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五，世多传诵。又为仰韩堂，《三阳志》云：“其亭额，陈文惠（即尧佐）笔也。文惠倅郡之日，实名之复记之也。”尧佐，四川阆中人，尧叟之弟，端拱元年进士。其仕潮不过官州倅，竟效韩公著文驱鳄，开地方官尊韩之先例。傅增湘集《宋蜀文辑存》，收尧佐文十篇，若《仰韩堂记》等均不传。《三阳志》，陈文惠公祠有二，一在仰韩堂，与韩公并祀。碑刻有陈文惠公像。宋时官吏画鳄鱼为图，尧佐之外，又有王举直，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九，云其知潮州，“钓得鳄鱼，其大如舡，画以为图”。吴颖《志》作王举元，皇祐间人。

（二）元祐五年知州事王涤建韩文公庙，榜曰“昌黎伯庙”，苏轼为撰碑。王涤，莱州人。东坡与涤书，称其寄示韩庙图，又称其先伯父与陈文惠相知。东坡眉山人，其家与尧佐向有交往，彼对潮州之认识，当从尧佐诸文字获知详细，盖亦深受尧佐之影响。王涤有《拙亭记》，言“建韩庙以尊先贤”[①]。

（三）南宋乾道间，郡守临邛常祎建仰韩阁于广济桥西岸。《三阳志》五《桥道》：“乾道七年，太守曾公（汪）造舟为梁八十有四只，名曰广济桥。……太守常公（祎）创杰阁于西岸以镇江流，名曰仰韩。以韩文公遗迹，实与是阁对也。……董是役者军事推官曹嵩。”按《三阳志》十二《文章》收有曾汪《广济桥记》，称：“乾道七年六月己酉始经之，落成于九月庚辰。”此文为最早之广济桥记，以后诸潮志不收，资料极为可珍。曾汪为福建长乐人。又张羔《仰韩阁记》云：“太守临邛常公祎……复计余缗，创杰阁于岸右。………福建舶使虞公似良以古隶扁之曰‘仰韩’。”常祎籍临邛，与韩谆

① 文见《三阳志》。

（著《韩集全解》）为同乡同时人。《三阳志》收其《潮州图经序》，末署淳熙二年（1175）七月。王象之《舆地纪胜》一百："《潮阳图经》，郡守常袆序。"《三阳志》收新修《潮阳图经》、《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即指此书。此《图经序》可补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之缺。

以上为蜀人仕潮崇韩，有所建置之卓著者。若乎闽士仕潮者，以南宋为盛。上举曾汪而外，又有下列诸人：

（一）绍兴十四年（1144）潮州学教授莆田林霆建学舍，修补雅乐。时郡人东津刘昉记其事云："教官莆田林霆考古制，按音律，……潮学一新，士知古乐，教授林霆之力。"[①] 霆于绍兴十四年典教于潮，诸生复为立祠于大成殿之东庑，迨宝祐（戊午）六年，其孙光世守潮，遂卜地改创，建删定林公祠于郡学仰韩堂之侧。[②]

（二）庆元四年（1198），通判廖德明。《三阳志》："文惠堂创于赵君（善践），后增祠昌黎、濂溪。景定壬戌，通判程（应斗）重建。……以贤良许公（申）尝从文惠游，槎溪廖公（德明）尝倅此州，故并祠焉。前为堂，扁曰'梅竹旧游'。拙窝在文惠堂之下，旧名遥碧，廖公更今名，朱文公书扁。"后陈圭于韩山书院增塑周濂溪、廖槎溪二像。《三阳志》云："槎溪尝倅此州，继而为本路宪帅，威德至善，使人不忘。"按：槎溪即廖德明，南剑（建阳）人，朱子门人。

（三）嘉定十二年（1219）曾噩修仰韩堂，乃县之旧学。[③] 噩字子肃，福建长乐（永福）人，与张元乾同邑。元乾《芦川集》，卷末有曾噩序，文中引韩子"气，水也；言，浮物也"一段论文气，称其"与孟、韩同一本"。盖用《答李翊书》语，可见曾噩受韩文熏陶之深。噩尝令潮人除去高髻，废畬民旧俗。

（四）绍定二年（1229），知州为孙叔谨，建仰斗亭及思韩堂。《三阳志》："思韩堂在万卷堂之东。绍定初，孙侯叔谨重建直院，陈常伯（贵谊）记之。后有亭曰仰斗，刻韩公像于其中，刻韩公及诸贤墨迹于两庑。莆田王迈为之记。"又称："八贤祠，绍定二年孙侯……卜韩庙之左而迁焉，立于亭前，扁曰'海山风涛'，取韩公《别赵子诗》语也。邦人黄梦锡记之，文见《古瀛丙集》。"

---

① 元《三阳志》卷十《学校》条。

② 《三阳志·祠庙》。

③ 《三阳志》。

按：孙叔谨，字信之，漳州人。王迈，字实之，事迹详刘克庄《大全集》卷一五二《臞轩王少卿墓志铭》。克庄于嘉定间为潮州通判。《古瀛集》有乙、丙集（见《三阳志·书籍》），久已无传。

（五）淳祐二年（1242），郑良臣莅任，翌年，于城南建韩山书院，榜曰"城南书庄"。《三阳志》："后有堂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赵德像，山长郡博士为之，此书院创始之规模也。"良臣，福州人。

（六）淳祐五年（1245）陈圭继任潮守。圭为复斋（陈宓）嫡嗣，于韩山书院复有所更张，捐金市朱子所著书实于书庄。又刊其父所书《仁说》于二壁，增塑周濂溪、廖槎溪（德明）二像并祠其中。复修原道堂。圭字表夫，福建兴化人。

上举长乐曾汪、曾噩，莆田林霆，漳州孙叔谨，福州郑良臣，南剑廖德明，兴化陈宏规、陈圭父子，皆福建籍，有功于潮，或景仰韩公，有所兴建，或以学术为人崇祀，而配享于韩庙及其近邻。南宋时，闽学对潮州影响至巨，官师之尊韩，盖亦与理学息息相关。

《韩集》之校刊，蜀、闽两地致力独多。欧阳修已见到蜀刻，苏溥在其《韩集后序》中称："尝见益州雕《韩集》，又从嘉州李推官借欧、尹（洙）二本。"其序系年为嘉祐六年（1059）。溥为仁宗时蜀士。方崧卿云，溥所校者为刘、柳（开）、欧、尹四家本。朱子《考异》引眉山孙氏汝聪之合解本，又东坡之乡人也。南渡而后，闽本最流行，莆田方崧卿，孝宗时知台州，著《韩集举正》，至朱子著《考异》，《韩集》遂得一总结。潮州《韩集》刊本，自宋迄明，叠有刊刻。列举如次：

赵德《文录》。

刘允大观刊本。刘昉《序》云："先君集京、浙、闽、蜀刊本及赵德旧本。"

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一千二百板。中字《韩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①] 此为朱子《考异》之潮刻本。

《韩文》四十卷，明知府括苍何镗刻于郡署，有序。万历甲申推官蒙自王国宾补刻。见郭子章《潮中杂纪》七《艺文志》著录。

以上各种，仅知其目，惜书均沦佚。观此，潮州地区对韩集刊刻亦不遗

① 见《三阳志》十。

余力。固不让蜀、闽专美于前也。官师提倡，自是主要原因。

由上陈事实，可得一结论：两宋莅潮官吏，蜀士与闽人，对昌黎崇奉最力，且挟蜀、闽之《韩集》，传入于潮。自庆元以后，官师不少为朱子一系人物，如通判廖德明即朱子门人也。潮刻大字《韩集》所刊即为朱子《考异》。朱子其他著述亦在潮镌板。[1] 廖德明以遥碧更名曰拙窝，朱子为书扁并周濂溪《拙赋》。淳祐乙巳，陈圭捐金市朱子之书以实城南书庄，韩学且与理学结合，成为当时潮州文化思想之重镇，而韩公在潮州之地位，亦日益提高。此辈名宦，既倡导为韩公建祠缔构以表景慕，倡导者继而复为后人所尊崇，且得与韩公配享，入祀于名宦祠之列，如林光世为其祖林霆建祠，陈圭为廖德明塑像，韩学与理学相得益彰。元明以后，朱子理学大行，韩公地位遂与日月争光。韩公在潮地位之隆，因上地方官师尊韩之结果，而朱子与理学风气助力尤多。此种直接间接之关系，尚论地方学术史者不可不知。因略为抉发，以就正于关心乡邦文献与治韩集诸大雅君子焉。

原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日本，同明舍，1989

① 《三阳志》所载又有《朱文公论孟或问》六百板、《中庸辑略》一百八十板、《朱文公家礼》一百七十板。

新刊《丁禹生政书》序

1970年秋，余执教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则闻全美有研究生三人以丁日昌与洋务运动为博士论文题目。时耶大图书馆方购得温丹铭先生整理之《丁中丞政书》一部，借读者甚众。此即是编点勘者据以人校之本，而为中丞曾侄孙家骏助资付梓者也。丁中丞于同治初以洋务吏精能罕匹，最为李鸿章所倚畀，西方史家论“同治中兴”，数其人物，中丞以能斡济时艰列其首。

中丞《政书》，包有巡沪、淮鹾、藩吴、抚吴、抚闽各时期之文件，共三十六卷，都四十余万言。综其一生，由苏松太道，而两淮盐运使，而江苏藩司，而江苏巡抚，最后官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方面之任，绵历海疆，其嘉谟远猷，翊赞朝野，使人想闻令轨，迄于今兹而不替。中丞始以下吏起家，熟悉刑名钱谷，讼庭无事，奸宄尽除。重刊牧令之嘉言，留心西炮之秘巧，太平敉定，实借乎外力，常胜军遣散，尤赖斡旋之功。方其抚苏，兴利祛弊，前后清理积案二十七万余宗，四方翕伏。迨其抚闽，躬问民瘼，赈灾救溺，日不暇给。尝巡台湾，自苏澳以至恒春，披草莱，立城邑，番民夹道欢呼，其烈盖伟矣。若其远瞩高瞻，睥睨中外，折衷尊俎，固我藩篱。受江南制造总局之职，条其精细事宜，陈外海水师火轮，斯为第一利器，宏规富强之策，首重海洋之御。他如注重人才，与容闳同建博选幼童留美之倡议，百年树人之计，非学又复何求！至于革新军械、增设实用科技科目诸条陈，豪杰之士无不服其远见，而乃屡扼于守旧者用夷变夏之腐论，清廷之踬，未始不由于此。同治洋务之得失，足为今日之龟鉴。重览中丞议论，温旧省新，

可以辜较而知。遥瞻未来之资，足致善谋之利，于历史中求教训，乌可忽乎哉！此家骏所以急欲重刊是书，其用心之足尚，又不待余之缕言矣。是为序。1987年1月。

原载《国际潮讯》第七期，香港，1987

复见《丁禹生政书》卷首，香港，丁氏，1987

重刊《曾刚父诗集》跋

晚清粤中诗人必数梁节庵、曾蛰庵师弟。梁诗温丽悲远，世所共识。曾诗任公推许备至，称其腴思中含，劲气潜注，晚岁所得，每造陶柳圣处，可谓知言。公丁易代之交，抚己深怀，履运增概，其遭际正与陶公同符；及躬耕杨漕，不啻归园田居矣。夙耽禅悦，故能因情而尽性。今读《静中花下纳凉》诸作，一归性境之真。其论《桃花源记》，谓直是性境现量。其诗云："相逢便问今何世，始觉陶潜是恨人。"实前贤所未道，足见其于陶公所得者深。钟记室品陶言："每观其文，想其人德。"窃谓读公诗亦当以此义求之。夫其夐出尘表，若清飙厉翮，劲气生襟，造境之高，又岂并时才俊所可企及耶？公诗向有手写定本，没后遐庵丈为印行，惜印本不多。比者韩君穗轩斥资重刊，以广其传，有足多者。以余与公谊属同州，属为一言。予生也晚，未获奉手，然每诵公诗，如接謦欬，往往中夜徊皇，不能自已；重感韩君之意，爰为推论如此，以谂世之读公诗者。抑公之志悬诸日月，昭在天壤，何劳后生妄赞一辞。其所不能已于言者，亦以区区私淑之心，而识小之旨，想为贤者之所乐许云。癸巳嘉平后学潮安饶宗颐敬跋。

原载《固庵文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

地不爱宝，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许多向来完全消失不见于记载的文物，陆续不断地出土。戏文亦是其中之一个重要项目。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地发现明代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书坊刊印的《白兔记》戏文，轰动一时。在广东则1958年从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的黄州袁公墓出土一种题名《蔡伯皆》（即《琵琶记》）三个写本，其一上有“嘉靖”年号题记。[①] 1975年12月，潮州市凤塘公社后陇山园地出土对折纸本《刘希必金钗记》，封面朱书“迎春集”三字；第五页第四出，上面写明“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全剧末尾又写“宣德七年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等字样[②]，年代非常明确。二者都是潮属当地民间的唱本和演出手册，后者还附有《锣鼓经》，更觉宝贵。成化刻本已由上海博物馆精印为《成化本说唱词话》一巨帙，被称为“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戏文刊本”[③]。这一册宣德六七年间写本的《金钗记》，早于成化本三十余年，而且还是手写本，不是刊刻，这才真正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其价值可想而知。

四十年来，国内外学人对于民间戏曲和民族音乐的探讨与钻研，引起极

---

① 曹腾騑：《广东揭阳出土明抄戏曲“蔡伯皆”略谈》，载《文物》，1982（11）。

② 陈历明：《明初南戏演出本“刘希必金钗记”》，载《文物》，1982（2）。又《前人“刘希必金钗记”的来龙去脉》，载《文物》，1982（11）。

③ 见孙崇涛：《成化本白兔记与元传奇刘智远》，见《文史》，第二十册，211页。

大的热潮，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寻究当地祀神的风俗与戏剧的联系诸问题①；在欧洲大陆，对于华南各地民间戏曲唱本的搜集和研究更不遗余力。从福建的南音以至纸影戏，都有专家作过重要研究工作。② 关于潮州戏文的古代刊本流落在海外者，亦有人加以汇集印行成书。台湾大学退休教授吴守礼先生即竭一生精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特别从语言学观点，做出许多贡献③，他编印的"明清闽南戏曲"四种便是一个例子。④ 可是他所收集的《荔枝记》戏文，以牛津藏的嘉靖本而论，分明标题曰"重刊五色泉、潮"，是合泉州、潮州二本加以会刊。奥地利的万历本标题曰"潮州东月李氏编集"，东京的《潮调金花女》，分明出自潮州，具有"潮调"名目，把这单纯列入"闽南"的范围，似乎不甚公允。说它们是用广义的闽南方言来写作，虽则潮语与闽南同属于一个语言系统，实际上仍有许多距离。

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把新近出土的二种戏本及流落国外的三种明刻本，合刊为《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是一桩值得赞扬的古籍整理工作，为元明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无上的可靠第一手资料。我个人对这桩事，在开始筹备的时候和征集有关资料过程上做了一点协助和促成的事务。出版社要我写几句话，虽然我对于戏剧研究是门外汉，却有几点看法想说一说，也许对于爱好古典戏曲的人们，有点滴的帮助。

《琵琶记》在《辍耕录》所记的金院本称为"蔡伯喈"，列于"冲撞引首"之类，引首是开场的意思。《九宫正始》亦题作《蔡伯喈》，注云："元传奇"。《南词叙录》的"宋元明篇"作《蔡伯喈琵琶记》。在宋元南戏都习惯以剧中主角的名字作为全剧名称，此嘉靖写本题名正同于金院本，而"喈"字作"皆"，有好几处写"蔡伯皆"三字。西班牙圣路宁佐的皇家图书馆里收藏一部嘉靖癸丑岁（1553 年）詹氏（子和）进贤堂重刊的《风月锦囊》戏文总集。

① 田仲一成著《中国祭祀演剧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

② ［荷］施博尔（Kristofer Schipper），Une couection de manuscrits de Pieces de théâred' ombres chinoises（《中国纸影戏残本集目》），载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2），1979（《欧洲学会中国研究》第二册）；及该书 73 页，拙作《钞本"刘龙图戏文"跋》。

③ 吴守礼：《荔镜记戏文研究序说》（《日本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昭和二十二年，587～598 页；吴氏又著《荔镜记戏文研究》的《韵字篇》（1962）和《校勘篇》（1961），收入《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第七册。

④ 《定静堂丛书》本。

此书《文渊阁书目》有著录，首编卷一即为《伯皆》，目录作《蔡伯皆》[1]，这和揭阳出土本一样作《伯皆》是很有趣的。[2]《风月锦囊》一书在国内还很少人注意，甚有需要加以整理影印，以广流传。要校勘出土本的《蔡伯皆》，嘉靖本的《风月锦囊》是不可缺少而应该互校的本子，比较利用明代嘉靖苏州坊刻本和清陆贻典抄校本似乎更为重要。

关于域外三种戏文版本有若干事须加以讨论：

（一）牛津大学 Buldeian Library 藏本《荔镜记》[3]，末叶有“告白”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嘉靖丙寅年。”即明世宗最末一年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新安余氏的来历，龙彼得教授（Van der Loon）曾举出在欧洲和日本的藏书中有几种具有新安堂名号的：

> 《新刊韩朋十义记》二卷，万历丙戌十四年（1586），新安余绍崖自新斋刊本（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
> 《新刊京本增和释义魁字千家诗选》二卷，万历间书林余幼山新安堂刊本（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宽文七年重刻本）。
>
> 《新刊徐氏家传针灸捷法大全》六卷，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书林余苍泉新安堂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可见余氏刻书，用新安堂名义前后有余绍崖、余幼山、余苍泉诸人。苍泉的籍贯是福建建阳（余苍泉名良进，又名余良堂，其书堂又称怡庆堂）。这本题“余氏新安”必与上述诸人有关。

此书日本天理大学藏有二册，比牛津本为完整而印刷较为清晰，蛀损地方，两本可彼此互补。有“千叶文库”及“小汀氏藏书”印记。服部宇之吉《佚存书目》附载三曾加著录，现有天理（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复印

---

① 刘若愚：《西班牙藏明板风月锦囊考》（The Fêng-yuêh Chin-Nang——A Ming Collection of Yuan and Ming Plays and Lyrics Preserved in the Royal Library of san Losenzo, Escorial, Spain），香港大学《东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4, 1957, 1958, pp. 79—107）。

② 金院本的《蔡伯喈》当为元高明写《琵琶记》时的版本。在高明以前宋时亡有《赵贞女蔡二郎戏文》（《宋元明篇》）。钱南扬作高明传，谓“高明生长戏文发源之地，必曾见演出，曾见脚本”（《汉上宧文存》）。关于《琵琶记》的来源，清徐石麒（坦庵）认为牛相国即牛僧孺。潮本云：“赐婚牛氏。”焦循在《剧说》卷二颇同意徐说，谓指“牛僧孺之女，因为适合”，故疑原作《蔡伯皆》，或非蔡邕本事。但高明已将伯喈视作蔡邕。

③ 此书向达最先于 1936 年加以记述（见《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五号，后又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617～652 页。

本，由八木书店印行。

（二）奥地利万历本《荔枝记》。此书原藏于奥国维也纳（Vienna）的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 bibliothek），其前身为宫廷图书馆（Hofbibliothek），为龙彼得教授于1964年所发现。卷一首题“书林南阳堂叶文桥绣梓，潮州东月李氏编集”，末有牌记“万历辛巳（九年，1581）岁冬月朱氏与畊堂梓行”。据龙氏考证，朱氏亦为建阳书堂，现存刻书有下面一例：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十卷，扉叶署“书林与畊堂朱仁斋绣梓”，书末牌记云“万历甲午（二十二年，1594）岁朱氏与畊堂梓行”。知朱氏与畊堂主人乃是朱仁斋。此《荔枝记》原本或为南阳堂叶文桥刊刻，其后板归于朱氏欤？

（三）《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二卷。无序目，传为万历时刊。缺第二十五、二十六两页。书分两栏，下栏为《金花女》戏文，写书生情州刘永上京赴试途中遇贼投水获救，金花女水边祭灵，纪年为“大宋熙宁七年十二月朔”。是剧亦以“金姑看羊”一段闻名，可知其故事原亦出于北宋。上栏为苏六娘与郭继春事，乃出潮州本地故事。苏六娘是揭阳雷浦村人，清时谢锞尝将她的故事写成长诗，载于其所著的《红药吟馆诗钞》。[1]

此册为孤本，原东京长泽规矩也博士所藏，现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详《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页三、四，是书昔年傅芸子在《东京观书记》中曾有介绍[2]，吴守礼亦撰有校记。[3]

潮州正字戏出自南戏，渊源甚早。牛津嘉靖本《荔镜记》篇末有跋文云：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嘉靖丙寅年。又在插图之上一栏开头题云：

《颜臣》全部。

这一嘉靖本原是潮本、泉本和《颜臣》三种的糅合本。在《颜臣》戏文内屡次提及颜臣，又称陈彦臣。

例如：

---

① 《潮州志·丛谈志》。

② 见《白川集》，110页。

③ 收入《民俗丛书》第四辑，台北印。

〔普天乐〕只一封书信寄去还前日陈彦臣……不是娘仔细时（幼年）亲柑许彦臣何敢想来……

〔一封书〕陈彦臣书拜禀连氏靖姑（娘）是我有情妻。……

可见彦臣即是陈彦臣。龙彼得君认为《颜臣》与宋人笔记罗烨《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静女私通陈彦臣》是同一桩事，那是对的。《荔镜记》此本题目把“彦臣”写成“颜臣”，但内容分明是陈彦臣。唐圭璋《宋词纪事》收连静女的《武陵春》“人道有情须有梦”及失调的《朦胧月影》各一首，其本事即出自《醉翁谈录》，连静女与连靖女正是一人。此本的“颜（彦）臣全部”，虽不能说是宋时《烟粉欢合》所记陈彦臣的戏文原本，可能是经过多少损益润饰，改编而成，但本事同出一源，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这本书恢复陈彦臣戏文全出的原貌，堪为研究南宋戏曲以及它渐变为地方戏曲的历史提供一无上资料，应该把它拆出单行。

再谈《刘希必金钗记》，即是刘文龙的戏文。《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收有《刘文龙菱花镜》。《永乐大典·戏文九》著录作《刘文龙》。元时，史敬德和马致远尝合写过《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一戏，又名《刘文龙传》[1]。这宣德本有一段文云：

阿不干啡噜、答剌速末叫番奴唱番曲丑净唱〔雁儿舞〕。

阿不干沃庆（虔）答剌速，嗽哩答夕，蒙古嗖噜噜，干别吉忑可□速也，呵罕独满八木里。

声齐哩哇啰，哇哩哇，唻啰哩，啰啰哩，哇啰哇哩哇！啰哩哇啰啰哩哇啰哩哇！末白

其中渗入一些蒙古语，可见与元时的《刘文龙传》有多少关系，其祖出于元人。

至于哩哇啰的助声，在成化本《白兔记》的开场中《红芍药》一曲便有：

---

①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刘文龙菱花镜”条，78页。

末唱：哩啰嗹，啰啰哩，嗹嗹嗹，哩啰哩，嗹哩嗹，啰嗹哩嗹，啰哩嗹，哩嗹啰嗹，哩嗹啰嗹……哩嗹啰，哩啰哩。

和《金钗记》一样有缠声的哩啰嗹。用哩啰唱词的习惯，可追溯到南宋。史浩在《鄮峰真隐漫录》中《粉蝶儿》劝酒上阕内有"解教人，啰哩哩啰。把胸山一些磊块，一时熔化"[①]。董解元《西厢记》卷五乔合笙云"和——哩哩啰，哩哩啰，哩哩来也。"金时，全真教诸大师若王重阳、谭处端写的《捣练子》，都喜欢用哩啰唛、哩唛啰作为助声。这类啰哩嗹是有声无义，至今潮州歌谣中仍有这种助声。潮州人在形容人们高兴时顺口唱无字曲，叫做"唱嗹啰曲"。福建莆仙戏还保存唱"哩啰嗹"作为"下词尾"的习惯。据《莆剧谈屑》记载："莆剧在未演出时，后台先打三锣鼓，过后有彩棚，念四句大白，念完唱'下词尾'。下词尾只用'哩啰嗹'三字颠倒唱出。这三字是咒文，为得怕舞台上秽渎了神明，唱完这咒文，便可保台上大家平安。"这三字作为"下词尾"是由全体演唱，据说这是七煞曲上的"打讹"——亦即"打和"[②]。清初曹寅听闽乐，听到"啰哩嗹"的词句，作出下列的诗，加以揶揄。句云：

一拍么弦一和缠，舞余无复扫花细；团郎漫纵哄堂笑，摘耳犹闻啰哩嗹。

以此取笑。台湾台南现时道曲的唱本还存有遗声，摘出一段如下：

出仙宫，哩啰嗹。离了蓬莱，腾采云，哩啰嗹（你来），出离了天堂。哩啰嗹哩啰嗹。（法国施博尔藏陈荣盛抄本）

上述各例，可见这一类"打和"的帮声，从南宋、金、元以来流传演变的情形。《刘希必》此本亦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莆剧认为唱"哩啰嗹"等于念咒，可以避凶趋吉，我以前曾研究这一类和声（打和），是从《悉谈章》的"鲁流庐楼"而来，演变为唐人《渭城曲》的"刺里离赖"。原出于佛家《涅槃经》文字品。全真教采用它，变为"哩啰唛"，禅家作"啰啰哩"，再变成

① 《全宋词》，1929 页。

② 据胡忌《宋金杂剧考》中，宋剧遗响一节引用。原为复写本。

为“哩啰嗹”。由莆剧把它看成咒文一层看来，鄙说是可以成立的。[①]

明代以来，地方戏曲的演出，各有不同的脚本。以最流行的《琵琶记》为例，其演化极为复杂，大抵有京（金陵）本、闽本、吴本、徽本之差别。[②]揭阳《蔡伯皆》戏文的出土计有三本，其中一本是总纲，一本是小生使用的己本。有些宾白，为元本所无，正表示演出时有地方性发展的特点。据说同时出土原又有《玉芙蓉》二本[③]，惜已被虫蛀坏。该墓葬主人题“黄州袁公妣江□陈氏墓”，可能是外地人。但潮州墓碑常有冠以祖宗原籍地名的习惯，故也可能这位袁公已久住潮州。从戏文中杂有一剧潮州俗字方言看来，可能是当时潮州民间艺人配合当地条件的演出本。祝允明为兴宁县令，所著《县志》谓：“弘治前后，兴宁有南杂剧演出。”又《潮阳县志》莆田宋元翰传云：“其治人以礼教，椎结戏剧之俗，一时为之丕变。”元翰令潮阳在正德九年，可见弘治、正德之际，潮州一带，南戏已甚盛行。《琵琶》、《金钗》两记之出土，正足以说明这一事实。这两本均见于《永乐大典·戏文》[④]，惜已佚去。尤其《金钗记》卷终下记着“在胜寺梨园置立”，有“梨园”二字，当时戏班之具体规模，可想而知。潮剧戏班亦祀田元帅，即唐明皇时的雷海青，雷字可省作田，如雷万春之作田万春是。[⑤] 与福建莆仙戏所奉相同。

明代刻本的剧文多少带点综合性的宣传意味，喜欢用全像（相）、南北插科等字样，由下列诸本书名可以见之：

宣德《金钗记》云：《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

嘉靖《荔镜记》云：《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

万历本云：《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

嘉靖本《风月锦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

---

① 《梵文四流音R、R̄、Ṛ、L̄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金文京日文译本（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三十二册）。

② 参田仲一成：《十五、六世纪を中心とする江南地方剧の变质につい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七十二册）。

③ 《玉芙蓉》为曲牌名，见《拜月记》。王骥德《曲律》“论须识字”谓：“《拜月》、《玉芙蓉》曲‘富五车’之‘车’字，当作居音乃叶。”

④ 戏文四与九。

⑤ 读岳珂《桯史》卷十“万春伶语”条。

可以看出这些带宣传性的字眼，是明代书林刻书常用的伎俩。

宣德本《金钗记》篇题有“忠孝”名目和《永乐大典·戏文》著录的《忠孝蔡伯喈琵琶记》称谓一样，最可注意的是“正字”一名称的使用。潮州戏称正字，亦称为正音，意思是表示其不用当地土音而用读书的正音念词。元本《三阳志》风俗条有云：“或曰韩公出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韩愈为潮州刺史不到一年，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但可以理解“正音”是与本地乡音相对立的雅言。① 潮州语每一字多数有两个音，至今尚然。一是方音，另一是读书的正音，例如歌字方言 Kua 入麻韵，雅（正）音则为 Ko，歌韵。清季海阳王定镐的《鳄渚摭谈》说：“潮俗菊部，谓之戏班。正音、白字、西秦、外江凡四等。正音似乎昆腔，其来最久。”正音即是正字，与白字（潮音）分为二类。以前不知“正音戏”起始于何时，现在从宣德抄本的正字刘希必（文龙）一名称，可以看出南戏传入潮州之早，正音戏分明是受到南戏的影响。虽然宾白仍不免杂掺一些土音，但从曲牌和文辞看来，应算是南戏的支流，所以当时称曰“正字”，以示别于完全有潮音演唱的白字戏。

这一部《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名称虽止五种，其实《荔镜记》上栏为《颜臣》，《金花女》则合《苏六娘》为一，原是不同的两种戏，合计应得七种戏文，其中大半属于徐渭所称“宋元旧篇”。今刊五而获七，尤以《颜臣》全部，可以看做《醉翁谈录》中“烟粉欢合”的实例。同时，从《苏六娘》戏文还可以看到潮剧从南戏逐渐演变成地方剧种，并早在明代已有将地方故事编写成戏文的实例，说明了潮剧源远流长的古老历史。这两个资料，更值得重视。此书之印行，特别有裨益于宋元南戏之探讨，故乐为喤引，略举所见，以求教于博雅君子。1985 年 1 月于香港。

原载《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卷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① 地方旧时称曰“孔子正”，是指读书讽诵的语音。

钞本《刘龙图戏文》跋

施博尔先生曩旅居台南，颇留心闽粤传入鲲岛之民间文学作品，前后采集纸影戏唱册旧写本，共得一百九十八册。其中最早者为《司马都戏文》，写于嘉庆二十三年。又《刘龙图》一册，为光绪四年十月廿九日陈廷宽手抄本。年月及书写人名并具，尤为难得。与《刘龙图》戏出相同者，又有《刘聁骑竹马》一本，内容无大差异，惟聁字从耳，诡怪不见于字书，实应作刘昉也。

昉字方明，潮州海阳县桃坑人（今属东津乡），为化州知州刘允长子，绍兴中知潭州，官龙图阁学士，《宋史》无传[①]，惟《系年要录》颇记其事。桂林伏波山有刘昉题名。[②] 昉精医术，尤擅儿科，著有《幼幼新书》[③]。《滂喜斋藏书记》宋刻《昌黎集》下引绍兴己未刘昉序一叶，称："大观初，先大夫尝集京、浙、闽、蜀刊本及赵德旧本，参以石刻订正之。"先大夫即指允也。昉仲弟景，官台州、高雄二州知州，其墓近年在笔架山发现。[④] 刘允及子昉、景，《夷坚志》颇著其佚闻。[⑤] 昉他事尚多，他日当为《宋史》补选昉传。三十年前，尝见钞本《东津刘氏族谱》，记昉一家事迹甚备，故书藳落，已不可

---

① 《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传》，绍兴十四年，潮南安抚使刘昉奏武冈军傜人事。

② 桂林伏波山还珠洞摩崖题识："潮阳刘昉方明，自蜀还乡过桂林寓八桂堂，治舟伏波岩下。……男汶、渭、溱，孙驹哥、骥哥、鸾哥、鹏哥、鸿哥，外甥叶骐哥侍行。绍与戊寅六月中澣。"真书字大四寸，自称潮阳者，盖用郡名。

③ 《幼幼新书》尚有传本，见《潮州艺文志》第二册子部（《岭南学报》）。

④ 《考古》，1963（9），南宋刘景墓。

⑤ 《夷坚志》甲十四、支景七、补七记刘允及刘昉，甲十四、丁二记刘景事。

问。施君又藏有《萧端蒙汀死江西王》戏文，传钞相同者共四册，其中有云："霄禹承教子不忠。"考端蒙之父为萧与成，霄禹承即萧与成之音讹。端蒙潮阳人，字曰启，嘉靖辛丑进士，巡抚贵州，寻按江西，病卒。事迹详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

施君所集诸册得自台南，故悉题曰《闽南皮影戏》，然刘昉原籍在今潮安，萧端蒙原籍在今潮阳，均与福建无关，此刘、萧二出，应是潮州当地纸影戏本，后来辗转入于邻省者。

《刘龙图》写本别字累累，如韩擒虎作翰禽虎，太行山作太降山，唐山作长山，西园翰墨林句作韩木林，皆为潮音沿讹。其俗字或书其偏旁，如以亘为就，讹取其半体，如以佮为命，皆字书所无者，不特可推究方音，且保存"方文"（此谓 local script，与方言实同样重要），可为俗字谱添入不少资料，言小学者不应以其鄙俚而轻视之也。

余在法京，喜得睹此诸册，恐刘昉、萧端蒙之名，较为冷僻，非湛于地方文献者不易道其详，爰不揣固陋，为跋其后，而于施君之爱好闽粤文献，嘉其毅力之不可及，以视邦人之自弃旧家乔木，漠然以为不足以珍爱者，其识见之高下，为何如也！饶宗颐，1979 年 4 月于法京。

原载 P. Van des Loon 编 *Occasional Paper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1979，Paris
后收入《固庵文录》，台北，新文丰公司，1989

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何以要建立“潮州学”

潮州地区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对象，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因此，潮州学的成立，自然是顺理成章不用多费唇舌来加以说明；更有一个充足理由，客家学以梅州地区为核心，在清雍正十年（1732）嘉应直隶州未设立以前，整个梅州原是潮州所属的程乡（后来分出镇平、平远），长期受到潮州的统辖。大埔、丰顺二县，亦属潮州所管。北京的潮州八邑会馆，只有说客家语的大埔没加入，但大埔仍是潮属的一邑，至近时方才割出独立。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

中国文化史上，内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潮人在这二方面的活动的记录一向占极重要的篇幅，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潮人若干年来在海外拓殖成果和丰厚的经济高度发展的各种表现，在中国以外各个地区孕育出无数繁荣美丽的奇葩，为中外经济史写下新页，久已引起专家们的重视而且成为近代史家崭新的研究对象。因此，潮州地区人文现象的探讨，更使多数人发生热烈而广泛的兴趣。本人对这一件事，多年以来屡加以积极提倡，汕头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的成立，正说明这一工作已经取得相当成就。此次在香港潮州商会鼎力资助下，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首次为期三日的潮州学研讨会，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当是分不开的。先以民族而论，潮

州土著的畲族，从唐代以来，即著称于史册。陈元光开辟漳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即与畲民结不解缘。华南畲民分布，据专家调查，皖、浙、赣、粤、闽五省，畲族保存了不少的祖图和族谱，无不记载着他们始祖盘瓠的传说和盘王祖坟的地点，均在饶平的凤凰山。换句话说，凤凰山是该族的祖先发源地。我曾引用宋晁补之集中《开梅山》一长诗，和泰国北部发现的《徭人文书》里面《游梅山》的记述，来讨论宋代畲、徭的关系。又引用元《三阳志》记载宋时水东有"不老"的土音来探索畲族什么是他们自己称呼的名号。这些问题，牵涉甚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近十余年来潮汕地区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可观。饶平浮滨类型的文化遗存之发现，震烁中外，但正式报告尚未有人着手编写。我曾到饶平该地考察，深觉发掘及研究工作尚未认真展开，例如该地出土重要文物带有"王"字符号的大口陶尊，长达 17.3 公分的铜戈，还有铜觯与鸟形壶，都是珍品。江西新干商代遗址的奇异绚美的铜器，亦有鸟形文物，吴城亦出凤鸟形握手青铜器盖，它们彼此间之关系如何？均有待于考古学家的探索。其他各地出土文物林林总总，只有各县《文物志》作一些简单报道，我们正期待一本完美周详图文并茂的报告。

再谈戏剧问题，在清代福建蔡爽的《官音汇解释义》卷上的"戏耍音乐"条，记着："做正音，唱官腔，做白字，唱泉腔，做大班，唱昆腔，做潮调，唱潮腔。"其时的潮调与官、泉、昆三腔并列。由于多年来我国民间戏剧调查研究的跃进，温州南戏、闽剧特别是莆田戏的深入钻研，对潮剧研究的来龙去脉有一定帮助。中外人士已写成一些专著，灿然可观。出土新材料若宣德本《金钗记》、嘉靖本《琵琶记》已引起世界学人的注目，异国收藏如奥地利、日本都有旧本，这些珍异文物得到潮州商会的大力资助才印出《明本潮州戏文五（七）种》，风行一时，有口皆碑。其中《刘希必》写本所附板拍，对南戏音乐研究开创了一新纪元。现经中日学人共同探索，温、潮原出一脉。永嘉郑孟津君对宣德本点板的解读认为与《琵琶记》的明初臞仙本正是一脉相承，更属创见。

潮州方言的研究久已展开，卓著成绩，述作之富，毋庸赘述。惟潮州地区，澄海与潮阳、普、揭，各成语系，语音的差异如何进一步分析，及与古音的比较，还有待专家之探索。至于潮乐方面，器乐的专题研究，和活五音位律吕的研究，近时在国内成为热烈讨论题目，甚至可与曾侯乙钟律的四颠、四曾音位作出比较研究，其重要可知。

凡此种种，俱见潮州文化若干特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若失潮史新文献的发掘，我在编纂《潮州志汇编》时候，将《永乐大典》里面的元《三阳志》残本加以重印，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和采用。近时我又将久已失传的万历知府郭子章所著的《潮中杂纪》，从日本影回，即由潮州商会出版，订于十二月在潮州学会议开幕时推出，以供大家参考。这更是香港潮州商会对潮州学的又一次贡献。

潮州学的内涵，除潮人在经济活动之成就与侨团在海外多年拓展的过程，为当然主要研究对象，其与国史有关涉需要突出作专题讨论，如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明史等论题，有潮汕已有不少文化机构着手从事编写，十年以后，研究成果，必大有可观，钩沈致远，深造自得，蔚为国史之要删，谨拭目以俟之。

原载《潮学研究》(一)，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

本年11月18日，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澳门隆重开幕，特设专题讲座，以上列的题目要我主讲。什么是潮人文化传统？说来话长。自从苏轼在《韩公庙碑》上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故向来一般都认为潮之有学，由韩公开始，这一点殊为不确。姑勿论东汉末三国吴时，揭阳人物已有安成长吴砀，晋时程乡人程旼，宋人称颂之曰："万古江山与姓俱。"潮州在唐代学术范畴之内，无论儒、释，均有特出魁杰之士。中唐之际，名宦谪潮者众，常衮先韩公莅潮，"兴学教士"，故明、清方志都说"潮人由衮而知学"[①]（郭春震及吴颖《潮州志・官师部》如是说），非始于韩。兹将代宗广德至穆宗长庆四朝有关学术大事列下：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常衮与大兴善寺不空及鱼朝恩等新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供养法》一卷（慧琳《一切经音義》卷三十五）。

代宗大历初（公元766?） 潮阳僧惠照自曹溪归，大颠与药山惟俨同师惠照于西山，后游南岳参石头（希迁）禅师。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 赵德进士授推官（《吴志》）。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德宗即位。五月常衮贬潮州，九月十一日到州

---

① 《新唐书》一五〇《常衮传》云："德宗即位，……再贬潮州刺史。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宫云。"衮卒于福建任所，其贡献在闽，于潮州任期较短，而兴学则同。

（《全唐文》常衮《潮州刺史谢上表》），兴学校，潮州由此知学。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五月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梁克家《淳熙三山志》）。

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 大颠灵山寺创地基（《郭志》）。

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 灵山禅院落成，门人传信千余人。

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韩愈贬潮州。十月愈移袁州，与大颠留衣服为别（《答孟简书》）。

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 大颠坐化，年九十三（《国志·仙释》）。

由上列史实看来，韩愈不是第一位在潮兴学的潮州刺史，实际应该归功于常衮。衮以丞相南迁，道经惠州而至潮，所驻山冈，后人名为丞相岭。潮州城北金山上有“初阳顶”摩厓，旧传出于常衮手笔。[①] 又潮州开元寺内有尊胜佛顶陀罗尼经幢，为广东唐时唯一的密宗石幢，题曰不空和尚译。然唐代各地经幢一般都用波利译本，如福建泉州即据波本镌刻，独潮州乃用不空译者，盖常衮于大历间与鱼朝恩及大兴善寺不空等奉诏译陀罗尼念诵轨仪，开元寺之有不空译加句本，可能由彼谪潮州时携来的。

潮地释氏，在常衮未到之前，已先有惠照禅师传曹溪的法乳，药山惟俨，与大颠共师事惠照于西山。[②] 潮阳的西山在县西十里，形势巉嶭，源上有砖塔[③]，其地当即惠照之所居。相国李绅铭其石室云：“曹溪实归，般若观妙。体是宗极，湛乎返照。”宋时余靖题惠照小影，有“已向南宗悟，犹于外学精，士林传字法，僧国主诗盟”之句，则其人亦擅长文学。惟俨“年十七，度大庾岭，至西岩师惠照。大历八年受具足戒于衡岳”。惟俨于贞元初还药山，韩公门人李翱时与之游，至今禅门尚传为佳话，溯其师承所自，实出于惠照。大颠创灵山禅院的年代为贞元四年（公元788），在韩愈谪潮之前三十二年，彼深得施主洪大丁之助，大丁亦进士也。[④]

《吴志·仙释》称大颠“长庆四年，年九十有三，无疾而逝”，则元和十四年愈谪潮州，年方五十有二，而颠师已臻大耋，八十八岁矣。愈《与孟简书》呼之为老僧，正符事实。泉州《祖堂集》记“侍郎令使往彼，三请皆不

① 《海阳县志·古迹略》。

② 《景德传灯录》十四：“澧州药山惟俨……姓韩氏，年十七依潮阳西山惠照禅师出家。”

③ 《郭志》。

④ 吴《府志》唐进士列三人，洪奋虬下云：洪大丁亦举进士，为灵山施主。或云：洪圭字大丁，即奋虬祖。

赴”，其风格高峻可以见之。是时内学在潮州，高僧间出[①]，皆禅门之龙象。故论潮人学术，唐世先得禅学之薪传，继起乃为儒学，在韩公未谪潮之前。已卓然大有成就，是即潮人文化——传统之源头，儒佛交辉，尤为不争之事实。

至于如何发扬，愚见海外潮人，团结精神表现最为特色，惟传播知识，发扬学术，其热诚则远比他处为落后，可谓勇于生财，而短于散财，能聚而不善于散。释氏之学，以慈、悲、喜、舍四无量最能开拓人们的心胸，而财施、法施，对于人类社会的融和与智识思想的推进，贡献尤巨。唐代虽三教并立，而佛教诸宗的建树及教义的阐扬，使整个社会浸润于“无上圆觉”追求之中。儒家伦理更与释氏之仁道交融为一体，在朝注重密宗，在野则盛行禅悟，人们在精神上由顿悟更得到“向上”与“超越”的安顿。唐代两位在潮兴学的贬谪刺史，一则信佛，而一则辟佛。韩公到潮以后，与大颠来往，知其“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胸中无滞碍”。最少他本人在精神修养上已受到大颠的影响，是不用否认的。韩公所以“不助释氏而‘排’之者”，由于不愿“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②]，完全从狭隘的夷夏观念出发。今天站在人类文化立场，我们需要知彼、知己，不能一“排”便了事，许多历史问题，还要从多方面智识的帮助，才能获得正确的了解。我于 1963 年在印度研究婆罗门经典，方才明白中国人何以吸收佛教，无条件接受，复加以发扬光大，反而排斥原始佛教所从出的印度教为外道，是别有他的道理的。去年冬天到过唐宪宗、懿宗先后迎佛骨的“法门寺”，看见当时大兴善寺密教和尚智慧轮供奉的法器，方才知道当日韩公谏迎佛骨失败之由，及唐室对佛教迷信积重难返的社会背景。又从《佛顶陀罗尼》译本的比勘，才悟出潮州开元寺经幢之用不空加句译本，是和常衮谪潮有密切关系。凡此种种，都是近年研究所得，以前是完全不了解的。近日汕头大学人员来港，告知最近汕头大学招生，历史系与数学系没有学生修读，在生前“唯利是视”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人们精神处于封闭和空虚状态，很需要禅宗的清凉剂为之指出“向上”一路，加以提撕的。我们如果真的有诚意去发扬潮人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在开一轮会议作一次演讲，事同粉饰，说了便算，还要切实出具体的方案来扭转目前这种轻视理论科学的人文科学的歪风。我认为潮团

---

① 程乡阴那山有惭愧祖师，明理学家杨起元有《阴那山访唐僧法堂》诗。

② 《答孟简书》。

在联谊之外，应该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例如设置某种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和奖金，来嘉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继承唐代常、韩两位地方刺史“兴学”的精神，在海外培植一些人才，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我想各位必会同意我的建议而努力去促其实现的。

原载《国际潮讯》第十一期，香港，1990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演讲摘要

今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隆重举行，本人应邀出席，感到十分荣幸和由衷的高兴。因为从潮州文化历史的角度来说，像此次集全国各地许多专家学者于一堂，以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作为专题进行讨论，从而将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的研究提升至全国性的层次，这可说是潮州文化历史上的空前盛事。作为潮州人，作为一名浪迹海外的学者，首先我要对促使此次盛会得以顺利举行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及当地各机构领导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几位发言，都说我是潮州历史文献方面的专家，这一点我是愧不敢当。应该说，几十年前我曾负责编修过地方志，但那些作品已经是“少作”了。半世纪来，我的主要精力已转移在其他的学术领域，在研究和整理乡邦文献方面，我已经是个落伍者。通过今次的盛会，我愿追随在座诸位，为整理和提高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水平而共同努力。

回忆几十年前我们修地方志时，条件既差，各种志书史料又十分缺乏。现在本地学人所共知的几个地方志版本，如古潮志之《三阳图志》和明嘉靖年间修纂之郭春震《志》，那时尚未寓目。上述志书连同郭《志》，是我在日本时，获悉东京内阁文库庋有完帙，夜间托友人日比野太夫教授影印。后来（六十年代初）我就将《嘉靖志》合《顺治志》，以及《永乐大典》潮字号所

收《三阳志》，和我编纂的《民国志稿》，这就是1965年香港龙门书店出版的《潮州志汇编》。

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现，新的史料日益丰富，关心和有志于地方文献的人才亦越来越多，如果能在旧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地方志的质和量，在史料采用的综合性和科学性方面，在思想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开掘拓展，相信在地方文献和文化学术的研究上，必能超迈前人，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问题，我认为海外与内地一样，都要进行研究。正如杜经国教授在发言中所说的，内地有潮汕人一千万，而海外亦有同等数目的潮汕人，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另一方面，潮汕人很会经商和向外开拓，这种特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我的一位德国朋友、汉学家傅吾康先生，很留意类似的问题，但他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潮州人，而是整个华人社会海外拓展的历史。他收集中国人在海外建立会馆的碑记，从碑记中收集史料，这是很可靠而又实际的文献。法国又有一位施博尔先生，也很关心我们潮汕的民间文学，他曾前后采集潮州歌册一百九十八本，其中《钞本刘龙图戏文》曾请我写了跋文。[①] 这个例子也可窥见外国学者对潮州历史文化感兴趣和重视的程度，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成就是很令我们感到汗颜的。傅吾康先生在海外收集华人会馆碑记进行研究一事，令我想起潮州人在海外也有许多会馆。[②] 1968年我初到新加坡大学任教时便留意到星、马及东南亚国家有关潮州会馆的碑记史料。所以，我向今天与会有志于此的同人提供这一课题，希望能搜集众多的海外潮州会馆碑刻，从实录中研究潮人拓殖和创业的历史。

参与潮州瓷器的研究，我认为那是古代潮州历史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因为早年曾经编撰《韩山志》，韩山即潮州水东窑所在地，所以对潮州瓷窑向有留心。1955年旅东京时，我有一篇关于潮窑历史的论文，即为日本弓山富士教授取去，由长谷部乐尔译为日文，载于日本陶瓷协会出版之《陶说》二十四期，该文屡见学人征引。后来变写为《潮州宋瓷小记》一文[③]，其中谈到“潮窑盛于宋，周明所造佛像，技巧之精，即其明征”。且上述佛像刻有长文，而“北宋瓷器有长文者不多，其备记窑名、制造年月、供奉人及塑

---

① 编入拙著《固庵文录》。

② 数十年前在内地许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都设有潮州会馆。

③ 后载入拙著《选堂集林·史林》中册，中华书局，1982。

像匠工姓名者尤少。如此治平、熙宁佛像，实为仅见”。上述佛像曾为我家所收藏，载于拙著《选堂集林·史林》的《潮州宋瓷小记》，即附有上述佛像图片。有关唐宋潮瓷的海外出口贸易问题，“唐代青釉凤头壹残片，据冯先铭云，近年于潮州韩山及广州西村窑址，屡有发现。凤头壶为吸收波斯作风之制作，泉州海上贸易唐宋甚盛，故广东潮州亦有发现①，此类凤头壶如果为本地产品，合北郊发见之莲花纹圆瓦当二事论之，唐代潮州瓷器与外地最少已有相当交往，瓷业发轫甚早，故北宋中期，水东窑制作遂有此种成就，非偶偶然也”②。有关汉唐中国对外贸易的途径，我曾在拙作《蜀布与 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③ 一文中曾有论及，我认为西北新疆一带之交通贸易是通过陆上丝路，南方交广一带，则由海上丝路，故文中专立一章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日本友人三上次男著有《陶磁之路》一书。潮州应该是海上陶瓷之路一重要站。我听说讨论会上④，有的学者也以此为专题进行探讨，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另外，在有关潮资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我听了一位从甘肃来的学者作关于丁日昌的研究报告。（按：为兰州大学汪受宽副教授所作《抚闽奏稿篇序厘正》。）他对丁日昌的研究方法既细致又新颖，有不少真知灼见，令人感佩。从这些事例，和此次交给大会讨论的众多外地学者以潮州历史文献、文化学术与人物为题材的大量论文题目看来，说明这次讨论会在潮州的文化历史上，确实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末了，我仅此向促成此次盛会的机构的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伟川整理记录，并经饶宗颐教授过目

原载《国际潮讯》第十三期，香港，1991

---

① 《文物参考资料》，1958（2）。

② 引自拙著《潮州宋瓷小记》。

③ 载《选堂集林·史林》。

④ 有一个上午我因事请假，杜经国教授特准，因此未及聆听。

《潮汕史》读后小记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刘峰先生领导之下，多年以来，广搜史料，发扬幽潜，懋著业绩，出版书籍，至今一百多部。最吃力的工作，是着手第一部《潮汕史》的撰写。史作通史体裁，取材宏博，煞费苦心。杜、黄、陈三位专家，花去若干年的心力，才能成此伟构。顷者黄挺兄以上册稿本见示，刘峰叮嘱切要提出不同意见，不敢违命，因略举数事论之。

过去方志所载，潮州第一个地方官是揭阳令史定，本书只在注释中提及。第一位乡贤是揭阳人吴砀，本书完全没有提及，主要问题似乎是因为处理史料过于谨慎，故不采录。以余观之，南越国晚期的揭阳令史定，其人互见于《史记》、《汉书》的《建元以来侯表》，他与毕取、杨仆三人，同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三月乙酉日封侯，定被封为安道侯六百户。嗣子各当时。安道地在南阳，《史记》表称：

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自定降，侯。

意思是说自定以下皆投降于汉，定的名字同时出现于《史》、《汉》的南越赵佗传，《汉书》卷九十五《南越传》称：

粤揭阳令史定降汉，为安道侯。

以《汉书》与《史记》互证，定即是史定。由此可知赵佗的南越国确实没有揭阳县令，及汉武于南海郡内置揭阳县，显然是继承南越的旧制，不必怀疑。史定和他的士兵大部分当是中原南下的人，我们不能说中原人从南越转入本区，没有证据，当时本区自然是南越所管辖的地方。

至于吴砀事迹，郭春震嘉靖《潮志》已为立传，清郑大进的文章亦提到吴砀。有关吴砀的史料，取自《三国志·吴志》的《吕岱传》，其传云：

建安二十年（吕岱）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留岱镇长沙，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砀据攸县，权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攸，砀得突走。

《吴志》不载砀为揭阳人，《潮志》可补其缺。砀官安成长。《岱传》言其与袁龙首尾关羽，考建安是年刘备已得益州，孙权索回荆州诸郡，备不许，权遂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乃遣吕蒙督兵二万以取三郡。备自蜀亲至公安，促羽争三郡，权遣鲁肃将万人屯益阳。后备求和于权，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蜀[①]，安城属长沙郡。是时吕岱镇长沙，砀据攸抗拒，为鲁肃攻败，突围回里，正在此时。近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吴简，吕岱名字不止一见，其行事有简牍可证，自是可信。清钱大昭著《东汉郡国令长表》收安成令，而不见吴砀名，应据《吕岱传》补入。本书据《三国志》裴注引《会稽典录》记录曾夏一事，何以《吕岱传》中的吴砀，弃而不录，殊不可解。

唐宋之间贬潮州的大官。韩公为众人研究之重点，有关文献其他尚多可考，兹举李德裕为例，《资治通鉴》记载：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德裕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秋九月甲子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德裕居潮的时间约几个月与韩愈差不多。

德裕莅潮年月，新、旧《唐书》所记颇有歧异，《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八载德裕潮州司马制末题大中元年十二月，可证《旧唐书纪》作七月为误，《通鉴》从《新书·本纪》是也。《南部新书》称其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贬潮州司马或指成行时间。关于德裕之贬死年月，先前有陈寅恪之《辨证》，近有傅璇琮《年谱》之订讹，均足参考。

《李卫公别集》卷四有《到恶溪夜泊芦岛》诗，与谪岭南道中作诗“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同为谪潮时之作。

余弱冠曾妄有著论[②]，于今重省少作，恍如隔世。是年德裕在潮又有《舌箴》，《自序》言戊辰春月戊申夜，宿于洞庭西，仲夏月达于海曲。戊辰为大

① 《资治通鉴》标点本，2136～2138页。

② 见《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第一卷第二期，1936。

中二年（公元848），即莅潮之期，时德裕六十二岁。是年九月德裕再贬崖州司户参军。[①] 是在潮仅正月至九月短暂时间，而有化象潭等故事流传，足与韩公驱鳄事相辉映。

温（庭筠）李（商隐）均有诗伤其南贬。又《李卫公文集·外集》四卷亦称，《穷愁志·序》自言作于崖州，其中有些可能出后人假托。但对南迁的李卫公，有不少史料可以研究，潮汕史稿唐代只举韩愈一人，似嫌过于疏略。

通史所以难写，不是史实铺叙之难，而是史料取舍抉择之难，上面仅举出三个例子，以供商讨。作为读后的一点小小补充，既够不上书评，何况序言，由于此书出版在即，匆匆写此，聊当跋尾小记，尚请指正。

原载《潮汕史》（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① 《唐大诏令集》文年月相同。

饶宗颐教授与“潮州学”

郭伟川

选堂先生是蜚声国际的汉学大师，在学术和艺术上具有多方面的辉煌成就，然其自昔至今始终十分关心家乡潮汕，对于乡邦文献之学和历史文化艺术，倾注了不少心血，作出了极大贡献。今年十二月将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潮州学研讨会”，也是经选堂先生首为之倡和积极推动，在香港潮州商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大和有关各方进行精心策划和筹备，其使“潮州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并将受到深入研究而发扬光大，是必然可期的。

潮州历史文化之成为“学”，当有其根源和特色，这是经二千余年来的酝酿、积渐而逐步形成的，其中包含历代先贤的辛勤劳动。而在地方文献和学术文化的探究上，以近世而论，选堂先生堪称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成就和贡献，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选堂先生对潮州地方志在文献方面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如下若干方面：

一、于三十年代后期，继承其先君饶锷老先生未竟之志，补辑校注《潮州艺文志》，使其得以成为完帙并刊行问世。此书乃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首次进行系统的著作实录，网罗古今，博采众家，遍录自唐赵德《昌黎文录》迄本世纪四十年代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创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集书目千余种，并附作者简介，选堂先生且加精警之评论。所以，这部发端于饶锷老先生，而完成于选堂先生之手的《潮州艺文志》，其内容实际包罗

潮州千余年来的文学、哲学、史学、诗词、文学评论等著作，成为后人探究潮州文化学术史之重要文献。而《潮州志》之包含有《艺文志》，至此在体例上始称完备，此也为饶志超迈前修之处。

二、1936年前后，选堂先生考证潮州湘子桥史料，为撰《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桥之有志，在潮州是史所未有的事。其间先生并撰《韩山志》，惜稿已佚。序例见《固庵文录》。

三、1937年至1938年之交，选堂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省志，期间撰成《潮州丛著》一书，自序中云："予少耽丛残，志存乡献。平居访耆，时有嘉获。前岁冬与纂省志，窥览所隶，苴缀弥多。虽复窜写成篇，而诠弟犹未。今春简暇，稍事整比，先取数篇，刊为一帙。"此书遂为中山大学罗香林教授列为"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由是以一州之乡献遂得弘扬于省垣。

四、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选堂先生暂返故乡潮汕，期间曾对古代潮汕土著畲民进行深入研究。翌年，先生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院研究员，时该校已迁往云南澄江，遂取道鲨鱼涌至香港拟转赴滇，但途中因深入畲族地区作调查研究，竟染上恶性疟疾，大病经月，遂罢入滇之计，在港居停。然而先生这一时期对潮汕畲族之研究，却对粤东先民的源流问题，作了导夫先路的探索。及后，选堂先生于1961年用英文发表《韩江流域之畲民》（*The Shē Settlements in the Han River Basin*，*Kwangtung*）一文，载于香港大学金禧纪念刊上，后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下卷。

五、抗战胜利后，选堂先生于1946年由桂返穗垣，应聘为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年中，即由穗返潮汕主持潮州修志馆，肩负总纂重职。并兼任南华大学文史系主任。至1947年被广东省政府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故经常往返于汕穗之间。其间先生曾东走台湾，调查潮人旅台资料。1948年复亲往潮属揭阳县黄岐山虎头岭勘查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并亲涉兴宁之水口，普宁之大坝后山、铁山、大棚山、苦肠腹、洪山，揭阳之五经富，丰顺之汤坑、潮安之登塘以及饶平之黄岗等地，勘察史前遗址，研究出土文物，比勘自1941年以来韩江流域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存。初稿撰成后，选堂先生曾专为此赴台与东友台湾大学人类学教授金关丈夫、国分直一两教授切磋，付印前，叶恭绰先生及华西大学郑德坤教授又为校阅，可见选堂先生对此文是抱着何等重视及谨慎的态度。1950年，《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终于出版，它不仅是第一篇本地区之新石器考古记录，在该时期，也是广东省首本

考古方面的专书，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1947 年，由选堂先生总纂的民国《潮州志》终告出版。此志以旧府属为范围，但应用新体例、新内容和新形式，用科学的方法分门别类，有关地质、气候、地理、水文诸志，均延聘自然科学家撰稿。而撰写方法也多所变通，特别是对史料的撷采取舍，各专志之编排次序，均极具匠心，“若大事志者，则采提纲旁注之法。户口、交通志，均侈列图表，颇异前规”（见饶志序言）。凡此种种，显示选堂先生能够跟随时代的步伐，为方志开创新体例，增添新内容，使志书不仅发挥乡邦文献之功能，而且起到济世利民的实际作用。而事实也证明，此志书出版后，对地方之人文和建设诸方面，裨益甚多。《潮州志》至选堂先生之手，可谓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七、1965 年，选堂先生将未曾寓目之元《三阳志》（载《永乐大典》）、明嘉靖郭春震志，连同顺治吴颖志及先生自己所编之民国潮志，都为一集，名曰《潮州志汇编》。先生于序言中，述其端绪云：“方志地方史也，亦国史之要删也。……良以桑梓之邦，耳目睹记，以参为验，于所接最亲切者尽心焉，庶乎著手之非难，而持论斯较可信。余自三十以前，颇留心地志之学，既于中山大学参预粤志之修纂，复于新修潮志，忝董其役。……向者囿于见闻，即古潮志之三阳图志，暨嘉靖间郭春震所修志，深以未获寓目为憾。去岁读书南港，始于插架见郭志残本。嗣如东京，悉内阁文库庋有完帙，友人日比野夫教授复影见示。因取嘉靖志合顺治志，益以《永乐大典》所收《三阳志》，及余所纂民国志稿，汇成一帙，用备省览。”全书长达 1270 多页，香港龙门书店 1965 年版。此书合元明清及民国诸志，可谓为古今潮志之集大成者，允称中国方志史上之创体。而其内容涵盖所及，举凡历史沿革、大事记载、地理、交通、气候、水文、地质、农工渔猎、志异丛谈等，共有十五个专志之多。是书对于潮州之人文历史及风土民俗，灿然赅备，允称是潮州文献史上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弥足珍贵。后来香港大学授予选堂教授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在于表彰其纂修《潮州志》之功绩。

八、选堂先生为表彰潮州先贤之令德节概，先后为明代揭阳二志士薛中离、郭之奇撰写年谱，每谱皆五万余字之多。另撰潮州先贤像传三十篇，使乡邦之历史资料与文化精神透过这些乡贤的行状功德而得到发扬光大。

九、选堂先生对潮州韩学研究之推动，不遗余力。1986 年 11 月 30 日，由其倡议，汕头大学、韩山师专和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我国第一次“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市召开，来自美、法、日、新加坡、香港和国

内各地的专家学者70多人参加了这一盛会。选堂先生作为首位主讲人，在讨论会上作了《宋代潮州之韩学》讲演，受到了与会者高度之重视。及后先生又发表力作《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韩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拙编《国际潮讯》在转载此文时，因其重要性而特加编者按："韩愈治潮八月，办乡校，驱鳄鱼，固有功于潮者。然其名位迄宋始显扬，至是江山姓韩，庙祀香火不绝，令誉之隆，并世无二，潮人其何厚于韩愈耶？——饶老此文，钩既泛之史料，提发幽微，指出此乃由于'两宋莅潮官吏，蜀士与闽人，对昌黎崇奉最力，且挟蜀闽之韩集，传入于潮。……而韩公在潮州之地位，亦日益提高'。另者，'此辈名宦，既倡导为韩公建祠缔构以表景慕，倡导者继而复为后人所尊崇，且得与韩公配享，入祀于名宦祠之列'，实质上扬韩亦在于扬己，故倡导者不遗余力；而'韩学与理学相得益彰'，更使韩公在潮地位日隆——其见解之精辟，为前人所未阐发者。而文中人物与史料俱在，尤具说服力，因此是关心乡邦文化和治韩集者不可不读的一篇重要文献。""韩学"研究而今之成为潮流，先生之首倡与推动，实在功不可没。

十、1993年，选堂先生赴澳门参加"中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选堂先生在会上宣读论文《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先生为撰此文，将于1993年年初专程赴潮属饶平县考察，柘林为饶平出海口，先生为弘扬潮汕历史文化，不顾辛劳，风尘仆仆，实在令人仰佩。

以上所举，皆荦荦大者。其他如《华南史前遗存与殷墟文化》，其中引用揭阳、普宁等地之出土文化，与安阳小屯发见之殷代遗存相联系，而推论殷商文化向南传播。《潮瓷说略》一文，乃选堂先生五十年代初所作，日本著名学者小山富士夫十分推崇，特由长谷部乐尔译成日文，刊于日本陶瓷协会机关刊物《陶说》杂志上。潮州宋瓷之得以弘扬日本，乃得力于此文之推介。《潮剧溯源》、《钞本刘龙图戏文跋》和《南戏剧神咒哩啰嗹问题》诸篇，则可窥见先生对潮剧源流及其演进之研究的深厚功力。尤其《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可谓为潮剧理论研究的权威之作。此文从元明戏曲史的角度，考证了潮剧与南戏的关系。先生旁征博引，论证了剧本的语言、声调、节拍乃至戏文的唱法，无不为知者之言，十分令人倾服，且屡为国内外所征引。而《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之出版，也是先生敦请香港潮州商会和香港潮州会馆捐巨资赞助广东人民出版社刊印的。先生对潮州戏剧史所作出的贡献，十分巨大。至于对潮汕先民之探讨，先生也用功甚早。其《说蜑》和《畲瑶关系新证》等篇，则为粤东先民之研究，提供不少翔实之论证，具有十分重要的

史料价值。

选堂先生论潮专著及文章，可说自成系统，而且在客观上，也是“潮州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潮汕历史文化之弘扬，不仅形诸文字，而且在重要的全国性和国际性会议上，更多次发出呼吁，对乡邦文化研究之宣扬，不遗余力。

1989年11月18日，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澳门举行，大会特敦请选堂先生作专题讲座“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先生除在会上精辟地阐述潮州历史文化的源流和演变之外，并特别呼吁国际潮团在联谊之外，“应该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例如设置某些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和奖金，来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①。他的讲演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与关注。

1990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举行，选堂先生专程从香港前往参加，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教授在大会上特别指出：“这次会议，有海内外著名学者饶宗颐老专家、老学者参加。饶老研究的方面广：古代史、敦煌学、方志学、目录学等等，我也数不清了，尤其是自青年期就钻研潮汕文化写出多种撰著，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我们非常佩服。饶老的莅会，为会议增添了光彩，提高了质量。我们仅向饶老致意，表示我们崇敬之情。”②

选堂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从潮州文化历史的角度来说，像此次集全国各地许多专家学者于一堂，以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作为专题进行讨论，从而将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的研究提升至全国性的层次，这可说是潮州历史文化上的空前盛事。”他并着重指出：“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问题，海外与内地一样，都要进行研究。”③ 由于其渊深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选堂先生看问题，往往能从全国性和世界性的角度加以比较和评论。他的许多见解所以不同凡响，显然也缘于此。这是因为站得高，看得远。对于潮汕历史文化的地位问题，他往往也是从比较广阔的层面去加以审视的。而他对如何在海外弘扬乡邦文化，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

1991年9月2日，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巴黎隆重举行，来自香港、

① 《国际潮讯》第十一期，1990年6月。

② 《国际潮讯》第十三期，1991年3月。

③ 同上。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32个潮人代表团和祝贺团，一千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盛全，会议场地设在曾举行七国经济高峰会议的巴黎拉德坊大会堂，法国政府内阁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宗旨和表现出来的凝聚力，赞赏备至。选堂先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了发人深省的演说，他一开始就指出："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巴黎召开，这是海外潮人国际大团结的一件盛事。此次年会首次跨出亚洲，迈向欧洲，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为中国华侨史写下了新的一页，也为亚欧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在讲话中赞扬了法国潮州乡亲在短短数年之间，事业拓展十分迅速，使潮人善于经营的美誉在巴黎被传为佳话。同时指出，整体而论，海外潮人的经济实力十分强大，这是有口皆碑，十分了不起的事。选堂先生最后仍然向大会发出了十分恳切和重要的呼吁："不久前我在香港与杨振宁博士谈及如何以财力去开发智力的问题。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财力与智力的结合，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海外潮人创业有成，财力雄厚，如果能重视智力的开发，以财力去培养智力，那么对乡邦民族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记得在澳门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我曾提出成立'中华潮州文化研究基金'的问题，已经引起我潮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响应。……如果这一基金能够真正成立，其对潮州文化的推动和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鼎力支持，共襄盛举，使潮汕文化能够借助各位的力量，更加发扬光大。"① 选堂先生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随后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施博尔博士应邀登台发言，其中特别提到："饶宗颐教授不仅是我们法国汉学界的老师，而且也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他除高度赞扬选堂先生学术和艺术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对于先生热心弘扬乡邦文化的拳拳之心，也深表仰佩之忱。

1992年11月，选堂先生应邀参加在汕头举行的"潮汕历史文化座谈会"和"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并提出在香港举办"国际潮州学研讨会"的可能性问题，令与会者大为兴奋。及后先生对涉及"潮州学"的若干重要学术问题，从内容至形式，乃至如何物色学有专长的学者参会负责论题主讲等事项，进行深入考虑，精心

---

① 《国际潮讯》第十四期，1991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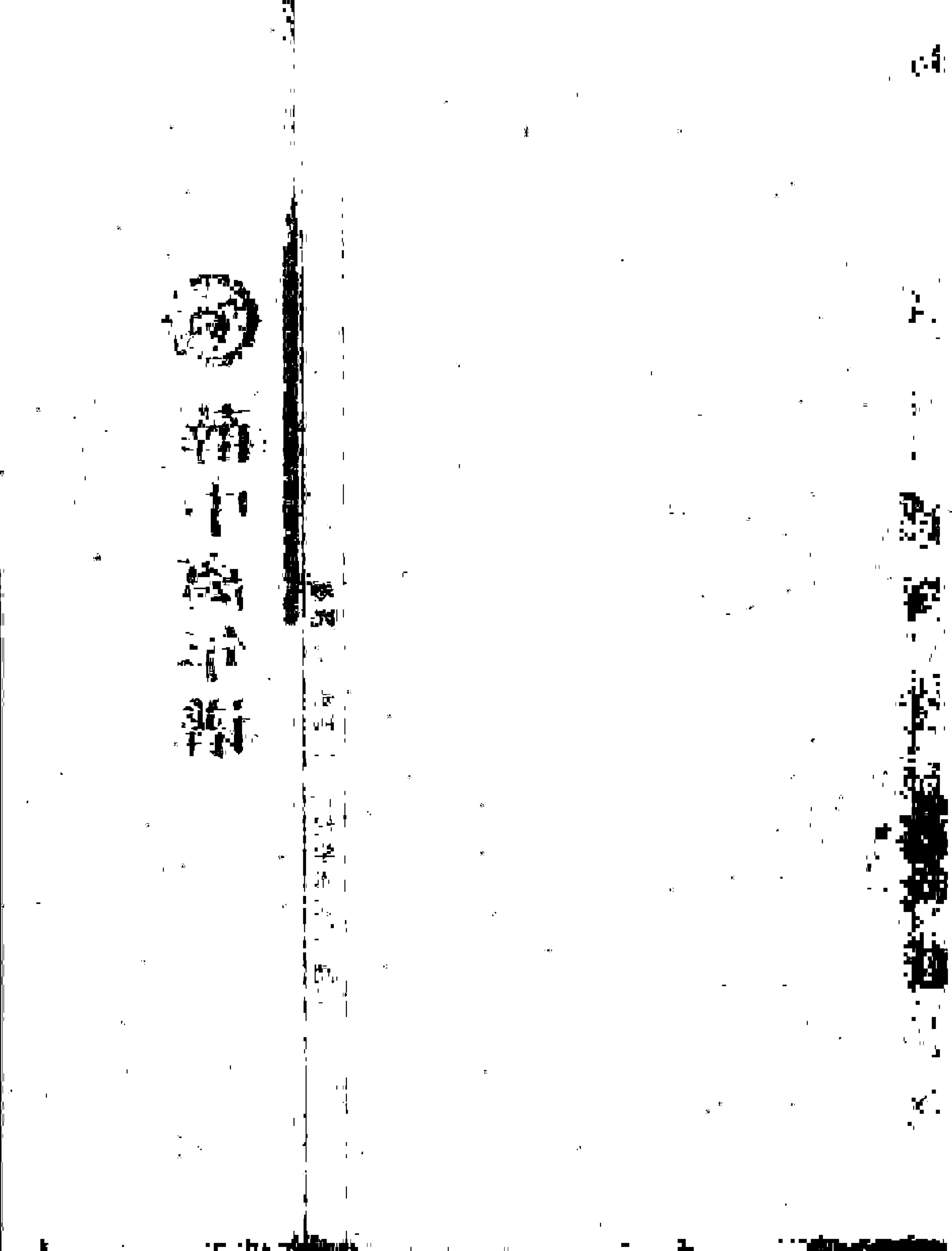
筹划，周章备至。我因自1987年起负责《国际潮讯》编务兼主笔政之后，与先生接触日多。先生才高八斗，文史哲艺皆精，因此其稿件的大力支持，使本刊增色不少，并大大提高其层次与质量。而在治学上，我得以追随先生，聆听教诲，获益良多。日常耳濡目染，习其著作，如入宝库，益知先生学术上之博大精深。而其有关潮州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之论著，虽为饶学之一部分，然已甚具规模，自成系统，足以为“潮州学”奠基。而本文所引选堂先生在历次国内和国际会议上对潮汕文化之弘扬与推动，我因大都参与其役，亲聆其言，并为之整理记录，故缕述如上，以作他日研究“潮州学”与“饶学”者参考之史料。1993年2月22日于香港。

原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卷首，汕头，汕头大学，1996

[illegible]



薛中离年谱



目　录

Preface

All students of the history of Far Eastern thought know that Wang Yang-ming's intuitive, dynamic, and purposive idealism exercis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in China for over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and inspired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1868 Restoration in Japan. He has continued to inspire modern Chinese leaders such as Sun Yat-sen.

Wang's doctriner spread all over China in his own time. The on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ir spread in South China was his pupil, Hsüeh K'an (d. 1545). Hsüch not only recorded part of Wang's conversations that make up the *Ch'uan-hsi lu*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in which his most important doctrines are set forth; Hsüch was also the first one to publish the work. Of far greater importance is the fact that he defended his Master in a bold and constructive way. Wang was vigorously attacked as a Buddhist in Confucian disguise. Instead of denying any Buddhist element in Wang's philosophy, as most of Wang's defenders did, Hsüch frankly admitted the presence of the element of hsü (vacuity, emptincess) in Wang's philosophy but showed how it is truly Confucian in spirit and not Buddhistic or Taoistic, in that it does onto mean nihilism but the concrete, selfless observance of one's moral duties within society.

Hsüeh was a man of great integrity. He applied his Master's doctrine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innate knowledge of the good throughout his life, leading a simple life and devoting many years to lecturing on his Master's doctrines.

Professor Jao's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Hsüch not only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is man. It also gives an excellent picture of Wang's influence in South China. This is the first and only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his. Professor Jao's exhaustive coverage of original sources, his extensive research, and his scholarly and judicious use of the material have resulted in a biography of the highest standard. No serious stud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can afford to overlook this work.

Wing-tsit Chan (陈荣捷),
Professor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Dartmouth College, N. H. , U. S.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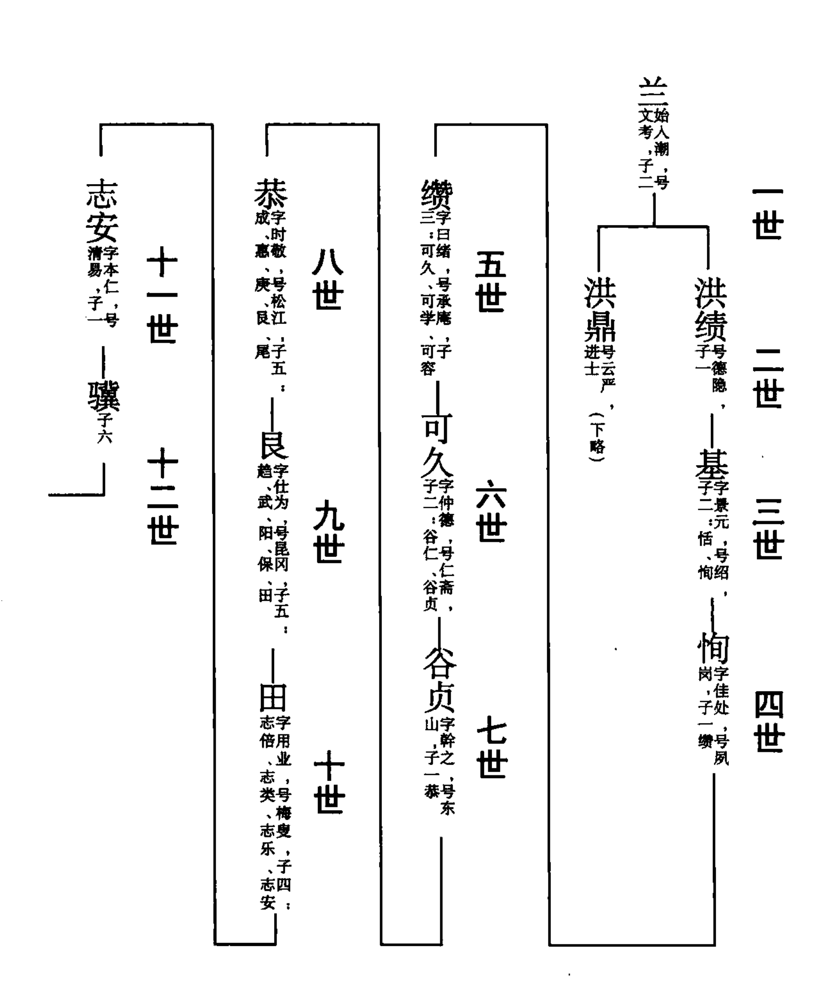
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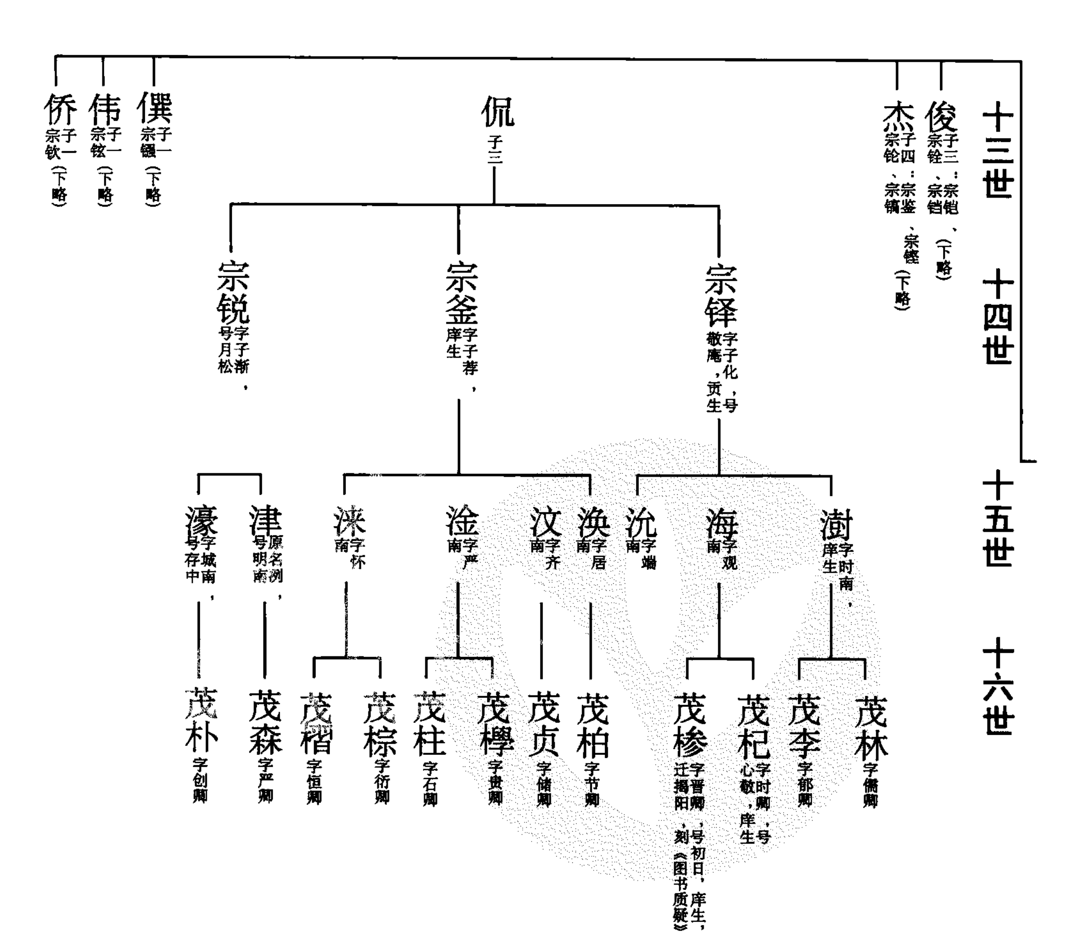
先生讳侃，字尚谦，姓薛氏，曾号钝子，又号常思子（《中离全书》，下简称《全书》）。《知非记》云："有钝子者，性僻而狂，窘于病，与物多忤，仍于思中得惩忿去欲之几，题其斋曰'思斋'。及往省于闽，历常思岭，复觉其思之不常，因号为常思子。"师事阳明先生。

先生以其质虚，赠号中离。后结茅虎山讲学，遂称其山曰中离山。薛侨撰行状曾凿渠于东莆，人呼曰中离溪。《全书·开溪记》一世祖讳兰，字文芳，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始迁于潮，卜居揭阳龙溪之凤陇。（《薛氏族谱》）按龙溪都，明初属揭阳县，为揭邑十三都之一。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析揭之鳄浦、鮀江、蓬州，置澄海县；割龙溪一都隶海阳县。故先生时为揭阳人，殁后十年为海阳人。龙溪今属广东潮安县安龙乡庵埠地。有子二：洪绩、洪鼎。洪鼎字汝器，通《尚书》《三礼》。（《薛氏族谱》）宋宁宗嘉定四年辛未（1211）赵建大榜进士。（光绪《海阳志》十三《选举表》）洪鼎遗迹，今存白云岩题字，在桑浦山，即梅林湖西之石牛头山径口，字大一尺五寸，署款宝庆三年（1227）三月日进士薛洪鼎书。洪鼎修白云岩，别号云岩山人。四世讳恬与恂者，伯仲俱志行高洁，子孙蕃衍。人因其姓，名其居里曰薛陇。（罗万杰《薛氏迁凤廓祠记》）按《全书》十一《薛靖轩传》云："居陇上，姓薛氏，人称为薛陇，亦曰凤里。"（见先生《行状》）先生高大父讳良，字仕为，号昆冈。曾大父讳田，字用业，号梅叟。大父讳志安，字本仁，号清易，代有隐德。父讳骥，字孔乘，号让斋，以先生贵，赠文林郎行

人司司正。继以先生弟侨贵，加赠奉政大夫兵部郎中，母曾氏加赠太宜人。（《行状》）先生昆季六人：长俊，字尚哲，一字尚节，号靖轩。弘治甲子（1504）亚魁，仕终国子监博士。以子宗铠贵，赠刑科右给事中。次杰，字尚弼，恩授七品散官。次即先生。次僎，字尚勉，恩授将仕郎。次伟，字尚英，太学生，以诗名。又次侨，字尚迁，号竹居，嘉靖癸未（1523）进士，兵部郎中，改春坊司直，兼检讨。先生配黄氏，生子三：长宗铎，字子化，号敬庵，国子生。次宗釜，字子荐，号笔山，治《尚书》，补邑庠生，与讲一真，刊行父书，为士林所重，娶杨骥女。季宗锐，字子渐，号月松，庠生，娶翁万达女弟。女一，适通判唐泽。《海阳县志》选举表：唐泽，正德五年（1510）庚午科举人，与中离同科。泽字东湖。（见《行状》）

薛氏谱系


一世
兰二 始入潮，号文考，子二
二世
洪绩 号德隐，子一
洪鼎 号云严，进士 （下略）
三世
基 字景元，号绍，子二：恬、恂
四世
恂 字佳处，号夙岗，子一缵
五世
缵 字曰绪，号承庵，子三：可久、可学、可容
六世
可久 字仲德，号仁斋，子二：谷仁、谷贞
七世
谷贞 字幹之，号东山，子一恭
八世
恭 字时敬，号松江，子五：成、惠、庚、艮、尾
九世
艮 字仕为，号昆冈，子五：趋、武、阳、保、田
十世
田 字用业，号梅叟，子四：志倍、志类、志乐、志安
十一世
志安 字本仁，号清易，子一
十二世
骥 子六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俊
子三：宗铠、宗铨、宗锴（下略）
杰
子四：宗鉴、宗镫、宗铊、宗镝（下略）
侃
子三
僎
子一
宗镪（下略）
伟
子一
宗铉（下略）
侨
子一
宗钦（下略）
宗铎
字子化，号敬庵，贡生
宗釜
字子荐，庠生
宗锐
字子渐，号月松
澍
字时南，庠生
海
字观南
沆
字端南
涣
字居南
汶
字齐南
淦
字严南
涞
字怀南
津
原名洌，号明南
濠
字城南，号存中
茂林
字儒卿
茂李
字郁卿
茂杞
字时卿，号心敬，庠生
茂椮
字晋卿，号初日，庠生，迁揭阳，刻《图书质疑》
茂柏
字节卿
茂贞
字储卿
茂欅
字贵卿
茂柱
字石卿
茂棕
字衍卿
茂榗
字恒卿
茂森
字严卿
茂朴
字创卿

年　谱

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　一岁。

六月二十九日戌时先生生。（《行状》）

按：先生长兄俊，生于成化十年甲午（1474）九月二十七日。二兄杰，生于成化十三年（1477）丁酉八月初五日。详《薛氏族谱》。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1488）　三岁。

弘治二年己酉（1489）　四岁。

八月十三日四弟僎生。（《薛氏族谱》）

八年乙卯（1495）　十岁。

十月十八日五弟伟生。（《薛氏族谱》）

十一年戊午（1498）　十三岁。

三月初一日侄宗铠生。（《薛氏族谱》）

六月二十八日翁万达生。（《稽愆集》卷首）

十三年庚申（1500）　十五岁。

先生自幼受学于兄俊，天资颖迈，（《行状》）性僻而狂。年十五就学，始知天地间有大人君子一等事业，心窃慕之，得格言懿行，辄识于壁。（《全书》十一《知非记》）

按《薛氏族谱·让斋公传》云："乡有陈琨者，博学善士。公遣子从游，文行使取则焉。而陈督六子皆成名。"则先生蒙父兄之教也深矣。

七月初十日六弟侨生。（《薛氏族谱》）

十四年辛酉（1501）　十六岁。

年十六，闻讲《中庸》，心遂志圣贤之学。（郑三极《研几录序》）

十七年甲子（1504）　十九岁。

先生补郡弟子员。（《行状》）

兄俊领是科乡荐（《海阳吴志·选举表》）中乙榜。（《全书》十一《薛靖轩传》）

九月十二日父让斋公卒。（《薛氏族谱》）让斋公遘疾，先生尝粪以验，比弃禄养，哀毁尽礼。水浆不入口者数日。事母益谨。（《行状》）

让斋公生于景泰三年壬申（1452）九月二十二日申时。卒于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九月十日午时，享年五十三。（见《薛氏族谱》）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　二十岁。

友人郑一初成进士。

一初字朝朔，揭阳人，读书紫服山，因号紫坡。乙丑登进士，后告归。率子姓宗族事耕读。（《全书》一一《郑紫坡传》）

武宗正德二年丁卯（1507）　二十二岁。

十月二十六日长子宗铎生。（《薛氏族谱》）

正德三年戊辰（1508）　二十三岁。

兄俊授连江训导。（《薛谱家传》）

正德五年庚午（1510）　二十五岁。

中亚魁。（《薛谱家传》）《海阳县志·选举表》云：侃正德庚午科举人。刻文以传。主司争欲先生为首选，及见先生曰：大才即宜北上。（《行状》）

题斋曰“思斋”。（《知非记》）

八月，刘瑾伏诛。郑一初起为试御史。（《紫坡传》）

六年辛未（1511）　二十六岁。

冬，阳明在铨司，郑一初因陈世杰请受学（《传习录》栏外语），日与徐横山、顾箬溪问质究竟，始闻圣人之学。（《紫坡传》）

《传习录》上郑朝朔问“至善”一条云：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王阳明全书》一）

> 按《阳明年谱》引《同志考》：壬申，顾应祥、郑一初、徐爱等同受业，潮人入王门者，当以一初为首。考阳明祭一初文云：“辛未之冬，朝于京师，君为御史，余留铨司，君因世杰，谬予是资，予辞不获，抗颜以尸。”（《王阳明全集》三十三、三十五）是一初事阳明在辛未，不在壬申也。

八年癸酉（1513）　二十八岁。

上春官，过南畿，见河经自洛，泗水出于邳，秋风夜月，蓬斗清辉，瞿然而动，百度皆有自新之意，因作《知非记》。（文见《全书》十一）

冬，先生友人杨骥创东津精舍，号曰玉林。

杨鸾《玉林寻乐记》云：“玉林，津头之一林也，面黄田，带韩江，背金山……为亩二十有奇。……盖闻白沙诗曰：‘海上花开万玉林。’古词有之：

‘云是玉林人，人闲共此清。’斯地称之，故因以为名。”

九年甲戌（1514）　二十九岁。

五月，王阳明在南京，（《阳明年谱》）阳明于四月升南京鸿胪寺卿。先生往师之。

先生是岁赴南宫不第，闻阳明官南畿，讲孔孟周程之学，遂就南监师事焉，服良知之教（《行状》），是为先生隶王门之始。时先生同门徐爱、黄宗明、马明衡、陆澄、季本等皆来聚，日夕渍砺不懈。南畿论学，重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阳明年谱》一）

七月壬戌朔，郑一初道卒于杭，阳明为文哭之。

文云：“维正德九年，岁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鸿胪寺卿王守仁，驰奠于监察御史亡友郑朝朔之墓。呜呼！道之将行，其命也与！道之将废，其命也与！呜呼朝朔，命实为之，将何如哉！将何如哉！……君尝问予，圣学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则是。隐辞奥义，相与剖析，探本穷源，夜以继日。君喜谓予：昔迷今悟，昔陷多歧，今由大路。呜呼绝学！几年于兹。孰沿就绎？君独奋而。古称豪杰，无文犹兴。有如君者，无愧斯称。当是之时，君疾已遘；忍痛扶孱，精微日究。人或劝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与世杰，访予阳明。君疾亦笃，遂留杭城，天不与道，善类云倾。”（下略）（见《阳明全书》二十五）

紫坡性善饮，能多而不乱，后知戒而内伤已积，以疾告归，淑后进以明正学。抵杭，疾遽不起。（《全书》十一《紫坡传》）

先生有《祭郑侍御文》。（《全书》十二）

十年乙亥（1515）　三十岁。

兄俊升玉山教谕。（《海阳县志》列传）

按：玉山亭在江西上饶县东北，以境有怀玉山，故名。《薛谱家传》作丙子升玉山教谕，则在翌年。

先生益笃于学。

按：《行状》云："三十守益定，举业益精，累试监元，大司成汪公器重之。爰阁笔砚，惟笃志学问，若将终身焉。"

杨思元来学于阳明。

阳明有《书杨思元卷》云："杨生思元，自广来学，既而告归。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闻之。惧不克任，请所以砭其疾者而书诸绅。予曰：子强明者也，警敏者也。强明者病于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于浅陋，是故浮而不能实。砭子之疾，其谦默乎！谦则虚，虚则无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则慎，慎则无不密，是故积而愈坚，诚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谦者也；少见而自炫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恶之，自炫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吾恶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观人而必自省也。其谦默乎！"（《阳明全书》）

按：思元杨琠子，琠龙溪人，与弟玮俱师事陈白沙。正德戊辰（1508）进士，官监察御史，著有《庭训录》，阳明为之序。

十一年丙子（1516） 三十一岁。

兄俊初事阳明。九月，阳明巡抚南赣汀漳。（《阳明年谱》一）过玉山。（《揭阳县志·贤能》俊传）俊遂执弟子礼，问行己之要。阳明曰："自尚谦与予游，知子笃行久矣，试自言之。"俊曰："俊未知学，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范围耳。"阳明曰："依理而行是理与心犹二也。当求无私行之，则一矣。"自是所学日进。（《海阳县志》俊传）

秋，杨骥、杨鸾兄弟领乡荐。（《海阳县志·选举表》）拜湛甘泉于荷塘（《全书·杨复斋传》作"莲塘"），有忘归意。鸾先归，理旧业于玉林。（杨鸾《玉林寻乐记》）骥则会试入京师，遇先生，闻阳明之教，遂赴赣州。

数月有省，驰简示知友云："古人致知工夫，自是直截易简，视后支离，茫无可入，大径庭矣。"（见《全书》十一《毅斋传》）又有《与弟士鸣书》云："近处泉石嘉趣，名师益友，此千载奇会。当知百年内，这等光阴不可多得，务尽去平日旧习，直从一念好善良心，真切发见处，卓然立起，不为耳目玩好所摇夺，使日切一日，必期表里透彻而后已。……来书谓无定性，甚中今日之病。凡人临事不能静者，只务外为人之心胜，能于此持醒此心，将名货声色诸病一齐攻下，无有闷心之意。当时潇洒自在，《复斋号说》议论自

胸流出，立志之坚，向道之勇，服膺不失，即不远复，是亦颜子而已！来归一事，非无是念，但以二十四年之旧习，一旦得闻先生至教，仅掇粃糠，未能脱然自立；遽舍而归，必为流俗旧染所汩，成无日矣。”

《传习录》上有士德问格物一则：“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公文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阳明全书》一）

十二年丁丑（1517）　三十二岁。

先生登进士第。（《海阳县志·选举表》云：“由揭阳学。”）

王阳明在赣州，有《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书》云：“闻诸友皆登第，喜不自胜。非为诸友今日喜，为野夫异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竟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非黏泥贴网，恐自主张未得。不知诸友却何如？想平时工夫之须有得力处耳。”（《阳明全书》四）

又有《与顾惟贤书》云：“闽寇虽平，而虔南之寇，乃数倍于闽。善后之图，尚未知所出。……”曰：“仁近方告病，与二三友去畊霅上。霅上之谋，实始于陆澄氏。陆与潮人薛侃皆来南都从学，二子并佳士，今皆举进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阳明全书》二十七）又《与黄诚甫书》云：希颜、尚谦、清伯登第，闻之喜而不寐。（《阳明全书》二十七）

旋告归侍母于玉山。先生既登第，自谂曰：仕以行道，吾斯未信。乃告归，过怀玉。时太宜人就养兄俊官邸。（《行状》）

《全书》八有《书怀玉王翁本仁序》云：“丁丑日南至，予就省怀玉官邸，庠友方子夔、李子珠、徐子佑征言以寿。”先生将归，阳明贻先生及杨骥书云：“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某向在横水，尝寄书士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数日来谅已得必胜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质，诚可与共学。

此时计已发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廨中事以累尚谦，想不厌烦琐。小儿正宪，犹望时赐督责。”（《阳明全书》四）

按：此文《阳明全书》云丁丑，而《年谱》系于戊寅正月征三浰时。考书中云“向在横水”，阳明平横水诸寇，在是年十月，则当是冬杪。作书时，先生归省在玉山也。

杨鸾延陈明德讲学玉林。

是年春，鸾及龚、谢二友延致海涯先生于玉林，讲明正学。复得刘大章、廖朝肃、郑大衷交相丽泽；又得邱、饶二友讲学，王政斋辈亦往来，各遗珠玉。（《玉林寻乐记》）明德字思准，号海涯，海阳辟望（今隶澄海）人。闻白沙倡道东南，遂弃举子业苦心砺行，迨中离归自虔，始闻精一之旨。（《全书·陈海涯传》）

十三年戊寅（1518）　三十三岁。

春，阳明在赣，征三浰诸寇，至四月班师。（《阳明年谱》）有与先生书三首。

其一云：“沿途意思如何？得无亦有走作否？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辨义利。若于此未有得力处，却是平日所讲，尽成虚语，平日所见皆非实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经一蹶者长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为后日之得。但已落第二义。须从第一义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这些子既是，更无讨不是处矣。此间朋友聚集渐众，比旧颇觉兴起。尚谦既去，士德又往，欧阳崇一病归，独惟强留此，精神亦不足。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于接济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谦更静养几月，若进步欠力，更来火坑中乘凉如何？”

又一云：“得书，知日孚停舟郁孤，迟迟未发，此诚出于意望之外。日孚好学如此，豪杰之士必有闻风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见太和报效人，知欧、王二生者至，不识曾与一言否？欧生有一书，可谓有志，中间述子晦语颇失真，恐亦子晦一时言之未莹尔。大抵工夫须实落做去，始能有见，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误误人者矣。此闻贼巢，乃与广东山后诸贼相连，余党往往有从遁者，若非斩绝根株，意恐日后必相联而起，重为两省之患。故须更迟迟旬日，与之翦除。兵难遥度，不可预料，大抵如此。小儿劳诸公

勤勤开诲，多感多感！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验之果何如耶？正之闻已到，何因复归？区区久顿于外，徒劳诸友往返，念之极切悬悬。今后但有至者，须诸君为我尽意吐露，纵彼不久留，亦无负其来可也。”

又一云：“日来因兵事纷扰，贱躯怯弱，以此益见得工夫有得力处。只是从前大段未曾实落用力，虚度虚说过了。自今当与诸君努力鞭策，誓死进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馆郁孤，恐风气太高，数日之留则可，倘更稍久，终恐早晚寒暖欠适。区区初拟日下即回，因从前征剿，撤兵太速，致遗今日之患。故请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后之罪今，亦犹今之罪昔耳。但从征官属已萌归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说。天下事不能尽人意，大抵皆坐此辈，可叹可叹！闻士德失调，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则身病亦自易去。纵血气衰弱，未便即除，自亦不能为心患也。小儿劳开教，驽骀之质，无复望其千里，但得帖然于皂枥之间斯已矣。门户勤早晚，得无亦厌琐屑否？不一。”（以上俱见《阳明全书》四）

先生偕兄俊、弟侨及侄宗铠辈来赣。先生居玉山数月，承颜顺志，孝养弥纯。一日，太宜人曰：吾闻孝以养志为至，儿能尽孝致居行道泽民，是吾志也。吾安汝兄养，亟再往虔，再侍阳明，以终汝所学。兄俊曰：是宜从命。乃催侨暨诸侄往，处于虔者年余。（《行状》）

阳明有《与陆元静书》云：“尚谦至，闻元静志坚信笃，喜慰莫逾！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乃今得还故乡，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寻平路，可以直去康庄，驰骋万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云云。系于戊寅，即作于先生再回赣时。（《阳明全书》四）

时阳明出入贼垒，未暇宁居。先生与同门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杨骥、郭治、周仲、周冲、周魁、郭持平、刘道、袁梦麟、王舜鹏、王学益、余光、黄槐密、黄鍪、吴伦、陈稷刘、鲁扶黻、吴鹤、欧阳昱，及兄俊、弟侨、侄宗铠，相与讲聚不散。（《阳明年谱》一）阳明提督军务，忘其冗剧。先生与友骥、元享、惟乾、郭浅斋、梁众峰复日进请益发明，以迪初学。风声鼓动，四方学者远集，沨沨乎洙泗之遗，大有功于师门也。（《行状》）四月丙戌，阳明为先生母题遥祝图。（《薛氏族谱》）

七月阳明刻古《大学》，复刊《朱子晚年定论》。（《阳明年谱》一）

按：《定论》卷末有正德戊寅（1518）六月雩都袁庆麟跋云：“揭阳

薛君尚谦旧录一本，同志见之，至有不及钞写，袖之而去。众皆惮于翻录，乃谋而寿诸梓”云云。是阳明《朱子定论》，乃初为先生手录也。钱德洪云：“《定论》首刻于南赣。隆庆壬申（1572），虬峰谢君廷杰刻师《全书》，命刻《定论》附《语录》。”今《阳明全书》《朱子定论》附刊《传习录》后，远溯其源，盖肇于此。

八月先生刻《传习录》。

是年徐爱卒。先生得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阳明年谱》）

按《阳明年谱》云：《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嘉靖三年（1524）十月，南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考《传习录》明时前后凡数刻，计有：

薛本：即正德十三年（1518）中离先生刻于虔州者。凡三卷，第一卷徐爱录，第二卷陆澄录，第三卷为先生录。编者徐爱，所录为阳明中年语。

欧阳本：凡二卷、一百七十一面，欧阳德刻，见《明南雍经籍考》下，付刊年月未详。

南本：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增刊，多阳明晚年语。〔日本佐藤一齐《传习录》栏外书云：南元善兄弟校《传习录》二册，嘉靖二十三年（1544）德安府重刊本，上册分为四卷：第一徐曰仁录，第二陆原静录，第三薛尚谦录，第四为答欧阳崇一书一首，答聂文蔚书三首。下书四卷。第一至第三为书札，第四为《示弟立志说》四则，《训蒙大意》六则。上册讨论书系门弟子旧录，下册四卷则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续而刻之是也。〕此本嘉靖二十三年（1544）重刻于德安府。

钱本：钱绪山刻。以南本下卷采摭书移入文录，而别摘文录问答语补之。附以陈惟濬、黄省曾所述，汇为续录，初刻于荆，名曰遗言，后芟汰繁芜，刻于宁国。

此外福州及桂之南宁亦有刻本（见周弘祖《古今书刻》），要以先生所刻为最早。《传习录》旧有七卷（见《百川书志·经志》类）、四卷（见《绛云楼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今通行本分上中下三卷。（《阳明全书》及日本松山堂本同）先生所录，概在上卷（当时先生所刻《传习录》三卷本，即全在此上卷中）。据松山堂本标明，右尚

谦所录者计三十五条。(《阳明全书》则不标明)其第一条侃问持志如心痛。据佐藤云:南本无之。分后侃问条以下为上卷三,此条恐系绪山所补者。凡先生手述各条备载《传习录》,兹但揭先生与阳明问答七条于下,以见当日师弟讨论问题,余则摒不采云。

一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一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曰:"何谓知学?"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一问: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驱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曰:"毕竟物无善恶。"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着、习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恶恶

臭’，则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先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驱壳起念?”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什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什么心?”

一问：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一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一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一问：“子夏门人问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此外先生所问见于陆元静所录者，又有一条云：“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阳明全书》一)

介乡人余善及阳明之门。

善字崇一，号土斋，潮阳人，从白沙游，操履端确。正德戊寅(1518)应贡北上，遇先生于南监，因入见阳明。(《全书》十一《余土斋传》)

十四年己卯(1519)　三十四岁。

夏，仍在玉山，杨骥来共论学。

初，骥偕先生归自赣，发明合一之旨，锐浣旧习，直培本根，以圣人为必可师，万物皆吾一体，一时士友翕然兴起。己卯，复往卒业，值洪都之变，冗攘不复追侍，适先生省亲怀玉，同处庠舍，砥砺日进。(《全书》十一《杨毅斋传》)

按：宸濠之乱在六月，据传则夏间先生尚在玉山也。

先生北归。(《全书》十九《乡约序》)

按:《行状》云:"先生亲师取友,凡六年始归。先生师事阳明,在甲戌之岁,至是恰六年。"

议行乡约。

初,阳明于戊寅十月倡举乡约。(《阳明年谱》一)先生北归,乡族有久讼者,为解息之,告以行约之意,约为十事,呈府给照。(《全书》十九《乡约序》)立齿德者数人为约长约正,劝善惩恶,乡闾化之。(《行状》)

兄俊聘典云南考官。(《薛谱家传》)

十五年庚辰(1520)　三十五岁。

先生居乡,与杨氏兄弟讲学金山之麓。

按《全书·陈海涯传》云:"中离归自虔,始闻精一之旨,毅斋邀处北山精舍,三年乃豁然。"薛雍《金山读书记》云:"潮廓有金山,玉华书院在焉。有精舍、有玉华堂、有北山书屋。"据杨鸾《玉林记》,杨氏有旧庐在金山下。而杨氏昆季三人,长凤号北山(见薛侃《三贤墓志》),所谓北山书屋,其杨氏之居欤?光绪《海阳县志·古迹》:玉华书院在金山,明天顺中知府陈瑄建,延邑人陈明德讲学于此。

结斋于梅林(即梅林湖)。

率群子姓而教之曰:德业进则举业精。三年间,游其门者日益众,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淬涤瑕垢,而甄陶乎德业,津津如也。(《行状》)

友人杨骥卒,是春骥以疾驰归,病革犹讲学弗辍,拱手正衾而逝。(《全书·杨毅斋传》)年三十七。(《三贤墓志铭》)

阳明有《奠杨士德文》云:"呜呼!士德之资,精一之志,笃信往勇,真足以任重致远,亦既有闻矣。忽中道而夺之,天也,吾谁归咎乎!士德素多病,得去冬怀玉书云:'扶病还潮。'谓亦常耳。秋初,士鸣过赣,凶变适传,且疑且愕,谓为不信。既而尚谦报至,而果然矣。呜乎痛哉!其之不幸,往岁曰仁之恸,吾已不忍其烈;今复恸吾士德,其何以堪之。昔尚谦为吾言,潮有二凤,盖指士德昆季也。后皆相继为吾得,自以为斯文之瑞,而今失其

一矣，鸣呼伤哉！士鸣归，聊附一奠，痛哉士德，今日已矣，复何言！复何言！（见《饶平县志》二十艺文。原书误作奠少默，《阳明全书》缺。）

骥弟鸾下第，见阳明，闻兄讣，遂南归。（《全集·复斋传》）

十六年辛巳（1521）　三十六岁。

先生还京（何维柏撰《传》），授行人司行人。（《礼部议谥策》，《薛氏族谱》同）

按《明史》本传云："世宗立，授行人。"是年阳明有《与士鸣杨鸾书》云："差人来，知令兄已于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无由一哭，伤哉！所委志铭，既病且冗，须朋友中相知深者一为之，始能有发耳。喻及'日用讲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扩充以尽其本体，不可迁就气习以趋时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诚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业安得而不富有！谓'每日自检，未有终日罕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间断。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辈文字同异，工夫不合，常生疑虑。'又何为其然哉？区区所谓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谓之知道，得此者，方谓之有德。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虽千魔万怪，眩瞀变幻于前，自当触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阳一出，而鬼魅魍魉自无所逃其形矣。尚何疑虑之有，而何异同之足惑乎！所谓'此学如立在空中，四面无倚靠，万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来，不容一毫增减。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虽言苟时有未莹，亦是士鸣见得处，足可喜矣。但须切实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说，未免亦是议拟仿象，已后只做得一个弄精魄的汉，虽与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为病痛，一而已矣。诗文之习，儒者虽亦不废，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组织，未有不起于胜心者，先辈号为有志斯道，而亦复如是，亦只是习心未除耳。士鸣既知致知之说，此等处自当一勘而破，瞒他些子不得也。（《阳明全书》五）

冬，过越，聚同门于会稽书院，讲学数月。（《行状》）据《阳明年谱》阳

明于是年八月至越。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1522）　三十七岁。

在京师。（王渐逵撰《墓志》）

弟侨以《尚书》登是科第六名。侄宗铠亦于是年领乡荐。（《薛氏族谱》）

兄俊聘典湖广。（《薛谱家传》）

二年癸未（1523）　三十八岁。

春，先生在越。时阳明丁外艰在越，先生与同门邹守益、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讲，为讲“乡愿”一章。（《阳明年谱》）

请问乡愿狂者之辨。曰：“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举裁。”曰：“乡愿何以断其媚世？”曰：“自其讥狂狷而知之，狂狷不与俗谐，而谓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乡愿志也。故其所为，皆色取不疑，所以谓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洁，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虽欲纯乎乡愿亦未易得，而况圣人之道乎？”曰：“狂狷孔子所思，然至于传道，终不及琴张辈而传曾子，岂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张辈狂者之禀也，虽有所得，终止于狂。曾子中行之禀也，故能悟入圣人之道。”（《阳明全书》三十五）阳明又有《与黄宗贤书》曰：“近与尚谦、子莘、宗明讲《孟子》‘乡愿狂狷’一章，颇觉有所警发，相见时须更一论如何？四方朋友来去无定，中间不无切磋砥砺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担荷得者，亦自少见。大抵近世学者无有必为圣人之志。闻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善善！但论议之际，必须谦虚简明为佳，若自处过任而词意重复，却恐无益有损。”（《阳明全书》五）

阳明又与先生书论轻傲及士鸣、海涯事云：“承喻‘自咎罪戾，只缘轻傲二字累倒’。只知用力恳切。但知得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熟味！此是孔门正法眼藏，从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说卒入于支离。

士鸣过虔殆常与细说，不审间中曾论及否？谕及甘泉论士德处，殆一时竟有所向而云，抑亦未见其止之叹耳。士德之学，未敢便以为至，即其信道之笃，临死不贰，眼前曾有几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钳’，正恐同辈中亦未见有能如此者也。书来，谓士鸣、海涯大进此学，近得数友皆有根力，处久当能发挥。幸甚！闻之喜而不寐也。海涯为谁氏？便中寄知之。”（《阳明全书》五）

阳明又有《与杨骛书》二通：“别后极想念，向得尚谦书，知士鸣工夫日有所进，殊慰所期。大抵吾党既知学问头脑，已不虑无下手处，只恐客气为患，不肯实致其良知耳。后进中如柯生辈，亦颇有力量可进，只是客气为害亦不小。行时尝与痛说一番，不知近来颇能克去否？书至，来相见，出此共勉之。前辈之于后进，无不欲其入于善，则其规切砥砺之间，亦容有直情过当者，却恐后学未易承当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为仇者，有矣。往往无益而损，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诱掖奖劝之。往时亦尝与士鸣论及此，想能不忘也。”“前者是备录区区之语，或未尽区区之心，此册乃直述士鸣所得，反不失区区之见，可见学贵乎自得也。古人谓‘得意忘言’，学苟自得，何以言为乎？若欲有所记札以为日后印证之资，则直以己意之所得者书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辞，反有所不达也。中间词语，时有未莹，病中不暇细为检点。”（上俱见《阳明全书》五）

兄俊升国子监博士。（《薛氏族谱》、《全书·薛靖轩传》）

弟侨及侄宗铠联登是科姚涞榜进士。（《潮州府志》、《海阳县志·选举表》）侨改国子监助教，继升工部主事。宗铠授贵溪令。（《薛氏族谱》）

三年甲申（1524）　三十九岁。

先生归养。奉使湖广，掌行辽恭王祀礼。事竣，便道入潮。（《薛谱家传》及《行状》）母曾太夫人卒。

七月二十二日，兄俊卒，年五十一。（《薛氏族谱》）俊病，闻母丧，荤浆不入口。奔走贵溪、宗铠官邸而卒。（《全书·靖轩传》）葬海阳东厢都九郎山。

阳明有《祭文》云：“呜呼！良知之学不明于天下，几百年矣。世之学者，蔽于见闻习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无假于外也。皆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纷纭交骛，以私智相高，客气相竞，日陷于禽兽夷狄而不知。间有独觉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则又群相诟笑，斥为异学。呜呼，可哀也已！

盖自十余年来，而海内同志之士稍知讲求于此，则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灭，未见其能光大也。潮阳在南海之滨，闻其间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与见。间有来相见者，则又去来无常。自君之弟尚谦始从予于留都，朝夕相与者三年，归以所闻于予者语君，君欣然乐听不厌，至忘寝食，脱然弃其旧业如敝屣。君素笃学高行，为乡邦子弟所宗依，尚谦自幼受业焉。至是闻尚谦之言，遂不自知己之为兄，尚谦之为弟，己之尝为尚谦师，而尚谦之尝师于己也。尽使其群子弟侄来学于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胜其有我之私而果于徙义者，孰能与于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则实君之昆弟之为介也。其有功于斯道，岂小小哉！方将因籍毗赖，以共明此学，而君忽逝矣，其为同志之痛，何可言哉！虽然，君于斯道亦既有闻，则夕死无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为长号涕洟而不能自已者，为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风寄哀，言有尽而意无穷。呜呼，哀哉！”（《阳明全书》二十五）

服阕，结茅中离山，以正学接引，潮士为之一变。（《薛谱家传》）

黄佐《中离山记》云：“中离山之名，古未有也。其得名于时，则自中离先生始。盖天壤间物无常主，时焉而已矣，时至则名因主而始彰。是故濂溪之得名以周濂溪主之，象山之得名，以陆象山主之，倡时道学，照映今古。由今视昔，离山之得名，非以薛中离为之主乎？故曰：天地间物无常主，时焉而已矣，时至则名因主而始彰。且中离之说，昉于谁乎？余尝读《易》至离卦，而知中离之义矣。夫中离一中虚而外实，体柔而用刚。故《易》于离卦曰：‘离，利贞亨。’《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乎四方。’而程传以为阴丽于上下之阳，取其中虚则为明义。朱子《本义》曰：‘阴丽于阳，其象为火，体阴而用阳也。’中离山之义，盖本诸此。夫丽易至于不正，丽而正焉，则教泽之在离山，见于当时，垂于后世，与‘重明以丽乎正，乃化天下’、‘大人以继明照乎四方’者何异哉？聚处四方生徒，讲明正学于时，竹居子筑东山之岩曰一真岩，东泓子筑石门之麓曰大中岩，三山并耸，中通外直，有似于离，遂名曰‘中离山’。迹其形胜，登山则有迎仙桥、步云阶之异，入门则有中离洞、会讲堂之奇。以观天文，云中层、偃月窝可观也；以察地理，观海亭、望陆坛可赏也。至于酌清泉以自洁，则活水流觞之亭建焉；茂对时以育物，则莲塘钓矶之台筑焉。他如岩前岩后，奇峰耸秀，则有联句

十八景寓焉。此盖离山之大观也。余叨年谊，受中离先生教益不浅。今中离往矣，乃弟竹居命中离仲子宗釜来谒请记。余尝思之，中离学有渊源，师靖轩，宗阳明，以忠信不欺为主本，以良知良能为实学，其有得于孔孟正传之深者乎！盖其学本至诚，未有诚而不动者。当时名宦若季彭山、刘晴川诸君，日诣离山，互相讲论；乡士大夫若黄子国卿、成子子学、郭子维藩、林子光祖、杨子日赞、杨子惟执，处士若陈明德、郑万化，罔不离山是游，景行行止。而士之以文学显、以德行称者，彬彬多出其门；中离子孙，亦皆心学相传、科第流芳，方兴而未艾也。虽然，方今道学大朗，人心复古，中离一倡群和，皆有志于圣贤之学，而独能穷其秘。此所以擢巍科，擅芳誉，而名重于天下。回视濂溪，象山，至今耿耿不磨，殆异世而同符矣。余得离山形势之奇，而又感于一时相与倡明道学之盛，故特详为之说，以传不朽焉。”（《揭阳县志》）

阳明去越，辟稽山书院。先生侄宗铠及杨鸾、黄梦星皆来学。

《阳明年谱》云:“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杨士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泰、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在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止于至善。”（《阳明全书》三十四）

按《复斋传》云：“庚辰下第见阳明先生，遂领大意，得毅斋讣南归。……率徒百余师事海涯于玉林，磨切汲引。……丙戌，上春官。”不载甲申从阳明于越事。

阳明《书黄梦星卷》云：“潮有处士黄翁保号坦夫者，其子梦星来越从予学。越去潮数千里，梦星居数月，辄一告归省其父；去二三月辄复来。如是者屡屡。梦星质性温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禀气弱，若不任于劳者。”（《阳明全书》八）

乡人林文亦来从学阳明。

文字载道，号希斋，揭阳人。曾掌教西安，颇能以身率物。时阳明先生居越，往来侍讲，学日益明。（《全书·林希斋传》）

四年乙酉（1525）　四十岁。

讲学中离山。日与士友讲习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会文考德，兴发益多。（《行状》）先生《离山书院钟铭》云："晨昏二十四敲钟，声彻前峰并后峰。试问岩前诸学士，已闻尝与未闻同？"（顺治《潮州府志》）

乡士大夫黄国卿、成子学、郭维藩、林光祖、杨日赞、杨惟执，与陈明德、郑国化皆时来讲论。（详上黄佐《中离山记》）

五年丙戌（1526）　四十一岁。

辟中离洞。今中离洞三大字犹存。署款"皇明嘉靖五年进士薛侃书"。洞位于梅林湖西石牛头山对面之虎肚地。

山中有十八景之胜。季本有诗云：

览遍离山好洞天，杖藜到处尽云烟。中离此日藏修地，应作人间胜迹传。（藏修地）

九华三岛客来频，洞口云毡作主人。论药谈弦酬酢处，藓痕苔色共车巾。（迎仙桥）

上上云阶步步平，云阶百尺接壶天。登云且作栖云客，入洞还为出洞仙。（登云阶）

二实中涵一太虚，乾坤万古自如如。取将各洞缘天造，谓有真人向里居。（中离洞）

一石两石耸云烟，千山万山匝洞天。风月半帘悬太古，图书满榻对先贤。（石壁岩）

白云堆里一楹存，两窦虚明日月奔。万壑千峰浑脚底，考槃独寤世稀伦。（云中屋）

万古乾坤此月明，人间何许夜迷人。窝中终日蟾光照，谁识窝中不夜春。（偃月窝）

瀛渺连天自有津，日知多少往来人。在山亭子当潮立，直看沧溟欲变尘。（观海亭）

中离洞里中离老，仰离台上仰离人。瞻依已遂依归愿，携瑟应同舍瑟春。（仰离台）

泗水涓涓一脉流，向来寒閟几经秋。如今浚出源头活，任派乾坤万古流。

（活水亭）

一泓疑是古蟠溪，水色天光浸石矶。月作钩儿萝作线，垂竿意不在夫鱼。（钓鱼矶）

龙卧离山睡欲吟，石床天巧跨松阴。他年若际风云会，起作苍生四海霖。（龙睡岩）

石井峰头八面飞，擎天石下见柴扉。书签药裹披霜磴，碧草琼花映翠微。（后岩）

叠石东峦敞石砑，琴书一榻自仙家。鹤翻老乾窥晴曙，花放幽香簇晓霞。（东岩）

丹崖翠壁耸岩扉，荒草疏枫映夕晖。久住高人忘水石，相将鹿豕日同归。（西岩）

白云飞我北㠥天，中有谈㠥不世人。住久浑亡寒与暑，四时风月四时春。（北㠥岩）

一径千峰透白云，往来都是卧云人。埜夫亦欲穿云去，一掬收回六合春。（连云径）

三石分明品字函，上奇下偶自天缄。中开玉洞迎仙侣，此是离山第一岩。（叠石岩）

（上俱见《揭阳县志》）

先生同门友季本，以御史摘揭阳主簿，时相过从。（《行状》）

季本字明德，浙江会稽人。正德辛未（1511）进士，授建宁府推官，擢河南道监察御史。以言事谪揭阳主簿，官至长沙知府，学者称彭山先生。（《揭阳县志》五）

先生言于知府王袍，重修南阳。（《海阳县志·建置略》）又越冬，先生撰《修堤记》。

《记》略云：潮治东南夹溪为堤，一遇崩溃，巨浸百里。自侍御杨琠请以广济桥盐课易石为固，府主谈公（伦）克襄其事。嘉靖丙戌（1526），府主王公归自述职，乡达郑玉之暨予以告公曰："此予责也。"遂率民修之，益崇三尺，广一丈。是年飓风发，水陵旧堤三尺，其不没者仅一尺耳。越冬，会节推李公重修，益石崇其险。（《耆旧集》五）

按：王袍字子章，浙江山阴人。南堤起潮城南门越角，至庵埠许陇

涵澄海界止，计长八千四百五十一丈，袤七十余里。

友人杨鸾上春官，卒于南雍（《全书·杨复斋传》）甘泉之邸，年三十五。（《三贤墓志》）十二月十四日，营葬于双溪山左。迁北山墓于上，毅斋前安浮山黄田埔，乃葬其衣冠于右。称曰三贤之墓，先生为之铭。（《全书·三贤墓志》）

阳明有《祭少默文》云："呜呼士鸣！吾见其进也，而遽见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殁，吾已谓天道之无知矣，今而士鸣又相继以逝，吾安所归咎乎？呜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资，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见，而顾萃于一家之兄弟，又皆与闻斯道，以承千载之绝学，此岂出于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发圣学之光辉，翼斯文于悠远。而乃栽培长养，则若彼其艰；而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于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无主宰于其间耶？呜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鸣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后先颉颃而起者以数十，其山川灵秀之气，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则亦宜有盈虚消息于其间矣乎？士鸣兄弟虽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内善类，孰不知南海之滨有杨士德、杨士鸣者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凤，争一睹之为快；因而向风兴起者比比，则士鸣昆季之生，其潜启默相以有绩于斯道，岂其微哉？彼黄馘槁毙，与草木同腐者，又何可胜数！求如士鸣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呜呼！道无生死，无去来，士鸣则既闻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独吾党之失助而未及见斯道之大行也，则吾亦安能以无一恸乎！呜呼痛哉！"（《阳明全书》二十五）

湛甘泉有《祭少默文》云："於乎士鸣，而至于是耶！而止于是耶！孰主张是耶？今学者患无受道之器；有其器矣，患无必为之志；有其器有其志矣，所贵遵道而不贰；有器有志而不贰矣，彼重任道远者，必天假之遐龄，而远乃可致；若夫不遵道而贰，致远而泥，假之遐龄，彼苍苍者将何意耶？於乎！昔者子也与仲骥也，承命伯氏，千里而来，同负笈笥，及再见于荷塘之庐；联举秋试，慨然圣学之并诣，岂非后生可畏耶？士德北游，子居予樵之屺，讲合一之学于勿忘勿助之际。士德乃来，予有砭剂。予顾谓子，尔辙勿异，是以有支离之说、易途之诫也。於乎！昔在夫子之门，称好学者颜氏之子，终日而愚，独以默识。故曰万言万中，不如一默。於乎！尔旧字少默，宜默不默，而乃以鸣易尔字耶？多言伤气，气以动志，行往以谈以歌，彻夜不寐。

不寐固励志也，以能养其身，将指为祸生之戒，夫然后知勿忘勿助者，绝无丝毫人力，乃为学之至也。於乎！海内同志者无几，得尔兄弟，又五六年相逐而逝，此夫子所以恸丧予之慨，岂天果无意于斯文也耶？岂天无意于斯文也耶？（《饶平县志》）

友人翁万达、陈思谦同登是科龚用卿榜进士。（《潮州府志·选举表》）

六年丁亥（1527）　四十二岁。

秋告季本重建龙头桥。（《全书》十一）

桥为宣德壬子（1432）僧惠庆修，弘治间仅存其半。先生告主簿季本重修，并为记云。计费三百二十有奇，肇功嘉靖六年（1527）秋，期年告成。（《全书·重建龙头桥记》）

冬，开中离溪，有《记》。

《开溪记略》云："潮有二水，自西北来，东曰洲溪，西曰西溪，东南绕郡治之南。二水回流，相错弗通仅十里，或为渠为池，旱干水溢，农者弗便也；其地出橘柚诸果，贩鬻以脚，商者弗便也；人家一瓦一木，动费资运，居者弗便也；舟楫转海而后达，风涛寇贼，民之死者无虚岁，行者弗便也。嘉靖丁亥冬，予过其处，察其可浚而通也，以告府主王公子章。公命经卫涂子相之，具以事复。公曰：'事则尔矣，地理若何？'曰：'其乡之言云：浚之风水且有益。是故水上不产溪物，是岁则产焉，地气兆矣。'曰：'地兆则事基矣。天时若何？'曰：'东南无经岁之旱，自秋徂春，沟渠皆涸，工易为力，天时应矣。'曰：'天应则事协矣。人力若何？'曰：'古之兴事者必云从众，然亦有寡而弗愿者矣，今则异是，是故人力齐矣。'曰：'人齐则事集矣。'遂依里甲分布，东莆凿田百四十丈，浚渠百丈，造桥四所；上莆凿田百二十，浚渠二百五十丈，水派百八十丈；龙溪浚池百尺，修溪三百丈，修桥七所；桃山浚渠二百六十丈，修桥四所；地美凿田四十丈，修溪百丈，桥一所；登云修溪四百丈，修桥三所。布讫，赴功如归市，梅冈以后至，输工值弗受，以筑修堤石亭。计凿田一十余亩，压田二十余亩，应偿时金百两；洼田受益者偿之，计田二顷余亩，亩出时金二钱；里之益尤者偿之，东莆五十里，米千余石，出时金四分。其新塞者弗偿，浚渠衡不亩者弗偿，出纳有籍有稽。噫！是举予与涂子洎林子孚中，焦思涉泥，肇功正月二十四日，越三月哉生魄工毕。放舟试之，是夕乃雨。民喜，呼其溪曰中离溪，呼其桥曰涂公桥。（《全书》十一）

按：桑浦山华岩前为宗山书院，中离溪在其前。溪上有二石亭，一镌《中离开溪记》，一镌林熙春《续浚中离溪记》，两碑今俱存。

是时又建通济桥，并修砌桥路三十余所。（《行状》）

《薛氏族谱》载先生遗乡功绩十二事，兹列于下：

一　浚海阳县上莆等都溪三十余里，上通潮城揭阳，下通鮀江鳄浦等都，商民舟楫，往来由里河，免航海劫溺之患。

一　造中离桥路大小共一十五所，乡民往来与耕田，牛畜利便。

一　设龙溪都里社祭坛引道三条，并石亭二柱，社庙一座，门楼一间。舍围一十二亩，带租银二两六钱，坐落蓬州都士名蚬港等处。

一　舍园一十五亩，带租银三两二钱，坐落海阳县南桂都土名磨枋洲等处。

一　架龙溪都乡约所二处，与乡都会约行约便利。

一　造龙溪都通济桥九明，上通潮城，下达蓬州所潮阳县等处。

一　造桃山都登岗桥五门，上通府城，下达潮阳惠来等县。

一　造地美都龙头桥七门，上通揭阳县，下达龙溪蓬州等都。

一　修地美都鸡笼山径路一十余里，与民便利。

一　造龙溪都庵头桥三门，并修石路至海阳县上莆等都二十余里，与民便利。

一　筑许垄子堤，并砌砚头三座，御咸潮育淡水，海、揭二县溉田苗利便。

侄宗铠起补将乐令，调建阳。（《薛谱家传》）

阳明南征来粤。时受命三广，征讨蛮夷，过其乡。先生起复曰："志存天下，毋专美于一方也。"（《行状》）

按：《阳明年谱》阳明十月至南昌，十一月至肇庆，不经潮州也。

七年戊子（1528）　四十三岁。

先生入京师（《薛氏族谱》及《行状》），起故官。（《明史》本传）

初，季本推行乡约，以先生所定十事酌为三十四条，普行一邑。（《乡约序》）并上呈阳明。阳明批委潮州府通判张继芳，历属县督令各县勤习。（《阳明全书》十八《批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

按：潮有乡约，始宣德间知府王源时曾举行。府治明时西湖山犹有旧约全址。

先生有《庆彭山季子治成奖异序》。（见《全书》八）

弟侨典试顺天，于落卷中拔马一龙为解元，卒成名臣。转武选司郎中。

是岁阳明在梧州，六月，兴南宁学校。

《阳明年谱》三云："日与各学师生朝夕开讲，已觉渐有奋发之志。又恐穷乡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监察御史降合浦县丞陈逅主教灵山诸县，原任监察御史降揭阳县主簿季本主教敷文书院。"按据此季本于是年六月已离揭阳任。

吴继乔来梧州从学阳明。（顺治《潮州府志》）

继乔字世达，号之溪，揭阳梅冈人。嘉靖戊子（1528）举人，闻阳明讲苍梧，往从之游。（《揭阳县志》本传）

陈明德见阳明先生于羊城。（《陈海涯传》）

按《阳明年谱》三：七月，破断藤峡。十月，祀增城先庙。十一月二十五日逾梅岭。是其来羊城，应在十月十一月间。

冬十一月乙卯，阳明先生卒于南安。（《阳明年谱》三）先生闻阳明讣，为于兴隆寺，率侨与四方同志欧阳南野、魏水洲辈数十人朝夕哭焉。（《行状》）

八年己丑（1529）　四十四岁。

二月庚午阳明丧至越。（《阳明年谱》）

秋，先生求使山东，趋王宅。时先生欲弃职奔迎。或曰：即选言官，且少俟。先生弗听。方西樵（献夫）时为冢宰，劝曰：重望舆论攸属，亦不听。求使山东，公事暇，趋王氏家，事无大小，咸为经理。（《行状》）

有与诸同门轮年为阳明抚孤题单。（《阳明全书》三十八）

《抚孤题单》云："先师阳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义、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礼、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长为先师，次守俭、守文、守章。先师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择守信第五男正宪为嗣，抚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聪，明年奉命之广，身入瘴乡，削平反乱，遂婴奇疾，卒于江

西之南安。凡百家务，维预处分，而家众欺正聪年幼，不知遵守。吾侪自千里会葬，痛思先师平生忧君体国，拳拳与人为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为先。区区田业，非其所重。若后人不体，见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禀太夫人及宗族同门戚里，佥事汪克章、太守朱衮，酌之情礼，参以律令，恤遗孤以弘本，严内外以别嫌，分爨食以防微，一应所有，会众分析，具有成议。日后倘复恩典承袭，亦有成法。正聪年幼，家事立亲人管理，每年轮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诸叔侄不得参挠。为兄者务以总家爱弟为心，以副恩育付托之重；为弟者务以嗣宗爱兄为心，以尽继志述事之美；为旁亲者亦愿公心扶植孤寡，以为家门之光。则先师在天之灵，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疏虞，执此闻官。轮年之友，亦具报四方同门，咸为转达。明有宪典，幽有师灵，尚冀不爽。所有条宜，开是于后。”（《阳明全书》三十八）

九月登泰山。

《游泰山记》云：“是秋使鲁，适叔谦张兄寓平原，乃申旧约。九月乙卯，偕杨生世禄十人自鲁至，步谦偕马生珪十人自平原至。……及登，雨雪蒙蒙寻丈。……”（《全书》十一）

又登峄山。

有《记》示诸生云：“扶舆之秀，自昆仑而东为岱，而南为峄，二山之间，一钟为吾夫子，再钟为颜、曾，再钟为思、孟，皆为万世师。故岱曰岱宗，峄曰络绎，已兆名山之始矣；然则二山者，吾圣贤根本之地，当时游衍授受之所也。今岱祀有典，峄为琳宫梵宇所据，使登临之士，追怀景止之心亦微矣。余使鲁来游，见斯岩通明中正，犹数楹之厦，命曰大通岩。谋诸守土，塑夫子小像于中，四子侍焉，俾游者礼其容，思履其道，是亦世教之一助也。谋既集，或疑而问曰：‘学无方，其以游与?’曰：‘游者，学之方也。子不闻与点之意乎?’曰：‘游无方，其以山与?’曰：‘山者，游之方也。子弗闻仁智之语乎?’未达，复谂之曰：‘天得以一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物得一以生。故一者其本体也，无弗同也，学问之道，复其本体而已矣。然山水无私，而人物有情，有情者变，无私者存；是故登其山，本体形焉。清者感之旷其情，浑者感之涤其虑，郁者感之散其怀，蔽者感之豁其意，忙者感之息而怿，闲者感之静而益幽。’或悟而起曰：‘有是哉！游之益也，然则亦有损乎?’曰：‘有。旷其情而无主，其失则忘；涤其虑而无主，其失则荡；散其怀而无主，其失则逐；豁其意而无主，其失则流；息而怿而无主，其失则骜；静而以幽而无主，其失则僻。忘焉骜焉僻焉，离物者也；荡焉逐

焉流焉，着物者也。着物也者，俗之谓也；离物也者，禅之谓也。匪禅匪俗，其圣贤之道乎！其圣贤之学乎！传曰：'上下与天地同流。'又曰：'充之便是尧舜气象。'此之谓也。"（《全书》十一）

过兖州，谒孔孟家庙。会诸士于大通岩，刻杏檀讲授之议于石，以记其盛。（《行状》有《重修兖州儒学记》）

文略云："兖州，吾夫子之乡也。士生千载之下，犹思同堂共席，慰倾慕之怀，而况于其地者乎？仕于四方，虽远在荒服，则亦俎豆周旋，凛乎如在，而况仕于其地者乎？然则生斯地者必求其道而学焉，斯无愧夫子之乡人也；仕斯地者亦必求夫子之道而行之，以迪是邦之人，然后为能以其出夫子者而反事夫子也。永新刘君子正，自守是邦，刑清讼理，既楼其城，壮其郡治，公宇之外，焕然改观。则曰：'斯夫子之区域也，而政弗在是也。'乃轻其徭，平其赋，益和辑其民。既而曰：'斯政也，而学弗在是也。'乃修殿庑，修明伦堂、尊经阁，新棂星门，新斋堂一十二楹，号舍三十楹，又辟地为门为射圃，黉宫之内，焕然改观。则曰：'斯学也，而夫子之道弗在是也。'方迪诸多士而进诸道，侃适有事于鲁，从而质之曰：'道有异于学乎？'曰：'无必异也。而今之学则异乎道矣，居庠序者知训诂则谓之学，能文章则谓之学，博闻强记则谓之学，外身心而骛声利，得则盈焉，失则馁焉，夫子之道，宁若是耶？然则学有异于政乎？'曰：'无以异也。而今之政则异乎学矣：法制以驱于民，簿书以成其务，责人之善不必其己勉，夫子之政，宁若是耶？是故道一而已，一则贯，贯则一。一者何？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王道之本，学之体也。动直则公，公则溥，天德之发，学之用也。此精一之传，圣门之宗要也。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人病弗为耳。世学不明，舍心而求之外，是故知、行二矣，人、己二矣！知、行二，宜其有外道以为学者，入于记诵、辞章而弗反矣；人、己二，宜其有外学以从政者，流于刑名、功利、术数而弗知矣。间有知之，而弗反之者，则又非拘滞于仪容格式之粗，则泛沦于玄虚空寂之谬，是皆不知一即贯也，贯即一也。贯而弗一，其动虽直，是义袭也，是多学而识也，忘其体者也。一而弗贯，其静虽虚，是遗物也，是以己性为有外也，废其用者也。然则欲明夫子之道，亦惟一贯而已矣，欲为一贯之学，亦惟无欲而已矣。'诸士闻之，亦幸生于夫子之乡，而以获修其道是庆。侃归，训道陈子炜辈，与合庠之士，德刘君之惠，征言为之记，予喜明夫子之道自吾夫子之乡始，故不辞而为之记。"（《全书》十一）

十一月至越城，奠阳明先生。仲冬癸卯，阳明先生窆于越城南三十里高村，会葬者数千人，先生与弟侨、侄宗铠及同乡主事翁万达，各就位哭奠。（《阳明全书》三十七）

有与翁万达合《祭阳明先生文》云："呜呼！世有一长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学继往圣，功在生民，顾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与人为善之心；岂非浅近易知而精微难悟，劣己者容而胜己者难为让耶？且自精一之传歧而为二，学者沦无滞有，见小遗大，茫无所入。吾夫子发明良知之说，真切简易，广大悉备。漫汗者疑其约，而不知随遇功成，无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员无滞，动出规矩，非率略也。袭古者疑其背经，考之孔孟，质诸周程，盖无一字一意之弗合。尚同者疑其立异，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尝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于世教圣门之宗旨也。盖其求之者也备尝艰难，故其得之也，资之深若渊泉之莫测，应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时雨之施，弗先弗后；而言之易入，若春风煦物，一沾一长。其平居收敛，若山林之叟，了无闻识；其发大论，临大难，断大事，则沛然若河海之倾，确然若蓍龟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议夫子者，非晏婴之知，则彭更之疑；非互乡之惑，则子路之不悦；非沮溺荷蒉之讥，则武淑、淳于髡之诋；用是纷纭，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门墙而无闻。顷年以来，知切淬励。夫子逝矣，慨依归之无从，虑身世之弗立，郁郁如痴，奄奄在告，盖一年于兹矣。方将矢证同志，期奉遗训，尚赖在天之灵昭鉴启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传之来世，以永芘于无穷，是固夫子未尽之志也。灵輀将驾，薄奠一觞，衷怀耿耿，天高地长。於乎哀哉！"（《阳明全书》三十七）

《阳明全书》三十八载陈惟濬引先生语云："昔见有侍于先生者，自称可与行师。先生问之，对曰：'某能不动心。'曰：'不动心可易言耶？'对曰：'某得制动之方。'先生笑曰：'此心当对敌时，且要制动，又谁与发谋出虑耶？'又问：'今人有不知学问者，尽能履险不惧，是亦可与行师否？'先生曰：'人之性气刚者亦能履险不惧，但其心必待强持而后能。即强持便是本体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谓'守气'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时欲，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自能应变无言，此曾子之所谓守约，'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者也。"（《阳明全书》三十六）

弟侨主试武闱。（《薛氏族谱》）

九年庚寅（1530）　四十五岁。

先生转官行人司右司副。（《谱传》、《行状》授司副，年月未详，在使山东后。）

五月建精舍于天真山，祀阳明先生。（《阳明年谱》附录二）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岩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师昔在越讲学时，尝爱择地当湖海之交，目前常见浩荡，图卜筑以居。将终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随师渡江，偶登兹山，若有会意者。临发以告，师喜曰："吾二十年前游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遗以二诗，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之句。侃奔师丧，既终葬，患同门聚散无期，忆师遗志，遂筑祠于山麓。同门董澐、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董其事，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前后相役；斋庑庖湢具备，可居诸生百余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阳明全书》三十五）

舍成，先生有勒石文，并告天真土神及竖柱二文。（《全书》十二）

《勒石文》云："嘉靖庚寅（1530）秋，天真精舍成。中为祠堂，后为文明阁，为藏书室，又为望海亭，左为嘉会堂，左前为游艺所、传经楼，右为明德堂，为日新馆，余为斋舍。周以石垣，界则东止净明，西界天龙，北暨天真，南抵龟田路。是举也，成夫子遗意，四方同志，协而成之，勒之于石，俾世守者稽焉。"

《告天真土神文》云："维年月日，侃等谨致告于天真山土地之神。伏以先师阳明夫子倡道千载之下，海内同志，得其归依，黄钟一宣，群梦咸觉，恩莫大焉。追维夫子，尝图卜筑此山，以便讲学，二诗可以识其志矣。将命南征，生还无日，诵其遗教，能不痛心！今以是日兴事作室，朝夕讲肄，承事夫子之灵，以免于离居，以终永图。维神含德无疆，发祥有待，文明之象，实惟其时。尚赖潜扶默佑，永观大成，俾夫子未尽之意，已明之学，日博以行，同于无疆，实惟神之所锡类也。敢告。……"（上俱见《全书》十二）

十月二十四日，上《正祀典以敦化理疏》，陈七事，请以象山、白沙从祀。（月日据《薛氏族谱》以下各疏同。）

疏文略云：

一、宋儒陆九渊，生而清明，学术纯正。四岁侍父，遇事物必致问。一日，问天地何所穷际？父笑不能答。及长，读书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

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事，吾分内事，即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西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盖实见人心之妙，而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自孟子没而心学晦，至宋周敦颐程颢追寻其绪，九渊继之，心学复明。故所至从游云集，虽乡曲老长，俯首听诲。当时吕祖谦、张栻辈莫不敬服。今诸子皆已从祀，而九渊独未从祀，盖以蚤岁尝与朱熹论说不合，故其徒遂挤之为禅。臣考九渊赴荆门时，朱熹延入白虎洞讲喻义喻利之旨，僚属诸生，听者为之流涕。熹亦叹服以为不及，且请笔之书，又自为之跋，以为不迷于入德之方，则非禅明矣。夫禅空寂其心，遗人伦，弃物理，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也。使九渊之学而果若是，则诚禅矣。然其书具在可考。如曰："惟天上之至一，为能处天下之至变。"曰："先立乎其大者。"曰："学莫先义利之辨。"则皆孔子、孟子之旨也，此岂空寂其心者？或曰："某何尝不理会文字，但理会与人别耳。"曰："在人情事势物理上用功。"曰："己德明，然后可推其明以及天下。"此岂遗弃伦理者哉？况荆门之政，可验躬行之效，则见于贤相之称；超然独契乎本心，以俟圣人百世，则见于名儒之赞。而宋朝议谥文安，亦极尊美之词。及先儒吴澄、许衡，国朝名臣程敏政、席书，皆有撰述，每称其学之纯。独陷于记诵词章而莫自觉者，乃以躬行实践为近禅，则世学之惧也。不然，则天下岂鲜文学之士，而为臣未必皆忠，为子未必皆孝，士习未必皆正，民风未必皆淳者，何哉？正以不求诸心，不能实践之过也。仰惟皇上复古，正人心，变士习，如九渊者，乞赐赠从祀，风示四方，使学者反诸心以精义利之辨，笃于行以成淳厚之风，则善人多而天下治矣。谨将程敏政、席书所撰之书，随本进览，伏惟圣明裁择。

一、人才国家之盛，而从祀庙庭，尤见人才之盛也。我朝造士百六十年，未尝有从祀者。诚无其人，则作养无征，国家之耻也；苟有其人，而莫之行，岂非尊崇好尚，未以是为先乎？臣考当代文行名节，忠勤之士固多，而潜心理学者，数人而已。然究其所造，又皆未免以人性为仁义，其于所谓"一以贯之"之旨，则时出时入，而未或自得也。惟翰林院检讨陈献章，博而能约，不离人伦日用，而有鸢飞鱼跃之机，虽无著述，观其答人论学数书，已启圣学之扃钥矣。其言曰："道以天为至，言诣乎天曰至言，人诣乎天曰至人。"又曰："夫道至无而动，至近而神，故藏而后发，形而斯存。"又曰："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在人深思而自得也。"又曰："舍

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酬应，如马之有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且能养俗藏修，默回士气，又善淑人成物，则其造诣可知矣。数十年来，四方士子于文字功利之外，而知有所谓学。山林兴恬退之风，仕宦励廉节之志，良由我宪宗纯皇帝，征聘献章，特授馆职，故风动若此。臣观宋淳祐元年，即诏以周程张朱四子从祀，士习为之丕变。仰惟皇上以道化天下，伏乞将献章赐谥从祀，以彰我皇明之盛德，鼓舞人心，当有不疾而速者矣。伏惟圣明裁择。（《全书》七）

按：《正祀典以敦化理疏》陈七事，今谨节摘二事。

十二月迁司正。（《族谱》载敕命在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追赠先生父骥为文林郎，行人司司正，如官。母曾氏为太孺人。敕命月日同。

十年辛卯（1531）　四十六岁。

在司正任。

二月初二日，上《明正学以安圣躬疏》。

《疏》云：臣伏惟陛下励精以来，圣躬日强，臣民胥庆。顷者愆和虽已平复，仰瞻天颜，犹尔清癯，意者积劳所致，非特感冒而然也。陛下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自朝至夕，不遑暇豫，惟以问学政事为念，可谓有圣人之资，圣人之志矣；独未臻圣人之治，是以圣心焦劳而致此也。臣谨因问安之诚，推明圣学，倘蒙采纳，则圣地清定，圣躬安矣。古称大有为之君，必曰无为而治，非有为自有为、无为自无为也，亦非有为而后无为也，盖为乎无为，无为而为也。无为者道也，有为者人也。道者，天理也。天理者，吾心之本体也，即陛下所谓一者也。人者，自用功而言，用功者吾心之存，主应用者也，即陛下所谓敬者也。主一之谓敬，敬则一矣。有意为公，非一也；先事而迎，后事而将，非一也；物而不化，行而有息，外内体用有间，非一也。故主一者，圣贤之学，主则一，一则贯矣；弗主则二，二则杂而昏矣。故曰：“聪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飨帝。”是故用功非道，则愈求愈远，劳而“无功”；用功合道，则虽劳弗劳，是谓深造自得，居安资深，是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故曰“无为”。或曰：“如此何以能了天下之事，而成天下之治乎？”曰：“学患其弗一，胡患乎弗贯？”夫天下之道，敬天也，

勤民也，用人行政也，一而已矣。故曰："天得一以清，人得一以灵。"敬天者，非独苍苍之表天也。由太虚有天之名，自中心之虚，以达前后左右，莫非虚也；莫非虚，则莫非天也。莫非天，则无适而非事天之地矣。故主一则无欲，无欲则静虚而动直，是故戒慎恐惧，不愧屋漏，所以事天也；出入起居，罔有弗钦，发号施令，罔有弗臧，所以事天也。以此事天，天、人一矣。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善也，非以其有生也，故治民者，于钱谷兵刑治生之务虽非可缺，然不过足食已矣，足兵已矣，富强已矣，非王道之重，孔门不得已而可去者也。故称唐虞之治，必曰"百姓昭明，黎民敏德"；称三代之治，必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而逸居饱暖不与焉。故惟主一则能以善养民，而民兴于善，夫然后君、民一矣。人皆可能者，善也；有能有不能者，才也。以才用人，人求之外而不足；以善取人，人求诸内而有余。是故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问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智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秦誓》论大臣之道，亦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盖善者一也，休休者，亦一也，主一则上以是求之，下以是应之，而九德咸事矣。《书》曰："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如此，则君、臣一矣。为政必有纪纲制度，然非有意而为之也，因之革之，与时宜之。由周而来，虚文日繁，其弊未之有救也；为今之治，莫若导民务实，返朴还淳，此复古急务也。如以纪纲制度已焉，则三皇之制，不如五帝之备也；五帝之制，不如三王之备也。然而论治，王不及帝，帝不及皇。何也？且禹嗣舜，典章由旧，九官十二牧由旧也。乃曰："尧舜之人，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何也？盖禹入圣域，未优精一之纯异，故感孚之机殊，此禹所以泣也。由是言之，为政之道，不在文为之间明矣。故曰："笃恭而天下平。"笃者，纯而不已也；恭者，敬也，主一也。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夫然后不赏而劝，不怒而威，愈纯愈化，此圣帝明王之事也。动而后敬，言而后信，则亦必赏而后劝，怒而后威，英君谊辟之事。若夫动而不敬，言而不信，则虽赏弗劝，虽怒弗威，后世庸君之君也。陛下不由师傅默契敬一之旨，此天启贞元之会，欲使斯民蒙至治之泽也。臣愿陛下无假外求，无亲细务，无事词藻，惟纯之又纯，内外一，上下一，君民一，天人一，无为而治矣。陛下时时主一，则自安静以养和平，圣虑不烦，精神凝固，圣躬安矣，圣躬安，则臣民安天下安矣。臣无任恳悃陨越之至。（《全书》七）

六月二十六日，上《复古制以新士习疏》。

闰六月初九日，上《仿古更化疏》。

同月二十六日，上《复旧典以光圣德疏》（《薛氏族谱》），乞择亲藩贤者居京师，慎选正人辅导，以待他日皇嗣之生。帝方祈嗣，讳言之，震怒。立下先生狱廷鞫，究交通主使者。（《明史》本传）

疏云："臣闻圣帝明王之道，必有远猷。陛下践祚以来，明大礼以事亲，举大禘以事祖，皆品节古人，以垂万世。而惟旧典一事，系关宗社，未及举行者。臣仰稽祖宗分封宗室，犹留最亲殿下一人在京，原藩为宗人令四字，俗呼为守城王。有事或为居守，或代行礼。其为国家虑，至深远也；列圣相承，莫之或改。正德三年，逆瑾怀异，遂并出封。瑾败，廷臣但俟宗嗣繁衍，因循未之议复。今者陛下入继，十年于兹矣，未有以为陛下告者。臣知陛下之心，天下之至公也，于事未尝有所讳避，惟其是而已。伏愿查复旧典，于亲藩中择其亲而贤者，迎取一人，入京为守城王，抡选端人正士，为之辅导，他日东宫生长，其为辅王，亦非可缺焉者也。如有以次皇子，则仍出封大国，彼得以自郡王而为亲王，亦足以展其亲矣。万一不然，则系陛下躬亲诲育，自于太后有恩，世庙有恩，其与仓卒之间，阔然无情不侔矣。陛下聪明，首出庶物，弗虑及此乎？帝王图事，动出万全，譬之弈棋，由前以俟，特一着耳。由今以处，是有二三着、四五着矣。多算者胜，少算者负，此防微虑远之道，当如是也。矧此处人之所难处，行人之所难行，诚帝王之所盛节也，陛下何惮而弗为乎？且陛下出而临朝，有君臣之乐；入而在宫，有母子之乐，有夫妇之乐；独自藩邸，及今未尝有兄弟叔侄之乐也。圣衷渊曲，机事邃密，有臣下不得闻而可与议者，有宫闱不得预而可与言者，时节高会，优游德义，亦人间之至情，天伦之真乐也，陛下亦何惮而不为乎？其视深居孤立，上无以系九庙之安，下无以慰四方之望，相去一何远哉！臣备员下僚，区区忧爱，敢为陛下陈者，知陛下有纯孝之心，有忘我之仁，有天下无疆之图也。伏惟陛下，深思远顾，悯臣之愚，留臣之奏，特降手敕，下廷臣会议施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无任恳悃陨越之至。（《全书》七）

初，"南海彭泽为吏部郎，无行。因议礼附张孚敬，遂与为腹心。后京察被黜，孚敬奏留之，复引为谕德，至太常卿"。先生以疏草示泽，泽与先生及少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时数忤孚敬，泽默计储副事触帝讳，必兴大狱，诬言同谋，可祸也。绐先生稿示孚敬，因报先生曰："张公甚称善，此国家大事，当从中赞之。"与为期，趣之上。敬孚乃先录先生稿以进，谓出于言，请

勿先发以待疏至，帝许之。先生犹豫，泽频趣之，乃上。（《明史》本传）

自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四日，连鞫八次，具得其实。初六日，谕革先生为民，构陷者彭泽谪戍。

二十八日，先生被提，次日廷鞫。（《廷鞫实录》）拷掠备至，先生独自承。累日狱不具，泽挑使引言。先生嗔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尔也。尔谓张少傅许助之，言何豫？"给事中孙应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应奎等疏闻。诏并下言应奎、汴诏狱，命郭勋、翟銮及司礼中官会廷臣再鞫。具得其实。帝乃释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仕。先生为民，泽戍大同。（《明史》本传）先生免归，翁万达时为地官郎，寄书乃父曰："薛为彭愚，彭为张愚，语直而心不动，两京士夫咸壮之。千载而下，名照汗青，吾乡为有人矣。"（《行状》）

至潞河，遇圣节，焚香叩祝甚谨。

先生至潞河，遇圣寿节，焚香叩祝其谨。或报参政项乔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圣者。"乔曰："必薛中离也。"迹之果然。（《明史》本传）

复至越。（《行状》）

按《行状》云："先生归至越，建天真精舍以萃同志，善类孚助，不月而成。"系于是年。《阳明年谱》作九年五月，异。

侄宗铠召拜礼科给事中，迁户科。（《薛谱家传》）

十一年壬辰（1532） 四十七岁。

先生还乡，明农讲学。（《行状》）

筑书院于宗山中，建祠祀阳明先生，旁为精舍，延陈明德居之。（《全书·陈海涯传》）

邹守益《怀惠祠记》云："怀惠祠者何？潮士若民怀阳明先生之惠而祠之者也。……先是小靖石骨寨允蠢，行旅罹其害，先生征漳寇至杭，亲临境土，抚谕平定，害斯已。厥后总制四省，班师五羊，多士赴讲，故政教沾被，士民思之。乃乡耆洪瞻、生员王垆辈，请于大巡吴君麟，允建宗山书院，尸而祝之，……中为祠堂，左为讲堂，右为经楼、为宴会厅，翼而环之以书舍，萃生儒肄业，可居百人，诚一方之胜也。然景僻烟远，风高易圮，直冬閴寂，非二三人可守。中离薛子自出租五十，募人看守香灯。继而贰守刘君魁置租九

十，大巡洪君垣拨废寺租二百石，续正祀典，徭编门役，令府县佐贰官致祭。中离收回原租。顷因奉例鬻寺田，龚守湜取其寺租而鬻之民。竹居子克承厥事，入直于官，仍以百租归宗山。岁延有学行一人主教，给租四十石。增募守看二十，差输十有五，春秋遣官主祭，服从约二十人，……乡绅及乡耆生儒陪祭约百人，或五六十人，……官租九十。岁征海阳县给方里，按二祭授为香灯募役修茸之费。（《海阳县志·建置略》）

按：宗山书院在今潮安东蒲都塔下乡南，在内桑浦山之中部，石坊犹存，面华岩山。坊正面题“宗山书院”，背书“仰止”二字。后改建于城北。

友人林大钦登是科一甲一名。

大钦字敬夫，世居东莆。“嘉靖辛卯（1531）就试，督学王公奇其文，为荐于巡按御史吴公，更试《李纲十事》，考据详核，词旨凛烈，读之觉奕奕有生气。相与叹赏曰：‘此苏公笔墨、胡公封事也，必然大魁天下。’”明年上春官，连举进士状元及第，如二公言。（中离撰《林东莆太史传》）

十二年癸巳（1533）　四十八岁。

先生乡居。

十三年甲午（1534）　四十九岁。

先生乡居。

十四年乙未（1535）　五十岁。

诏复冠带。（《行状》）

二月，《阳明文录》刻成于姑苏。

《阳明年谱》云：“洪、畿奔师（阳明）之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铨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

先生与王汝中萃阳明文词之简切者，集为《阳明先生则言》二卷。

先生有《则言序》云：“先生之言，始锓自赣曰《传习录》，纪其答问语也。锓于广德曰《文录》，纪其文辞者也。锓于姑苏益之曰《别录》，记其政

略者也。录既备，行者不易挟，远者不易得，侃与汝中萃其简切为二帙曰《则言》。盖先生之教，贵知本也。大本立而达道行，则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乃天则也。学者患无志焉尔；能志乎此，则戒慎恐惧而致其中和，自不容已矣。孰戒慎？孰恐惧？此良知也。孰云为中？良知廓然而弗倚者也。孰云为和？良知顺应而无滞者也。是故天曰太虚，圣曰通明。虚、明者，良知之谓也。致也者，去其蔽全其本体之谓也，去其蔽者，非谓有减也；蔽去则知、行一，人、己一，本体复矣；本体复，非有增也，吾之性本无方，体无穷尽者也，能复其性则可以抚世，可以酬物矣。夫是之谓学。然胡为而证其至也？考之书焉已矣。质诸圣焉已矣，资诸师友焉已矣，夫是之谓问学。问学之道无他？致其良知而已矣，此《则言》之意也。或曰：'先生之学，不厌不倦，其道荡荡，其思渊渊，士羹墙而民尸祝矣，诵其遗言，皆可则也。譬之树然，芽甲花实，皆生意也，子独摘其实而遗余焉，无乃不可乎？'曰：'道之在我人也，孰彼此焉？而其见于言也，孰众寡焉？惟其切于吾之用也，则一言一药矣，而况于全乎？如其弗用也，则六籍亦粕烬耳，而况于一言乎？且夫树之生也，居者玩焉，绘者象焉，有国有家者，梁焉栋焉。'今子之爱树也，则将若是焉已乎？抑亦摘而艺之，俾复生生已乎？或质诸周子文规？'曰：'然。'遂命锓之。"（《全书》九）

按《内阁书目》五云：《阳明则言》二册，明王守仁语录，门人潮州薛侃等辑。《脉望馆书目》载《则言》有二册，《学海类编》有王守仁《传习则言》一卷，所采语录共二十条，见于《传习录》者九条，其余不知是否采自《则言》。考先生《与闻北江书》有云：《文录》、《别录》之多，士友不易得，即采诸友杂记再刻一本。又摘《后录》中要言别为二册，庶自便览。所谓摘要二册，当即《则言》也，惟编集年月未详。以其书采及《文录》观之，当在《文录》刊行之后，姑附系于此。

构行屋于东津，高士陆竹溪时相往还。（《潮州耆旧集·陆竹溪传》）

竹溪讳大策，字一士，海阳人，隐居东皋。郡守叶元玉闻其名，召见，辞以诗，有"野心甘老碧山云，蓑笠如何可出村"之句。（《海阳县吴志》）所居门首有石联云："白社重开三径竹，红尘隔断一条溪。"（《韩江记》）翠竹清流，夐绝尘境。

按《竹溪传》言："暮岁中离养疴，构竹屋东津池上。""竹溪临终之岁，往宿离斋，旬月不忍去。"不明言系何年之事。考竹溪墓有盛端明题字，署嘉靖丙申（1536）季冬，则竹溪之殁，应在丙申之际，姑附其事于此。

七月二十七日，先生侄户科左给事中宗铠上疏，劾吏部尚书汪鋐奸佞。（《薛氏族谱》）九月，斥宗铠为民，廷杖八十。越五日，赋诗见志而卒，年三十，时二十日戌时。甘泉撰《东泓墓志铭》。（《薛氏族谱》）

宗铠字子修，号东泓，靖轩先生子也。（先生撰《薛东泓传》）少有大志，长善文辞，历治三邑，洞见民隐。（湛甘泉撰《墓志铭》）及迁户科左给事中，汪鋐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铠白其枉，事具《明史·戚贤传》。其后鋐愈骄。会御史曾翀、戴铣劾南京尚书刘龙、聂贤等九人，鋐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学士李时，言鋐有私，留三人而斥其六。宗铠与同官孙应奎复言鋐肆奸植党，擅主威福，巧庇龙等，上格明诏，下负公论，且从二子为奸利。鋐疏辨乞休不许。而给事御史翁溥、曹逵等更相继劾。鋐又抗辨，且极诋宗铠等挟私。翀复言："鋐一经论劾，辄肆中伤。诤臣杜口已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帝果罢鋐官，而责宗铠言不早。又恶翀"诤臣杜口"语，执下镇抚司鞫讯，词连应奎、逵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阙下，斥宗铠、翀、一桂为民，镌应奎、浦、逵等级，调外。宗铠、翀死杖下，时十四年九月朔也。隆庆初，复宗铠官，赠太常少乡。（《明史·冯恩传》）其见志诗云："大奸在位，毒流缙绅。爰及三年，愤积神人。乃披忠悃，乃吁帝宸。惟帝时嘉，俟时而行，惟彼奸谗，捏构诬绳。惟帝赫然，迸兹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于皇明圣，实余寡诚。大奸既去，遑恤我身。阳德方亨，永底乂宁。"（《薛东泓墓志铭》）

冬，潮州府同知刘魁为刻《研几录》。

薛侨跋云："是录也，山居诸友录其所尝闻耳。录成，贰守刘晴川先生至，访离山，乃命工锓梓。侨适顺归自公，因谓诸友曰：'循是修之，可以入德，可以上达矣。'执此而谓先生之训止是也，则谆谆恳恳，引而不发之意孤矣。"

郑三极序云："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蕴之曰性，由之曰道，动之微曰几。性也，道也，人皆有之，人皆可能者也。丧其有而弗能，非他，慢于几而已矣。故研几者，率性之括，修道之枢要也。是故学圣也者，致中焉已矣；致中也者，惟精焉已矣；惟精也者，精于几也。精于几则莫非道心之运，而

人心无自萌矣。此理、欲之源，王、霸之分，圣、愚之判，毫厘千里，不可忽焉者也。《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书》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学者舍是无所用其力矣。是故克己非几弗净，图事非几弗遂，感物非几弗通。圣人知几，大贤庶几，学者审几。大哉几乎！一真百真，一妄百妄，有即百有，无即百无，毫厘千里，不可忽焉者也。是故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非几也；言而后信，动而后敬，非几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志常存，念常一，精神意思，常凝定而虚明，而后一有萌焉，必觉也，一有觉焉，必克其善去其不善，是之谓研几。吾老师中离先生，年十六闻讲《中庸》，遂志圣贤之学，然求之十余年而不得其门。迨获师承，修之二十余年而未成厥志。一旦悟曰：吾慢于几已乎？吾无贰其事而德弗崇，无弛其功而质弗变，吾慢于几已乎？乃严乃惮，惟良知是则，惟万感之微是慎焉，斯日新矣。三极等早侍而日见其精也，录其言曰《研几录》，皆发明要约以贞夫一者也。谋诸同志梓而受之，用作于观者。"（《研几录》）刘魁字晴川，泰和人。《明儒学案》：正德中，登乡荐，受业阳明之门，为潮州同知。先生讲学中离山，魁常盍簪取益。（《全书·陈海涯传》）乾隆《潮州府志·职官》：魁于嘉靖十四年（1535）任同知，知到任在是年。

十二月，先生弟侨撰宗铠行状。（文载《薛氏族谱》）

十五年丙申（1536）　五十一岁。

先生游江浙，会罗念庵于青原书院。（《明儒学案》）

是岁，浙江诸友数出期一会，先生命驾往至吉安，为邹东廓罗念庵辈留处青原书院者旬月，四方同志听讲数百人。（《薛氏族谱》）

按：钱穆《罗念庵年谱》引《鹅溪彭君墓表》，甲午邹东廓大会士友于青原，知青原之会起于甲午也。

往天真修阳明祠。（《薛氏族谱》）钱绪山、王龙溪、王渐逵皆来会。（王渐逵撰《墓铭》）

督学少湖徐公闻之，檄吉安临江各郡之士赴讲授，郡心翕然归依。先生语诸同志曰："不可。"遂辞而避之，往天真修葺祠宇，访阳明之孤，阐遗教以维同志。常曰：学须见万物一体，乃是孔门正法眼藏。沾沾自足，不能成乎物，硁硁自是，不能通乎众者，去道远矣。（《薛氏族谱》）

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友人林大钦有《祭东泓（宗铠）文》。（《东莆集》）

闰十二月，湛若水为东泓撰《墓志铭》。

好友翁万达有《祭薛给事文》。（《翁襄敏东涯集》）

十六年丁酉（1537）　五十二岁。

五月初六日，先生仲兄杰卒。（《薛氏族谱》）

友人翁万达为广西副使，略定诸夷。（王锡爵撰《襄敏神道碑》）

万达有与先生书云："赤壁行边，经略诸务，会入交近地，龙、凭二州部酋，杀官相踵为乱，交人伺变，境内震骇。某出万死，擒韦应，械李寰，毙赵楷，皆巨魁也。又格杀其余党百十人，二州始帖帖屏息，交人亦悚服。"（《稽愆集》）

十七年戊戌（1538）　五十三岁。

春，先生与王汝中登天目山，憩金山，门人陆南卿与俱。（《全书·祭陆南卿文》）

湛甘泉《答王汝中书》云："前此闻与薛子诸贤为天台雁荡之游，此心飘然，若相与徜徉于两山之巅。"（《甘泉文集》七）

弟侨分考春闱，寻迁东宫右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检讨。

侨分考在是岁。至迁东宫官年月无考，姑系于是年。后侨告归，集潮士立一真会所，发明良知之学，先生五弟伟亦聚讲一真会，埙篪唱和。（见《薛氏族谱》）湛若水有《代简寄薛竹居》诗云："八十六年怀竹居，一真会后定何如？若知真处元无事，连此空名亦破除。"作于辛亥，即嘉靖三十年（1551），附载于此。

二十一年壬寅（1542）　五十七岁。

三月上巳，与林东莆（大钦）翁东涯（万达）谢前山游桑浦之宝云岩。（《林东莆集》三）

《宝云岩记》：宝云"岩与老君、甘露二岩俱有名。……甘露岩洞虚敞，可千人坐，跨玉简峰之胜；而宝云则由桑浦径口南，入两山夹道逶迤，纡曲曲折。……前有宋时，先四世祖秘书潜峰公，与郡人翁庆偰、纪善甫蔡渤讲学于此。时知军州事高寿卿题额曰'聚奎阁'。……岁壬寅，届修禊之辰，余偕同人薛中离、翁东涯、谢前山三君入山，作踏青游。……三君询及往

迹，……遂同质于郡侯郭以享明府，……命山僧以惠董其役，因遗址而架木集工，越十月工竣。”

按：郭以享名春震，江西万安人。周《府志·职官》称春震二十四年任知府，据此记二十一年春震已在任。

夏，游罗浮朱明洞。

是岁夏，先生入罗浮朱明洞，潮士三人从。题壁间曰：“张弩非极力弗开，磨镜非得药弗明。定水非去滓，脚挠之必浊，烧坯非足火力，遇雨终碎。”盖目击时事，因以自箴。未几，岚瘴损一人。（明本《廷鞫实录》附识叶萼《答杨复所询先师寓惠事作郡志传书》）

十二月过惠州，居半径之寻乐堂。

季冬，遣衬还潮，过惠州。叶惠江、谢惕斋、刘古狂留先生居半径之寻乐堂。（叶萼答书）按：《全书》十二《祭陆生南卿》文云：“予与蓝生入罗浮，蓝生遂故于山。”所谓损一人者，即蓝生也。

二十二年癸卯（1543） 五十八岁。

春，迁丰山永福寺。

先生居寻乐堂三阅月，避湿迁丰山永福寺，从游数十人。林鹏举、叶萼日侍讲席，雍见川以河图、洛书、太极图来问，于是著《图书质疑》梓之。惠初未闻阳明先生之学，士多见毒于魏庄渠，讳言学。然天真衣钵来，孰无艳慕？既而钟寇潭、林艾陵、卢康衢自东莞，翟极江、张白野、胡曙峰、车鹤岑自博罗，刘象龙自江右，陈舜夫、沈希周自闽，何古林、王青萝、庞弼塘自五羊，魏立峰自蒲阳，周狮峰、周崦山行部闻之，道旧竟日谈。四方之士，负笈接武至，公日与游衍西湖论学，作《西湖记》。惠人于是广见闻，知法门自有真矣。矢不入城，刺不投缙绅，居常静坐，少观书，时盼湖山，洒然物外，歌咏则左右二三子，因事点化。来谒教缘问，翩翩曲引，不作经传见解，有时而不答。惟请托者接人嬉嬉，不见纤毫畛域，和冲蒸人，腹肠浮躁为之夺魄。供具虽瓠叶二簋，与其徒或对客啖之亡厌。出口非世道则古今学脉，亡一剩语。见人寡言曰：此不见底，难入真境。人寡与曰：此路径太窄，未知一体。人高谈曰：此没头脑，大肆迷妄。人执泥曰：小家相，未识其大善。于讽譬以竦动，其人虽闭塞之甚，一闻忽开；虽胶固之深，一闻遂

活。尝曰：人非万物一体，便失孔门命脉，非学也。葶葶以无欲为事，其为言曰：吾学以无欲为主，然无欲亦精之不尽也。目前见其无矣，精之不几时，又见其无者未尝无也，一生精神，若未希天知命不已也。此外更亡所事。（叶葶答书）

按：丰山一名慧丰，镇丽湖边，山左丰渚，山为归云洞。先生有《丰山步月和周狮峰韵》诗云："野寺湖中景，月上绿杨堤。矫矫鸣阳鸟，飞过倍参差。别去惠锦囊，落我白云居。呼童拈香读，词雄湖海姿。往事已陈迹，逢辰正忧危。行行凌霄汉，维屏壮猷为。寂寂卧烟坞，虚庭花影移。元窍嗟久塞，探赜谁端倪。鲁阳戈入手，宁讶夕阳时。悠哉无穷思，抱独守其雌。"《惠州西湖志》：永福寺在丰山前，宋时为无量寿院。入清先后为万寿宫，为惠阳书院，为丰湖书院。

又按：叶葶《延鞠实录序》云："先师居罗浮，迁西湖之永福寺，时嘉靖甲辰（1544）岁也。"与其答杨复所称癸卯春略异。

二十三年甲辰（1544）　五十九岁。

东莞奇石人刘颐斋迎先生居玉壶洞。（王渐逵撰《墓志》）著《经传论义》。（王渐逵《墓志》作《正义》）

是岁，庞弼塘以东莞善士刘颐斋迎居玉壶洞，同门日质经传，著《经传论义》，更请疏《二论全书》，谓论在不精不粗之间，易杂邪说，正学明，则支离之说自破，著《鲁论真诠》，每书疏数十，令鹏葶侍坐，师同高声诵，叹赏则止。（叶葶答书）

王渐逵访先生于奇石。

逵撰先生《墓志》云："及来奇石，余往访焉。联床数宵，始克合一。盖公涵养日深，大本融逸，所见益明，沛然无所抵石碍。"（王渐逵《墓志》）

夏，刊《图书质疑》、《惠生八问》。

先生自作《质疑小引》云："有气斯有象，有象斯有数，皆理也。数以尽象，象以尽理，理以尽物者，图书也。予少阅弗领，考观众说，只见芜蔓，竟莫释然。顷忽开悟，似甚昭晰，人皆可知可由，而非玄且远也。盖道本一不可二也，本完成不可析也，本具足不可补也；二则杂，析则离，补则赘。后儒动裂而二之，析而补之，道丧其真，学失其枢纽矣。故图书者，心性之源，文字之祖，政治之基本，一差则百差，不可以弗明者也。乃即数为图，

即图成卦，皆造化自然，无俟折补训释，而天地易简之理，圣人精一之义彰矣。诸生闻之，恍然有省，请次图解，并录答问，用质诸君子。然与未然，必有以教我者。寓罗浮西湖，中离薛侃谨识。”（《图书质疑》卷首）

林大钦有与先生书云：“近蒙寄《惠声（生）八问录》，虽辨问周明，莫非实事，然觉毁誉之心未忘，而精察之功少慢。若顾形迹声色之末，非吾廓然无情之体，势将治己约而望人周矣。夫人各有见，是非岂能同？君子尊德性，道问学，非必人人之信己也。同我者欣，异我者矜。或曰：‘以善养人。伊尹以天下为己任，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古人至诚恳怛，以万物为一体如此。此乃生人之根。从此养习充达，方为无上实际。故不见人非，不见己是，物我无间，廓然同春，此吾侪平昔讲究之旨，造次颠沛必于是者也。夫匡章，孟氏与游，而通国以为不孝。伊伯奇至顺，而其父以为不义。人心不同，至亲尚隔，况人人乎？夫子温良和易，至为无忤，而之陈之楚，每至不容，或谓德修谤兴，名高毁来，此犹常谈。夫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圣人之忘于内外如此。故乐天而无忧，圣人之事也；希圣而敦仁，学者之职也。今不孜孜于道之所当务，而徇众人之所知见，则慢易鄙吝之心易生，而精微神化之体难入，此吾与丈之所共忧也，幸相与戮力勉之。”（见《东莆集》）据此则《惠生八问录》者，又曾别帙单行。

门人叶萼撰《廷鞫实录》。

萼《序》云：夏桂州居首相，修《实录》，索此入选，故备述之。

门人成子学、郭维藩同登是科秦鸣雷榜进士。（《潮州府志·选举表》）

先生长子宗铎辟崇光岩于揭阳。今石刻题字犹存。

二月，友人翁万达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明史·翁万达传》）

二十四年乙巳（1545） 六十岁。

秋七月返揭阳。（叶萼答书）

邑令王凤辑《揭阳县志》成，先生为之序。

凤，江西吉水人，举人，创修《县志》凡五卷。先生《序》云：“王公穷陬博采，委郑君峻甫，再月而告成。”峻甫，湛甘泉门人，名大仑，号仙桥，揭阳官溪人。嘉靖壬午（1522）举人，德清教谕。

八月十九日弟僎卒。（《薛氏族谱》）

十一月十九日配黄孺人卒。

孺人生于弘治戊申（1488）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于是年十一月是日，年

五十八，私谥敦济。（《薛氏族谱》）

十二月二十四日酉时，先生卒（《行状》），年六十。葬揭阳地美都之桃源洞凤鸣山。（《薛氏族谱》）

谱后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二月，广东按察司佥事施雨致祭。

同月，揭阳县知县王凤、县丞蔡楠、主簿喻利、典史蔡伯实、儒学训导黄元厚、梁世珊亦来祭。

四月，惠阳东莞刘常、叶时来奠。（祭文俱载《薛氏族谱》不备录，下同。）

同月，惠阳东莞门人姚淮、郑一雅、姚澜、陈沛、姚浤、刘文洽、姚深、李佳、李鹏举、叶万达、胡世祥、陈守经、刘文岳、廖见曾、龚卿、张文道、石俊、刘以成、姚濂、任九河、叶萼、刘彦珣、叶梦奎、李经、刘绍稷、钟岳、杨彦璋、罗烈、罗延寿、欧应选、罗宗学、莫如齿、卢存礼同致奠。

祭文云："於乎！伤哉夫子！吾复何言矣。良知之教，犹在吾耳；乐易之容，犹在吾目；作圣之志，犹在吾心也。伤痛可如何哉！追思去岁洪石泉之来玉壶也，云离翁脉理，至八月戎疾当作，今欲奉迎东归。淮等窃谓夫子之摄疾罗浮也，不迩声色，不殖货利，疾从安作？每致疑于石泉子之言。夫子亦不忍弃二三子而遽归也，惟欲遍观二三子之学有所就，而经传之训直底于成也然后归；二三子依依之志，亦不忍遽违夫子之侧也。惟欲夫子久居于此，得以领教于无穷，其于石泉子之言若罔闻也。而子化诸兄，屡以四师叔之恙来报而后归。二三子时各系于庠序，不能遐随于离山之巅，临别乃为丁未武夷、白鹿之约，拟与龙溪诸君打归一而后归。於乎！相期之志，可谓远且毅

矣。讵知仲秋过旬之后，脐患重作，而春冬书来，则云疮已渐愈，是为再世之人，当复无患矣。淮等又幸石泉子之言无征也，而依归之愿，何慰如之！今春闻夫子奄逝，淮等且疑且骇，遍访潮，言人人殊，然犹未敢以为然也，不数日而讣音继至。於乎！天乎！胡夺吾夫子之速乎！吾夫子之筮仕也，志未大行于天下，而与当世之士讲求阳明夫子良知之学，其成己成物之志，亦可谓远且大矣，而竟不获以跻期颐之域。於乎伤哉！天之不相斯道也固如此矣，吾复何言哉！虽然，朝闻夕死，夫子固已无憾，而淮未有成。疑也，谁其解之？回也，谁其释之？成章也，谁其化裁之？於乎！天胡夺我夫子之速，而俾淮等学问之无所成也。於乎痛哉！闻讣之下，未能即哭于潮，不胜伤悼，乃率二三子就夫子所游之馆，制服悬像，对泣竟日而还。淮等不得亲供殡殓，罪莫无极，所幸幼嗣皆能，必诚必信，当勿使有悔矣。淮等学未有成，而秋阳之思，奚啻曾子。夫子大知，其尚默相于冥冥之中，知也启之，行也翼之，庶几不至昏而且怠。而二三子者，质虽不敏，敢不互相鞭策，以承我夫子之教乎。试期渐迩，不能奔哀于潮，谨具菲仪，属洽先往奠焉。惟夫子有灵，其尚来鉴之也。於乎伤哉！”（《薛氏族谱》）

是月，弟侨撰先生《行状》。（文载《薛氏族谱》）

五月，同门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陈大纶致奠。

祭文云：“呜呼！圣学湮晦，降自周程。天启先师，以觉我人。兄闻风而崛起，昆季翩其蜚英。始钻坚于南都，继仰高于虔城。曰大道其不远，惟寡欲以养心。察良知而烛炯，见天性之孔神。亶日乾而夕惕，若临履于渊冰，剪康衢之榛秽，塞多歧之纷纭。慨任重而道远，刚迈远而遐征。置毁誉于若一，何得丧之能婴？既遭蹶以林卧，益钩极于精深。谓困苦与郁抑，殆天意之可谌。胡六十而温化，曾不假以遐龄？豹别兄八载，恍昨暮与今晨。读《研几》、《质疑》之录，若面命而耳聆。得伏忱之琅函，惠进修之好音。矢尽涤其偏蔽，酬雅志于平生。此缄未启，讣音先承。谅渺末之在念，取近譬以相箴。敬服膺而勿堕，敢忘垂绝之殷勤。知灵爽之不昧，听斯语于冥冥。”（《薛氏族谱》）

九月乙卯，应天府通判庞嵩遣门人刘文岳致奠。

十二月，巡抚都御史张岳遣揭阳县儒学训导黄元厚来奠。

同月，门人徽州府同知杨日赞遥奠。

二十六年丁未（1547）正月，都察院都御史顾璘、潮州府知府郭春震俱致奠。

二月庚子，广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朱纨，右布政使龚辉，左参政张鏊，右参政张烜，左参议顾中孚、朱宪章，右参议方民悦，广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屠大山，副使陈恺、袁载、张宝、周宗镐，佥事何元述、陈捷、施雨、陈崇庆来祭。

三月，门人成子学过天真精舍，谒阳明先生祠，见先生神位在左，亦为文致奠。

九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缄词束帛，托总督大中丞静峰遣官致祭。

吴鹏、柯乔、韩柱来祭。(月日未详)

二十七年戊申（1548）正月，潮州知府郭春震、同知王贵、推官赵沚、海阳县知县褚宗录、潮州府儒学黄仲阳、训导江用舶、陈伯容、吴全、王茂，海阳县教谕宋楫、训导杨枢、黄仪致祭。

七月，漳浦门人林成纲、林一新、林楚哭奠。

八月，朔，巡按广东监察御史黄如桂，遣揭阳县儒学教谕黄启初致祭。

同月朔，广东按察司按察使李遂来奠。

二十八年己酉（1549）二月，揭阳县教谕黄启初、训导黄元厚请崇祀典。奉巡抚张批，入祀府学乡贤祠，提学蔡批，入祀县学乡贤祠。(《薛氏族谱》)

八月，潮州府通判黄懋允、涂渠、推官赵沚奉奠。

同月，揭阳县知县郑用宾、县丞蔡楠、主簿杨继嘉、典史蔡伯实来奠。

九月，先生仲子宗釜，往谒少詹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前南京国子监祭酒黄佐，为撰《中离山记》。

又谒南海何维柏，乞为先生传。(文载《薛氏族谱》)

同月十九日，湛若水撰《宗山祠堂记》。(《薛氏族谱》)

文云："新建伯阳明王先生，其豪杰之必为圣人者乎！中离子薛子，其阳明先生之入室弟子乎！阳明公道义在人心，勋业在朝廷，然而君子必以教言焉。中离子行义在乡里，名节在朝野，然而君子必以学言焉。何居？重道教也。阳明子之教，良知之教也。正德丙寅，与甘泉子初定交于京师，兵曹清黄语人曰：吾从官三十年，未见此人。其时共尊明道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学是矣。谪去龙场，归而教人也，一变而为正念头之说亦是矣，再变而为致良知之说亦是矣，皆是也。然而致良知者，阳明之定教，其说出于孟

子，夫岂有差别哉？或曰：新建公于孟子良知良能章，独举良知为教，何居？或者有深意存焉否也。欲人知知之贯乎行，知行为不贰也乎否也？甘泉子亦尝有言：学问思辨开其知也，笃行恒其知也，学至恒知焉尽之矣。天包乎地，知通乎行，通乎行而知者，圣学之始终也，其与阳明公举良知之说，不约而同矣乎否也？虽然，学必会其全。问之曰：良知何知矣？则应之曰：无不知爱亲，无不知敬兄可也。爱敬之真心，即天理也，是其同也。问之曰：良知能为亲亲敬长，何以为仁义矣。则应之曰：达之天下可也，扩爱敬之心以达之天下，通天下以为知焉，伊尹之先知先觉乎，斯道可也亦是矣。或曰：如斯而已乎未也？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知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乐则生矣，生则乌可已也；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天下之道皆原于爱敬焉，发之，曰：如斯而已乎未也？曰：以其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以其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此孟子之大全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蕴而孟子发之也。或问曰：说良知者则曰常知，曰常觉，不曰爱敬，不曰达之天下，岂阳明公之意异于孟子固如是乎？甘泉子曰：吾为惧，往往为之明辨，以间阳明之道，岂得已哉！间阳明之道以间孔、孟、周公、文、武、禹、汤、尧、舜之大道，岂得已哉！中离子入室弟子，所著《研几录》、《图书质疑》，皆以发明师之的指，无后来毫厘之差也；然则其所得必不可量矣，惜我与之离索之久，未得闻其详耳。曰：然则薛子之忠义在朝野也云何？曰：行人尚谦，遭大狱于朝，明目张胆于天子之廷，义气冲空，百折不挠，若有之死而不可回者，则其中之所存，与平素之所养，一念真切，浩然刚大之气，无愧于天地，无愧于日月，无愧于鬼神，是宜其在潮感潮，在惠感惠，闻于诸司感诸司。诸司可其白，立祠宗山精舍，上祀阳明公，下以中离子配焉，凡若干楹，有田凡若干亩，以永住守焉。以其德之所感若此，可以知师傅之学哉！其弟竹居子尚迁能世其学，复置田贰百亩于祠，以赡学者，乃令中离次子来居学天关精舍，请予记。予老且病，乌能文哉？苟力疾捉笔述其始末之说，以剖学者之藩篱，以不贰于阳明中离授受之的指云。”（《薛氏族谱》）

二十九年庚戌（1550）六月，吏部稽勋司行取金谿、黄直来奠。

三十三年甲寅（1554）九月十一日，先生长子宗铎卒。（《薛氏族谱》）

三十九年庚申（1560）十二月，门人饶平县教谕漳浦林成纲、生员张时翀

来祭。

四十三年甲子（1564）四月十五日，先生六弟侨卒，年六十有五。（《薛氏族谱》）

隆庆元年丁卯（1567）十二月，有诏赠先生承事郎河南道监察御史。（《明史》本传、《薛氏族谱》）

二年戊辰（1568）冬，先生侄孙洪，集其父宗铠前后奏疏并行状墓志诸祭奠文，辑为《光裕录》。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琼山海瑞为之序。（《薛氏族谱》）

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大学士申时行请从祀阳明。（《明史·王阳明传》）先是有从祀之议，澄海唐伯元独排之，并讥及先生。疏下，为南京给事中钟宇醇所驳，伯元坐谪海州。（《明史·儒林传》）

附唐氏《疏》云：正德嘉靖间，乃有新建伯王守仁者，始倡为致良知之说，行于江南，而其旨顿异；彼其初意，非欲有异于熹也，但以识太敏，才太高，任道太勇，立言太易，当其谈锋溢出，前无古人，故往往不觉其抵牾于熹。而为之徒者，推波助澜，争高门户，益以疑天下之心，而遂为敌国。往该浙江抚臣题请祠额，伏蒙皇上赐以勋贤之号。夫守仁以道学自名矣，不与儒者之称，而只曰勋贤，天下之人，有以知我皇上厚恤勋臣之意，而惟恐其学之有戾于道或以骇见闻也。又近该台省诸臣，后先疏请从祀，经时累月而不遽定。乃者虽蒙俞允，然伏读御批有曰：操修经济，都是学问。夫祀典之所重可知已，必以经济与操修并言者，天下之人，又有以知我皇上念守仁有殊功，则当有殊报，不必其学问之有异同也。大哉皇言，一以劝功，一以正学，所以立天下万世臣民之极者至矣。但祀典既新，人情观望，学术歧路，从此遂分。故祭酒张位拳拳以今准从祀布衣胡居仁为言，而洗马陈于陛、少詹事沈一贯又欲并祀祭酒蔡清，无非欲全朱熹以安守仁，皆委曲以明不得已之意。观其言曰：恐学者过于信守仁而轻于诋朱子，则守仁岂能一日安于庙庑之间哉？又曰：恐学者谓朝廷尊宠王氏，此重彼轻，则今之进王，乃所以斥朱，而道术将从此裂；祖宗表章朱学，以为制考之意亦从此坏。甚矣诸臣之忧深而虑远也！不知我皇上以诸臣之见，是耶非耶？夫察之也未详，则其虑之也不周，见之也未审，则其防之也不预。当此祀典初颁之时，正观听移易之始，如其虑之不周，防之不预，使诸臣之忧，验于异时，是我皇上崇贤报功之殊典，适以违正学明道之盛心，岂惟诸臣之忧，亦皇上他日之所必悔也。何也？其察之也未详，而见之者未审也。皇上深居九重，万几之暇，所稽者祖宗训典，所对者圣贤诗书，所探讨者古今帝王治乱兴衰之迹。若欲考

真儒，上自鲁邹，下逮濂洛关闽止矣，何暇详于守仁之学，而辨其是与非？乃天下之疑守仁者，皇上亦从何而闻且见也？臣是以不避烦琐，敢为皇上陈之：世之訾守仁者有六，而守仁之可疑者不与焉。訾守仁者，一曰：道不行于闺门也。臣以为守仁少负不羁，长多机谲，一旦去而学道，遽难见信于妻子，亦事之常。人见其妻朱氏抗颜而揖门生诟守仁也，遂执以盖其生平，此未足为守仁病也。一曰：乡人不信也。臣以为乡曲之誉，必其人无子弟之过者，而守仁固不能也。夫老而无述，圣人羞称，士能闻道，一日千里，况以守仁之才之识，而可量乎！人见其议论过高，而言动气象，未见有异于常人，其一二为之徒者，又多蒙不洁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也，益以暴其短也。而臣以为抑末也。一曰：宸濠之功状疑似也。臣以为宸濠之不能有为也，不待守仁而办也。说者谓其未发既无先事之防，既发又有张皇之状，踪迹诡秘，行止支吾；使非吉州忠义伍守方略，江藩之变，未可知也。道路讹传，至今不解，其徒又呶呶而为之辨，故令听者愈疑。夫朝廷之劝功也，但考其成，君子之论人也，贵成其美；如守仁之功，报之以伯爵诚当，即进而配享于功臣之庙，亦无不可。故曰：宸濠之功状不必疑也。一曰守仁之学，禅学也。臣以为守仁非禅也，夫禅者泊然一空寂于内，澹然绝慕嗜于其外，彼其道亦有可以治心养性者，使能不屏伦理而自为一家，君子犹有取焉；若守仁者，机多而智巧，神劳而形疾，傥所谓禅者，亦呵佛骂祖之流，窃无修无证之糟粕者耳，而守仁非禅也。一曰：守仁之儒，霸儒也。臣以为圣人之道，得王而信，得霸而尊。夫圣人未尝不与霸也，一匡九合，春秋著之特详。何者？彼固窃圣人形迹之似，而非敢曰我圣人也。若守仁之自处，则已断然自为圣人，其徒亦推崇之，跻之颜、曾、思、孟之上矣。是故守仁非霸也。一曰：守仁良知之旨，弄精神也。夫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也。是故《大学》言诚意正心矣，而必以修身为本，孟子言存心尽心矣，而归于修身以俟君子，引而不发，但言工夫，不说本体。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则臣平日之论也。虽然，弊也久矣，苟不至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之猖狂，皆有可恕者；此不宜又独疵守仁，而守仁之可疑，亦不在于弄精神之失也。夫立于不禅不霸之间，而习为多疑多似之行，功已成而议者不休，骨已朽而忿者愈炽，吁！可以观守仁矣。臣未暇论其良知是否，且就其说之自相矛盾者论之。守仁之言曰："心即性也，心即理也，心即道也，心之良知，是谓圣也，心之良知，即天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可谓自其言矣。然又曰："致其良知，以精察此

心之天理。”又曰：“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然则良知与天理为一乎？为二乎？曰“佛氏本来面目，即圣门良知”，曰“良知即是道”，曰“至善者心之本体”，似夫知性矣；又曰：“无善无恶者心之体。”又曰：“无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然则人之有性，果善耶？果恶耶？曰“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矣，曰“天地无良知不可以为天地，草木瓦石无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然又曰：“良知本体，原来无有，人心本体，亦复如是。”然则良知之在人，果无果有耶？驳朱注曰：“‘格物者，穷至事物之理也’，功夫在穷，实落在理，若上截穷字，下截理学，但曰至事，则其说难通是矣。”彼其自为解则曰：“致我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致良知者，致知也，事物得其理者，格物也。然则致知与格物，孰先乎？孰后乎？守仁之言后先矛盾而不顾，大率类此。又有间为奇险之论以反经者，如谓曾孟非孔颜之传，则是颜曾异学也；谓知即为行，则是目足齐到也；谓明德在于亲民，则是本末先后倒施也；谓冬可以为春，则是阴阳昼夜易位也。又有故为互混之论以遁藏者，如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不知心体本无，则善恶之名，从何生也？曰：“不睹不闻是本体，戒慎恐惧是工夫。”又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不知本体工夫，从何别也？曰：“有心是实，无心是幻。”又曰：“无心是实，有心是幻。”不知实与幻、有与无，从何定也？苏秦、张仪，缙绅之所不道也，守仁则曰：“秦仪窥得良知妙用，圣人之资也。”孔子之圣，生民之所未有也，守仁则曰：“圣人犹金，尧舜万镒，孔子九千镒也。”又曰：“求之吾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大发千古所无之异论，欲为千古所无之异人，彼谓不忍操戈而入朱熹之室，不知其操戈而入于孔氏之室也；彼谓朱熹之学为洪水猛兽，不知其自陷于洪水猛兽也。当时尚书湛若水与守仁至契，亦尝答吕怀曰：迩来横议，汤沸火燎，眼中已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矣。尚书张邦奇答唐顺之曰：今之讲学者，至于狎侮天地，秤停诸大圣人分两轻重之类，开辟以来，未有无忌惮若此者。太常卿魏校答崔铣曰：自守仁说行，而杨简逆天侮圣人之书出祸天下，其邪说甚于无父无君。提学林希元作《四书存疑》曰：天地间自来有此妖怪，如许行邪说，至为无谓，犹有从之者，无怪良知之说惑人也。夫此四人者，皆世所谓贤人君子，且素重守仁者也，而力诋之若此，是必有大不得已者，夺其情也。且自国朝以来，真儒如薛瑄，已从祀无议矣，从祀之道自任者，莫如今准从祀检讨陈献章，守仁之徒所推服亦莫如献章，今献章之书具存也，有无忌惮如此者乎？彼为之徒者，往往

推守仁于献章，而不知其不类也。何以明其然也？彼驳朱熹穷物理之说曰：如求孝之理于亲之身，如恻隐之理于孺子之身。不知熹无是教也。又曰：亭前竹子，穷物不通，七日成疾，以为格物误人。不知熹无是学也。以一心好酒，一心好色为主一之功证，居敬之失，不知好酒好色不可以为敬，亦未有敬而好酒好色者也。如此之类，欲以病朱熹而愚天下，至指之为神奸所伏，考献章之言有如此者乎？观其诗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又曰："一语不遗无极老，十年无倦考亭翁。"吁！何其尊之至也。守仁之奖借其徒，人人闻道，处处颜曾。如哀主事徐爱之亡曰：汝与颜子同德，则是颜子在门也。别山人董澐之序曰进于化也无难，则是自处已化也。指王畿心意知物善恶俱无之见，为明道颜子不敢当，则是王畿过于明道颜子也。臣之郡人杨氏兄弟仅及门，而一皆称之为闻道，此外又有薛氏兄弟子侄之盛，又有毅然任道数十人之多，则是邹鲁诸贤，不足以当臣一郡也。奖人以所无之善，诱人以伪成之名，枉其心之公，贼夫人之子，惑世诬民，莫此为甚！考献章之言，有如此者乎？观其语李承箕曰：世卿以欧苏人物自期，安能远到？其伦张诩曰：廷实是禅矣，但其人气高，且不可攻。吁！何其严之主也。夫朱注之行久，学士遵为矩矱，而求其体验于身心者实少。自献章以静入诚养见大无欲之旨迪人，而学者始知反求诸内，可谓有启佑之力；然其补偏救弊之言，亦不无时有稍过者。昔程颢有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常时皆谓发前圣所未发，而朱熹独谓其太广而难入。献章之言曰："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又曰："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读书。"虽出于救末学之弊，而臣亦谓其语意尚须善会。又曰："谁家绣出鸳鸯谱，不把金针度与人。"则极喜程颢与物同体之说。或者病之，又谓金针之语不当喻学，而臣则以程颢献章各就己所至而言朱熹之意，则为圣教而发，若乃所引禅语，诗家借用，似无嫌于同辞者。要之，圣人无是也。夫道中而已矣，教中道而立而已矣，卑之不可，高之不可。贤者立言，往往不能如圣人大中而无弊也，此圣贤之分也。虽然，不意守仁之好异一至于此也！考胡居仁与献章同时，同受业于吴与弼者，然尚以献章之学为禅，使其生于守仁之日，将不知其指守仁为何如人也？守仁之学，实从湛若水而兴，若水献章之徒也，所谓良知，岂能出献章造悟之内？而生平论著满车，曾不挂口献章一语。呜呼！彼固上薄孔子，下掩曾孟者，固宜其不屑为献章也。或者比而同之，过矣。推守仁之意，生不欲与献章齐名，殁岂欲与献章并祀。傥如守仁者，而欲议祀典，则必巍然独当南面，而孔子为之佐享，如颜曾思孟周程，犹得列之廊庑之间，彼程颐朱熹而下，当

并弃之，不与同中国矣，岂能一日同堂而居也。呜呼！此皆由守仁自任之太过，虽守仁或亦不自知其至于此也。臣少年读其书窃喜，盖尝尽弃其学而学焉；臣之里人，亦有以臣将为他日守仁者。赖天之灵，久而悔悟，始知其自奇智解者，乃工于获短之谋也；其借口一体者，乃巧于盗名之术也；终日招朋聚党，好为人师，而忘其身之可贱也；稍知廉耻之士所不肯为，于是颜忸怩而心愧畏者累月，是以宁谢交息游，不敢学媒约之言以奖进人物，宁其中一无所有，不敢高阔其谈以骇人惊世。何者？自顾其才非其才，其道不敢道也。昔马援戒其子侄曰：杜季良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吾爱之重之，不愿尔曹效之，学而不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里妇效颦于西施，其姑见之曰，此吾妇也，胡然化而为鬼也。故守仁之学，有守仁之才则可，无其才而效之，不为狗成则从鬼化。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别于鬼魅者，以其平正明实，守经守礼，虽愚夫愚妇，可望而知也。今若此则又何贵焉？然以臣昔日之误，则天下之为臣者，宜不少也，以臣之迷而后悔，则天下之迷于其说者，皆可原也。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踏也，中庸不可能也。"夫宁学中庸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君子之所以戒慎恐惧也。负三者之行，索隐行怪以为中庸，而欲以凌驾古今，小人之所以无忌惮。虽然，中庸之难能久矣！如献章之与居仁，皆学中庸者也，教求其至，即献章之诚笃光辉，臣犹未敢轻许；况居仁乎？而又何责于守仁也？若舍中庸而论，则守仁者，亦一世之雄，而人中之豪杰也。乞宥言官一疏其气节足尚，江西广右之功，其勋名足尚。《传习录》虽多谬戾，拔一塞源之论，亦不免借一体以行其私，独训蒙大意一篇，能道先王之旧，而象山祠、文山祠二记，与客座谕俗数语，有可以警发人心，其文章足尚。三者有其一，已得祀于其乡，合之以祀于孔庙，似亦不为甚过。乃臣之所为过虑者，亦窃比诸臣之忧耳，诸臣之忧，实天下之人之所同忧，不可不为之防也。《书》："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其论为邦曰："远佞人。"佞人殆是以共工之流。两观之诛，自后世观之，皆若大远于人情，而不知圣帝明王，皆急急以正人心为第一义也。今守仁挟秦仪之术，薄孔孟之教，张皇告子佛氏杨简之论，而自谓千古一人，举世皆知其利口巧语，而拟于谗佞，是大舜孔子之所畏恶也。我皇上方隆唐虞之治，崇孔氏之学，而又以祀典宠守仁之功，事虽若可以并行，义不可以不明辨。（下略）

（见《醉经楼集》）

三十七年己酉（1609），林熙春跋《研几录》。

文略云："余少从家大人受书，则有中离先生《研几录》。曰：'先生为阳明首座，读此有裨圣学。'时有事帖括，解者十七，所未解者十三。比杖斥家食，搜此书无有，始就先生裔孙诸生士彦茂椮得抄本读之。见其精密恢扩，直发前人未发，圣人复起，不能易矣。近来姚江标柄，人间疑其支离。先生之学，有入门归宿，而一生气魄，百折不回，真为姚江功臣。第此书阙，只存千百什，姑缀数语简端。俟获全书，当叙付剞劂，为先生传神。岁己酉，乡人后学林熙春识。"（《研几录》）

四十二年甲寅（1614），都察院准礼部咨请谥先生。（文载《图书质疑》末）

四十四年丙辰（1616），先生文集刊行。（曾彭年撰《全书题记》）

按：此即先生孙德卿所梓，《千顷堂书目》著录四卷本。（详《潮州艺文志》）

四十五年丁巳（1617），先生曾孙茂杞重刻《图书质疑》及《研几录》。（见《图书质疑》卷末）

崇祯六年癸酉（1633）四月，揭阳县知县陈鼎新撰《中离集序》。（文载《薛氏族谱》）

十年丁丑（1637），邑人为先生侄东泓建祠于金山。（《海阳县志·建置略》）

十一年戊寅（1638），先生曾孙茂椮刻《廷鞫实录》。

十二月，张明弼撰先生文集序。（文载《薛氏族谱》，文又见张氏《榕城集》卷五。）

十三年庚辰（1640），张明弼撰《东泓祠堂记》。（文载《薛氏族谱》）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潮州府知府吴颖建理学名贤祠，祀先生。（《海阳县志·建置略》）

记略云：郡之金山，有周濂溪先生祠，由来旧矣。廖槎溪以紫阳高弟判郡事，今从祀孔庙。王阳明抚虔，潮人士多从之游，为建祠城西。独紫阳先生曾游于揭，主同年郑氏家，题诗石壁去，而缺焉无祠。后之宦游潮者，郡丞刘晴川、揭簿季彭山，位诎道伸，潮人以为师。而此邦所称闻道好学之人，如三薛立朝，不愧名节，二杨兄弟，自相琢磨，陈海涯笃实躬行，林龙湖陈

员溪讲学不倦，皆圣贤之徒也。呜呼！濂溪祠改而贮火药矣，阳明祠第为马厩矣，兴废之故，可胜感矣。岁辛丑元旦，谒庙，见郡学侧有旧屋三楹，故为复礼祠，今盐贾僦居，因议新之，以祀理学诸先生十有四人。首濂溪，次紫阳，又次槎溪，从乎濂闽之传者也。于明则首阳明、晴川以下，或游宦，或授业，或私淑，皆衍王氏之学者也。发一堂之问学，化三古之异同，予窃于合祠有深幸焉。榜曰理学名贤合祠，并次第其事，以永之无穷。（《海阳县志·建置略》）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惠潮嘉道诸城李璋煜，委教授顺德冯奉初，刻《潮州耆旧集》（《耆旧集》冯奉初序），选先生文编为《薛御史集》。（列于《耆旧集》第四卷。）

民国四年乙卯（1915），揭阳曾彭年编印《中离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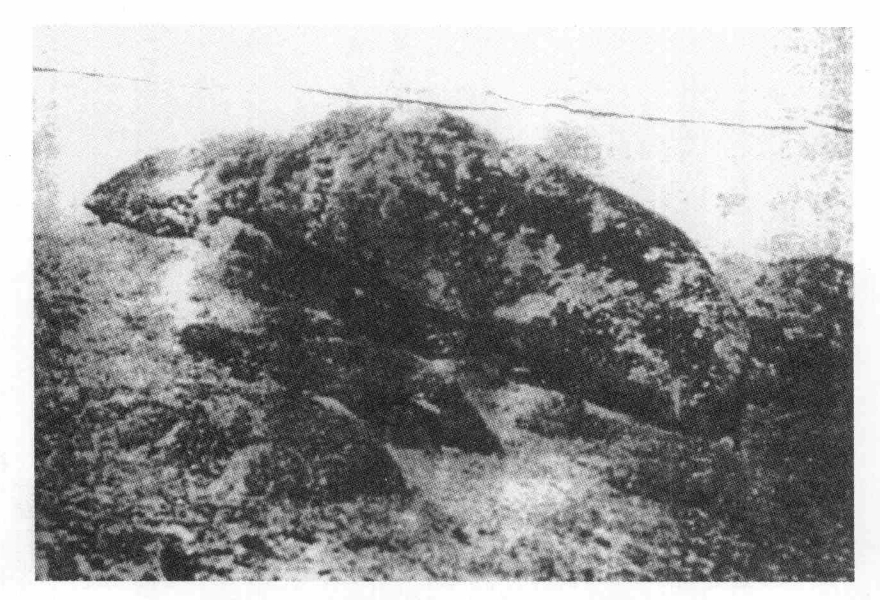
题记云："先生书存者凡三种：曰《研几录》，刊于嘉靖乙未（1535）；曰《图书质疑》，有先生自序，不言付刊；曰《文集》，刊于万历丙辰。今乙未丙辰二板久无存，《文集》尚有旧家藏本，《研几录》《图书质疑》则皆辗转传抄本也。三书各为卷数，惧其散而易佚也，用陆文安王文成二书例，合而刻之，另加编次，订为二十卷。先之以《研几录》，《图书质疑》次之，《文集》又次之，而附以先生侄东泓给谏《疏草》终焉。道光朝，冯氏奉初辑《耆旧文集》，于先生作，具见搜罗，恨非足本；当日校雠尚精，抄本讹脱，往往借以是正，其校无可校者，则姑仍之，不敢轻易窜易，示慎也。又案杨文懿公起元《惠州寓贤记》，称先生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经传正义》、《中说》、《西湖记》诸作，《鲁论真诠》未成，稿藏李鹏举家，又十余年，叶萼得之其蔽笥中，追忆续成之。王氏渐逵《墓志》、何氏维柏《传》，均称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经传正义》，湛甘泉氏《宗山祠堂记》则仅称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以上四家所叙先生著述，互有不同，然考文懿所称前三书与王氏何氏同，其《中说》寥寥短篇，已见《文集》中。《西湖记》无存，至《鲁论真诠》，则明言叶氏续成，非尽出先生手著，且叶氏续书时，在先生既没十余年之后，则为家传与志墓之文所不及见，亦自有说。惟《经传正义》为甘氏《祠堂记》所不载，则一疑案耳。冯刻《耆旧集》，亦不及《正义》、《真诠》二书只字，冯氏去今近百年，搜辑较易为力，乃亦仅此，则此二书之亡，盖亦久矣。附著于此，以谂后之读先生书者。"（《全书》卷首）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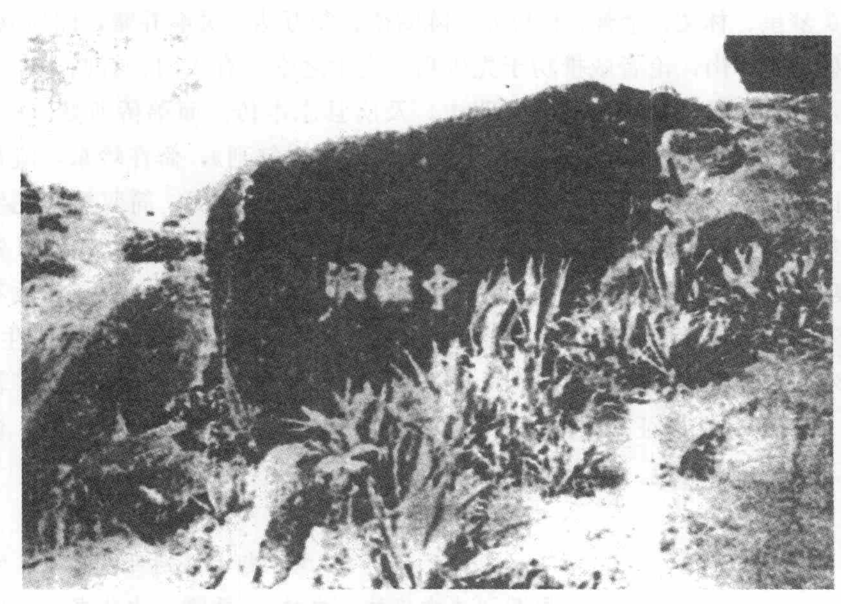
中离先生为王门高弟，首钞《朱子晚年定论》，刻《传习录》，于师门宗旨，多所敷发。阳明居赣州，先生偕兄俊及群子弟往问业。由是杨骥、鸾兄弟，黄梦星、林文、余善、杨思元、陈明德、翁万达、吴继乔辈，闻风兴起。王学盛行于岭南，论者咸推功于先生焉。先生之学，有入门、有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其节概具见《明史》及府县志本传。而弟侨所撰《行状》一文尤详，载钞本《薛氏族谱》。予曾录刊《方志旬刊》，僻在岭东，流布未广。比者，广东文献馆将刊行《广东文物》特辑，叶玉虎、简驭繁两先生征文于余，以中离思想事迹为题，乃于凤陇薛家假得《薛氏族谱》，参以先生《文集》，撰次为谱，著其行事，系年纪要。至其学说，《全书》具在，故不详及。附载王门潮籍诸君子，其谊兼师友者，有郑一初，事阳明盖在先生前，亦并列焉。先生廷鞫经过，向有叶萼《实录》，不复觌缕。至若先生《著述考》、《学侣考》，以征稿限迫，未及写定，兹暂从阙。是稿以半月之力，仓促成篇，疏漏知所不免。容俟异日，再行苴正。

戊子冬十月朔日，饶宗颐附识

原载《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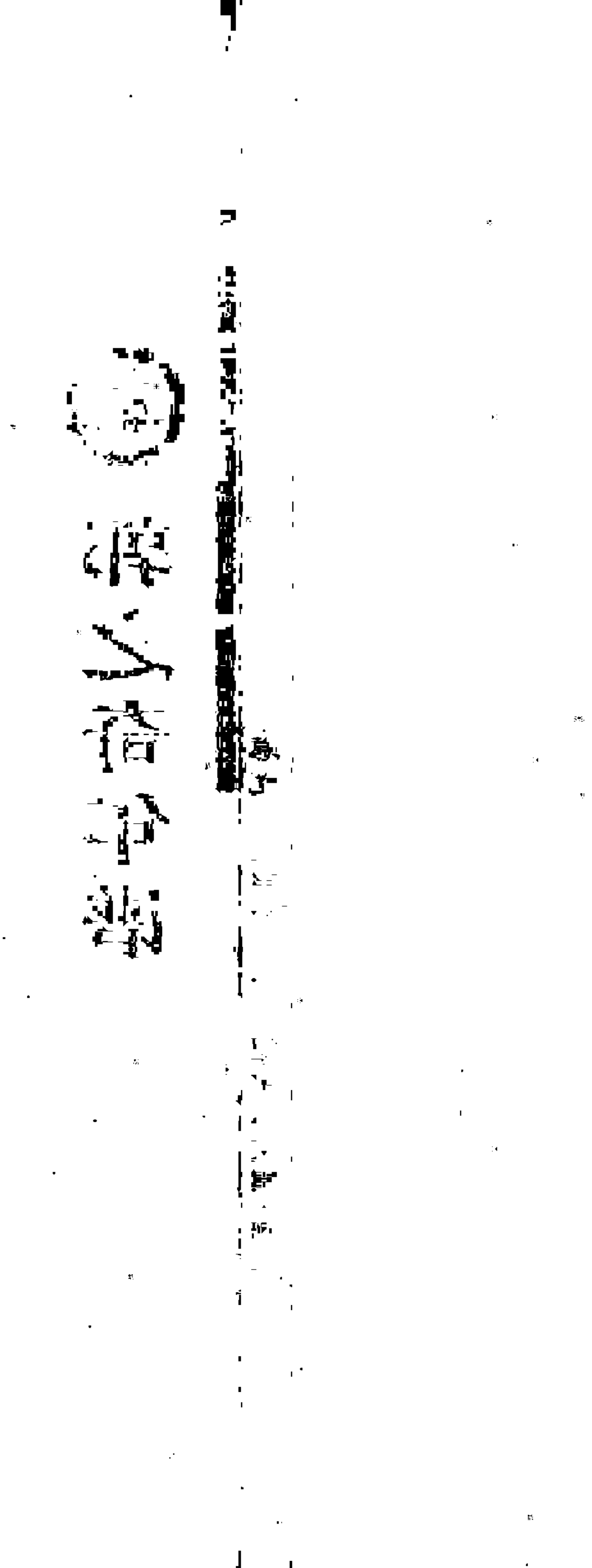
图一　东岩（中离山十八景之一）薛侨所辟



图二　中离洞（在今桑浦山，中离先生辟）



郭之奇年谱



目　录

引　言

此年谱稿弱冠时草创，抗战中，播迁揭阳县城，曾造郭氏旧居，得睹其家乘，故于世系能详加胪列。公之著述若《稽古篇》、《宛在堂集》，均余家中庋藏之物，先君撰《潮州艺文志》，时常考览，小子侍笔砚，知之独详，因据以载录。溯自鞅张以来，奔走异地，先人故庐，文籍荡尽，不可复问；而此稿弃置箧衍，绵历星霜，忽忽四十年矣。比岁屡尝旅游粤地，北至乳源，西南适新州，谒六祖出生之地，甚思南极雷、廉，凭吊公晚岁循海流离转徙之所，而人事沧桑，骤不易得。顷者汉升先生征稿，因取此文略加点窜，聊付剞劂。呜呼！迭遭丧乱，积稿沦于兵燹者不可胜计，独此尘封累载之丛残，幸告无恙，似公之灵实呵护之。

检谢国桢《晚明史籍考》重订本，于公著述各种，只字不提《宛在堂集》，东京内阁文库犹有其书，而诸夏竟成稀本。以谢君殚极数十载之力，于公遗事尚陌生如此，故此年谱于南明史事大有裨益，刊布夫岂容缓？用志其成稿颠末，以见一文之刊，其成毁显晦，亦有缘遇，非可力强而致也。此稿整比誊正，赖门人郑炜明勷助之力，不可不书。

己巳（1989）端午后十日，饶宗颐识

谱　前

先生名之奇，字仲尝，号菽子，一号正夫，又号玉溪。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东门人。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八月十八日庚辰，于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壬寅（1662）八月十九日己未就义，年五十有六岁。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定《殉节录》，复先生原官，赐谥忠节。嘉庆二年（1797），奉旨崇祀忠庙，兼祀乡贤。

按：先生事迹，详具先生长子天祯所撰家传，载《榕东郭氏族谱》。

郭氏之先，福建莆田人。太始祖有处士曰毅山者，其裔孙为宋节推，官于潮，卜居海阳县登云都，有德于乡。孙六人，次名曰诚，号原兴，始移居揭阳县城东关，是为榕东郭氏之祖。

元兴公有子二，其次名立，号刚直。配陈氏，生子二。长名善，字南峰，即先生之曾祖，以先生贵，累赠如先生官；配柯氏，生子一，名明作，即先生之祖父也。

明作公号静湖，庠生。秉德礼让，以文行显，祀乡贤。以先生贵，赠如先生官。生于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五月廿一日，卒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五月十三日，年六十七。配洪氏、陈氏。

先生父名应试，字国征，号首鸿。静湖公长子。邑庠生，授州同知。生平恂恂，闭门扫轨，人称为南极老人。生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5）八月初

五日，卒于隆武二年丙戌（1646）十二月十五日，年六十三；配林氏，南安州学正林益盛（隆庆二年明经，揭阳人）孙女。

首鸿公生子八人。长用章，次即先生，三之章，四之廉，俱嫡出。五之宰，六之产，七之竑，八之音为庶出。

长兄用章，字伯尝，号俊夫。由府学廪生援例加勋，署补武英殿中书科中书舍人。配曾氏，子二。长锡禄，字尔功，由选贡授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次天祝，字尔山，国学生。（《年月志》）

三弟之章，字叔尝，号文夫。意气轩昂，及冠食饩。隆武丙戌（1646）八月登明经，九月以御寇守城战死。配谢氏，子二：天禧，字寡庵，监生；天价，早卒。

四弟之廉，字季尝，号介夫，永历中，奉敕以兵部员外郎集义旅，应西师事，泄败。

按：《府志》载之廉顺治辛卯恩贡。其时选举未兴，恐后来追赠。配方氏、洪氏，子三。天礼、天祀，俱庠生，以文学显。另一子名天禄。

五弟之宰，字立夫，六弟之产，具庠生。七弟之竑，字昱夫，增生；迁居棉湖。八弟之音，国学生。

先生元配林氏，海阳人，林尚书谥忠宣熙春长孙，兵部职方司主事林绍铉长女，三加锡命一品夫人。年三十三。

继室周氏，澄海冠陇人，庠生周良泽三女，再加锡命一品夫人。年六十九。

继室张氏，直隶顺天府人，中极殿大学生张翼凤长女，敕封一品夫人。年十六来归，十九岁卒于石井。

侧室陈氏，海阳人（年十七归先生，二十五岁生天禔）。年八十六。

谢氏。

侯氏。上二人并死于壬辰（1652）马鞍山之难，赐祭葬，褒嘉义烈，诰封淑人。

先生子四人，义子一人。

长天祯，字尔兴，号二则。康熙九年（1670）岁贡，荫尚宝司丞；娶崇祯戊辰（1628）进士浙江仁和县知县宋兆禴季女。年六十一。

次天禔，字尔肃，号宓庵。康熙十七年岁贡，荫尚宝司丞；娶尚书黄奇

遇女。明末从父走荒域，及父入交趾被获，以身蔽父，刃挥其颅，血涔涔不少却。洎父死桂林，扶榇归里，负土筑茔，结茅芦墓。事前后母能尽孝。著有《屯园尺牍》、《溪堂诗集》。卒年七十四。

按：事迹详《府志·孝友传》及《揭阳续志》。

三天社，原聘右佥都御史罗万杰女，未娶。从仲兄天禔走交趾省亲，殇逝文渊旧州，年十六。荫中书舍人。

四天裯，字尔甸，号潜园。荫征仕郎中书舍人，娶天启丁卯（1627）举人兵部主事大埔杨世乔第五女。早卒。

义子天祉，从先生桂林。荫国子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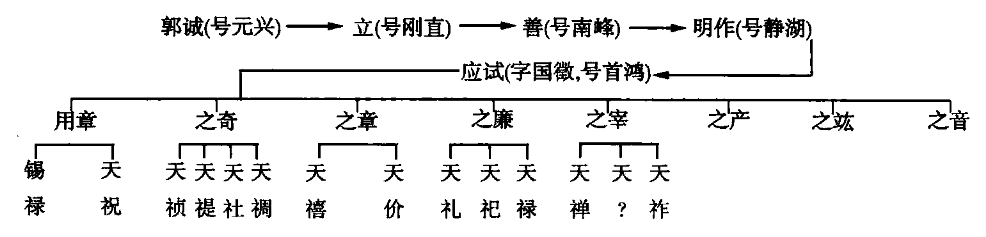
先生有八女，均不育。一女名玉，年十三死于壬辰（1652）飓风之变。

按：以上各人事迹，俱据《郭氏族谱·日月志》。

先生墓与林夫人合葬揭阳蓝田都。周夫人、张夫人墓葬官溪都盐埕陈吊岭（见《揭阳县志》）。

乾隆四十年（1775），赐谥忠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通谥录》云：“文渊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郭之奇，揭阳人。明亡跋涉闽、粤、滇、黔，往来万里；闻孙可望杀严起恒，团聚乡勇，守乐民所，为陈奇策等声援。后被执，至广西省城，不屈死之。”

兹列先生之谱系如下：



年谱（1607—1662）

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　先生一岁。

先生于是年八月庚辰生于揭阳东门。生而不接人乳，母爱而自乳之。（《家传》）

三十六年戊申（1608）　先生二岁。

八月初三日申时，室林夫人生。（《榕东郭谱·年月志》）

三十七年己酉（1609）　先生三岁。

侧室陈氏生。（《年月志》）

四十三年乙卯（1615）　先生九岁。

春，黄道周应潮州守詹佐雨聘，来潮。时年三十一。（《漳浦年谱》）

四十五年丁巳（1617）　先生十一岁。

先生充邑庠生。时宗师为杨瞿崃。（《家传》）

天启元年辛酉（1621）　先生十五岁。

初为诗。《编年诗总序》云："忆年十五，帖括之余，间学声律。"二月初九日，先生三弟之章生。（《年月志》）

二年壬戌（1622）　先生十六岁。

食饩。宗师为杨启华。（《家传》）

五年乙丑（1625）　先生十九岁。

九月十一日，继室周夫人生。（《年月志》）

七年丁卯（1627）　先生二十一岁。

举于乡，主考为张茂熙（丙戌进士）、曾栋（丙辰进士）。（《家传》）

是年有诗二十首。

八月十一日，长子天祯生。（《年月志》）

崇祯元年戊辰（1628）　先生二十二岁。

上进士第，殿试以孟夏一日。（《马上集》）

时总裁首相施凤来，次辅张瑞图。房师雷躍龙得先生卷，惊叹以为异才；与何吾驺同荐为元卷。总裁以大英异，抑置之。既撤闱相见，雷公语何公曰："此子姿仪朗越，弱冠负曜魄，以之进金闺，修天禄石渠之业，舍斯人其谁属？"（《家传》）

按：先生戊辰会试策问，载《耆旧集》三十四。

选授翰林院庶吉士。

先生为歌诗，骏发踔厉，鞭挞一时，既为同官者所忌，又严气正性，不肯委随以附权贵。宜兴周玉绳、乌程温长卿皆嫉之。（《家传》）

《宛在堂文集》有《戊辰会闱作，为拟"上御文华殿讲读毕，召见部院诸臣，咨询时政，俾各条陈职掌，随出御礼，申诫大小臣工；务修实事，共佐平康"群臣谢表》及《正人君子所深愿文》；阁试有《条陈急切时宜疏》、《拟应诏陈言时政疏》；馆课有《拟昭雪忤当被螫诸臣诏》上下及论四篇（一、《上下交而志同论》，馆选第十名；一、《生知安行论》；一、《心存无尽性之理论》；一、《孔子称伯夷、叔齐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尝称之，至论百世之师，独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何如》）。诸篇皆载集中。

有《怒流草》。

《自叙》云："《怒流草》，何以名也？曰：'天地怒流人事错，错则文章一道，盖本怒气以生，而后天精既下，五色并见。'孔曰'不惧'，孟曰'浩然'，此气出之篇章，拂扬其华，犹令毛孔生动。吾人甫学搦管，便已腹孔胎孟，而成败两念纵之，窃吾气以行焉，亦重所不忍也。壮士冲锋，冒矢突刃，稍计成败，顾影狂奔，不在他人后矣；斩将搴旗，不属之冒矢突刃，而属之顾影狂奔者哉？人生坠地，我法自尊。奈何总角方弁，而奴颜婢膝；先见方城尺幅之下，备办天下事者，伊而人未之闻焉。究竟收功，此又反不偿彼，亦重为鬼揶揄也。余志疏质顽，终岁少成一文，而顾呶呶口天下事，冥行蜚词，何敢逃讥？虽然，语有之：'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各有其性焉；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各有其势焉。'因其性之所赋，行其势之所旺，而以摛其气之所生，则《怒流草》之名，盖取诸此。若夫凿茨泄溪，取铁作剑，登城而麾军破卒，或自有文中真欧冶在，余吃吃，何能多言？"（《潮州耆旧集》三十四）

八月二十八日，先生四弟之廉生。（《郭谱·年月志》）

二年己巳（1629）　先生二十三岁。

给假归省。

冯奉初撰传云："崇祯戊辰成进士，选庶常。明年请假归。"《视学报政集》："崇祯二年，给假省亲。"

自燕都至白门，有《纪行诗四十韵》。（见《马上集》，不录）

由浙江、闽至潮，有《百山行五十韵》。

诗云："山行尽一月，逾山历万乡；入山又出山，宛在山中央。《山图》所未及，《山经》或未详；夏山翠如滴，秋山净若妆，冬山深如睡，春山远更芳，不尽山四时，山情那可量？江山自严厉，溪山转幽凉，神山未获见，海山意中荒，我闻山异德，始知山各疆。朝涉东山巘，山日飞混茫；午憩南山侧，山风扑面扬；晚出西山岫，山云尽可囊；夜倚北山麓，山雨欲浮床。山岚时结瘴，山露乍凝霜；何木不山落，何草不山黄？落木悲山末，黄草敝山旁；山木犹有枝，山草孰堪攘？此尽山糟粕，岂见山英芒？山草非芝瑶，山木愧扶桑；山樵恣斤斧，山牧自徜徉。欲穷山变化，久为山低昂。穿穴看山鼠，扑树突山獐；彼俩凭山鬼，依倚任山狼。迁鸟出山谷，雌雄立山梁；求山仍求友，山集又云翔。颇怪山中物，未必与山忘。何人买山隐？何士构山堂？紫霞依山栋，碧霭吐山房；山葵供小摘，山竹表幽篁，山居虽暂许，山

意岂堪偿？山不厌人闲，人莫厌山长；心能与山静，山亦与人商。久从山终始，姑使山颉颃，山朝复山暮，与山俱未遑。我仆叹山砠，我马鸣山冈；采山人不见，何处置山筐？山巅余鸟道，山径及羊肠；崔嵬极山致，屈曲探山藏。举头问山隐："山书秘何方？"低颜语山客："山柱伊毋戕。"山盘五十余，惟有泰山当；山池二十八，或倍华山阳；彼山标千古，山以名益昌，此山阻遐僻，名晦山何妨？山之言产也，不产山无良；或曰山为宣，非宣山曷扬；我有家山在，俟我山始彰：东山与西山，咫尺共山光；近山情可悉，遥山意可望，聊以家山绪，先矢《百山行》。"（亦见《马上集》）

按：《马上集》序："驱车方夏仲，抵家而秋既老。"故知先生抵家在秋后。

有《初瞻集》。

《自序》略云："矢诗不多，强半家思，实凄且远，言志遂歌，终不畔于《归去来》之旨云尔。"（《耆旧集》）

又有《马上集》。

《序》云："思远则心劳，抚时则意沓，吊古则神壮，感物则气连；四者积而导乃情，情之所钟，莫能伪也。旷之以见闻，展之以梦寐，致之以山水，配之以友朋，悠之以岁月；五者备而言乃志，志之所之，莫或杂也。天地殊观，古今快事，不有韵人，朗之声歌，煜之编简，后死者安得与于斯哉？追尚往者，孰情深而言永？孰志坦而词昌？孰违情而易性？孰惑志而干时？为真为伪，为正为杂，未繇度识者之眸矣。余守燕三载，尘风游倦，白云思深；蒙恩归省，途历八千里，水陆虽兼，然马上强半也。驱车方夏仲，抵家而秋既老。积情备志，盖匪朝夕之故；寤言啸歌，若或速之；念不及转，私不及谋；虽意浅文轻，为伪为杂，亦庶几其免夫。"（《耆旧集》三十四）

《编年诗总序》云："读书中秘，与曹允大、方肃之、刘胤平、徐九一、金正希诸同馆，花砖马背，连裾振譬，扬扢风雅，思不懈而至于古；及休沐抵里，得冯令如陶令，唱酬不辍，始有《马上》之刻。"

按：先生《宛在》诗，断自《马上集》，其前作《怒流》、《初瞻》二集俱不存。同馆诸人即曹勋、方拱乾、刘若宰、徐汧、金声。冯令指冯元飙。

三年庚午（1630） 先生二十四岁。

正月，海贼犯城，先生与诸绅议城守之法。

时海贼八十余艘，用佛朗机大铳攻城。先生与诸绅议分城战守；另募壮丁百四十余人，杀一贼给二十两。十九日，开北门与战，诸生范应龙、郑祖绍与焉。贼退。（《揭阳县志·兵燹》）

三月二十四日，先生募壮丁击退丰政贼。

流贼自长乐入境。时丰政贼叶阿婆、张文斌等乘势并入，劫蓝、霖二都。先生捐赀募壮士，与知县冯元飙率兵逐之。（《揭阳县志·兵燹》）

先生家居。邑侯冯公元飙聘修邑志。

《辑志旧指·凡例》（《辑志旧指》下称《志指》）云："旧志成于嘉靖年间，知县王公凤创稿，孝廉郑君大仑校增，迄今几九十年岁。庚午前令冯公元飙申请修刻，之奇以省觐家食，函币再至，力辞不可，因敦语及冯君牒学分请诸庠士，搜寻事迹备采；既以浪游，未获援笔。"

先生撰《冯元飙传》："侯字尔弢，浙慈溪人。壬戌进士，选澄海，以忧归；后补揭邑，天启六年任。"

秋，有《题苏子瞻睡乡记后》（《耆旧集》）。

是岁大祲。先生父应试，罄禀藏以赈饥，远近就食者以万计。（《郭谱·年月志》）

四年辛未（1631） 先生年二十五岁。

家居，任邑志总纂。

《志指》："一岁辛未，署篆江公愈敏，捷学呈报庠士王生阳春、谢生焘、袁生年、陈生仕清、黄生梦选，督之分纂，而以奇总其成。属有犬马疾不能与闻。"

有《谢儒美（宗镄）御冷斋诗序》（《耆旧集》三十四）。

五年壬申（1632） 先生年二十六岁。

家居，邑志成。

陈鼎新《揭阳志序略》："前令冯君，早已具仪币请郭太史为政，而偶未属稿。新猥承冯君后，幸太史尚居邑中，即敦请其终事，阅数月而告竣。"

冬十一月，作邑志《凡例》。

《志指》："岁壬申诸君稿成，录呈今令陈公鼎新，始及见副稿。再承仪

币，督奇改正增辑；逊谢不获命，起稿秋中，告成于仲冬之晦。”又《凡例》云：

一、图志所由设，本以通天下之志，达天下之情，使一道同风，治教所开，法戒所垂，莫斯为大。今郡邑诸志，皆不领于王官有司，故或苟且应事，其于是非理乱之故，可以招鉴明本，示之将来者多略不书，其去古远矣。是以忘其固陋，策鞭于古今之域，定辔于时事之冲，考所学以立言，矢诸心而直著，不敢徇人，不敢欺己，奇之志也，即奇之罪也。

一、是志为纲六，为目三十有九，叙次之指，著于各篇之端；间或兴感时事，缀以俚言，为论、为议、为赞，则附各篇之末。

一、乘中人物，除科目封赠及旧志所载者依之外，如例仕、黄耆、素行、节烈等项，俱今君酌定。

一、搜核省府志事实同异。磨勘年代后先，则杨生闱、陆生应登，劳不可泯。

一、诸志皆首著沿革，分纪灾异；兹独志年、表事之巨著，悉见于编年之下。

一、凡各项记序、诗赋诸文，恐厕杂事下，病于冗长，俱汇见文纪，分而类之，以便省览。

一、旧志遗文不概见，文献不足，先圣忧之；兹所搜录颇多，或不厌其烦也。

又作《修邑志成感赋四律》，修《揭志》作《榕城八景诗》及有《挟改数字不得者，再吟二律》诸篇，见《宛在堂诗集》中，《遂初集》。（不录）

按：此志原帙久亡。据之奇《志指》，知原编分六纪：曰《地纪》、曰《时纪》、曰《政纪》、曰《献纪》、曰《文纪》、曰《余纪》。《地纪》分“分野”、“疆域”、“山川”、“潮汐”、“津梁”、“水利”、“墟市”、“物产”诸目；《时纪》分“气候”、“年表”、“风俗”诸目；《政纪》分“赋役”、“职制”、“位署”、“祠祀”、“学校”、“城池”、“兵防”、“官师”、“坊表”诸目；《献纪》分“选学”、“例仕”、“封赠”、“武科”、“隐逸”、“素行”、“黄耆”及“传记”诸目；《文纪》、《余纪》细目未详。

作《兵防七议》。

有《乡约考》附邑志“疆域”下。其为邑志撰传，有知县汪起凤、曾应

瑞、冯元飙诸传，载《政纪》“官师”门下。又郑一统、林熙春、孙森诸传，载《献纪》中。

又为《广文先生赞》、《林熙春赞》、《宋汝翼墓铭》，皆载邑志中。有《宋兆禴学言余草序》。（《耆旧集》）

六年癸酉（1633）　先生年二十七岁。

假满。偕兄用章晋京。（《家传·年月志》）

坐失权贵，散馆左迁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提督会同馆。

《文集》：“解馆，有《圣王明教化以善俗论》。”

方左迁时，报至，祖母叹曰：“儿之邀于天下者早，是必不能援手于人；儿之行所志而不能干时也，吾知之稔矣；确然。宁为此，勿为彼。”（《郭谱·家传》）

七年甲戌（1634）　先生年二十八岁。

三月七日，华亭董其昌为先生撰诗序，长洲文震孟亦为之序。（见《宛在堂集》卷首）

五月，奉使册封荆藩，即蕲州府德安王。便道归觐。（《郭谱·家传》）

兄用章补武英殿中书舍人。（《郭谱·年月志》）

八年乙亥（1635）　先生年二十九岁。

九月报命，再接馆务。

先生目击朝鲜馆垣低颓，逼迈居民，恐奸人乘机舞法，密地交通，自捐俸修筑。（《郭谱·家传》）

十月，朝鲜入贡。又提督三阅月。（《郭谱·家传》）

十二月，转本司员外郎。

九年丙子（1636）　先生三十岁。

主试河南。事竣，转郎中。（《郭谱·家传》）

王铎有《送礼部主事郭菽子主试河南序》。（《拟山园集》卷十三）

按：《永历实录》谓先生授河南□□知县，盖以此误。

七月十二日，母林太安人卒，年五十二。（《郭谱·年月志》）

有疏乞假，亦见《耆旧集》。

与兄用章痛哭回籍。（《郭谱·年月志》）

十月二十三日，先生五弟之宰生。庶出。（《郭谱·年月志》）

十年丁丑（1637）　先生年三十一岁。

闰四月初二日，先生继室张氏生。

十一年戊寅（1638）　先生年三十二岁。

冬，服除，补原职。

十月，母林太安人归葬普宁山步塘。（《郭谱·历代墓志》、《郭谱·年月志》）

十一月初四日寅时，兄用章以喙疮卒（状如张素），年三十四。（《郭谱·年月志》）

十二年己卯（1636）　先生年三十三岁。

正月初十日，先生元配林夫人卒，年三十三。（《郭谱·年月志》）

《编年诗编序》："乃不幸，而有何时之哀。罢蓼居庐，继而分荆，怆魄余桂伤魂。阅丁丑、戊寅、己卯诗，不能事百，总附秋思之末；然闭门一室，破涕为歌。"

按：据此，先生是时仍家居也。

十三年庚辰（1640）　先生年三十四岁。

《诗总序》："庚辰出谷，携小草入长安，则有前辈蒋八公德璟、黄可远景昉、王觉斯铎；吾友宋文玉玖、方萧之拱乾、徐九一汧相讨论。"（参《郭谱·家传》）

又云："驱车而南，以近作示琴张子公亮。公亮辄怃然为间曰：'吾于海内，罕所低首。读先生近集，知吾家勾曲三峰，或未能与揭岭争高下。'"（见《郭谱·家传》）

按：《家传》云及"休沐抵里，以诗集示张明弼先生"，知先生本年

北上，后又曾返梓也。张明弼读郭菽子近诗，时先生将视学闽中。（《张明弼文集》）。

十四年辛巳（1641）　先生年三十五岁。

升福建提督学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郭谱·家传》）

名虽擢，实体仁党排之也。

《忠逸传·黎士弘小传》云："督学闽中，盖不得于乌程也。"

按：先生《诗总序》云："辛壬癸甲，砣砣铸人于八闽。"《郭谱·家传》云："公四载学校中。"知先生主闽四载，盖始于辛巳岁。

按：试长汀学，题为"恫而不愿，倥倥而不信"。诸生黎士弘读牍，征用张禹、卢杞故事，先生拔置第一，批其牍曰："竟是乌程一幅小影。"时圜峤尚当国，而先生置书不阿，"其崖岸崚厉，不以屡挫易其节"如此。按试两期，诸生从无一人倖进者。

按：据黎氏《小传》，此事系于壬午前，故知为辛巳事。

先生受事匝岁，诣关公庙自誓："正文体；禁提调通揭荐，禁诸生坐保官颂德。"士风为之一肃。

按：誓词及禁示，俱载《耆旧集》。

十五年壬午（1642）　先生年三十六岁。

是年闽闱得人为盛，门下士中式五十余人。（《郭谱·家传》）

李世熊《寒支岁纪》："辛巳七月，学宪郭正夫之奇较订士，拔予第一。壬午值郭公再较订士，复拔予第一。十月郭公延予阅下南四郡岁考卷，备劳瘁。"（《寒支集》卷二目）

时郑成功名森，为泉州诸生，其父芝龙势力方盛，百计乞置成功高等，得饩廪；抚按两司亦为缓颊，先生奋曰："若辈鹰鹯之性，岂一廪生所能羁縻乎？"卒不许。成功仅得以二等应试。

十六年癸未（1643）　先生年三十七岁。

是年榜发，捷南宫者十八人，俱先生门下士。（《郭谱·家传》、罗万杰撰

《墓志》）

方先生视学于闽也，父戒之曰："勿遗闽一士，慎勿以货取于人。"故先生四载视学，孜孜罔怠，勿敢陨越，诸人士至今犹能道之。力振文风，奋兴士气。严绝竿牍，力杜蹊径，虽权要弗避；提调之同心者嘉兴之，馆县之传邮者申夺之。若夫发假印林东晓等，借赃助饷，靡勘历科，红案摘出，提等续八百余名，严行另考。黜革三百余名，降春社二百七十名（明制诸生考四等挞责，五等降春衿社学，六等黜退社学，训童蒙地。弘治十六年，行府县，立社学）。隔省改学三百余名。黜退四十余名，降春社五十余名。所黜所降，几至七百余人。此辈非为是不僵，则孔方有灵，聚其族可以得有力者之把持，合其谋可以兴含沙之巧中（时按临汀州揭榜，黜降稍多，有数百人在场咆哮，递呈为黜降者辩，先生特批斥，严禁乃止）。先生独任劳任怨，务使宫墙芜秽，廓然汰清，从前滋蔓，根株尽绝；以及劾革徇私提调，奏逐放利教官，选送卫所子弟（明制卫所生员谓之军生，每卫军生三十名，大卫四十名，卫各建学宫，立学官）。严厢学，蠹劣衿。凡花红廪馈饩，已载裁解，设处以补其额；建按较书，捐俸置租。有言必行，有诗必果，陵援俱捐，怨劳独失。（《郭谱·家传》）

先生转副使，寻摄按察司事，又摄兵备事。（《忠逸传》）

断强豪，平冤狱，修会城，弭通夷，苏疲驿，催裁站，知无不为，为无不力。

九月，平尤溪贼。

尤溪贼魁吴绍兄弟，集伙剽掠闽清、永福，先生约会官、乡兵，披寻窟穴，馘吴绍，随获贼总吴应开、贼伙林一烟、陈十等及首恶林定宇等。时闽清贼首徐三、伪军师罗明华等，倡率贼众百余人，谋与远寇虔刘七闽，乘署县，不戒遂于九月初十夜，攻劫县治。先生乃于九月十四日辰时，督兵五百余人，历一昼夜，驰三百里，十五日午时到闽清，与地方官遍察地势，分兵搜剿。先生介马逼贼至四都笔架山上，舍骑徒步督兵围搜，擒、斩首伙军师共百二十八人，乃亲临各都，分里按籍，稽查保甲，搜剔奸徒，远近反侧之谋，因潜消而默夺焉。（《耆旧集》）

十一月八日，流寇近突袁吉诸郡，益藩邕宁王亡国走闽；邵武樵川告急，全闽震动。先生抵邵武，请于抚军；提师扼于关，谒益藩，请归国，建南赖安。

尤溪贼平月余，而袁、吉告陷。赣川既困，民乃大亡其郡；当事者有奉

藩封，疾趋杉关。关人告逼，再危；传烽之辰，盖仲冬八日也。十日庚子，公誓师南郊；十二日壬寅，即介马督劲卒西驰，午至芋原；十三午抵水口；十四日泊舟需；十五日至黄田，十六日至茶阳；十七日至延平，十八日至王台，十九日抵顺昌；廿日抵富屯；廿一日抵拏口，特申笠诛之禁，兵皆肃然。廿二日抵邵郡，益藩将治驾至三山；守令曰：藩王将疏职等拒藩，詟"守土之臣，不知所云"。先生曰："樵川蕞土，敢辱朱缨之临，将为保障全闽安危，视此一丸泥耳。"廿五日，复谒藩王，先生曰："职等彷徨踧踖，趋侍恐后，第流氛尚远，江右有司，何以失于护卫，俾殿下造次入闽？"王意不怿，先生揖长史而言曰："臣惟防守为首务，抚台即至于关防守。王自以意传令皆归国，两得之矣。"遂至于关，察险隘；隘，布置防守以周知其藩塞之阻，戒治士座驿骚，藩遂如约归国，于是内奸不得发而流氛以远，民赖以安。（《耆旧集·督兵日录》、《郭谱·家传》）

闽人思慕，建坊于诏安邑郊。学士黄道周为题其额曰"一代儒宗"，又曰"八闽山斗"。（见黎士弘撰《小传》）

复叙先生集略云："正夫既以学宪治建中，士益好古，绣补龙骨，烂然比屋之下。会渔梁盗起，正夫手握两印，朝驰浦城，暮歼其渠首而归。江右诸郡，又方怵于风鹤，藩府仓皇利用迁国；正夫身佐抚军，提一旅西扼于关。七建之士，用有底定……如正夫者，所谓备体用，适于通变者也。今世摧颓，人才愈下，文吏不武，坐为宵旰所轻；诚得如正夫三五辈，张维振纮，天下廓然。"（《黄漳浦集》卷三十一）

按：《漳浦集》卷十六有《答郭菽子文宗书》，又卷三十七有《郭正夫文宗构尊经阁诗》及《读郭正夫集并观校士有作》二诗，并未详为何年所作。

崇祯十七年甲申（清顺治元年，1644）　先生年三十八岁。

擢太仆寺少卿。

抚院萧奕辅、张肯堂，按院李嗣京、陆清源先后荐举，秩满以廉卓升太仆寺少卿。（《郭谱·家传》）

三月，李自成犯居庸，进陷京师，帝崩于煤山。（见《通鉴辑览》）

时拜命甫下而北都陷，先生闻变哀恸。群议哭临，而巡抚张肯堂犹援常例，欲待哀诏至乃发丧，先生力争，帅闽士哭临，始得成礼；时闽士犹汹汹

讽议，公示禁之，乃止，然以是忤巡抚意。（罗万杰撰《墓志》、《郭谱·家传》、《忠逸传》一）

五月，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监国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圣安本纪》）

是年先生第三子天社生。（《郭谱·年月志》）

九月，升詹事府詹事，便道归里。

时诬讦百出，幸巡抚陆公先以清廉卓异荐，宰相王公铎得书，遂揭荐于上；奉端品政绩之旨，特升詹事府詹事。（《郭谱·家传》）

按：《四库提要》五十引《类姓登科考》，载先生官至詹事府詹事，但书先生至崇祯末之官阶。非是。

先生为《宠命殊常事疏》云："臣视学闽海……忽闻神京之变……欣逢皇上正信南离……臣方署篆建南，从按臣陆清原……忽于九月廿日传来邸抄，为特申优擢司成之请事，奉圣旨：'郭之奇端品，复有政绩，原系词林，著升詹事府正詹事。'……自自天……臣闻命即拟单车星驰，亟瞻宸阙。……自臣发建州，即闻汀寇数千，刈杀兵将，靡有孑遗，间道师里，与父臣抱头痛哭……自孟冬望日抵漳界之云霄镇，甫一日而此镇报陷、屠城，集众复至数千。今臣郡且岌岌震邻矣。……俟臣乡寇盗稍定，臣即单车就道。"（《耆旧集》、《文集》，此疏弘光元年上。）

按：《长汀志》："十七年，粤寇阎王总出没虔州部境，渐逼汀州，郡邑告急，督抚张肯堂遣兵五百救援，时贼陷汀之古城镇，焚戳备惨。"《疏》中所言汀寇，当即阎王总也。

十二月，先生输金千两助饷。

疏云："臣于元年十二月初七日，为罄产效涘，以尽臣悃，以倡义风。事奉圣旨：'郭之奇毁家输助，数以千计，可谓急公之最。即著下游抚臣刘柱国察收，著的当员设解赴建宁备用。'"（《耆旧集》）

李世熊《代郭宫詹助饷启》："方今国仇未诛，司农告乏，乃拥封营窟，疾呼周闻，心窃耻之。自惟一官茹蘖，膏不润唇，仅余肝胆可涂，奚有羽毛足恤？仅将祖父遗产，变措千金，聊括针头之铁，拟助飨士一醪。"（《寒支

集》卷四）

弘光元年乙酉（后半岁为隆武元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　先生年三十九岁。

先生在揭阳。

四月，清兵南下。二十五日陷扬州，史可法死之。（《通鉴辑览》一百十六）

六月，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以鲁王以海称监国于绍兴。（同上一百十七）

九军起揭阳，僭号后汉（详《揭阳志·兵燹》）。

乙酉六月，武生刘公显，聚兵蓝、霖二都，建营南塘山，号九军贼。九军者曾铨、马麟、马殿、马登、傅达、邱瑞、黄甲、吕忠、吕玉也，又以潘俊为东军，陈云任南军、陈汝英为北军、陈侃如为西军，共十三军；又以温韬鲁为都军、吴元为大将、曹懋昭为二将，共十八将，伪号后汉，僭称大升；立十五大营，十三大府，铸印选官，攻城破县，势甚猖獗。（《揭阳志·兵燹》）

闰六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南安伯郑芝龙奉唐王聿键，称号于福州，号隆武，以福州为天兴府。（同上）

七月，林学贤侵惠来，称兵部。（《惠来志》）

先生遭谗去职。吏部尚书张肯堂、南安伯郑芝龙，俱有拥立功，挟宿憾力挤先生落职。以偲宪何楷、总督万元吉及蒋德璟、黄景昉、陆清源、童天闶、张家玉等连章昭雪，推毂赐环，起用经筵讲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郭谱·家传》、《忠逸传》）

隆武二年丙戌（清顺治三年，1646）　先生年四十岁。

先生仍家居。

先生既遭谗，家食，未有出山意。（罗万杰撰《墓志铭》）

二月十五日，奉旨，先生再捐银一千五百两。命义子天祉解赴军前。（《文集》）

疏云："随将捐银一千两如数倾足，于正月初四日解交抚臣刘柱国。抚臣以解役未便，臣躇踧靡宣。谨冒险差臣义男自解。……谨于前解千两之外，悉索微赀，再捐五百两；而臣父，累封中宪大夫、督学副使臣郭应试，忠爱激发，愿捐赀五百两；臣胞弟，现增侯廪生员郭之章，闻义踊跃，亦愿捐赀

五百两，合臣前捐再捐，凑足二千五百两。臣与臣父臣弟先完二千两赍解，现在伏乞勒下御营户部察收；更五百两，再候措办另解，稍展微臣一门恋主无已之寸悃。”

按：《家传》：“春，二月，公捐银二千五百两，父捐银五百两，三弟之章捐银五百两。”《文集》：“七月初十日，公具奏。续完捐银。有旨：‘父子兄弟，一捐再捐，可谓一门风义。’”

跸移延平。

帝决意出汀州入赣，与湖南为声援。郑芝龙不欲聿键行，令军民数万人，遮道呼号，拥帝不得行，遂驻延平。（《通鉴辑览》）命户科给事中李日炜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粮饷（其借助过者，准作三年预征）。（《思文大纪》）

二月，上《为恢复先审定略事疏》。

略言：“今国家肇基闽南，当以江右、两浙为枢。……窃计徽、饶未靖，建抚伤残，则两关广信，皆非砥道，陛下非暂住富沙，绸缪牖户，必当移跸章贡，号召楚江。臣愚以富沙之后户，章贡之咽喉，莫要于汀州，盖建昌间道抵汀，四日而遥，广昌接连宁化……今建广虽浅，而宁汀安堵者，敌畏闽兵之议其后也。假令闽兵失援，寇突汀境，徽饶烽火，缀我三关，则前后周章，闽地为在箕舌，章贡断为外府。臣之愚计，谓下游巡抚，宜镇汀州，漳南兵道，宜驻宁化；东连虔吉，北策建昌，指臂相连，呼应如响。陛下如暂驻富沙乎？其利有四：繇此而长驾远驭，移跸章贡乎？其便有五。何谓四利：勋臣在关而藩篱固，抚道在汀而寝奥安，一也；转输供亿，江闽如咫，二也；指顾千里，从枕席上过师，三也；有犬牙交错之势，无添兵措饷之扰，四也。何谓五便？背枕两粤，咫尺湖广，粤饷源源，不忧匮乏，一也；六龙临江，士气百倍，鞭箠江右，运掌而定，二也；江督万元吉，才略逾群，西江人才，忠义奋发，闻风响应，所向无前，三也；粤督楚督，东南来会，舟师顺流，直抵金陵，四也；渐通襄邓，襟带湖浙，聊络川贵，控引江淮，五也。计之万全，诚无逾此。”（《耆旧集》三十二）

二月二十一日，奉旨。奏内尽进取情形及四利、五便、养民、政贤之说，具见留心时务。近着行在该部看议。（《文集》）

三月，敕惠潮巡抚刘柱国，加意绸缪三府，以为中兴根本。（《思文大纪》）

准礼部尚书黄锦，给假三月，往潮州与新抚臣商度机宜，然后乘胜出虔，以谢良有所募三千之众，听其调用。(《思文大纪》) 八月，清兵越仙霞岭。关门无一守兵，遂长驱直入。二十一日，帝自延平奔汀州。清兵奄至汀州，遂陷帝入清军中，至福州崩。

按：隆武以失援败，果如先生言。

张家玉来镇平。隆武二年，请给三月假，返粤募兵，惠潮将籍饷八万，练兵一万，为进取江西计。帝许之，赐营名武兴，以家玉为监督总理；八月，至镇平。(《忠逸传》五)

是月上旬，先生弟之章膺明经。(《郭谱·家传》、《郭谱·年月志》)

九月，九军刘公显、吴元等陷揭阳城。

九月十一日，九军贼刘公显连金甲贼吴元等陷县，由新河渡北溪，五鼓入进贤门，毁文庙，折城隍，开库狱，焚黄册，大肆杀掠。缚执仕宦高氏，酷刑拷朴，体无完肤，分踞镇营县署，杀在籍都司黄梦选、进士许国佐、黄毅中、推官邢之桂、知县谢嘉宾、学人杨琪华、黄三槐、杨世俊、岁贡林鼎辅、谢联元、武学杨德威、监生王之逵、郑之良、例贡郭之章，诸生被杀者七十余人。(《揭阳县志·兵燹》)

九月二十二日，先生弟之章以御九军巷战死，年三十六。(《郭谱·年月志》)

时之章奉邑侯及先生令，团聚乡勇，堵御流寇。至是夜，闻警，帅师登陴巡守，内奸忽起，城陷。之章巷战死之，面如生。先生为文以祭，作诗哭之。(《郭谱·年月志》)

同月二十五日，先生祖母陈夫人亦死于难，年八十三。(《郭谱·年月志》)

二十八日，先生长嫂曾氏骂贼死，年四十一。(同上)

曾氏为用章公夫人，江西东乡知县曾敬之女。九军破城，将掠去，厉声骂贼，不屈死。(事载《揭阳志》卷六《列女》)

先生父应试及先生皆被掳。

十月初十日，丁魁楚、瞿式耜迎永明王监国。十四日即皇帝位，仍称隆武二年，以明年为永历元年；以肇庆府署为行宫。(《明季南略》)

冬至日，先生父应试出贼庭。(《郭谱·家传》)

之奇长子奔普宁。故人林侍御铭球输金赎之，贼先纵应试归普。（《忠逸传》）

十一月二日，苏观生拥立唐王聿𨮁于广州，改元绍武。

有潮人杨明竞者，诡称精兵满惠潮间可十万，即特授惠潮巡抚。（《通鉴辑览》一百十八）

郑芝龙以福州降清。（《粤游见闻》）

十二月一日，先生脱虎口。依林铭球家。

先生以腊之一日脱虎口。计在寇庭八十一日，有《九九》之序。（《郭谱·家传》）《序》略云："自邑陷至脱身，为日九九，颠沛无聊中得诗八十一律，以九九名篇，志遇也。吁嗟！予之濒死于九者，不知其几，与夫痛定思痛，不暇自痛，而深有痛于九者，亦不知其凡几矣。予夜闻变，登陴巡御，内奸蜂起，长矛及胸，几出于不意死。孑身赴濠，踉跄获济，几颠踣死。窜伏寺后，为强人所获，露刃相逼，余正颜叱之，几不测死。既而以余归予室，且以甘言相诱，将有所索也；诘朝而诸营豨突，跆籍相残，几从乱兵之中死。余既舍予室而狂奔，适有邹姓者，匿之小舍，次儿从而后，逐中失焉；越十七偕长儿之山寨，骨肉星散，卧病旬余，几以忧患死。既而长儿获归普阳，喜后事之有托也，呻吟歌啸，聊以永日，旋为诸强所迫，以仲冬三日复自寨归邑，鱼釜再游，雉罗重入，自审无日而不邻于死。首难之长，颇念斯文，爰以六日之夜，获省先君子，余见先君子之疲病颠连也，抱首长号，几以不得为子而愤懑以死。幸而普阳侍御，脱骖为赎，先君子获于至日归普养疴……有黄姓者，馆余别室，礼侍有加；诸军筮于明神，谓出余最吉，遂以腊之一日，引余出西门，至钓桥，得就扁舟，溯流往普，维时风帆助顺，瞬息出鲸波，就安澜。铁山一枝，亲友互集，幼女稚男，参差继至。先君子虽枯瘠之甚，而神气清宁，言谈娓娓；喜而悲，悲而痛，痛定思痛，痛如何哉！吁嗟！曩之濒于九死也，几不暇自痛；今之痛定思痛，而深有痛于九者：数百年生聚之邦，有朝血殷，有野燐熠，有君子而猿鹤，有小人而虫沙，有弟沟壑魂消骨化，有父奄奄逢此百罹，有琴既爨，有鹤既烹，有书万卷祖龙一炬，余之痛可以九尽，而不可以九尽也！先哲之言曰：'世事不堪逢九九，休言今日是重阳。'余生不辰，甫丁阳九，戏马台中，俄长铜驼之棘，龙山帽落，羞同短发之吹。吁嗟兮！风景不殊，黄花无色，山河草木，胡不幸而与余同此九九乎？昔之人，履盛平而歌九以劝，涉末流而辨九以悲，有同有不同，亦各言其遇矣。余以九九名篇，志遇也。世之悲予遇者，有同有不同，

亦将有感于斯作。云岛逸人书于居此之处。”（《耆旧集》三十四）

是月，清兵自闽攻潮州。总督佟养甲、总兵李成栋，甲士六万人南来。

十五日巳时，先生父应试卒于普宁林铭球家，年六十三。（《郭谱·年月志》）

是日，清兵陷广州，绍武君臣死难。

十五日，清兵突至，破城。时潮州山寨私拥赵王，佟、李遣兵往，赵王即自归，削发，居光孝寺。（《粤游见闻》）

按：《永历实录》谓先生就李成栋乞降，其时先生仍在潮，未免厚诬。

十二月十八日，桂王即位肇庆府署，改元永历，以晏清为吏部尚书，瞿式耜为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黄奇遇为礼部尚书，先生为詹事正詹。（《台湾外纪》六）

李世熊《丙戌与郭正夫老师书》云：“徂夏一函，意峡鳞羽，嗣知贵潮寇乱，底于秋终，而敝乡寇乱底于冬仲。半岁之内，草庐三徙，真使苕华叹息无生，虎兕悲其率旷也。”又《答郭仲常老师书》：“某以为老师执正蒙谗，生徒寥散，即不能伸诉公卿，戟胸动帝，亦已辱矣！……所为汗颜愤叹，不寝不寐也。”姑系于是年之末。

永历元年丁亥（清顺治四年，1647）　先生四十一岁。

正月朔，帝出梧州。李成栋入肇庆。（《高要县志》）

先生居普宁。友人林铭球卒（卒于何月未详）。

先生初与林铭球谋起义兵，图恢复，而铭球以楚役积劳，悒悒逢疾，卒年六十。（《忠逸传》）

二月，赖其肖（《小腆纪年》误作天肖）与张家玉等先后起兵。

清兵入广州，其肖遂与弟其贤及应殿据镇平，以明宗室朱慈奋主军政。丁亥二月，家玉起兵东莞，其肖与应殿亦起兵镇平，出攻各州县，以应家玉。叛将文贵金及陈虎、余成隆来战，克二寨，至勒马寨，贵金单骑先入，其肖伏兵起，遂杀之，虎及成隆俱死。（《忠逸传》二）

二月十三日，先生第四子天裯生。（《郭谱·年月志》）

八月，东阁大学士陈子壮攻广州，死之。

九月，朱由榛入揭阳，附九军，称监国。

由榛流寓潮州，丁亥至揭阳，招抚土贼许元烈、刘有、潘俊、吴元、程缨、吴英、吕耀、林梦祥、林西畴等，据城拥由榛为监国，将发兵攻潮州。清镇道闻之，先檄乡兵攻揭阳，及诱吴元为内应，开城门放乡兵入潮；镇车任重兵寻至，擒由榛，杀之。(《忠逸传》三)

永历二年戊子（清顺治五年，1648）　先生年四十二岁。

正月，金声桓反正于江西。

二月，帝幸柳州。(《东明闻见录》)

旋自象州奔南宁。(《通鉴辑览》)

闰三月，李成栋夺佟养甲兵柄。十二日布告奉永历正朔。

(《粤事记》云："四月初十日，成栋归明。"盖以清历算。)

四月，封郝尚久新泰伯。(《小腆纪年》)

二十五日，上《陈中兴事疏》(《文集》)，又上《为光华复旦疏》云："臣生不辰，甫还侍从之班，遂遭揭邑之陷。身出烬余，家门荡尽。臣父封詹事臣郭应试甫脱虎口，辄正首丘，臣凄其苦块，糊食旅邸，自戊冬以及今夏，泥首塞窦，跂足瞻云。忽闻皇上奋迹粤西……省檄遥传，黎民于变。"(《文集》)

二十七日，刘公显犯府城不逞。

明定国公郑鸿逵率舟师三千人，至潮阳港口，九军附之。

先生以九军散故，回揭阳，仍里居，结陶社，与罗万杰等唱和以寄意。(《忠逸传》二)

七月，帝幸肇庆，太后中宫俱往福州。(《东明闻见录》)

车任重杀潮州知府凌犀渠等。(《东明闻见录》)

李成栋反正后，明道臣李光垣、知府凌犀渠、海阳知县岳桂皆改调他任。桂以事笞任重部卒；愬之府，府责之；愬之道，道责之；任重怒，令众兵诡称山寇至，突入三人署，擒杀之。(《小腆纪年》)

八月，先生至惠州。时两粤湖南尽复，先生闻讯至惠州，以父丧未进。(《忠逸传》)

十月十八日，上《为积悃未舒等事疏》云："臣通籍二十一年矣，梯荣报国之思，不能苟同时俗，报国捐躯之志，窃尝久矢生平。自戊辰馆选，观中秘者六周，以触忤权奸，摈春曹者八载；屡奉优擢之纶，谨视八闽之学，两

考孜孜，三年报政，署兵、署臬，荡寇防关，八闽之事，臣以一身任之；威宗皇帝，鉴臣清执，特拔臣于京堂；圣安皇帝，褒臣端品，特还臣于词局；只缘神京之变，闯氛薰灼，抚臣张肯堂，心怀疑贰，濡滞哭临，臣率八闽士子，痛哭力争，深中忌讳，遂起戈矛。及思文皇帝奋迹闽南，肯堂邀天为己，冒厕家席，罔忘国仇，惟寻私隙，再疏诬讦，谗谤频兴，不至杀臣不已，赖三山舆论昭明，辅臣蒋德璟、黄景昉、总宪臣何楷、陆清源、总督臣万元吉、冏臣童天阅、翰科臣张家玉等力洗臣冤，连章推毂，思文皇帝知臣孤立，屡锡温谕，还臣旧官，悼臣生坎壈，甫闻赐环，顿遭挹邑之陷，三月系累，几从信国之游。及北兵抵郡，臣脱身至普，不幸而丧臣父，泥首苫次，幸而不辱臣身，日与台臣林铭球联络义勇，潜图恢复。天祚明圣，勋臣成栋，手植乾坤，俾臣获全，顶踵再睹光华，从此有天可戴，靡怀不伸。忽闻六驭，近跸端州，臣虽身在草土，敢不踊跃企瞻？况臣郡频受寇躏，复值兵哄，漳泉密迩，腥秽勾连，袖手坐观，势将及溺，用是不遑启处，匍匐观光。既至惠阳，偶犯霜露，呻吟床褥；屈指腊月，已为臣父大祥，稍俟新春择吉，即当茧足脂车，依云就日，执羁以从。不啻深愧攀附之侣，及时而起，敢复远忘袍泽之歌，别敷芹曝，仰希大鉴，臣无任瞻依慕恋之至。”（《耆旧集》三十三）

按：《清鉴》记吴楚之党交哄，事在戊子八月，并列之奇名。案之奇是时犹未赴行在也。

十月十八日，上《潮事可忧有四等事疏》。（《文集》）

以黄奇遇为詹事、礼部左侍郎，充经筵官。（《永历实录》）

十一月初九日，奉旨。著照原官另用。（《文集》）

十二月，先生父大祥，服除。

永历三年己丑（清顺治六年，1649）　先生年四十三岁。

正月元旦，郝尚久杀车任重，李成栋题为潮州总兵。（《台湾外纪》六）

庚辰，清兵入湘潭，督师武英殿大学士何腾蛟死之。（《小腆纪年》）

二月甲寅，清兵取长沙。乙卯二十六日，李成栋兵溃于信丰，渡水溺死。（同上）

兵部尚书揭重熙兵败程乡。（同上）

三月，郑成功戍兵分水关，命部将黄山从靖海破惠来。（同上）

四月初六日，孙可望遣龚鼎、杨可任等六人诣肇庆，求封秦王。（《粤黔纪略》，《行在阳秋》系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二日，上《外惧不足忧，内治必操胜算疏》，又上《恳恩补给诰命疏》。（《文集》）

七月，堵胤锡承制；封孙可望为平辽王，可望不受。（《小腆纪年》）

八月，王化澄奏题原官起用，先生遂奉召敦趋。（《郭谱·家传》）

八月十五日，上《遵召趋觐疏》，遂召见，朝疏。（《文集》）

十一月初六日，先生在肇庆，召问，翌日上《为恭承召问等事疏》言："皇上锐意恢复，不遑宵衣；但中兴一统，必定规模。张皇六师，先求次第；可守而后可战，攘闽必先安潮；傥盗贼不散，则兵多内顾，难以全力办敌；且师行粮食，飞鸿满目，征饷何从？故求安民散盗之术，莫如慎选守令，久任责成；其提纲挈领，激浊扬清，则巡抚监司之责也。至于恢闽次第，当如廷议近旨，速简重臣督师，合力分路：一从黄岗入诏安取漳，则伯镇臣郝尚久能办其事；一从大埔入永安取汀，则新命佥宪臣罗万杰，宜速与敕印，俾统吴六奇、赖其肖等，同心规闽；而科臣谢元汴，现在平远监军，使之犄角于武平、上杭之间。先以文告，耀以德威，有不角稽争前，云霓恐后者乎？其不愿从戎者，应尽追前劄，驱之南亩，以安内地；此当专责抚道守令，令其一心办此，盖力田为积粟之本，积贮系天下之命。内而休养，外而输将，胥从此也。以息民者用民，即以安潮者恢闽，虽一统全局，在指顾中矣。臣更区区有进者，方卧尝宵旰之时，视朝接下，不宜仅循故事，务与大小臣工，日商安攘全局，遍询远近情形，满朝之精视毕举，上下之心德既孚，自能化异为同，涣小成大。皇上既能不迩不殖，以礼制心；尤宜独断独行，以义制事。但使二祖十三宗有赫之灵，日在左右；三帝未伸之痛，时系心胸。默消水火之渐，共发同仇之心，倘蒙葑采，获见施行，未必非刍荛之一得。"（《耆旧集》三十三）帝不能用。蒙谕褒典，赐银三十两。（《郭谱·家传》）

十月，王化澄、何吾驺罢，惟严起恒独相。（《小腆》）

十一月，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郭谱·家传》）

按：《永历实录》："公为礼部，在于是月。"

《文集》有《为宠召谕詹事疏》云："臣于前月廿七日见朝后，面阁臣，

即谕臣八月十一日已经推臣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经筵讲官。臣逡巡不敢就列，忽于本月初七日吏科抄出行在大学士臣士俊、臣起恒、臣化澄奏单，奉圣旨：'览卿等奏郭之奇，词林翘楚，人望攸崇；既经陛见，著即到任供职'云云。"

此疏上于永历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二十六日，大学士堵胤锡卒于浔州。遗疏劾楚党袁彭年等五人揽权。（《十国略》）

时吏官乏员，诰敕多出中书，帝欲归其职于翰林，阁臣严起恒、黄士俊奏请考选，留守瞿式耜疏荐部属之堪备官职者，而帝意特在科名。于是礼臣黄奇遇请效唐、宋开科取士。帝命廷臣三品以上，各举所知，卿贰等自举其属，汇送吏部，敕尚书晏清会同礼、詹、翰诸臣，严加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乙榜知名未仕者亦与焉，是日，帝临轩亲试经艺三道，论一道，诗一首。外廷密奏阅卷诸臣通关节，帝即遣出，独留辅臣宿文华殿宫中，赐卧具，内小竖司饮馔。拆卷日，鸿胪传各官侍班，诏科道面举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即位来，始有是举，毋于用后尔等又多言也。"拆后，御笔填写六卷，遽命已，辅臣再三请，更允两卷。合得八人，曰刘茝、钱秉镫、杨在、李来、吴龙桢、姚子壮、涂宏猷、杨致和，改庶吉士；辅臣以诸臣有资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选例，请授编检，王（帝）曰："此朕特典，与考选不同。"择日送馆教习，推礼、詹、翰大臣有品行者为馆师。（《小腆纪年》十六）

十一月初七日，先生以帝左右终虚无人，而上《为补牍再陈事疏》，倡科场宜急开，为国储材。（《耆旧集》三十三）

先生奏言：宜急开科以收士心，勿俾不羁者赴敌闽浙试，及杜近日纳贡纳秀之弊。馆员固急须考选，然特宜慎重，宜敕礼部速行颁布，以四年二月乡试，三月会试，新旧公车，一时可集，廷试之后，即选庶常。必欲近循威宗末年之例，则宜以俸满中行知推，发访考授，第其甲乙，分为词林科道部属；或另荐另考，不问资格来历，是词林一带，反为授受私途。如以讲读急需，宜敕辅臣会同九列大臣佥举数员，取其才志确然可备开讲者，置之史局，倘所举不公，言路得执白简，以从其后。（《文集》）

先生所言与主张荐考诸臣忤，帝卒用荐考法，取士八人，授庶吉士。（《忠逸传》）

先生与同邑黄奇遇意不合，争为馆师。

先生与奇遇为同年进士，复俱以詹事兼礼部。而是时朝中分吴楚二党，

先生荐由杜永和，与吴党习，奇遇则与楚党习，忌者交构其间，遂有隙。二人曾以小嫌，争于杜永和前；及是，当推馆师，先生曰黄由推知改选，安知庶吉士典故，奇遇亦力诋先生，相争久之；士俊乃请并推，候帝亲定。而奇遇前所荐黄维璟不入选，兵部侍郎万翱与杜永和交章劾奇遇得维璟贿，奇遇抗疏，辨得直。（《忠逸传》）

按：先生与奇遇不合事，《永历实录》记最详。金堡论万翱讦奏黄奇遇疏，见《岭海焚余》卷下。惜以党见，对先生丑诋，恐未得实。

十二月，郝尚久降清。

尚久子在南京未降时，已遣人与马部院国柱通。（《东明闻见录》误作尚文）初尚久闻成栋败死，遣人乞降于尚可喜，可喜以沈时署巡道。（《温传》）

按：《所知录》下云："尚可喜、耿仲明久屯江西、吉安未发，惠潮道李士琏，本田仰中军，吉安人，与潮州镇将郝尚久，密往投诚，自从迫胁，缴敕印，受北官惠潮两郡，谓：'北有士琏，悉以国情输之；督西郡饷，接应北兵，导之入关。'凡江右宗室依士琏、寓惠州者尽杀之，没其家，执郡王十三人以献，北兵遂长驱而进。"

《录》系此事于四年庚辰二月。又《行在阳秋》载尚久降清为五年辛卯三月事，亦非。

四年庚寅（清顺治七年，1650）　先生年四十四岁。

正月乙卯朔，帝在肇庆，北兵破南雄；七日报至，百官争窜；九日，帝登舟；十三日解维。（《行朝录》三）

按：《小腆纪年》："正月戊辰，清兵复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

初七日，复以王化澄为大学士。（《阳秋》）

是年正月，邓耀据龙门。（《钦州志》）

二月甲申朔（七日），帝至梧州驻跸。

丁亥（《小腆纪年》），先生与吴贞毓等十二人合疏，论袁彭年等五人误国

十大罪。帝究五虎罪。

五虎失势，于是尚书吴贞毓、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万翱、礼科都给事中李用楫、户科右给事中张孝起、吏科给事中朱士鲲、户科给事中李日炜，御史朱统镭（《小腆》作钥）、王命来、陈光胤、彭佺（《小腆》作全）等合疏，论袁彭年、金堡、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党误国十大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议，余下锦衣狱，狱具，堡与时魁各杖八十，堡边遣，时魁附近名终身充军，湘客、正发徒三年，各赎。帝登位三年，至始见声色。（《行朝录》三、《所知录》下）

初七日，瞿式耜上《救刘湘客等五臣疏》。（《瞿忠宣集》）

先生充经筵讲官，掌詹事府礼部尚书事，兼翰林院学士。（《郭谱·家传》）

时东西交讧，百官悯愊挠丧，颠踣窜逃，先生手书示子天祯曰："儿当勉力有成，毋坠家声，予死生随吾君，未知相见何日也。"（《郭谱·家传》）

四月，转礼部尚书（《永历实录》），加太子少保，赐诚正儒臣国书。（《郭谱·家传》）

成功攻揭阳之新埠寨，降之。（《小腆纪年》）

六月，郑成功围潮州。陈斌烧断广济桥。（《小腆纪年》）

六月，孙可望复遣使求封。大学士严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杨鼎和、给事中刘尧珍等助之。（《通鉴辑览》）先生与文安之亦以为不可当许，疏论其事，有云："滇封之议，创为平辽，已非典则；失名义，矫而为秦，变而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又云"所忧在天下，不在一隅；所忧在异日，不在今兹……万代瞻仰在此一举，毋令天下后世执笔而书者，曰'举朝皆妇人也'"等语。（《耆旧集》）

会飓风荡舟，求直言。先生复言风变由滇封，议遂寝。（《忠逸传》一）

按：《永历实录》谓先生力请封孙可望真王，观此疏，亦知其诬。又此疏署衔行在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知作于是年。

十月，成功据南澳。（《小腆纪年》）

十一月辛亥（初一），清兵取广州。（同上）

甲寅，清兵入桂林，执督师瞿式耜、总督张同敞。（同上）

己未，帝幸浔，陈邦傅叛，遂奔南宁。（同上）

报至梧州，仓卒幸浔。初，邦傅欲留王以自重，不果，乃劫百官卤簿之舟在后者。内阁王化澄、吏部尚书晏清走北流，入容县港，严起恒、马吉翔、李元胤追扈及于南宁，百官稍集，饥冻无人色。（《小腆纪年》）

时分两股从帝者，上右江若严起恒、马吉翔等，余则入容县港，若王化澄等。上右江者，至浔州道上，兵各溃走；散入容县港者，于北流境上为土寇劫夺，弃妻失妾。（《明季南略》十四）先生随王化澄走北流，暂寓白州（今博白），会谋匡复。（《郭谱·家传》）

按：《行在阳秋》谓化澄从严起恒、马吉翔等往南甯，《小腆》等载误也。化澄后降清。《永历实录》记先生降虏，殆因随化澄同奔而误欤？

闰十一月十七日，留守瞿式耜，兵部尚书张同敞死之。（《阳秋》）

以副都御史张起孝抚南宁。（《小腆纪年》十七）

帝幸南宁，遁入土司。擢孝起为巡抚，兼巡抚高、廉、雷、琼四府；城破，走入龙门岛，被执，不食七日死。（《小腆》十七）

明封孙可望为冀王，犹不受。（同上）

五年辛卯（清顺治八年，1651）　先生年四十五岁。

正月朔，帝在南宁。

二月朔，孙可望遣贺九义带兵至南宁，假称护驾，杀首相严起恒，余臣星散；拜杨畏知为东阁大学士，旋为可望所杀。（《南略》十二）

可望怒起恒等之阻秦封也，闻王至南宁，遣其将贺九义、张胜、张明志等，率劲兵五千迎扈，直上起恒舟，怒目问："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等远迎主上，功甚伟，朝廷当有隆恩。若专问此，是挟封，非迎主上也。"九义怒格杀之，投尸江中；遂杀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追杀尚书杨鼎和于昆仑关。鼎和、尧珍以阻议故，而霖与载述则曾劾主秦封者也。（《小腆》）

先生自思州趋召。未至三十里，值可望发兵迎跸，至南宁，入贵州。时可望兵威张甚，亦以先生在尚书时曾抗疏力争，言可望不当封，乃密旨留先生于外。（《郭谱·家传》）

按：先生自此以后，遁播雷、廉之间，遥领科命而已。（《明清史料》）

是月清总兵徐有功，复陷高州。（《辑览》）提督李明忠之龙门。（《石城县志》）

按：《乱离闻见录》："海康伯李明忠，自辛卯携眷遁牙山、龙门。"

回防城，泛海之啼鸡山（交趾前属海岛）。

三月，至钦州之龙门。（《郭谱·家传》）

高州提督李明忠师溃，清兵追至电白，遂克高州。道臣郭光祖、吴人龙，知县文振义、副将王邦友降清。（《小腆》、《阳秋》）

按：二月拜东阁大学士。制曰："惟师学术渊源，道风遐畅，协相天工，克堪寅亮。板荡之天，其眷注为独至。"（《郭谱·家传》）

四月，至雷州乐民。（《郭谱·家传》）

七月，特敕督师闽粤，兼制江浙等处，恢剿军务，监催勋镇官义兵马，综理粮饷，赐上方剑，便宜行事，太子少保，礼兵尚书，东阁大学士。（《郭谱·家传》）

先生上疏言师首重闽广策应，略云："东南半壁，赖此长城，其中倡义绅士，则有枢臣卢若腾，枢贰臣王中孝、郭贞一，副宪臣沈佺期、林兰友等，俱能毁家为国，鼓忠教义，系千钧于一线，砥狂澜于既东。而臣乡潮郡，衣带漳泉，趾相错也；近臣役自虎贲营回（王兴，为虎贲将军），据阳江知县臣饶章禀报，是镇守惠潮，原伯臣郝尚久，反正有日；辅臣黄士俊、刑贰臣黄公辅，起义于广；铨贰臣李士淳，佥宪臣罗万杰、赖其肖，兵科都臣谢元汴起义于潮；但得蜡诏相通，修矛敌忾之众，其一呼万应也必矣。臣方蒿目而思，思得冒险矢贞之士，趋间道，通声势，而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包嘉允出自行畿，抵臣行营，抵掌而谈，义形于色，臣观其英资挺特，谠议秀出，倘以此充宣谕之使，衔漳国臣成功及八闽诸绅士之敕，必能丕畅皇灵，令海隅率俾，士气百倍。又如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臣邢祈长，萧条困处，蓬居塌户，不蔽风雨，泊如也；臣进而扣之，励以艰贞之节，遂能不辞跋涉，远之

浔横，晤同官臣晏清，共商机宜，联络近远，倘获给以粤中绅士士俊、公辅、士淳、万杰、其肖、元汴及伯臣尚久等各敕，臣即令之直趋虎贲营联络花山，由肇广溯惠潮，其从兹百粤风动，皆帝光之及也。”（《耆旧集》三十三）

时潮镇郝尚久密奏以全潮归正，旨特敕为故臣书家：豪杰黄奇遇、林绍竑、吴六奇、郭之廉等九人以兵部员外郎起用，哨集兼旅，以应西师。事泄，寻败。（《郭谱·年月志》）

十一月朔，巡督田西、后田、草塘诸闸。时清兵入雷州，移攻木内闸，连战十余天，大胜。（《郭谱·家传》、冯奉初撰《传》）

十二月，之龙门，至牙山。（《郭谱·家传》）

按：《忠逸传》以先生晋东阁学士及礼兵尚书以下至攻内闸等事，系于壬辰之春及七月。兹据《郭谱·家传》及冯奉初撰《传》。

道光《钦州志》一：“牙山，州东南一百里龙门外海之东，距龙门六十里。海中峙起三峰，形如排牙。距排牙山二十里，名金鼓嘴，迤东为乌雷港，迤西为马鞍山，皆海外扼吭之地。”

六年壬辰（清顺治九年，1652）　先生年四十六岁。

正月十六日戊子，孙可望遣总兵高天贵、耿三品、王爱秀等迎扈。（《小腆纪年》）廷臣从者，文武止五十余人。（《南略》）

二月初六日戊申，帝至安隆所，改名安龙府。（《纪年》十八）所居宫室卑陋，服御粗恶，将吏罕人臣礼。

四月，先生移舟贵明（钦州海岛）。

五月，移舟双墩（同上）。

七月癸酉，李定国复取桂林。

八月十八日，建极殿大学士朱天麟卒于西板村。

是月先生泊马鞍山（钦州海岛中），舟覆，三妾二女没于珠澳。

按：《内文集·清明悼亡诗序》云：“壬辰秋，五节没于珠澳。”秋八月，舟泊马鞍山，夜，飓风盛，室人促过臣舟；舟即漂出海口，仍碎于巨石，从鼓涛奔浪中，获登绝岛，越日飓风息，觅小筏之牙山；前舟已覆，家人尽没，幼妹玉时年方十三耳。时家人五人，三妾一女一侄女，

先是五人因乱，誓志不屈，风起，一绳相系，泛海不绝，逆流至先生筏前，得以收葬。先生具疏，特请奉旨褒恤，祭葬一所，表其墓曰五节。是岁慰勉之敕凡三至。（《郭谱·家传》）

构椽以居。《所思集》中有《壬辰避地马鞍山，治一枝未就。兹春闻儆，复于前址构栖，感赋诗十律》。

十一月，帝密敕西宣王李定国入卫。时可望内阁六部。拟国号曰后明，画尧舜禅受图，有僭窃之意。

是年清师至雷，擒高雷总镇海康伯李明忠。（《雷州志·沿革》）

雷人王之翰据西海一带。（同上）

七年癸巳（清顺治十年，1653）　先生年四十七岁。

正月人日，先生自号三士道人。

自序云："癸巳人日，自号三士道人。何言乎三士？余出身系进士，选馆为庶吉士，历官大学士；所求乎臣，未能一敢，问其次，至于三职，思其名，可不同于良士之瞿瞿乎？曰：三士何言乎道人？今之自标者，曰渔父、曰牧子、曰耕夫、曰樵叟，同曰道人也，予从同，同可不道人乎？若有人兮山之颠、水之湄，身在江湖，心悬魏阙，进忧退忧，独善兼善，展如之人也，可以为士矣。我生不辰，有志未逮，未闻巢由之买山，窃愧阳襄之入海，我不敢知；曰不降不辱之民，我则异是，我亦不敢知；曰避地避人之士可同？斯观世观生，终未望乎素履，思山思隰，独永叹于沧州云尔。"（《所思集》）

二月十五日，移居蓬罗山。

按：道光《钦州志》："大观港在州东南九十里，其东为蓬罗港。"

序云："马鞍一枝，粗得休憩，群居逼杂，回禄频惊于左右。遂以仲春之望，溯汐蓬罗，拾溟渤之大观，就幽深之窈谷，非薄于海而厚于山，我爱其静，远斯嚣烦而已。登彼蓬阳，瞻望岛屿，日月烟云，靡不记睹，时乃惠风和畅，群青奔目，高林肃错，历落相比，森森于上陵下麓之际者，惟苍松千百株。山之近民，既以煮海为业，不暇治山，青莎杂树，复不与诸松争峣瘠之土。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舍予其谁属哉！"（《所思集》）

二十二日，新泰侯郝尚久与恢剿总兵蔡元督同副将蔡俊、蔡杰等举潮州

反正。元遣参将管万赍奏至先生行营。(据先生《为全潮恢正疏》)

先是先生在梧州，已谋结纳二人，请加尚久新泰侯，蔡元以恢剿；既得报，遂奏请加元太子少保，实授后军都督同知、挂巩潮将军，给敕印。亦遣管万入奏对。(《耆旧集》、《忠逸传》)时清惠潮道沈时知府薛信辰，再事与尚久抗，尚久愤甚，会尚可嘉以其将刘伯禄代之，而檄尚久为参将，尚久遂执时、信辰，与故明南京礼部尚书黄锦、襄阳知府邹鎏、太仆寺少卿梁应龙、兵科给事中洪夔奉永历正朔，据潮属各县。(《小腆纪年》、《忠逸传》附《尚久传》)

按：沈时署巡道为顺治六至七年间事，不与薛同时，薛在八至十一年间。尚可喜以刘伯禄代郝，檄郝为参将事在三月，做《小腆》、《阳秋》以为尚久叛清在四月。疑尚久先闻，其子不待檄至而举义也。《行在阳秋》、《小腆纪年》均以尚久反正在四月事，今据郭之奇疏，知举事为二月二十二日。

五月四日，飓。有《飓风行》。(《所思集》十)

作《胡无人》四章。(同上)

六月四日，潮阳再陷。(《行在阳秋》)

六月，攻竹山，将犯潮阳；礐石兵迎战于华阳，陈万权当先赴敌，郝兵败走。(《潮州忠逸传·尚久传》)

先生重葺山居，作诗九绝。

序略云："敝庐既倾，课奴重葺……三旬竣事，息诸童竖。于组署之朔因书，满目微勤，劝之以九歌，后之居此者，亦当有感于斯作。"(《所思集》)

又有《蓬栖及空山中有诗》。

闰六月初九日，李定国出师广州，攻肇庆。(《阳秋》)由开建抵府城。(《高要县志·前事略》)

二十六日，总兵周金汤取遂溪，守将陈琪降。(同上)

七月，李定国复化州、吴川、信宜、石城，以施尚义守化州。(《阳秋》)

十三日，定国取贺县、平乐。(同上)

按：是时定国势张甚，尚久复反正，人皆以中兴可望。

敕谕再至，改督师为视师。先生有诗二首纪其事。（《所思集》）

按：罗万杰撰墓志云："甲午春，改督为视。"又《家传》："九年乙未，督师改为视。"

闰八月，耿继茂与靖南将军哈哈木统满、汉兵十万，以闰八月至潮，吴六奇、苏利引兵来会，蔡元、许龙亦弃尚久，后附于清，合兵围城。尚久遣部将杨清时乞援于郑成功。九月十一日夜二鼓，舟师自东门入，尚久退金田山垒，与子尧投井死。（《小腆纪年》、《尚久传》）

九月，潮州再陷。郝尚久父子投井死，潮州道李兆京死之。（《阳秋》）

十月，先生至防水练水军。（《家传》）

有《初冬十二至防水见黄花喜吟诗》。（《所思集》十）

按：清师以八月初五攻陷石城、遂溪，十月尚可喜陷吴川，杀陈彝典、陈其策，故先生退守防水。

先生以潮郡复陷，上疏优恤，并陈拯救之方，略云："臣于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据镇臣□□赍奏管万塘报恢复情形，随经两疏题奏。不虞臣郡，运当百六，于去岁闰八月复为强敌所破，侯臣郝尚久血战三日夜，迫于内变，投井而死；城陷之后□□□□□□□□□□□□□□□□□□□□□□；不屈而死之乡绅，则有原户部主事林佳抱其父先臣忠宣之柩，詈骂而死；其余士庶，难以更仆，今其存者，仅鸠形鹄面，茕独无告之残喘耳；此谁非三百年噢咻生聚之余，义不负国恩而一旦至于此极也？伏惟圣明恻念，念以死勤事之勋臣：功最高，节最著，于侯臣尚久，全畀五典，并死忠死孝之林佳，从优赠祭；诸被难最惨之家，俟恢复后，敕地方官核实议恤。臣前所请奉旨之敕宜速行补发。太常少卿臣辜朝荐，毁家避敌，现依勋臣成功，左右拮据，资望著于中外，忠愤盈于怀抱，宜敕部会推枢贰或发实推闽抚；佥都臣罗万杰、兵科都臣谢元汴，苦节抗敌，百折不磨，宜敕部会推枢贰佥都；又太仆少卿臣邹鎏、臣梁应龙、吏科右给臣洪梦栋、监军兵科臣陆漾波，各宜分别升擢；兵部试主事臣袁龙、夏光天、杨宫、林绍铉、郭之廉、林隽胄，宜实授职方，以册立恩给之诰命。臣虽屡奉便宜委任之敕，然小心翼翼，臣子之谊，诚慎之重之，不敢不一一题请也。"（《耆旧集》三十三）

八年甲午（清顺治十一年，1654）　先生年四十八岁。

正月朔，帝在安龙府，以吴贞毓为大学士。（《阳秋》）

先生在防城，有《防筑初成即事诗》。（《所思集》）

监国鲁王，移居南澳。（《小腆纪年》）

二月，李定国入高州，张月降。（《阳秋》）

邓耀设快马船于钦州石滩，为海上封锁之计。（《钦州志》）

三月三日，先生舟次龙门，有诗。（《徂东集》）

得晋文渊阁及太子太保之命，作《愧感诗》三首。

按：《家传》系晋太子太保加文渊事于九年乙未二月，与集异。

十三日，由牙山之雷州。十七晚抵乐民所，有闻西师下高凉及《宿乐民所诗》。（《徂东集》）

作《十八忠节吟》。

按：是月孙可望杀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先生诗即记此事。（详《南略》、《安龙纪事》及《小腆纪年》十八）

李定国入高州，道经雷、廉，破之。清将先启玉降。（《雷州志·沿革》）

按：《石城县志》："定国率骑兵数万，象十二头，由西粤突至。"又陈舜纂《乱离闻见录》据当日目击，定国入高州，实在甲午十一年三月二日。

四月初十日，李定国兵至雷、廉，攻复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县。（《阳秋》）时可望憾定国益深，定国恐其来袭，故出掠雷、廉以避之。（《小腆纪年》十六）

六月，李定国攻梧州不克。（《阳秋》下）

作六贤祠，祀寇准、苏轼、辙、李纲、赵鼎、胡铨，为诗六首志之。（《徂东集》）

按：集中《六贤祠诗》系在立秋前，作于何月莫考。

作《东征颂》百韵。（见《徂东集》）

七月，太监刘九皋赍永历诏，航海至闽与郑成功。时帝驻跸浔州，被掠于南陵，从行者惟严起恒、王化澄等，因遣九皋从龙门渡海，求援于成功，成功整师趋粤，至潮阳港蓬索坏，不果行，回扎金门。（《台湾外纪》六）

按：据《小腆》，严起恒于永历五年为孙可望将贺九义所杀。据《小腆纪年》王化澄已于永历四年降清。又南陵或即南宁之误也。

立秋前三日，由乐民之高凉，初秋朔抵步，有诗。（《徂东集》）

八月中秋，先生在高凉，作《秋月篇》。（见集）

二十八日，道经大墟，有七律二首。（见集）

九月至阳江。重九登高之会九人，值暮雨，作《九秋篇》。（见集）

十五日，发鼍江，之百宜，有诗。（同上）

晦日，在宜山中作《秋招诗》五首。（同上）

十月，李定国围广州。（《小腆纪年》）

陷高明，进围新会城。（《通鉴辑览》）

先生有《五羊秋》、《五羊冬》诗二首。

集中有《王师以季秋晦拔高明，冀露布遂达行徼》十绝。

按：是事《阳秋》、《小腆纪年》均不载。

十一月六日，先生发自百宜，经开平，马上有诗。

十一日，抵新会南开，会李定国之师，有诗纪之。

十三日冬至。与胡卫国率诸文武，设龙位，行十二拜礼。（《徂东集》）

是月郑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苏茂配战舰送林云璿奏旨行在。并会定国合师。（《小腆纪年》）

十二月初六日，李定国攻新会。（《阳秋》）

十四日，清援兵至，新会困遂解。

定国既入高州，遂进围新会。知县黄之正死守，不下。是月十八日，平、靖两藩协同将军朱马喇，统领满汉兵战于河头，用火箭破其象阵。定国大败

遁去，结筏而渡，奔回广西。（《雷州志·沿革》）

先生有《致败诗》，其序略云："十四□□大至，王师一战而溃。溃者何？败之忽也，如水之忽尔而溃也。兵不讳乎败。此何以书致？致之自我，不予口以能也……泓之战，先后一揆矣。"又有"闻闽师数百艘至澳门，喜其来而悲其晚……"（《徂东集》）

时尚可喜、耿继茂急请满兵会剿。清命都统朱马喇为靖南将军，率江宁驻防兵赴之。可喜结营山颠，伏兵江隘，与朱马喇合兵败定国于珊洲。（《小腆纪年》）

二十七日，先生由百宜移居石井，有诗。

按：石井在石城县，今廉江。《石城县志》卷二："石井在城东十五里西岸村前。深七八尺，广丈余，不溢不涸；时或久旱，足灌田千百亩。"

督虎贲将军王兴营文村。（《郭谱·家传》）

自定国败，兴退保新宁之文村。文村处万山中，左联戈壁，右扼大海，地接新会、开平、恩平、阳江、阳春，连广、肇二郡六邑。兴筑城其间。去城五六里，四面皆卤田；田中惟鸟道一线，不得径入。兴负固坚持数年。

是年得诗一百二十六首。

按：自定国攻新会失利还黔，时靖氛将军邓耀屯龙门岛。所集逋播臣，有两郡王、一巡抚、六部监，有知府以下凡数十人，东结凌海将军陈奇策之援，并解漳平伯周金汤之斗，近连交趾属，远约延平水军。（《番禺县志·屈士琼传》）

九年乙未（清顺治十二年，1655）　先生年四十九岁。

春正月，作《稽古篇》诸论，作诗五绝。（《徂东集》）

二月，李定国自高州退入南宁。定国败于兴业，又败于横州，遂退南宁。（《纪年》十八）

按：《行在阳秋》："四月二十六日，李定国兵败于新会。是年清设高、雷、廉总管。"（《雷州志·沿革》）

六月，郑成功取揭阳，遂入普宁。(《纪年》十八)

七月七日，先生第五男不育。卧病石井山中。(《郭谱·家传》)

八月九日，夫人张氏卒。有《悼内》四绝，见集。

草《稽古篇》。是岁除夕有《为稽古诸传未竣漫吟》五律。不录。

是年得诗二十四首。

十年丙申（清顺治十三年，1656）　先生五十岁。

正月，帝在安龙，仍改为安隆。帝涂苇薄以处，日食脱粟。守将承可望意，更相凌逼。

李定国败孙可望于田州，进扈安龙。(《纪年》)

清尚可喜遣左翼总兵徐有功、潮州总兵刘伯禄败郑成功将苏茂于揭阳。(《纪年》十八)

先生于石井山中，筑涧石圃。(《徂东集》)

序云："从石井右行可三里，有山深幽。山之后多巨石，石喷珠泉；日落虹蜺见，天清风雨闻，依稀乎飞流直下三千尺也，俗呼响泉。予激流植援，筑室其左，名之曰涧玉圃。夫玉以比君子之德，君子之冥栖于兹，谅非衒玉求售之日矣，故以为攻之以他山之石，不如涧之以此山之泉。"(《徂东集》)

三月，定国奉帝由安南卫西奔云南。既抵曲靖。时滇守刘文秀迓之。居可望第，改为滇都。(《纪年》、《通鉴辑览》)

按：《行在阳秋》系于四月。

进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以扶纲为东阁大学士。定国奏先生数年拮据苦心。承嘉赖之敕。(《郭谱·家传》)《徂东集》有诗三首。

六月，先生之下川。

自闰月五日，病潮热。

为《杂诗二十首》，取古今清节能言之士二十人（伯夷……）各以咏之。(俱见《徂东集》)

八月，拔高明。会诸水师同之雷、廉。(《郭谱·家传》)有诗曰《瞻云集》。

仲秋六日，自寨门解缆。有诗。

时粤省州县悉陷，其存者仅雷、廉海中之陈奇策、冯应骝、文村之王兴、龙门之邓耀而已。先生往来海上，委蛇观变。（《忠逸传》）

按：《家传》记拔高明于是年。冯奉初撰传系于乙未，陈伯陶《遗民录》本之，相差一年；罗万杰撰墓志不载此事。考《祖东集》有《甲午季秋晦，拔高明十绝》，是拔高明一事，有丙申八月（《郭谱·家传》说），乙未（冯《传》）、甲午季秋（《祖东集》）三说之异。考定国陷高明在甲午（《通鉴辑览》作十月，《行在阳秋》作二月，集作季秋），合兵围新会，当以集所载为是。乙未定国已退南宁，丙申奔云南。诸书所载，此二年中无明兵重拔高明事。温《传》谓一时事析为二，是也。

九月九日，泊东汕头。集有诗。

十六日，大会水陆之师。东海之众，观者如堵。有诗。

十月四日，先生抵乐民。其诗序云："自辛卯孟夏，甲午春，合此日而三至矣。"

《诏使抵乐民，喜闻季春幸滇之诗》（有诗三首），为《幸田颂》。（俱见《瞻云集》）

视巩、雷营。（《郭谱·家传》）

先生诗第十五集曰《稽古》，共诗一百首，俱丙申年作。

十一年丁酉（清顺治十四年，1657）　先生年五十一岁。

正月，次子天禔、叔子天社间道至乐民趋省。（《郭谱·家传》）

按：罗万杰撰墓志："丙申，仲、叔二子由间道趋省先生于乐民。"当系丙申自揭启程，至翌年正月抵达也。据《瞻云集》诗，二子以是月二十六日至乐民。

朔，帝在滇都。（《阳秋》）

二月，恩晋少保，武英殿大学士。（《郭谱·家传》）

敕书曰："倡义孤危之际，云旅倾依，誓师板荡之余，龙骧倍奋。"又曰："曩帷幄之筹，爰借出麾旄钺，厪庙堂之策，式宜入秉钧衡，患难君臣，其延伫倍切也。"（《郭谱·家传》）

先生有《恩晋少保及武英殿疏辞自述诗》。

九月，孙可望叛，移师犯滇。李定国、刘文秀奉命讨之。(《阳秋》)

有《雷海秋兴》八首。

十一月，又自乐民之龙门，过龙头沙望莞头，有诗。(见《瞻云集》)

是月十五日，孙可望降清。(《阳秋》)

明追赠安龙死难大学士吴贞毓以下十八人。(《小腆纪年》)

十二月，明复取南宁。(《小腆》)

除夕，先生在龙门，有诗。

十二年戊戌（清顺治十五年，1658）　先生年五十二岁。

春，节使漳平伯周谷城、职方郎许作庵由龙门之闽，册赐姓，为延平王，兼敕会师恢粤。先生有诗作：《周许二君承入直之召挑选所部随行有诗》。(《赡云集》)

三月，先生附奏粤事有机可乘，其雷、廉、钦、宁关两粤入闽咽喉，臣去留为安危，复须敕慰劳。(《郭谱·家传》)

五月，清兵分三路入黔。尽下南丹、那地、独山诸州，会于贵阳。(《通鉴辑览》)

六月，入上思州。(《郭谱·家传》)

清兵陷遵义。(《辑览》)

季夏由龙门解缆，自大直登陆至那洞，至思州，俱有诗。(见集)

十二月，先生抵安隆。(《郭谱·家传》)

是月清兵入滇，卓布泰兵取安龙府。清兵三路会于平越府之扬武堡。李定国遣冯双礼守鸡公背，张光壁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蜀兵出遵义，趋天生桥，由水西直取乌撒。文选惧，弃关走沾益州，从下流潜师宵济，遂入安隆。安国使其将吴子圣拒战，溃走，定国以全军据双河口。(《小腆纪年》、《通鉴辑览》)

十五日，帝离滇都。(《行在阳秋》)

是年《稽古篇》五十五卷成。

按：《稽古篇》有《稽古篇止于秦汉唐以下，先以诗述其概六首》。

又《稽古篇竣事十绝》，其自序书□□于二年著雍阉茂，乃戊戌岁，知成

于是年也。

编年诗有《答光□王赠行》、《之叶邕行》、《断桥行》、《洗村行》。(见《瞻云集》)

自序云:《稽古篇》之作,非作也,述也。取《汉书·古今人表》,正以《春秋》,订以《左丘》、《公》、《穀》、《国语》、《国策》、《史记》、《通鉴》,求其至当,毋罔古而惑今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耳,繇邃初迄周秦,前乎此有人有事矣,后乎此有人有事矣,曷为正乎?春秋正以春秋之义例焉尔。今繇班史所列,分以三科,别以九等,迹其论断圣仁智愚,上次中,亦拳拳于先师之牙后,何乃折中,无闻名乖义谬贻来者之讥。谪臣以为班生搦三寸之管,驰骛数千载,仰窥坟索,旁贯百家,扢芳轨于未沦,砭污嵤于既腐,班生之志则大矣。独悲其蔽乎暗而误乎臆也。何暗尔?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仁匪异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智仁非分也。上上曰圣,上中曰仁,上下曰智,懵其旨矣。夫妇之愚,可以造端,虽有下愚,自灾其身,犹愈于足智多能之乱贼也。下下之列,独归愚人,于勤惩曷取焉?况乎人类既滋,群生嗤嗤,书契以来,畸踪隐迹,律度量衡,所弗能数,统章元会,所未繇穷,嗟夫!史班探索,钩致而参伍之,一名一字,或分两人,此彼轩轾,错综矛盾,有繇来矣!若宇圣君圣佐,于今为烈,以及德功差等,忠佞分行。安得阿其所好,外其异己?鸿荒汤穆,结绳之故,不可得而详矣!盖亦观乎三代以来,少康祀夏,帝杼师禹,今古兴王,首推弓冶,康居上下,杼且中中,甚可诧也。芒泄虽贤,岂能方康?扃仅守府,顾反高杼,此抑扬夏后,不可为平者。太丁早卒,何闻而并思道之君?辛巳不竞,何竖而驾任贤之主?此低昂有殷不可为准者。至于伊尹元圣,一德齐汤,说命箕畴,心传稽古,比辙管晏,然欤?否欤?又如宗圣曾子,不如左丘;兴周八士,不如诸伶。胶鬲商容,厕于师涓之列;祝鮀孙贾,乃入史鱼之班。繇斯类推,可为三叹!即如下下方列,以待元恶,鲁隐让国,莵裘弗终,君子愍之。比诸长狄,不及围荦,薰获倒背,一至于斯!又如武丁射天,分身河渭;二世积市,殒首望夷,穷凶极暴,载籍稀闻。视夫逃债赧王,处松饿主,丧师坠国,积威使然。宜从哀矜之列,不在痛疾之科。下中下下,反有轩轾。臣故断断乎谓班史之蔽于暗,而误夫臆也。臆以成暗,暗以锢臆,虽欲仰瞻尼麓,流渐洙源,终南辕而北向矣!臣不惮折衷,别为序次。上焉者为圣人、大贤、贤者、希贤;亦曰圣贤之号,光被四表;圣人如日,大贤如月,贤者如星辰,希贤如云汉,三光为昭,将互相映发也。次者为畸人,如辟历夜明,以助化

工之神奇。次之为中人，如暑雨寒风，与四时同消息。尔下之为妄人、凶人，则霞虹霰雾，天之杂气；五残六贼，天之逆气。最下为乱贼元恶，则蚩尤枉矢，天之乱象，星移宿易，天之杀机。发于天者见于人，发于人者以人治之而已。总之，曰圣人，曰大贤，曰贤者，曰希贤，曰畸人，曰中人，曰妄人，曰凶人，曰乱贼，曰元恶。天有十日，故人有十等也。何谓圣人、圣君、佐圣师？勋放天地，德昭古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也。周孔以下，不再见矣。何谓大贤？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与夫大忠大孝、至清至节之谓贤，楷模天下，风起后人者也。何谓贤者？希于圣而贤于人，富强礼乐之英，多闻多见之隽也。何谓希贤之人？不忮不求，必信必果，有所不为，可以有为之俦也。凡斯三者，以语夫仲尼之门，识大识小之士，区以别矣。若夫春秋以下之人物，人之有猷有为有守，羞其行而昌其邦，三者之称，或稍恕焉。将望古而遥集，亦因时而尚论也。何谓畸人？曰博闻强志，精于术数，工于技能，与夫重言诺，轻死生，气矜自得之夫，跅弛不羁之侣也。何谓中人？曰希贤之下有中人，凡着职官服，书名氏于经史，遭时际会，附青云以声施者，则书之。畸人之次亦有中人，习仿流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亦如子舆子之圣娄输师旷，先告子，分黝舍，而巨擘于陵也。何谓妄人与凶人？曰天下之恶一耳，有索涂冥行者，有驱诸罟阱之中而莫知避者，有下愚不移者，有为不善而惟日不足者，所归之恶各有已甚未甚也。何谓匪类？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奸回阴鸷，为鬼为蜮。《诗》曰：投彼豺虎。《传》曰：进诸四夷。彼哉彼哉，非斯人之徒也。匪类何以有二等？所播之恶，亦有已极未极也。繇前后所列，古今之贤不贤尽于此乎？曰弗尽。弗尽则曷为书乎？此立少观多，存其略焉尔。曷为存其略？书缺有间矣，非书传所纪，言行无得而称焉。不可以为有，不可以为无，不可遽没其名氏。若夫诵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立乎今日以指上古，上古之日远矣；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从同同而阙疑殆。臣不佞，师先圣而述者也。始乎盘古，首出御世人之始也。何以止乎战国？曰备矣。汉唐以下，有志未逮者。何取乎叙赞论说？臣生也晚，窃取汉宋诸大儒，较诸班史，择精而语详也。解嘲分谤，以俟后之君子；则未知其为是欤？其诸好古阙文之意欤？繇后所述，君师之统八，侯国之纪二十。统者，总也，总天下之大同而归于作君作师之人也。纪者，记也，记分治之遗法而彰其建侯设屏之意也。附以列传百，外传四，总传三十。传者，传也，传于微，传于著，一人之言行而褒讥互见，一事之义类而善恶分途。为百为四，善善长而恶恶短也。总传之次，善善先而恶恶后，中国内而夷狄

外也。终以六训。训者，循也，遵也，循天地人之理道，遵皇帝王之典谟，以窃附于祖述宪章之微旨也。三古远矣，章之自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臣惟终身守此勿勿也。故曰《稽古篇》之作，非作也，述也，时□□拾贰年著雍阉茂之岁，律中黄钟，赐进士第光禄大夫行在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礼兵二部尚书，臣郭之奇谨叙。

凡例云：曰若稽古，曰鸿荒，冒天下者三皇。德如五帝，功如三王，统至嬴而中绝，道繇孔而日昌，初一为八统。曰若稽古，曰春秋战国，五伯莫盛于桓文，七雄同归于诈力，观征伐之自侯，嗟王者之迹熄，次二为二十纪。曰若稽古，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春秋大夫，同道为朋，战国人士，从善如登。择而从，择而改，观其所感而自兴。次三为列传百、外传四。曰若稽古，微微彰彰，其道日光，彰善瘅恶，千载旁皇，俾斯人之畏慕，垂汗简于秋霜。次四为总传三十。曰若稽古，曰君子言有方则而行有式，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观乎天之象，地之域，人之情，物之则，可大可久，而天下之理得。次五为六训。稽古之编，初一曰八统，取象乎八卦也；次二曰二十纪，取类于八方十二州也；次三曰列传百、外传四，取物于盈，取义于闰也；次四曰总传三十，取法于惟月也；次五曰六训，取则于六经也。合为五，凡五行之理也，分为五十卷，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也。

朱希祖跋略云：《稽古篇》五十五卷，明揭阳郭之奇撰。本书自序题赐进士第光禄大夫行在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礼兵二部尚书。其上所载年号已为人剜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存目》载此书，亦云“所载年月，上有阙文，第云著雍阉茂戊戌岁，当为顺治十五年。”案顺治十五年为是永历十二年，郭氏所题年号，必为永历，为清所禁书，故清代此书皆剜去其年号，以避禁毁；则此序必作于永历十二年无疑矣。序中自称谪臣，盖其时正由交趾入居雷、廉间已三年也。此书盖在交趾时始作，至此三年中乃告成耳。至此书之付梓，由其子天禔校字，且称此书为《交山遗史》，则作书在交趾，刻成在康熙，之奇已卒，故曰《遗史》也。（《郦亭书跋》）

十三年己亥（清顺治十六年，1659）　先生年五十三岁。

春正月初三日，清兵入滇都。（《行在阳秋》）

初四日，帝幸永昌。（同上）

闰月十八日，帝幸腾越州。二十日遂行，二十八日帝入缅关，二十九日帝留蛮莫。（同上）

二月十七日，清兵入永昌腾越州。（同上）

十八日，帝幸井梗。（同上）

三月，南宁陷。（《郭谱·家传》）

先生至龙州。

《宛在堂诗集》：己亥禊日（三月上巳）在江州。初七日至思忠练村，闻警。初九日自练州回江州。初十日至龙州板村。十三日憩龙州荒署。十五日发龙州，晚寓香村。十九日寓上石江村。二十日寓上石油村。沿途俱纪以诗。（见《瞻云集》）

先生以行畿路绝，由思忠（属南宁）至上石西州（太平府属，西至铜柱）二十余日，越数日入南交之文渊州。（《郭谱·家传》）

清师入滇，音问隔绝。海上诸部亦渐蹙。先生与光泽王俨铁（按《明清史料》作俨鐵）、总兵杨祥亡命交趾，才数里，入文渊州，州官僦舍居之。（《忠逸传》）

按：《行在阳秋》载是年九月，光泽王俨铁、大学士郭之奇、总兵杨祥被获，不屈死之。考先生被执为辛丑八月四日，就义在壬寅八月十九日，此误。

五月初四日，缅王遣官迎帝。初五日，帝离井梗。初八日，缅王羁帝于孟坑城外。（《阳秋》）

是月，先生移文渊旧州。（《郭谱·家传》）

仲夏有《题宝英洞诗》，序云："之文渊旧州一里许……出于己亥仲夏也。"又有《题泉始洞飞液岩诗》，时阮郡请振铎铧南邦，先生辞，作《至于斯》二首，诗见《陋吟集》。

七月三日，作《百日殊方诗》。（见《陋吟集》）是月上旬，有《文渊官骑象来谒，询问天朝捷音》及《忆新会之北，三十二牙同没于虏，感作》、《喜传磨盘之捷，兼闻缅国助兵感吟》三绝。先生虽居夷，犹眷眷不忘君困。

秋八月，第三子天社殇于旧州，年十六。（《郭谱·家传》）

按：天社即罗万杰婿。

十月，郑成功修表遣太监刘九皋同内司镇中营副将江玉振自龙门间道见

永历，请会师恢复。（《台湾外纪》九）

按：龙门昔日为内地近海孔道。

是岁先生手抄《周易》，撮其义为歌，又为《读易诗》四首。是年先生居夷，得诗三百六十首，定为《陋吟集》，其自序云："君子居夷，非得已也。素夷行夷，以不得已之心，人而自得，愈非得已也。予以春末抵文渊，一枝暂休，腥氛四逼，栗栗乎若高崖之欲倾，深谷之将陨；恐惧之余，犹不废我啸歌。或曰入山恐不深，人林恐不密；山深林密，思幽调远，歌声所自出也。或曰长歌以当泣，远望以当归；歌而望，望而歌，即见兴怀，有触于心，若钟鼓之考，不知声之发也。是二说者皆然。然予之居夷非得已，居夷而作诗数百，又岂得已乎？（中略）所恨孑影星遁，经史莫随，偶见次儿手抄古文两卷，取其惬于心者，韵而为诗。（中略）古思我获，陋室堪铭，韵于古者必不陋于今。予以陋吟名诗，志学古而未逮也。或曰居夷何陋，君子之余思也。诗止于冬腊，四时之气已备，七日之心可来，陋吟止而颂声作矣。（下略）"（《耆旧集》三十四）

按：是年又有诗十二首，编入《瞻云集》。

十四年庚子（清顺治十七年，1660）　先生五十四岁。

帝驾在缅甸孟坑城外。

三月，先生自文渊往上禄，移啼鸡山。

自文渊往上禄，行李从者为下州洞妖所截（赖常上禄阮文渊声义执言，仍归故里）。自上禄往先安至班衣山，为交人所阻，困泊凉台村。自凉台至江坪，穿山泛海，跋履尤艰，汉夷杂居，殆非人境也。旋卜筑草潭，春三月，移啼鸡山中。（《郭谱·家传》）

四月，泛海抵先安之帽山（在海中交州东南）。（《郭谱·家传》）

五月，泊板则。上筑村中，粮食俱绝。（同上）

九月，之禄州，旋寓板山，又之那突。（同上）

清海北道方国栋，总兵张伟入龙门。邓耀被擒于广西千隆山寺。（《钦州志·纪事》）

十月，女辰殇，年四岁。（《郭谱·家传》）

庚子至班衣山，为交人所阻，泊凉台村；自凉台抵木簰，自木簰抵黄约尤艰苦。自黄约村穿山至马爹，人迹几断；自马爹抵万宣，行海坪数十里；自台宣涉水则汉地矣。自罗洞至松林，由松林至江坪，汉夷杂居之地也。所至殆非人境，结茅以处，犹赋诗不辍。（《忠逸传》）

是年得诗百六十五首，定为《巢居集》。

是年王兴自焚死。（事详《明季忠逸传》、陈恭尹跋《王将军挽歌》）

按：兴殉节之年，各书所记不同。惟《续明纪事本末》以为庚子，疑《忠逸传》从其说。兹据之系年于此。《番禺志》：兴阖室自焚，清兵义之，葬于河南籮箕村，题其墓曰“明虎贲将军……之墓”。

是时闽受永历封眷，郑成功遣杨廷世同刘九皋泛海从龙门间道往粤西，永历召见，问成功兵船钱粮多寡。永历大喜，封成功延平王。（《台湾外纪》十）

十五年辛丑（清顺治十八年，1661）　先生五十五岁。

春，自编诗共十八集。自丁卯秋至是年春凡三十五载，得诗二千八百四十首，赋三篇，箴四首，词十四首，琴操三阕，总曰《宛在堂集》。

《宛在堂诗集》自序云：忆年十五，帖括之余，间学声律，呼夏虫而语冰，执井蛙而问海，必也为他日羞，诗成辄弃，宜矣。既七年读书中秘，与曹允大、方肃之、刘胤平、徐九一、金正希诸同馆，花砖马背，连裙振辔，扬扢风雅，思不懈而至于古。及休沐抵里，得冯令如陶令，唱酬不辍，始有《马上》之刻。丁戊己庚，历四载为诗三百，一再削稿，存三之一。由今观之，少年气真狂，有意与春竞彼一时也。灾之木仅志少作。辛未浪游，自虔江抵白水，江山闻见，岁月师资，《舟中》独对，如长日加益焉。流洄濒溯，遐心聊聊，一吟一咏，不与人事相接。虽才思疏阔，鲜达词源，而晴川芳草烟波，使人诗之，性情大可见。壬申家食，独寐寤歌，爰有《遂初》之吟，亦惟吾友宋尔孚、谢儒美披衣朝夕，析疑赏异，志相勖也。此诚得意，余外徒缤纷耳。由此而落影冰天，含香粉署，洎分桐汉水，歌鹿嵩河。历癸酉甲戌乙亥丙子，有《感遇》、《骓怀》、《立言》、《秋思》之作。数载孤愤，间多嵚崎历落之响。前辈文文起，乃以余出翰林，官词部，凛然钦其风节，谓“诸作为不朽大业”。而黄可远则曰：“仲尝顷不得意于词林，诗宜稍阻，顾益

勇为之弗衰，古诗之复，其以仲尝为功首。”二先生之意，夫各有所重也。嗟夫！人自负诗耳，官能阻人哉？一阳发阴，气含公鼎，彼苍海千秋朱鸟，名系者果何人欤？余是以散古史于左右，置风骚于后前，起作者于千载，求得失于寸心，心几疲于弱岁，其益励于来兹也。乃不幸而有何恃之哀，罗蓼居庐，继而分荆怆魄，余桂伤魂。阅丁丑戊寅己卯，诗不能半百，总附《秋思》之末，然闭门一室，破涕为歌，新诗改罢自长吟，非苟焉而已也。庚辰《出谷》，携小草入长安，则有前辈蒋八公、黄可远、王觉斯，吾友宋文玉、方萧之、徐九一，一时星聚，诸君子皆诗伯雄海内，金薤之垂琳瑯，宝光之烛牛斗，互相映也。余不揣实，左橐右弭，与之升昆仑，蹑姑射，罗缕根角，挈携陬维，属思微茫之表，移情窅窦之中。於戏！盛矣！八公之叙余曰：“萤芝鹦鹉诸赋，几淹江鲍。五言古咏怀，何必减嗣宗元亮。湖江八律，逼似《秋兴》。淮南王诸乐府，置汉人中殊不可辨。”嗟夫！余诗何能及先生言，而吾友文玉乃历取前后诸集，次第手评，以证功力之疏密，气候之浅深。余用以劝志，且相读书。自是而视学七建，诸同人若惝怳有失者。读肃之祖余之诗曰：“簪裾满京华，斯人独凭轼。”九一之诗曰：“拓落君特甚，风骚自千古。”何言之悲也！驱车而南，以近作示琴张子公亮，公亮辄怃然为间，曰：“吾于海内罕所低首，读先生近集，而吾家句曲三峰，或未能与揭岭争高下。”於戏！“文章有神交有道”，余方悲离索于尘风，而后倾怀抱于白云，有以也。辛壬癸甲，矻矻铸人于八闽，邮筒所至，辄闭目不敢视，微黄幼冲先辈，贵孤骞之凤羽，蔼冈梧之云物，斯道昆源，其不悲芜没于暮芳，嗟荟蔚于朝脐者鲜矣。先生之赠余曰：“巨秤出袖间，雄风播海内，约此玄冥籥，以作昭明耩。”又曰：“先生秉文珌，遂与六子绩。以尔伯夷风，焕为士勖。”即以此言赠先生也可乎？《闽辞》诸作，每篇之中辄寄意焉。余之情既见乎辞，亡何而国难遥闻，攀髯长痛。疲津息影，避阱于乙酉，陷邑于丙戌，悲何怙于丁亥，于戊子，四载幽思，愁叹苦神，永怀自广，总标之曰《素得》，中列《九九篇》，则自揭陷至脱身，为曰九九，日各有诗，志厄也。若夫蝉蜕戈革之中，低昂舒戚之际，囚神鬼于幽玄，弄鲸鳄之牙尾，每于惨淡经营之中，辄存潇疏旷远之意，倘所云“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者，以素得之欤？抑以诗行素欤？光华复旦，负羁绁于肇梧，绵蕞之余，稽古是力。由戊子而己丑，而庚寅，漫赓《复旦》之篇，一之日□氛再播，辛卯壬辰，两粤胥沦，由癸巳及辛丑，九载驱驰，东西迭哄。自避地南交，及修矛东土，复有《海上》、《所思》、《徂东》、《稽古》、《瞻云》、《陋吟》、《巢居》之什，是惟榛苓系目，

涯角惊心，长歌远望，间以奚囊当纪事，所冀回板荡于疾风，成中天之日月，海内同声，相逢梦寐，或有存者，执手而游汗漫，披腹而呈阛阓，其以是日乎？於戏！兵兴以来，诗亡道丧，有由然矣。回念昔者，如影海，如化城，如无何有乡，故姑取前诗，保残追轶，次第篇列。未及前贤，更勿疑也。嗤点流传，复何畏乎？李杜文章，垂光焰于万丈，卢王翰墨，存体制于当时。今之学古人者，亦各有能有不能也。余不能绮丽陈隋，仰齐梁之后尘于千载，亦何必模棱汉魏，失邯郸之故步于平生。然则今日之次第诸诗，宜自见乎其已及者，而勤乎其未及者可也。大雅不作，真滥谁分？我法孤行，甘苦自诣。余不及古之人也；如见其不及而不止，於戏！其稍益也哉。总前后诸诗，曰《马上》，曰《舟中》，曰《遂初》，曰《感遇》，曰《骈怀》，曰《立言》，曰《秋思》，曰《出谷》，曰《闽辞》，曰《素得》，曰《复旦》，曰《海上》，曰《所思》，曰《徂东》，曰《稽古》，曰《瞻云》，曰《陋吟》，曰《巢居》，凡十八集，诗二千八百四十首，赋三篇，箴四首，铭十首，词十四首，琴操三阕，自丁卯秋至辛丑春凡三十五载，前后序评，则前辈董公其昌、李公孙宸、何公吾驺、陈公子壮、文公震孟、黄公道周、蒋公德璟、倪公元璐、傅公冠、王公铎、文公安之、黄公景昉，友人冯君飙、宋君玫、刘君若宰、何君瑞徵、曹君勋、方君拱乾、徐君汧、金君声、姚君思孝、朱君天麟、宋君兆禴、王君化澄、邹君鎏、罗君万杰、夏君允彝、张君明弼、张君家玉、谢君宗鍹，凡三十人，其中品次独详，心心相勖，则八公、可远、文玉、肃之、允大、九一、公亮、儒美八君子也。时辛丑春日揭岭诗人玉溪子书于南交山中。

帝在缅甸孟坑城外。（《阳秋》）

六月十九日，缅酋杀文武官僚三十余人。（《阳秋》）帝左右仅存眷属二十五人。（《南略》）

秋七月，先生移居板及。（《郭谱·家传》）

按：先生《巢居集》收诗有八十五首，均在被执之前作。

长子天祯附家报，劝先生归。先生责之曰："予以眇躬为纲常谋，虽有家，义不得顾。非不念子弟侄，而惄然兴怀，瞻故都，眺邱陇，而怆然志伤以悲也。光复则归，扫垄有日，陆泛则望乡无期。儿继吾志，葬吾祖、吾父，传吾文，予蔑复有言矣。"（《郭谱·家传》）

八月四日，与光泽王俨铁、总兵杨祥，为交夷永福诱执，献于两广之使。

(《明清史料》)

时次子天禔被夷人殴击几毙，犹扶创追随，越三日至明江，创甚，乃留仲弟于明江，独与义子天祉(《史料》作天禧)就道。途中作《八月四日作纪事诗》(《郭谱·家传》)，诗云："十载艰虞为主恩，居夷避地两堪论。一时平地氛尘满，几叠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秋风洒泪痕。"其一云："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几自鞭，血比苌弘新化碧，魂依望帝久为鹃。曾无尺寸酧高厚，惟有孤丹照简篇，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内文集》附)礼部残题本顺治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准两广督臣李栖凤咨为报解伪王官事内开》："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据马提督分巡左江道塘报称，(中略)今接安南辅国政东致镇道内称：案照本国臣事天朝，惟以恭顺为心，昨见咨来使夹剿海逆邓耀，即为剿除，俾上国得宽一方之忧。续见移会各词，使擒献伪王伪镇，已屡差侦探，但彼逃匿山林，变易姓名，假为庶民，未知真伪，难于应命。兹始查访的实，并郭之奇等，已差调就关上，交付献纳，以息上国遗患之忧，以昭本国助顺之义等情。又据谅山处文渊州都督韬郡公阮廷禄，为具牒呈报事，称本年闰七月初四，蒙道牌等因奉此依依斋公文，投递本国王，令遣朝官已擒伪逆，献纳关上，与差官领行解献，合备缘由具牒等情，各到镇道，即行南宁府同提督中军游击佟天年点押，伪光泽王、伪阁部郭之奇、伪总兵杨祥、李联芳、张仕朝等，赴公衙门。本镇道会同并南宁府署印、同知薛尔宾、推官李廷樂、宣化知县王原朗、署思南副将事李明、游击杨国荣会审。"(《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又《光泽王朱俨铁等事关题诘残件》："计问伪光泽王朱俨铁，妻室萧氏，家人四名周凤、陈祥、吉兆、进贵，丫头四口宋氏、纪氏、曹氏、方氏，以上共拾名口；伪阁部郭之奇，妻室张氏，病在广东，男壹名郭天禧，家人一名郭有义，以上共四名口；伪总兵杨祥，妻室刘氏，又刘氏、王氏、李氏、吴氏、伍妹、四妹、三大，家人八名杨进宾、陈二、李四、张铙、仁素、陈奇凤、周瑞、白生；伪水师李联芳，妻室黄氏，妾吴氏，男叁名李杜祐、李兆生、李亚凌，孙媳孀妇梁氏，家人壹名李亚三，丫头二口大妹、细妹，以上共拾名口；伪水师张仕朝，妻室叶氏病故，妾姚氏、黄氏，男二名张大苟、张细苟，家人二名五子、陈亚养，以上共捌名。通共男妇肆拾玖名口。郭之奇伪视师银方印壹颗，伪诰轴表壳拾壹道，伪诰轴黄绫贰件，黄绢伪敕谕贰道，黄纸伪敕谕捌道，伪敕封伏波将军黄敕贰道；杨祥伪敕谕壹道，伪令旨肆道，伪兵部勘合贰张，广南府粮册壹本，解银批壹张，广南土知府农鹏

启本壹个，袁洪年手书壹扣，王三才红单壹个，抄白伪敕将军王才敕壹道，伪铜印壹颗，木雕伪将军正印壹颗；又伪王朱俨铁，伪阁部郭之奇，伪总兵杨祥，伪水师李联芳、张仕朝，各随诉词壹张。”（《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

按：又据《史料》载，顺治十八年九月廿七日，先生男天禧《状诉》称“父原任大学士郭之奇，因疏参孙可望，避地交南。因交彝韦永福谋杀刘监生主仆，罄卷宝物。禧父正言规责，以此生仇，乘机刻害，幸际部院差官陈端超在关招抚光泽王及杨祥等，刘监生家丁罗有得，脱身至关告知差官，书达彝官救父，送出将敕印诰命等物，开单察缴……讵料诸差欲以为功，听思明土官黄戴炫贿嘱，曲禀左江道插入杨祥等一案”云云。此当日先生被交夷误执经过，可补家乘及诸书之缺。

八月初七日，出南关，十四日至太平，廿一日至邕江（南宁）。

九月七日，过乌蛮滩，谒伏波祠。十三日，泊藤县。十五日，抵苍梧。念二日，抵端水。以上沿途均有诗。既抵肇庆，两广李栖凤礼待有加；先生不为少屈，手书示天祯，曰：“予负国重恩，义当死成吾志尔；事之废兴，天也。”旋咨回桂林。（《郭谱·家传》）

十月十五日，上马滩至昭平。二十三日至阳朔。（有《西奥石峰篇》）

十一月一日，冬至，午移桂城，寄城隍庙，有诗云：“年年日至为谁至，忽忽时来愁又来，惜寸惜分凭一线，观微劝动倚诸灰；未知人事长和短，且任天心去复回，满目寒烟空际揽，暮光谁许数峰开。”（《内文集》）

九日，诸当事集庙中询避地始末，诗以代供云：“明室孤臣抱苦忠，十年逋播此微躬，苞桑无地堪休否，歌麦何人许共同。《稽古》漫留《洪范》在（避地著《稽古篇》百卷），生今那得辱冠终，便教扶亡我安适，谁念西山薇尽空。”（《内文集》）一日，诸当事集庙中，询入交始末，曰：“汝何愿？”先生应之曰：“余何愿哉？余登籍三十四年，身为大臣，尺寸未立，生有余愧，死有余责，流放诛殛，引头以俟，早一日则一日之赐也，余何愿哉？”或呼伪相国。先生曰：“明有天下几三百年，二祖十五宗之勋业，焯焯照天地间，何谓伪？诸人咸食旧德，一旦臣事新朝，遽以伪相加，可乎？天下后世，其谓之何？”（《郭谱·家传》）

十一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兵人缅境。（《阳秋》）

是月三桂兵至旧晚坡。初三日缅首叛，执帝献于军前。（《阳秋》下）

除夕，先生羁馆，读《老》《庄》，赋诗十首。

十六年壬寅（清康熙元年，1662）　先生五十六岁。

正月十三日，吴三桂以帝还滇都。（《阳秋》）

按：《小腆纪年》作三月丙戌事。

春，在羁。定《道德经》为六十四章，系诗八首，序云："晋王弼注《道德经》八十一章，段落纷驳，予窃取义卦，定为八八，以《易》配玄，由玄参《易》，道非常道，名非常名，观有观无，知终知至，众妙见于今古，四德行于乾坤。岂惟函谷五千，牛背生人间之紫气；将使庖牺一画，龙德归君子之粹精云尔。"又檃括《南华经》，述内篇六言七章，读外篇四言十五章，杂篇述五言十一章。

清明，赋《悼亡》二首，序云："予自己丑秋鳄江解缆，遭时多故，未能合严殡于慈丘，四尺有待，雨泪终垂。由是泛泛东西。壬辰秋，五节没于珠滇；乙未秋，内子丧于石井，并一子弗育；己亥秋，豳儿没于文渊；庚子冬，辰女殇于禄平。诸榇分置一方，各未归浅土，虽魂气无不至而山川绝阻，死而有知，不知其聚怨何所也。今予羁系此地，自冬徂春，雨露既濡，凄凄默默。能不默默然四望而魂销乎？退之有云：'致尔无辜皆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予之明发有怀，固百身莫赎，而今前后妻妾四，大小儿女五，飘陨若此，其惭痛为何如乎'"诗云："死别生羁倍黯然，桂江榕浦共朝烟，松楸在目三千里，戈戟藏身十四年。故国方诛驼马料，荒茔孰挂鬼神钱？眼看数日残春了，五月书邮竟绝传。"其一云："晦晦明明此日天，生生死死孰相怜？余身久作青编汗，诸髑谁分白打钱？绝壤魂迷风雨外，故丘目断水云边，肠回九曲千轮转，泪浥三春万点连。"

夏，读《易》，为《矫志》、《励志》诗各二首。

四月十五日，吴三桂弑帝于云南。（《小腆纪年》二十）

先生闻永历帝在滇被害，作《滇云叹》三首吊之，其辞甚哀，诗云："日落风飘万里云，天阴雨坠百城氛，金戈铁马威灵怒，白骨青燐怨恨纷，野哭安知九夏鬼，战场谁吊古今文，泛泛幕幕伤魂处，姓灭名销那可论？"（三首录其一）

八月十九日，先生被害。

帝入缅甸，光泽王俨铁、总兵杨祥亦亡入其地，交人惧祸及，并执送广西，两司以下官多先生门下士，委曲谕降，不屈，饮酒赋诗而已。祥，蜀人，不识字而以忠义自许，同日遇害，望西叩头谢恩，危坐就刑，神色不变，观者无不流涕焉。（《小腆纪年》二十）

自被执至授命，计羁居三百七十五日，日惟赋诗见志。诗二百七十五首，其眷君、忾国、忧世、伤民，每寄托于山川云物间。（《郭谱·家传》）

按：黎士弘撰小传云："先生就义之日，慷慨从容，面无改色；康熙元年八月十九日也，莆田薛生英舒亲见之。"李世熊《寒支集》亦云，与《郭谱·家传》合。

子天禔与莆田门人薛英舒扶柩归。（冯奉初撰《传》、《郭谱·家传》、《郭谱·墓志》）

考异

《行在阳秋》（《明季稗史》本）：作之琦。又误以《十载》、《艰虞》二律为绝命诗。又误以清师陷潮州时，谓大学士郭之奇、礼科给事中郭朝荐相传殉节。

《永历实录》：卷二十有《郭之奇传》。一误以先生为东莞人，又误以先生曾为河南□□知县，又误以先生降清。

黎士弘撰《小传》：文载《宛在堂诗集》卷首。士弘，长汀人。先生按试长汀所取士。此传详先生在闽时事，又谓莆田薛英舒亲见先生就义，足正他书之误，惟谓先生出入两粤滇黔，则非。

傅以礼《残明宰辅年表》：永历三年郭之奇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二月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在杨畏知前。

五年，之奇二月遁入交趾，后为交人执送军前，不屈死。

按：《郭谱·家传》：永历三年八月，之奇始赴行在，拜礼部右侍郎，表误。拜东阁系五年二月事。又五年二月泛海之啼鸡，其后仍督师雷、廉。谓遁入交趾，亦非。

《恤谥考》：郭之奇，文渊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揭阳人，明亡，跋涉闽、粤、滇、黔，来数万里。后闻孙可望杀严起恒，团聚乡勇，守乐民所，为陈奇策等声援。后被执，至广西省城，不屈死。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列传》十八：有《郭之奇传》，记晚年播迁雷、廉、交趾事极详确。温氏《明季忠逸传》全录其文。

按：各家为忠节立传者，惟此文为最可从，似睿临曾见过《宛在堂诗集》。

李世熊《郭宫詹传略》：文见《寒支二集》卷四。

原载《新亚学报》，第十六卷上，香港，1991—1993

ISBN 978-7-300-10904-6/K·365

